一纸苍凉

杜高档案

原始文本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第二工程局第七工程段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
原始文本

◎李辉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纸苍凉

杜高档案原始文本

尘封了几十年的历史档案
唤醒人们反思一段沉重的过去
档案像一本发黄的相册
展现了贯穿事件的历史原貌







ISBN 7-5059-4512-2 / I.3516
定价：22.80元

一　纸　苍　凉

《杜高档案》原始文本

李辉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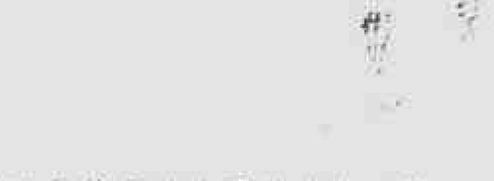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李辉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
ISBN 7-5059-4512-2
Ⅰ.一… Ⅱ.李…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694 号

书　　名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
作　　者	李　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56 千字
印　　张	12.75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512-2/I·3516
定　　价	22.80 元



1933 年，孩提时的杜高和母亲、哥哥。





1950 年徐悲鸿为爱徒蔡亮画像。



1954 年摄于长沙。



1950 年时的杜高。



1952年杜高在北海公园



1954年新凤霞送给杜高的一张剧照



1955年汪明写完剧本《第一次功勋》后送给杜高的一张照片。



1956年时的杜高。



（左起）：罗坚、田生、杜高、蔡亮、汪明摄于*1954*年春。时隔不久，他们就将卷入运动的漩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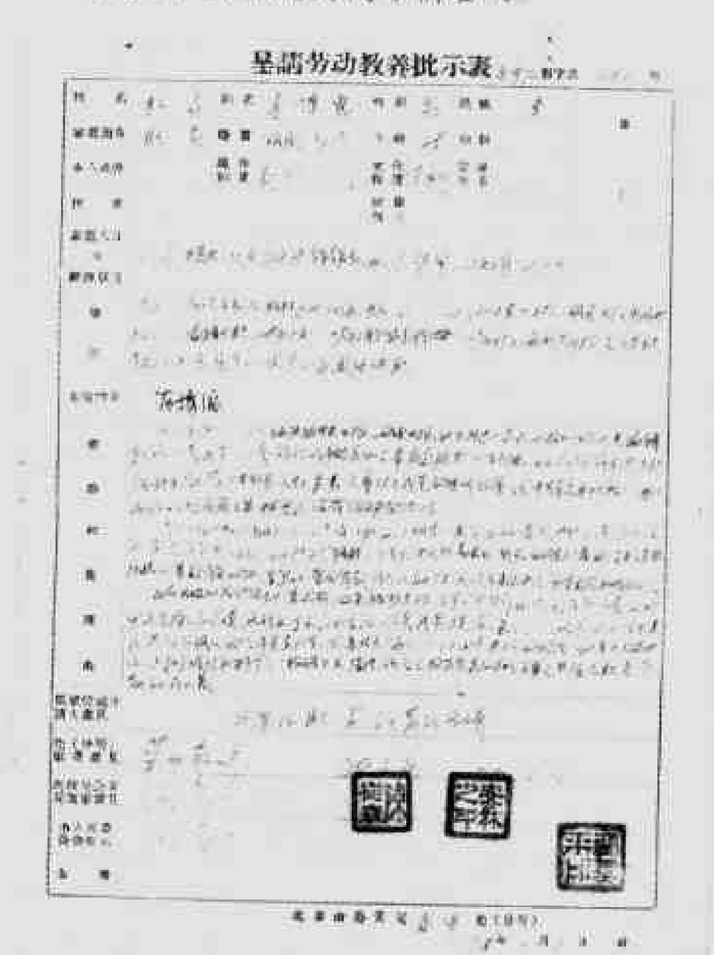
身处苦难中的杜高

*1955*年*9*月*9*日，中国剧协印发的《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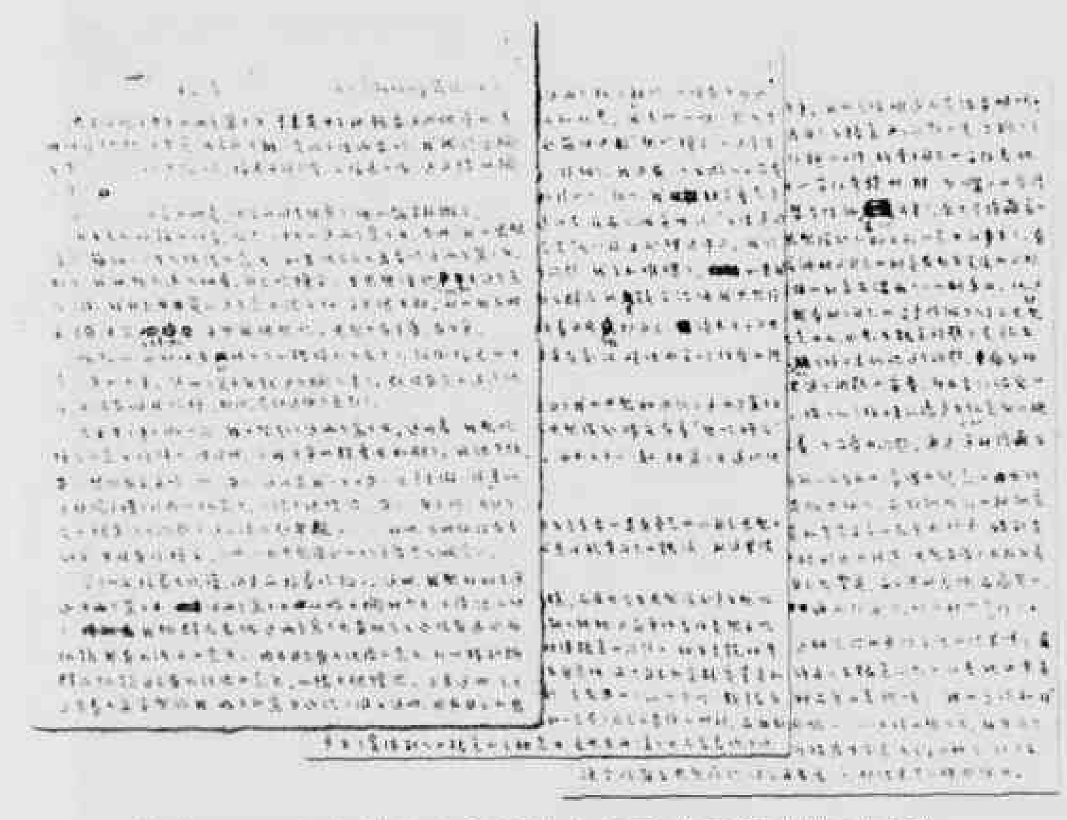
1955年7月31日杜高所写关于“小家族”的情况交代原稿首页

杜高档案中搜集的杜高致汪明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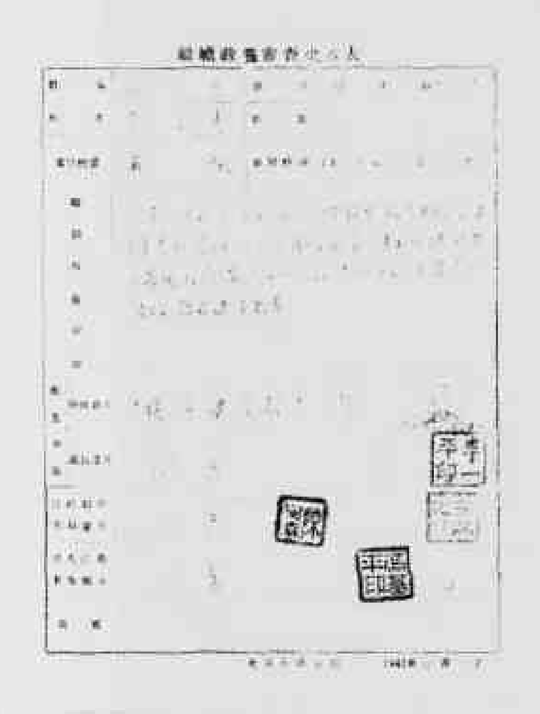


呈請劳动教养批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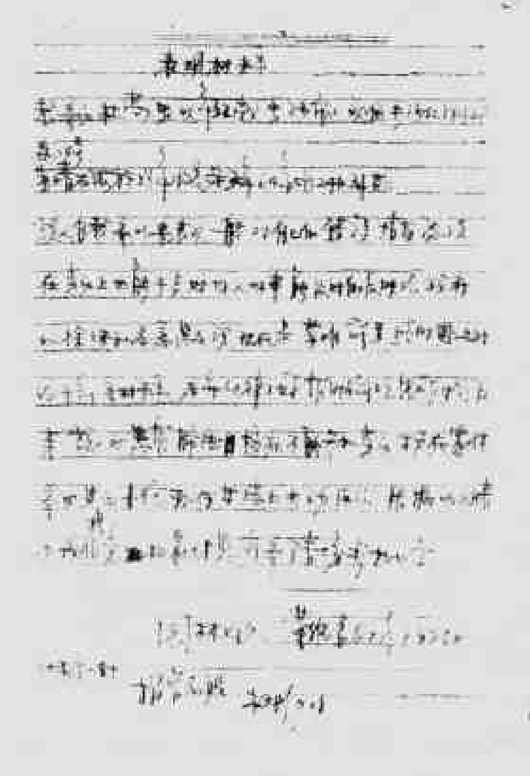
1958年4月关于杜高的《呈请劳动教养审查批示表》



杜高 1960 年在劳教时所写的关于两个窝窝头的《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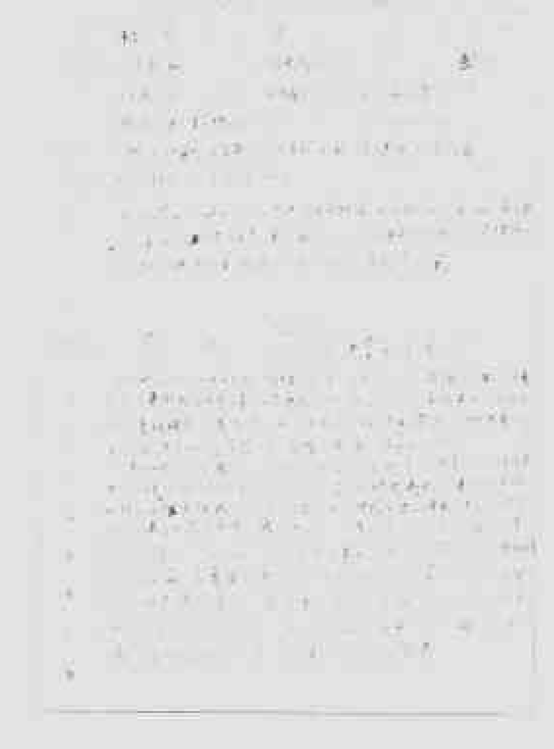


1961 年 4 月 15 日，关于杜高的《继续教养审查批示表》。



1962 年 7 月 26 日，关于杜高的《表现材料》。

1962 年杜高母亲陈璧登给部队申请儿子保外就医的信。



1965 年 10 月团河农场向上级递交的解除杜高劳动教养的申请报告。



70 年代的杜高。



1977 年 3 月杜高在上海



1979年春在青年艺术剧院建院30周年欢庆会上与老友重逢。前排左起：杜高、朱琳、刁光覃、苇岭。后排左起：路曦、白珊、张逸生。



1979年春重回北京，庆祝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院30周年。左起：苇岭、王正、杜高、吴祖光、王少燕。



1982年杜高与蔡亮在北京重逢。



90 年代，杜高与吴祖光（右）、丁聪（中）在一起。



当年难友劫后重逢。右起：杜高、从维熙、张永泽、韩大钧、杨路等。



杜高夫妇和胡风夫人梅志（*1997* 年）。



1999 年杜高和邵燕祥（中）、郭源在一起。他们均在 *1957* 年遭遇厄运。

编辑说明

出版一部已经尘封了几十年的历史档案，因为发黄的纸页可以引导人们反思一段沉重的过去，让我们清醒地面对未来。

在整理、编辑这些档案的时候，于字里行间能感到那些被审查者流露出的无奈、尴尬、彷徨和最终"真诚地忏悔"。在审查和监督者们的报告中，读者也能感到一种时代的印痕——思想感情的"真挚"和表现在档案材料中的形式主义作风的机械传承。我们对待这些历史的文档，没有去纠正那些文字的错误，也没有修改那些查无出处却表达着强烈情感的词语；没有去统一那些交代材料中前后不一的人名，更没有去统一时间记述上的不规范。因为这些文字的"问题"，体现着贯穿事件的历史原貌。

目　录

第三编 劳动教养时期(1958年－1969年)

附录一:

附录二:

序
留在纸上的苍凉
——整理《杜高档案》随感

李　辉

一

得到《杜高档案》,完全是意外收获。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震撼。

苍凉是挥之难去的感觉。

几年前,从北京潘家园旧书摊那里我淘到一大批历史资料,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 50、60 年代的档案材料。它们如何流散出来,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得到它们时,我正在写黄苗子郁风传和一篇关于"二流堂"始末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正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到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 1964 年的文艺整风等。这

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却是杜高的档案。

此前我与杜高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缘。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杜高与他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与他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和文化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

二

"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我是突然之间写出这个词的。

这些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地在各类文章中出现,尤其在回忆类的作品中,它已经成为几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汇,因为,恐怕没有一个人曾经远离过它,与它毫无关联。不可能。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录、研究著作,多年来时有所见,并且出现过一些颇有见地和分量的个案研究专著,但把历次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来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当21世纪已经来临、20世纪已经被视为过去的今天,人们有理由企盼这样的专著问世。

毫无疑问,在历史审视的过程中,最能引起反响的当然是围绕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而进行的工作。另外,多年的风气和习惯,大发宏论颇为盛行,因为它常常能于振聋发聩之间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仅仅限于笼统概括地发发议论,而缺少对历史档案的挖掘,缺乏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分析,这些议论很可能只是匆匆过客,过眼烟云,并不能把历史研究真正坚持下去,使其更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从而也就更具有科学性,更接近历史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它们建立在当年的史料和个人笔记基础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越来越看重个人日记、信件等民间记录在解读历史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它们比较起来,像杜高这种经历的人的个人档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把历史的令人颤栗的真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不带一般叙事作品的个人主观色彩,更无虚构成分和编造成

分。从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许多在回忆录中、在史书中读不到的历史细节。

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过程中，我曾听说当时胡风案发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反胡风运动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从《杜高档案》的"1955 年肃反部分"中，我才亲眼看到由田庄所在部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田庄专案组送交的田庄交代材料上，送交者署名为"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接受者则为"剧协五人小组"。另外一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给文化部艺术局的信》，由"艺术局五人小组"批转剧协。除此之外，《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使我得知，当年不仅仅只是成立所谓"五人小组"，还有专门的领导反胡风集团的机构。这份材料是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送交中央有关部门的刘复之，然后由刘复之转发中国剧协，因此，材料上落款为："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所盖图章则有两枚，一为"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一为"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从图章中可得知，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除"五人小组"外，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十人小组"，其成员构成待查。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其实未必准确。更何况中国之大，历次政治运动涉及面之广，远非轻而易举之间就可以把史实梳理得清清楚楚。研究者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认真、艰苦的努力，才能略有收获。从这一角度来说，杜高档案之类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

杜高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在我看来，具

有非凡的勇气，他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钦佩。他知道，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之中，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而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生命的某种展示。

检讨、交代与相互揭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个当事人必不可少的任务。建国初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参与者大多还是侧重于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贬低。许许多多从国民党时代走进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谁都需要过好这一关。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最初的关口面前徘徊过，迟疑过，但最终也都宣布愿意抛弃"旧我"，告别过去，创造一个"新我"。读50年代初的报刊，举目可见都是类似的标题和文章，这毫不奇怪。

和后来政治运动中受难者的检讨、交代相比，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恐怕还算得上和风细雨，更多的是自述性质的自我批评。80年代中期，我在撰写萧乾传的过程中，曾在他那里读过他写于当年的自述，基本上是细细回忆成年之后历年的活动情况，偶尔添加几句自我贬斥的话，其语气和程度尚属平淡，远没有达到后来往自己身上猛倒污水、自我蹂躏的地步。即便如此，今天看来，这样的自述仍可以视为"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文尔雅和和风细雨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政治运动中严厉无情的批判。到了此时，检讨与交代密不可分，而交代的内容也无限地扩展，从思想认识到历史问题，从大的政治态度到私生活的细枝末节，说得越详尽越好，自我贬斥得越厉害越好。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当事者被自己的错误与罪行压得喘不过气，让当事者把自己贬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样，主事者的英明与正确便不言自明了。情形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所谓的与人为善、对历史和对个人负责的说法，早已成为无稽之谈，个人的尊严、信念乃至命运，就在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高压之下扭曲变形。批判与改造，便这样在庄严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这几年，已经读到过不少个人检讨的汇集本，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我也曾受黄宗英女士的委托，整理过赵丹"文革"期间在狱中的交代。这些史料，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暗角中的文本特色，生动地表现出来。虽然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文字背后那种精神被蹂躏、灵魂被鞭挞的痛楚，却是相似的。当我检读"杜高档案"时，不仅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的情感不断受到更猛烈的冲击。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生命是如何白白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与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烤？也许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是个别例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则均未能摆脱不得不自我折磨检举揭发的窘状。如果说有所不同，那无非是程度上的差别，或者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在这方面，舒芜之所以不能被原谅，乃是因为他是在并没有遭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仅仅以

思想选择的理由，就放弃了传统的交友之道，主动反戈一击，把挚友路翎以及胡风等，晾到了炙热无情的阳光下。无论后来事态的发展是否在他的预料之中，都不能改变他主动出击这一事实。而主动与被动，在我看来，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格检验的关键所在。

杜高与他的朋友们，处在与舒芜当年完全不同的境地。他们已经被视为敌人，已经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度日如年。他们必须不停地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做敌人来鞭挞。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这种被强迫写检举揭发的苦痛的。他们不得不把朋友的问题详尽写出，甚至专案组更希望能够扣上屎盆子、尿盆子，这正是运动所需要的。杜高等人的命运不正是靠这样一些材料来决定的吗？杜高是在几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这些相互检举揭发的材料，感慨万分自可想象。那么好的朋友，那么熟悉的人，都在无奈地写出揭发。真实的或者片面的甚至虚构出来的故事，如今都在故纸堆里尴尬地望着杜高，而杜高眼前浮现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他理解他们，就像他们也理解他一样。在那样的情势下，谁又能有比这更好的做法呢？他们毕竟生活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毕竟摆脱不了时代加给每个人的局限，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如此这般留下这样的文字。

在尴尬的历史中，又有几人不是尴尬的？这就是人性的扭曲。

杜高愿意公开他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就像公开自己的交代一样。他深信，无论健在的还是早已故去的朋友，都会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往事已经过去，教训却应该留给未来。这教训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也包括每个当事人曾经有过的尴尬表现。

现实正是如此。慷慨激昂臧否他人，愤愤然发表议论，要比深刻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容易得多。我猜想，在如何处置检举揭发材料的问题上，杜高恐怕会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无比痛苦之中又一次煎熬自己。最终他决定把自己和朋友的尴尬毫无掩饰地公布于众，让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

交还给历史。我看到了一个智者的襟怀。

四

《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右派与刑事犯关押一起进行劳改时,思想汇报和年终鉴定又如何写,如何作出的;当年复一年需要填写表格时,不同处境下表格有何区别、决定命运的最后评语又是如何填写的……

我深知,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无法对档案涉及的诸多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我所愿意做的,无非是将它们整理出来,争取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让更多的人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进行解读和思考,对其中所呈现的文本予以归纳和划分,这样,便有可能为当代文化史、当代政治运动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多提供一个参照物。如此而已。

终于写完了想说的话,历时两年的整理工作也终于全部结束。整理过程中,20 世纪一天天走过,渐渐变为过去,新的世纪也在人们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呼唤中渐渐走近。一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然而,我又想,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刻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来

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依我看，对新世纪最好的献礼，莫过于对历史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回望往事找回历史细节的行列。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

现在，新世纪终于来临了，我的看法依旧，还是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向前走去。这也是我为何一年来，在工作和写作的同时，仍然看重与杜高夫妇的合作，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世纪交替之时予以完成。

最后，我得再次感谢杜高夫人李欲晓女士为整理这批档案所付出的劳动。她是带着探究历史的眼光和对历史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我一道阅读、整理，从那一张张破损的纸页上，细心辨认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的，没有她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这一捆史料也许永远会被束之高阁，默默地躺在纸箱里继续发黄，发霉，腐烂，直到完全无从辨识的那一天。

写于2000年11月29日～12月1日

定稿于2003年4月1日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李辉　杜高

一、概况部分

李辉：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档案时，有什么样的感受？恐怕不仅仅是吃惊，也不限于个人的痛感，是吗？

杜高：的确如你说的这样。当我面对着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既惊讶又沉痛，感情是复杂的。这本档案是50年代到70年代我个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的“敌人”、“罪人”。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1955年5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中收集和制造的各种材料，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起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里的全部材料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十一年六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在二十多年中，它对我的心灵的压迫是沉重的，它使我的生命窒息。

当1979年春天宣布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为“不实之词”而得到“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的历史终结。随着它的死亡，

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李辉：假如撇开个人因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该如何看待它们呢？

杜高：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早在十八年前就应该化为灰烬的历史档案，不但还完整地留在人间，而且在十八年后被当做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终于被你这位具有敏锐文化眼光的青年研究家发现和购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甚至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历史意志在有意地安排着这个奇迹似的。李辉先生，当你得到了这批档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楼适夷的信》在 1998 年 6 月 17 日《新民晚报》发表以后，不仅使我感到震惊，而且使文艺界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们当做奇闻传布开来。后来我又读到你写的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这批档案中的一些材料为你描叙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我每读到你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时都不免引起万端感慨，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先后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分是非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当时的意愿而反过来证明运动本身的荒谬和违反人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李辉先生，你这一代人理应成为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主人。它将使你们从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到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也将使你们从一个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同你们一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阅读这份档案。

李辉：这批档案截止到 1969 年你被释放回家。在深入讨论这些档案之前，我想先请你谈谈你释放之后的经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加深对档案的认识。

杜高：1969 年国庆节，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原地就业。一个月后，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命令”，11 月 4

日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把我们紧急遣送回原籍。这以后的十年，我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也随着我转到了我家乡的派出所。

记得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由北京市公检法的一名干部押送到长沙时，站台上已站着十多个戴着红袖章的荷枪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立刻领悟到，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我们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背着一个小被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的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作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我就这样结束了整整十一年六个月的囚禁生活，总算恢复了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

我到家的时刻，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妈”，我听见妈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十一年前的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天天盼着这一刻，认为我早就应该回家了！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我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督并不严厉。当时我正患着肺病，时常咯血，但又不敢让人们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干，不能维持生活。由于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防空洞，派我到郊外挑沙子，派我到街道翻砂厂去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快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工了。

不久后，我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恐惧万分。

1970年新年前后，我的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后，要我到他那里小住恢复身体，我就到了南京。一天早晨，我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

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中我看到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是曾同我在一起劳教的右派。1962 年 5 月，当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饿年月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时，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同时编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涂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 1948 年考进燕京大学英语系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西藏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 1963 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

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 9 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 20 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 1960 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 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有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

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李辉：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高：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辉：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高：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柏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辉：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高：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梓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销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

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年老后享受劳保。

二、肃反部分

李辉：80年代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时候，了解到你与路翎关系接近。那么，你和汪明等人作为小集团揪出来，是在1955年5月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还是在全面开始肃反之后？

杜高：对我和汪明的思想批判是和对路翎的批判同时开始的，而“小家族”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则是在肃反运动全面开始之后。

我想先从剧本创作室的情况讲起。

1951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1952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二十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年纪最轻的一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

戏剧工作,1939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唱,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

李辉:你和路翎接近,贺敬之也受到过"七月派"影响,与胡风有过交往。我曾访问贺敬之,请他谈过与胡风、周扬的关系。他谈到1955年曾因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那么,在发生变故之前,胡风与你们创作室这批年轻人有过什么交往?

杜高: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胡风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喜欢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可以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力的。

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成一种"邪教",胡风派也被当做左翼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危险的派别。

1954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

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个大批判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想着自己如何脱胎换骨了。

李辉：路翎当时的情况如何？

杜高：1954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的批评也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做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深夜他常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酒。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出声来：“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每当这时候，我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1954年12月8日的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去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的会议上，胡风作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李辉：能否把12月8日那次会议的现场情况回忆得详细一些。本来前几天还是由胡风、路翎慷慨陈词，但这一天突然间从批判《文艺报》转为批判胡风，颇让人惊讶。局势急转直下，我很想知道当事人的反应。

杜高：我没有想到，在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我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

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49年上海的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弢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完晚饭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19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在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是秉承了中央的意图，绝非袁水拍个人之作，是针对他这位主编的。他一直闭着眼坐在那里，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当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他都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便顺手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这两位前辈倒茶，没想到雪峰先生竟客气地站起来向我致谢，使我大受感动。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即楼适夷致汪明的信中提到的那件事）提出意见。会议的中心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的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从这天以

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代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监送着走出文化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绺白发。那年他 32 岁。

李辉：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那个报告之后，你们创作室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高：从 1955 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张，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几次发言，大家都认为认识肤浅，不能通过。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大肆鼓吹的现实主义，就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了界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 6 月号发表。

不料，在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发生突变。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纸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李辉：人们谈到当年的反胡风运动，时常会谈到吕荧在批判大

会上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举动。你当时在现场吗?

杜高:我在现场。那是1955年5月25日,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要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坐在第一排的大理论家张光年把他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

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李辉：在这之后你的处境怎样？你的档案是从这时开始的。

杜高：从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通知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一间约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位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还有另一种政治品德和道德风貌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的心情向你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同志。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了政治信仰的纯洁和精神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知道田兵同志为了我而遭受打击的详细情况的。

当我作为暗藏的特务分子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做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严厉驳斥，人们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作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着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1979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十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1998年10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1942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1940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执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辉：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高：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

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49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做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还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辉：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

杜高：我被隔离了一年四个月。运动后期，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了，专案组也不来管我了，我就在小屋里自学俄语，阅读俄文报刊。一直到1956年10月我才看到了肃反结论，恢复了人身自由。汪明、田庄、陶冶都先我恢复了工作。

李辉：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分有多少？

杜高：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1955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我反复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

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就这样连续几天的审讯，我疲困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想躺下休息，就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说 1947 年我到《湖南日报》去工作时，办公室有一个女人要我填了一张表，算我参加国民党了。档案材料里留下了这次审讯的记载。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可看出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可我绝对没想到，这个交代后来成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而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此没有了下文。

平心而论，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这时的审查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动武，但是它给人们心理的压力却难以承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没有问话，时间标明"夜 12 点"。这种审讯方式在田庄专案组的一份报告里也得到验证。这份报告说，经过"连续作战"，田庄终于交代了什么什么。所谓"连续作战"，就是审讯者不让你休息，不让你辩白，不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就不罢休。审讯者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逼供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顽强作战精神，为了说明审查对象的"顽固不化"，无意中把这种审讯方式也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所以，今天再看这些各自的交代，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李辉：我注意到关于"小家族"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到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它们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杜高：因为"小家族"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反动纲领，无论是别人揭发我，还是我揭发别人，一些政治性言论基本上还是属实的，只不过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歪曲了正确的认识，把真理诬为谬误，把活泼的思想看成反动。而那些下流言论的交代，不实或夸张的居多。政治上搞不垮，就要在生活上把你搞臭，道德败坏是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档案材料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审讯者一再追问我是否和女同志发生过性关系，真是对人的侮辱。而我的朋友们，实在交代不出政治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当做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在吴祖光家里看世界

名画集被说成看"春宫图",把《十日谈》里一些表现男女关系的语言也当做了我们的"痞话"。

当时我们是一群自命清高的文艺青年,我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情,在生活上是严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家族"的成员都是作风正派的。蔡亮和张自疑、田庄和陈敏凡等夫妇始终甘苦与共,忠贞不渝。我直到平反后年已五十才结婚,而汪明一生未近女色,孤身一人惨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李辉:*在《杜高同志的历史》这份档案中,你提供了不少历史证明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担任要职。但我注意到,这批档案中并没有他们的证明材料,这是为什么?*

杜高:这也是我很奇怪的问题。解放前我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自从10岁在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辗转流徙,但与不少地下党员以及著名的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审查我时,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是存留下的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这样的材料。这至少说明,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弃之不用。

李辉:*也就是说外调材料也是有选择的。*

杜高:我的父亲李仲融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输送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1938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1939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

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导演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在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讲戏剧的道理，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我的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10 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做一个作家。

1944 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了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都未能成功。如 1947 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1948 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都因种种变故未能成功。

我的母亲听说我被审查之后，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都寄到北京，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思想倾向。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了。

李辉：*原来你的习作剪贴本是你母亲主动上交组织的。在这批档案中我只发现了一本。*

杜高：李辉先生，在你寻找到的这批档案中，竟然还幸存了一本 1946 年我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这使我惊喜万分。真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纪念品送还给我。

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冬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 年 1 月 1 日"，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M. 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做一颗小小的火苗。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戏剧介绍，一个 16 岁的少年俨然以成人的口吻发表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

诚和激情。我今年已经70岁，重读一个少年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回首在新中国度过的半世纪风雨岁月，真有难以表述的感慨。

李辉：你怎样看1946年你所写的《沉默的祈祷》？专案组似乎对它很重视。

杜高：不知是专案组的粗心大意还是有意为之，这个题目错了，我没有写过叫《沉默的祈祷》这样一篇文章。

1946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做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必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沉默了。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的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肃反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我相信他会如实地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30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去世。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1938年4月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李辉：你的斗争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多大规模？

杜高：肃反运动中我的斗争会是在剧协机关开的，参加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同班同学，电影局出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二百多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由专案组范景宇带进会场，笔直地站着，回答愤怒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个质问："胡风是怎样指使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你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斗争会开过两次。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的副秘书长李超，他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斗争会结束前他用粗壮的嗓音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最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 1944 年西南剧展期间，他那时 20 多岁，我 14 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他们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他们加演田汉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久后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常和四队的舒模（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了不少宣传文字。1948 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四队演出做准备工作。1948 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也经过"文革"后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1964 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化装舞会，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便成为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辉:我收集到一些围绕那次批示而开展的文艺整风的材料,其中有对田汉的批判会记录,李超的多次长篇检讨以及对他的批判会记录。看看你的档案,再看看他的材料,我想文艺界那种循环反复的批判的确令人感慨良多,甚至有些不寒而栗。我希望能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

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高: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个材料上的批示吧?他的批示不只是"比较严厉",而是要置我于死地。

徐光霄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肃反运动。我的专案组所做的一切,都是贯彻他的指示,实现他的意图。从这个材料和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决心在肃反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幸亏他的批示不知道被哪一个上级给否定了。但这个批示证明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徐光霄40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他当时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文化部有三位副部长主持过与我有关的案件。除徐光霄以外,还有陈克寒和刘芝明。陈克寒是最早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我的一位领导人,那个分量是很重的。刘芝明是最后发表数万字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来结束对我们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领导人。

但是这三位副部长都没有想到,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赎罪。徐光霄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陈克寒被逼跳楼致残;刘芝明被造反派当做"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而遭受毒打,惨死于狱

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工作不久，徐光霄、陈克寒相继病逝。据罗坚告诉我，80年代初，他见到过徐光霄一次，徐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表示了歉意。

李辉：肃反运动结束时，你们结案没有？

杜高：前面说到的徐光霄批示的材料，后来没有成为肃反运动的结论。到1956年末，"小家族"一案才作结论，大意是它同胡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群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受胡风思想影响，有言论上的错误等等。因此分别给予行政性的处分：我被降了二级，汪明、田庄、陶冶也降了级，罗坚调去贵州，蔡亮到了西安。

肃反总算结束，但更大的风暴反右运动又来了。

三、反右部分

李辉：到了反右，你和所谓"小集团"问题又成为靶子。在《其他》这份材料里，有一处写道：你在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认为中国的肃反搞得如此糟，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你认为肃反和反右之间，到底有哪些关联？

杜高：1956年的春节以后，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我仍被隔离在49号院的小房子里，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种种罪行，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个报告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震动了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的中国。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本刊物上，我不断读到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揭露和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的批判。我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章，苏联的批判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时，又发生了美国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出共产党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事件，都在我的心里引起震撼。我记得周扬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

露了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他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这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运用。

我还记得，1955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定的，对斯大林进行了保护。但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偏差，我的朋友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共青团员小李也不再跟随着我了。9月中旬，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了肃反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了这个运动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被立案审查，而真正是反革命分子的只有八万一千多人。他承认运动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不久后，我看到了肃反结论。一些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

了感动，感觉着温暖。

我觉得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是同住在49号院里的当时担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他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反党，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万多字，把我心里的话通通都讲了，也引用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说的，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这时，已是1957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担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我们三人同年生，1942年我们12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的小伙伴，那时我们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便十分热诚地要我到出版社工作，特意安排我和另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的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反右运动的大风暴中，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吴祖光在戏剧界鸣放座谈会上，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运动中不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小集团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贾克拿

出了我交给他的那份报告，作为我攻击肃反和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证。只此一条，我也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贾克这时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使我难忘的是，当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时，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小家族"的大会，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把这个批斗会从头至尾拍摄下来，准备在全国放映，以教育广大青年。斗争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北鸥先生，他异常激动地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纪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年轻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陈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958年4月18日上午，公安人员把我和剧协其他四个受到劳动教养惩处的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时，两边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惜。惟独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疾步走出来，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

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春天，我果真回来了，我见到了北鸥。这时他拄着拐杖，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风了。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里涌满了眼泪。不久后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李辉：关于"小家族"的这些材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如果有专案小组，其人员有哪些，怎样构成的？

杜高：反右运动编的这一本"小家族"的材料就是根据肃反中的交代材料整理出来供大批判用的。发给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以备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和写批判稿。当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但主要的几篇还是专案小组成员写的。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的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的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

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这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讨论分别重点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右派集团“小家族”的。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根据这本材料写了批判文章。如张光年在首都剧场批判大会上对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喊：“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1993 年翰老逝世后，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 1957 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惟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

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和这种批判的虚伪。

李辉：你的“小家族”一个重要“罪责”是和吴祖光的关系。“小家族”是怎么和吴祖光挂在一起的？你对吴祖光怎样看？我很想知道你对吴祖光的评价。你认为，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

杜高：我认为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指他过人的聪慧、深厚的学养和飞扬的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经历过的漫长的五十年岁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幼的，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空前的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变成另一个非我的存在。而惟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他始终是他自己。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但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当严酷的现实生活逼迫着我们一个个都变得胆战心惊谨小慎微，变得世故虚伪人云亦云，一个个都变得明哲保身看风行事的时候，吴祖光依旧按照他的本性生活着，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的毫不遮掩的率真闪耀着多么美丽的

人性的光彩，又是多么地令人惊异啊。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反胡风运动本来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纯真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

出于一种善意的同情，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几句公道话。他不知道这样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哪有像吴祖光这样天真的人，自动送上门去呢？正好，这个小集团正缺一个头头，原来是想抓住胡风这个大头目的，实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现在吴祖光自己跳进网里，渔人怎不乐开了怀呢？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自己招来一场大祸。

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是，他这种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人们应当还记得，到了90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商场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哩。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待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我认为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

50年代初，我们和他交往时还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他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做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

“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做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接待。

1957年，吴祖光由于他的率真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去出席座谈会，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他有些激动地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发表时，田汉却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汉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奉命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两种因素都有？我这里不作考证。但不管怎样，田汉这一举既坑害了吴祖光，也表明了在极左政治风暴中他这样一个大艺术家自我心灵的扭曲。因为在吴祖光发言之前，田汉自己写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对戏剧工作的批评比吴祖光尖锐得多。

田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想，如果命运给他机会，他会向吴祖光道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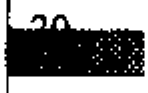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加重他的右派罪行，“小家族”

便以他为首了。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无可奈何地揪上台去，听任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你问我“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命运”，我想说，倒是我们这几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些材料连累了他。

李辉：从档案中看，在1955年路翎被捕之后你还有勇气去看望他的夫人，这令我感到钦佩。你还记得他夫人和家庭的大致情况吗？

杜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以后，早已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我的情况比他们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的宿舍里。大概是195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6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会见到我，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红门的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他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我便告辞了。虽然天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现在更值不得什么“钦佩”。这件小事之所以今天还为一些人提及，就在于它后来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惨的二十五

年，直到 80 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李辉：*你前面提到的友人肖里，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杜高：我很怀念已故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1956 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不脱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肖里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7 月号上。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教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肖里的命运很悲惨，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家庭破裂，他下放到了黑龙江。"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英年早逝的友人们，想起这一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

李辉：*你和唐湜在鸣放时写了赵寻的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他是剧协领导之一，这张大字报是否对你被打成右派产生影响？*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他们的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和敌人。他们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夜 12 点"，这些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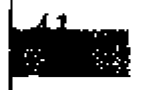
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

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1957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赵寻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当然起了主要作用。

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得到政治上的辉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他下放武汉，1959年反右倾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他被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列入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之一。他从牛棚到干校，饱尝极左政治的苦头。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评论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址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右派平反改正，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除汪明已经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以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1979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天晚上陈刚就陪我到和平里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吃饭。相隔二十二年后重见，我们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使我们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

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共事。

李辉：从7月2日你和汪明的大字报《我们要发言》来看，你们也在声讨右派分子，这是不是想通过表态来过关？当时有什么反响？

杜高：这张大字报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用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被当做我们的右派丑行编入了批判材料里，成为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一个事例。

5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突变，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批判的一个重点是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中央规定：凡是攻击肃反的，一律划为右派。

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文联大楼里帮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声讨右派的一篇篇檄文。人人争先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现在都紧张起来，而前一晌忍气吞声听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摩拳擦掌准备反击了。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张大字报。

李辉：这批档案中有不少汪明写的交代材料。今天你怎么看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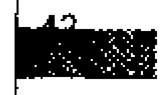
杜高：汪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也整了他，但他天真地以为什么都说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不仅把平时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甚至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整理的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多数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在批斗会上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为“小家族”翻案，为此，吴祖光夫妇和一些“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

尽管汪明的揭发交代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仍然认为汪明是一个单纯热情的人，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单纯和天真。他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并没有挽救他，他还是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大约在1966年我们在团河农场偶然相遇，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我还在教养中。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料到，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没能“回到革命队伍”，1976年他死于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

李辉：请谈谈1958年4月7日这份《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当时填写的过程，你是如何由剧协移交到公安局的？

杜高：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小家族”的全部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由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了他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算是对我们作了结论。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我预想到对我会处理得比他们重，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也会让我去劳动，但我没想到自此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1958年4月18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提、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64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教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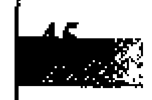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二十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40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1950年冬，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同我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在零下40℃的冰天雪地中度过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我们曾一同在敌机的照明弹下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山洞里的烛光下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轰炸中为战士们演戏。汪明从朝鲜回国后，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青年战士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情的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经排演成熟，即将在北京公演。不料此时突然爆发胡风反革命事件，由于汪明和路

翎的友谊，他被怀疑为与胡风集团有关联的人物。《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汪明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汪明一直到受了劳动教养的处置，仍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满腔热爱，他没有颓丧的表情，对前途似乎仍很有信心。他在公安局里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汪明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1976 年粉碎"四人帮"前几个月，他悲惨地死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他没有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堆泥土。1979 年我平反后，诗人公刘从安徽写信告诉我汪明已离世的消息，他说，汪明死后只留下了一个日记本。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1957 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1958 年底我被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1961 年到茶淀清河农场，1962 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 1969 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1979 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1979 年 1 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

"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四、劳教部分

李辉：我注意到，1960年关于你的材料中，你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然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譬如，别人揭发你在大跃进中不让别人多干活等。这是与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当时对大跃进有所看法？

杜高：1958年4月把我送交公安局劳动教养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把我整得"心疲力竭"，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哪怕流放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也会比在这里轻松些。我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未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折磨一个人和改变一个人，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着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敏锐地感受着新事物，接受新鲜的思想，并且喜欢毫无顾忌地对现实发表议论，不但自信，还有那种只有青年人才有的自负和自傲。因此我的性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个压抑个性、要求绝对统一的极左政治环境产生深刻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从逐年积累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和冲突也就贯穿了我的整个劳动教养的过程，直到岁月无情地给我添上白发，直到我的个性彻底泯灭。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适应那个劳改环境，还顽强地保持着我的性格的某些特征，我仍然克制不住地要表达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看法，比如材料里记载着我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就完全不是由于我当时就对大跃进的荒唐有什么认识，只不过是我忍不住要把自身感受到的"不许睡觉"的苦恼宣泄出来，和对人们打着盹儿强撑着以表示自己干劲冲天的奇怪现象说两句怀疑的真话而已。当时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报纸上说的形势大好，至于大炼钢铁、高产卫星田、公共食堂等对农村生产力的破

坏以及造成的严重恶果，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从各种回忆录中陆续得知的。

李辉：关于两个窝窝头专门开批判会，你也很认真地写检查，这也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对这件事你有什么可以补充说明的？

杜高：今天重看两个窝窝头事件我写的那篇检查和人们对我的批判，不禁要发出苦涩的笑来。

1960年底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那一天轮到我去伙房打饭，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他是工厂的技术员，记不得那天他是有病还是下车间去了，午饭时没有回来吃他那两个窝头。那时饥饿已经开始向我们袭来，没人吃的两个窝头对我是个极大的诱惑，我没有立即送回伙房。第二天管教干事查问这两个窝头的下落，我就赶紧送回伙房了。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在那个年代，尽管我没吃那两个窝窝头，但是有过想吃的念头，这就是罪过。为此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还要接受小组批判，没完没了。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些批判是那样荒唐可笑，但对于当时的我，除了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狠批自己，别无出路。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挤睡在炕上的人们不知是不是在思念家人，大都翻来覆去没有人睡，在监舍昏黄的灯光下我趴在炕头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不会想到，那将是更大饥饿的一个年头。



在那个环境里，人的生理要求也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前一年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放卫星"，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地干活。那时，谁要是说想睡觉，干活时打了个瞌睡，人们就要批判你对大跃进的态度，你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1960年，粮食紧张了，定量减少了，谁要是说饿，吃不饱，想多吃一个窝窝头，那就是对待"三面红旗"和"暂时困难"的态度问题，这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两个窝窝头的那篇检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李辉：1961年4月，监管负责人的评语很严厉，一句话"再劳

教三年"，便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当时知道这个决定后的反应现在还记得吗？在1962年1月你写的《思想总结》中谈到了对决定的认识，那么，这些话中的真实性有多大？

杜高：劳动教养原先是不规定具体年限的，一般最长三年，根据各人的具体表现确定时间长短，有很大的灵活性。到了1961年4月，我已被收容教养满了三年时，政府又颁布了新规定，像劳改犯判刑期一样，给劳教人员定劳教年限。考核每个人的表现分六类(从定期半年到最长三年)进行处理。我记得这一天，刮着大风，我们蹲在劳改厂的一个空坪里，紧张地听管教干部宣读名单。我被划人"表现很坏"的一类，继续教养三年。这样，我要到1964年4月才能解除教养了。

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是继续教养一年或二年，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李辉：你在什么场合用了"沙皇的狱吏"这样的字眼？

杜高：那是在冬日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教养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这本破破烂烂扯掉了封面的书，原来他看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改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这位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他为着靠拢政府，

争取自己早日解除，不惜坑害了我。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用告密来换取自由的环境里，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30岁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李干事忽然来把我叫醒，要我收拾好衣物，我便随一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茶淀农场继续改造。

我再听到有关李干事的消息是在五六年后。我因胸膜破裂被送进团河农场二大队的职工病房休养，正值"文革"高潮，公安系统内部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激烈展开，我不时从病房的窗口看到农场干部们被揪斗的场面，真令我惊心动魄。从病友的闲谈里，我听到李干事被群众用皮带打死了的消息，据说查出解放前他在天津卫当过警察。他死得很惨。也许，他也是一个冤案。

李辉：*一个人的印象就决定了你在劳改农场再呆三年。这新增加的三年是怎样度过的？*

杜高：李干事给我追加的这三年，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得最严酷的三年。

从1961年夏天开始，整个劳改农场笼罩在一片愈来愈可怕的大饥馑的恐慌、凄惨和混乱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饥饿能摧垮人的理性把人逼疯，饥饿能剥掉人的自尊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生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颤栗。



我们的口粮减到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副食只剩下一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最初我们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靠拼命喝水来胀饱肚子。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两条腿浮肿得提不起来，寻找食物便成为我们生存的惟一追求了。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渝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才生，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谢自渝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他在苏联批判铁托的时候，认为铁托的理论有道理，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了校方注意。这个天真的学子写了一封支持铁托观点的信，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掏出信，就被人抓住送回学校。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时，

他的手提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就是三大本《资本论》。他才二十几岁，还做着罗曼蒂克的梦，准备一边用强体力劳动来磨炼意志，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矮矮墩墩的青年在劳动中还拼命创高效，挖土方的时候他还硬挺着，涨红着腮帮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抬。在饥饿的这一年，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着自己，绝不像我这样露出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但是，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瞪圆两只眼睛扑了上去，一把扭住那条蛇，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蛇头，三嚼两嚼吞进肚里。就这样，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那情景真叫人惊骇。

我虽没有他这么大的勇气和本领，但也是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寻觅食物。除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在档案里还保留了我的一些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堕落”。可是检讨归检讨，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我曾用仅有的一双新布鞋和一件毛背心和附近的农民换了两个糠窝窝头充饥。我在地里寻觅野菜，有时能拔到一些马齿苋和胡萝卜缨子，晚上躲在厕所后面监管队长看不见的墙旮旯里，用两块砖架起脸盆烧些柴草煮熟了吃。没过多久，野菜挖不到了，天气渐渐凉了，饥饿愈来愈严重。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挖到了十多头大白菜根，真是高兴极了。收工后我照旧端着脸盆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但是这一天点火的人太多，天又黑得早，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长条火龙，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我正蹲在地上烧火，忽然听到有人喊：“队长来啦！快跑！”人们急忙把火踏灭端起脸盆就跑，我也跟着跑，慌乱中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和枯叶盖住的尿坑里，我紧紧地抱住脸盆，不让煮熟的菜根泼掉。浸湿的棉裤很重，我费力地把腿从尿坑里拔出来，艰难地回到监舍，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肚子，再脱下棉裤到火炕口去烤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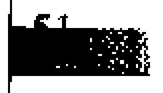
又有一天，我被派到场院去干水稻脱谷的活儿。干这个活虽然很累，但大伙儿都乐意干，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队长在场院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翻出来检查，但人们仍趁他不备抓起一把稻谷塞进棉衣兜里，然后假装大小便，躲到稻草堆后面，用鞋底搓掉谷壳，把生米塞进嘴里。吃了几次生米，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队长发现生稻谷也有人吃，把我们狠狠

地训斥了一通，不再派我们去场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白茫茫的一片冬雾，天气阴冷，我们怀里揣着一个中午吃的窝窝头到很远的大田里去拾稻穗，每人一行，从这头到那头足有一里多路，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遗落在地里的稻穗早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我捡不到几穗。但这一天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霜降，蝗虫飞不动了，一只又一只落到了我的脚前，我顺手抓住它们藏进了棉衣里。收工回来后掏出来一数，竟有二十多只，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点燃一张报纸，烤焦的蚂蚱香味扑鼻，真是那个年代里难忘的美食。

入冬以后，电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可怕的肝炎病毒在这里迅速蔓延，病号一天天增多，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呻吟。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抬走死人的声音。我已经麻木了，周围的死亡不再使我震动，我的腿浮肿着，走路十分吃力，我开始咯血，身体越来越虚弱，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

年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忽然来了命令，把各分场的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农场西荒地的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场里，伙食也有了一点改善，晚餐的两个白薯窝头改为一大舀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这一舀子大米粥竟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它太好吃了，以至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就盼望着天快些黑。粥是用大木桶盛着的，队长站在粥桶旁监督着，我们端着饭盆排着队每人领一舀子。这时冒出来一个人物，名叫高健，大高个子，东北人，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他真聪明，在出工的路上捡了一只破鞋，他把胶底修剪成一个刮片，洗得干干净净藏在怀里，他很快把自己那份粥喝完，蹲在粥桶边，等最后一个人领完粥，他突然扑向粥桶，把桶推倒，一头钻进桶里，用他的刮片把粘在桶壁上的粥汁刮下来，竟刮满一饭盆！这情景使监管队长也目瞪口呆，他披着军大衣叼着一枝烟鄙夷地吐出一句："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发明了各种工具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以后，我从被子里坐起来，忽然胸背剧烈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了，穿不上衣服，只得坐在炕上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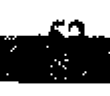
息。队长已经开始点名，班长跑回来拽我下炕，我挣扎着跟着队伍到了工地，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走过来厉声训斥我："不要装病，快起来干活去！"无论我怎样哀求，他都不相信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只好咬牙站起来。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的。

1962 年 5 月，各农场的右派分子都调回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三余庄集中改造。刚到的第二天早上，一位监管我们的高队长来查房。我躺在炕上，他看见我枕边放着的一个罐头盒里吐满了血，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到病号组去，不要出工了。"我很感激他，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用这么和蔼的语调对我说话的队长。

李辉：*1964 年 5 月你被解除劳动教养了吗？在这之后的处境和教养期间有多大区别？*

杜高：到 1964 年 5 月，我虽然"继续教养三年"也期满了，但并没有被解除劳教。这以后若干年，解除右派劳教的程序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1964 年 5 月是当时集中在团河农场改造的二百多个右派劳教分子们热切盼望的日子，这是所有定期三年的人劳教期满的月份。人们几年来忍受各种困苦，就是为了争取按期解除。尽管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将使我们恢复过去的社会职务和政治身份，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定期在三年以下的右派，都陆续按期解除了劳教，但摘掉帽子后被叫做"摘帽右派"，是公民中的"另类"；他们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接受监督，也不是一般的职工。但他们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还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宿舍外面没有铁丝网，劳动的时候不再有荷枪的警卫监视。



然而，就是对这一点点自由的向往和吃一顿饱饭的渴求，也都成了我们难以实现的奢望。

5 月的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始终没有解除劳教的消息。焦虑不安的情绪渐渐在劳教队中蔓延，人们忍不住询问队长，为什么到期不宣布解除？队长也露出为难的表情，甚至透露说，农场把你们的表现材料已如期上报了，批准的权力不在队里。那么，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又变了？三年前的规定又不作数了？对右派又

要有新的处置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在右派队里传播开来。为了稳定这二百多人的情绪，农场的场长特地到教养队来讲了一次话，他说："谁说党的政策变了？谁说政府说话不作数了？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党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政府说话是作数的。谁改造好了就摘掉谁的帽子，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摘掉帽子。现在一个都没有解除也是对你们的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信任政府，安心改造。……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里，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光明前途。……"

就这么一番话，又一次决定了我继续教养的命运。如果说1961年宣布延期三年是由于我"表现很坏"，那么这次无期限延期，就连理由也不说了。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1964年的无限期延期，就是我劳动教养进行的三部曲，我的青春和生命也就在这每一个节拍里消逝着。

场长讲话以后，我们无可奈何地沉静下来。悲观消沉的情绪笼罩着右派队，人们失望了，意识到右派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个人表现，而是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手里，任何个人努力都是徒劳的，自己能做的只是保住生命，活一天是一天。



但确实也有一些青年学生，虽然被视为党的敌人仍然对共产党一片赤诚，真心信任。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肖其中，很为他的不幸难过。肖其中是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是一个农家子弟。他的父兄对他寄予厚望，他不敢把自己当了右派告诉家里。他思家心切，深信场长说的只要积极劳动表现好就可以早日解除教养回家乡去。他努力争取，从不懈怠。我那时在队里做宣传员，每天写黑板报，肖其中是最热情的投稿人，他喜欢写诗，用美丽的词句歌颂劳动，歌颂党。他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工后他总端着饭盆站在黑板报前一边啃窝窝头一边看劳动简报，发现受表扬的人中有他的名字时，他总会流露出欣喜。他非常重视这种表扬，希望政府了解他的改造成绩，早一天让他成为自由的公民。1965年麦收时节，他从早下地割麦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中午都不休息。他在1961年大饥饿的日子里患过肝炎，全不在意，自信年轻力壮，不吃药不请假。这时他又常感到胃部疼痛，在麦田里，他捂着肚子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喜："我今天割麦又创了高效！"我看他强

忍着疼痛，额头上渗出一颗颗汗珠，劝他要求队长带他去场部医院检查，他笑笑说："我没什么，我还就怕像你这样得了肺病，不能干活就糟了！"

就是这样一个拿自己青春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争取宽大的青年学生，却唤不起一丝一毫的怜惜，硬是不解除他的劳教。更大的悲哀是，他的创高效又常常是对其他难友的威胁，他越积极就越孤立，常常遭到讥笑："上了黑板报又能捞到什么？"没有人同情他的病痛。

第二年秋天，我在一次劳动中胸膜破裂，被抬到农场职工病房休养。

一天，从教养队又来了一辆板车，车上躺着肖其中，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的腹部胀满了水，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病房里传来骚动的声音，有人急促地说："快给教养队打电话，天亮前把人送去烧了！"肖其中死了。他终于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这个农家子弟的青春生命就在这个静夜里熄灭了。

我却活着继续等待政府的宽大。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现在从档案里可以看到，每年教养队的确为我填写了一份解除劳教申请表，但"处、分局意见"一栏里都是空白的。表格中有关我的基本情况如罪行等项，一年年照抄下来，一字未变，惟一变动的是我的年龄。每填一张，便增加一岁。一直到 1969 年 4 月，军管会批准我解除劳教，但拖到国庆节才宣布，11 月我被遣送回原籍。

在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以来，像我这样劳动教养居然长达近十二个年头，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个案例吧！

李辉：从《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看，尽管经历了多年劳教，你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文革"初期对文艺界的情况也还是很关注，并且发表一些议论。你这是不是本性难移？

杜高：这一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言论，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妄加罪名，这在当时就算难得了。"文革"爆发以后，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文革"的信息。"文革"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首

当其冲的又是文艺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震惊、关注、思考和猜测，我虽然被禁闭在劳改农场，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家的政治变动，因为这首先关联着我个人的命运。坦白地说，每当我听到文艺界一批批的人被打倒，被揪斗，而许多人就是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猛烈斗争我的人时，我的感情是复杂的，禁不住要发出几声慨叹。

李辉：1966年初你们怎么收听《美国之音》？当时不怕被揭发吗？

杜高：这是很富戏剧性的一个现象。劳教队是不允许带收音机的，谁也没有收音机。但早晨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野里干活时，却常常传播一些外面世界的惊人的新消息。如彭真市长被揪斗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反党分子，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织了一个反党司令部等等。据说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是谁收听到的，是谁第一个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各种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右派队里有能人，有的人找来几个小零件自己就可以攒一个很简陋的收音机，也许就是用它在半夜或清晨偶尔收听到了《美国之音》。

这个现象表明，被囚禁被隔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而人们又总是用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智慧来冲破禁锢，绝对的封锁是困难的。

李辉：从1969年的"汇报"看，你在这时还经常发表对现状不满的言论。为什么？

杜高：这些"汇报"是不准确的，写这些材料的人有各种不同动机，多数是为着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改造有进步。经常是抓住听到的只言片语，加以夸大或上纲上线，所以这些材料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思想状态。

1969年是我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身体已经极度衰弱，而且因为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整个精神世界也已濒于崩溃，我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1969年初秋又因为一次在水渠劳动，浸泡在深水里患了急性肺炎，我又开始咯血。长期的缺乏营养和半饥饿的状态使我感到自己已无力再熬过这个冬

天了。在当时的处境中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恐怖，但求生的本能还是使我迫切渴望尽早解除教养，恢复自由。到了这时候，我只有不断地向毛主席悔罪，发誓永远按照他的言论来说话，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其他想法，只求给我一条生路。“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1967年12月《人民日报》重又批判“二流堂”“小家族”，指出后台老板是刘少奇。我更感到处境危难，所以这时我已不可能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反应，更没有勇气发表什么对现实的不满言论了。

李辉：最后一份档案是关于你被摘帽并送回原籍的材料，时间已是1969年，距你打成右派开始劳教近十二年。你自己坦率地讲，这么长的劳教，你认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到底是否起到作用，如果有，是哪些？

杜高：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由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以后的一般情况。我在长沙街道上做临时工的八九年虽然是艰难的和贫穷的，但总算安全和自在。这就是因为我经过了近十二年的劳教磨难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相当懂得政治世故的中年人了。生活逼迫我学会适应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并且早已懂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第一要义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我时刻意识到周围的革命群众在监视着我，我十分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不忘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摘帽右派”，从不敢得意忘形。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论居委会派我去挑沙子，挖防空洞，到翻砂厂抬铁水，拖板车送铁块，我都卖力地干，不论一个月给我二十元工钱还是四十元工钱，我都一样感激地收下，从不讨价还价。只要想想过去的近十二年在劳改农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就再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奢求。我悄悄地向有公费医疗待遇的母亲要来一点药品医治我的肺病，我不能让人们知道我患有结核病，我怕失去工作。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学会技术，工业描图或制作教具等等；我后来住在街道盖居民楼的一间堆石灰的小工棚里，在那里建起了一个教具车间。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时，我像过去站在监管队长面前那样，唯唯诺诺，把他们当成“无产阶级专政”。问到我的思想时，我会流畅地背诵一段语录再接着汇报。

有一次，户籍警对我说："革委会的头头说像你这样老老实实的右派，算是改造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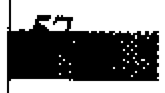
在我的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影子了，我变了一个人。

近十二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成为远去的岁月，加上我有意地忘却它，绝不再回想，但它却仍要不时地重现在我的噩梦中，一次次把我惊醒。这使我痛苦不堪，似乎它已埋藏到了我的意识的深处，提醒我不要忘记是一个有罪的人。

1980年春天，我50岁那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我的妻子温柔地爱着我，我感受到了幸福，但噩梦还是跟随着我。我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教队，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宣布延长我的劳教期……我惊恐地大叫，浑身冷汗。妻子叹息着，可怜我。在我结婚半年以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这一次，她哭了起来。

和"小家族"的朋友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个比我有价值的生命先后化为烟尘，无声地飘逝了。而我还活着。

二十多年来，我，一个渺小的生命，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艰难地挣脱长期的精神禁锢，一步步地重新找回被迫失去了的自我。



第一编　肃反运动时期(1955年—1956年)

中国剧协《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

"小家族"是从一九五一年以来以几个历史上有敌特嫌疑或有政治问题的人为骨干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小集团组织。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它的成员分布于北京、上海、青岛、内蒙、东北等地的学术机关团体、部队与企业部门等十八九个单位中，从业务性质上来分则包括戏剧、电影、文学、美术、音乐、歌舞、新闻、编辑、出版、行政、对外联络、企业等各部门。

现在把这小集团的成员、组织情况、政治背景以及他们的破坏活动等情况分述于下：

(一)"小家族"的组成分子

杜高——现在剧协剧本创作室工作，"小家族"的首要分子。解放前一直在蒋匪反动报纸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四九年在常熟伪青年军政工队任导演，解放前夕，混入一冒称"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人民社"。编写反革命文章，打人革命队伍并混进了青年团的组织，潜藏至今。

汪明——现在剧协剧本创作室工作，"小家族"首要分子，解放前据他自己说一度流浪，后考入伪国立剧专，在剧专参加了三青团，四七年到香港在《华商报》《中国学生丛刊》《星期报》等处工作，和特务周风搞过"归国学生任务团"后退出，通过章泯关系参加了工作。

田庄——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亦为"小家族"首要分子，在"家族"内部地位仅次于前二人。田为青年团员，并担任过支委(已撤掉)。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

陶冶——现在文化部联络司工作，为"小家族"骨干分子。青年团员。

罗坚——现在中央歌舞团工作，骨干分子。党员。

蔡亮——现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骨干分子。团员。

杜鸣心——现在苏联莫索斯基音乐院学习，骨干分子。

陈敏凡——现在电影局局长办公室工作，为家族一般分子。团员。

张自疑——中央美术学院，家族一般分子。候补党员。

尤在——现在北京《大公报》工作，亦为一般分子。党员。

胡秀玉——现在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一般分子。

王蓓——现在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工作，一般分子。

谢容明——现在上海歌舞团工作，一般分子。

吕伦——现在上海歌舞团工作，一般分子。

另外有些人与"小家族"关系极为密切的，有以下一些人：路翎（胡风骨干分子已逮捕）、吴祖光、洪遒（电影局）、萧崎（青艺）、王正（青艺）、潘开茨、陈西（农业部）、鲁军（电影局）、程若（实验歌剧院）、许仪耀（文化部艺术局）、文椿（电影局）、王肇湮（全国文联）。此外还有一些嫌疑分子，如：人民艺术剧院的朱琳、刁光覃、孟健，青岛市文联的孟力，报社的耿林莽，演员剧团的巴鸿、李露玲，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赖明（张冠球）……

（二）组织情况

这个小集团他们自称是一个天才洋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的"家族"，他们自称有理论强的（杜高），有组织能力的（汪明），也有兼而有之的（田庄）。参加"家族"是要经过"审查"、"批准"和"考察一个时期""候补期"，等等的规定，是有资格的限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加入。如果批准为小家族后还要通过最后的审查（到吴祖光或潘开茨处）摆酒席举行庆祝，以作参加家族的仪礼，此外家族中还有种种家规和做法，兹分述于后：

一、对每个人的大事（写作上的，工作上的）家族应该互相汇报，互相提供意见，必要时还要予以干涉和给任务。

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他们有句口头语："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

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

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他们有很深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潇洒和他们是一样的。

五、不准逢人就谈"家族"(对一些爱说的人,特别叮嘱要守秘密)。

六、按年龄排为哥哥弟弟,不称现在的名字,而叫绰号、原名、代号或小名。

违反规约者,轻则予以"训戒",重则开除出"家族"。还有一种处罚,就是对犯有"过失"的分子停止"弟兄"之称和本名的称呼,称之为"同志"或讽刺为"同志你'进步'了!"

他们相约每逢节日——五一、十一、新年,即举行"家族"团聚宴会,或相邀去某处跳舞。平时星期六、星期日经常聚会。

(三)小家族的政治背景和反革命的活动

从他们所传播的流言蜚语的来源和他们交代的关系来看,这个"小家族"主要受吴祖光和潘开茨等人的指使。在文艺上吹捧胡风文艺理论并以此毒害和引诱青年,联络、发展他们的"家族",另外便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大部分历史上有敌特嫌疑或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所以可能他们个人还有一个什么直接关系。以上的各种关系也许是互相通气的,也许是"心照不宣"的,总之是很少可能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

至于他们的野心也表现得很露骨,他们公开宣称十年后"文联主席台上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到那时就属于我们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便有计划地互相吹捧,彼此可以在作品上挂名,以图混得社会地位"一步步爬上去"。

一、为了"强固阵地",在社会上扩展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他们经常"互相帮助",经常督促从事创作工作的"家族"分子,"努力实践"搞出"成绩"来。曾有一次由于他们对田庄逼得过紧了,以致田庄写信告饶说:"你饶了我吧,不要抓紧我吧,你要了解我做小职员的悲惨命运的情况……"汪明刚写出《第一次功勋》的时候,杜高立即写信给他说:"《第一次功勋》争取上演,我们全'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演出,赶过那些正在得意的人们!……"

杜高在这一点上,是被"家族"视为中心的,杜高也自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西蒙诺夫",杜高所持的资本有两套,一是精通"胡风理论";另一方面是解放后,施展其剽窃的伎俩,连续拼凑了五本集子。尤其是后一点上骗住了不少人。

二、为胡风、路翎等人“创牌子”“壮声势”，小家族的分子每到一处必定大肆吹嘘胡风的“理论”，推崇路翎的作品，当路翎的《初雪》发表之后，杜高立即向人宣称“这是中国近年来最好的作品。”当《洼地上的战役》发表时又倍加称赞，说“《初雪》是路翎的青年之作，而《洼地上的战役》才是路翎成熟的作品。”当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出版之后，杜高即向人宣传“这书很有意思，耿庸对鲁迅很有研究，他的看法还是有根据的，看冯雪峰怎样吧！”

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胡风集团便常常通过路翎，去指使小家族的一些首要分子，配合行动。例如第二次文代大会时，路翎曾召集杜高、汪明讨论代表名单。认为孙芋、白桦这些人不应当选为代表，而应当选阿垅、绿原、吕荧。又如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之前，路翎写了一封“揭发舒芜的历史”内容的信，准备“递上去”的，事先也找到杜高、汪明等人进行过讨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未发表前，杜高便从路翎那里看到了打印稿。《文艺报》检查工作时，路翎在文联扩大会上发言后，把发言记录读给杜高、汪明等人听，杜高这些人马上表示“你为青年出了一口气”。并立即要求参加会“配合进攻”。小家族这些反革命分子，兴高采烈地猖獗起来。杜高逢人便说胡风的《意见书》“文章写得好极了，批评得太尖锐了。”杜高把《文艺报》“内部通讯”登载要开展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消息拿给路翎看，讨好他和胡风。当时剧本创作室改选理事，小家族分子尚在为路翎竞选，企图篡夺创作室的领导地位。路翎始终被小家族奉为“师表”的，杜高等人给小家族分子写信总在谆谆“训诫”要向路翎学习，路翎是他们的“榜样”。

杜高这个小家族的“首脑”，在这次运动中，思想检查会上竟直言不讳地讲“我对小家族的一些人，总像胡风对于路翎那样，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培养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有所成就”。

三、造谣中伤，这是小家族日常的“点滴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据调查，从小家族分子口中，传播出来的谣言，小广播，诬蔑性的言论已有四五十条。大致包括这样几项内容：(1)对党的领导干部诽谤污蔑，如说“刘芝明部长垮了，他和高、饶事件有关”，“周总理不要他当部长了”，“贺龙说周扬不行”等。(2)对国际朋友的恶意诋毁……(3)对战争局势有意扩大，造成人心恐慌。对今春反对

原子武器时周总理的一次时事报告，杜高等歪曲报告内容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很可能用原子武器，还故意表示要卖掉家具、书籍准备参军，这样来散布紧张空气。

四、俘虏和腐蚀青年的活动。为了达到"争取人""联络人"的目的，为了把一些俘虏来的人变成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便进行了一系列的如下活动：

(1)宣扬"才能"。对外宣传他们小家族的人都是"才子"。杜高的资本就是五本已出版的集子。当然都是偷窃来的，书名却标得很堂皇：《在思想战线上》《我会拿起枪来的》《战斗与战斗者》《向三八线挺进》。如杜高叫蔡亮为自己画了一张像，逢人便指着镜框啧啧赞赏，青年的天才画家。蔡亮的一张《借宿》完成之后更成了宣传资本。田庄没有什么作品，杜高便宣传田庄如何聪明，很多上演的电影剧本都经过他加工润饰的，《渡江侦察记》当中很多成功之处都是田庄增添上去的。其中路翎作为宣传"天才"的资本。有些人便由于倾慕被陷进圈套。"互相帮助创作"也是钓饵之一。

(3)经常以关心婚姻问题为名，对一些未婚的男青年进行拉拢。有时甚至找一些已结婚的人，谈性生活，无耻地叫做"介绍经验"，使得一些来婚青年神志迷惑，逐渐受其腐蚀。

男女关系不严肃是"小家族"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例如杜高自来北京到现在五年当中，所戏弄的女性已达十几个。汪明、田庄等人经常通讯中总是用"冒黄油"(即搞男女关系的黑话)、"铁的棍"猥亵的暗话互相询问男女关系情形。

他们用追逐女性为发展女青年成为小家族分子的主要手段。他们的黑话叫"抓小鸡""老鹰下树啦"。为了抓取一个女性，他们有时采取成群结队地去包围，他们的黑话叫"显示家族的威力"。比如杜高企图"抓"舒巧——上海歌舞团女演员，便布置小家族的人一齐到他和舒巧聚会的地方来，小家族分子陶冶便把插在书柜中的杜高的"著作"抽出来读一段，称赞杜高真能写，然后田庄等人一唱一和，谈起文艺理论来……然后便一个个溜掉了，单留下杜高和舒巧。这样很快地这只"小鸡"便被抓到"老鹰"的手中。是凡被"抓小鸡"俘虏的，都被无条件地认为是家族的成员。

在生活上，平时亦很放荡，吃酒，聚赌(输赢十几元)，在路上追

逐女性，电车上胡说乱道，说你是刚从莫斯科来的，我是从平壤来的等等。

运动开始之后，小家族的人便互相到和平餐厅、澡堂、公园等地定下攻守同盟，如问到小家族时，尽量少扯人。少谈事实。——今天攻守同盟基本已经攻破。

他们最初承认小家族活动时，只说是一个感情上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互相帮助创作，鼓励创作。在运动中逐渐揭发了他们的造谣破坏行为及生活上胡搞，有意破坏社会秩序的罪恶事实之后，才低头认罪，承认他们是反革命活动。

起初小家族分子都进行过顽抗，经过揭发斗争之后，逐渐都交代了反革命罪行，目前交代的情形除个别事实有出人外，大致都还相符。由相互包庇，已开始相互检举。

关于小家族的政治背景，现在尚不肯老实交代。现在还查出来，小家族分子当中有些人在历史上与反革命组织有联系，如汪明在解放前，在剧专曾参加三青团，与反革命分子黄若海、公刘、陈卓猷等人关系密切，到北京后仍有来往。杜高交代他在《湖南日报》工作时曾参加国民党，在《中国时报》工作时曾填过"国防部政工局特勤处"的表格。关于这些人的政治背景尚需继续追查。

中国戏剧家协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杜高同志的历史

(一)一九三〇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家庭。
父亲李仲融中共党员，现任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亲陈璧登也是知识分子，曾任教员。
(二)一九四一年参加新安旅行团，做儿童演员(在桂林)。
一九四四年遭遇湘桂大撤退，从广西和母亲一起步行到贵阳，

曾卖过报。

一九四五年至贵阳，经曹伯韩同志介绍在《贵州日报》做练习生。（这时杜高十五岁）同年，为一个校对打抱不平，被社长开除，在贵阳某剧团与一木匠同住。

一九四六年秋回到长沙，与母亲同住。

以上证明人为：

曹伯韩（不知是否共产党员，现任中央教育部《语文学习》主编）

王西彦（民盟盟员，现在上海《文艺月报》社）

（三）一九四七年二月一人往香港，找廖沫沙同志（曹伯韩的介绍），由廖沫沙同志介绍至"香港新闻学院"（夜大学）学习，并做一些事务工作。（后该学院改名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同年秋天，因母病，返回长沙。

以上证明人：

廖沫沙（党员，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陆诒（不知是否党员，现任上海《新闻日报》采访主任）

（四）一九四七年秋经梁中夫介绍入《湖南日报》做记者。

一九四八年一月至衡阳民营报纸《力报》任采访主任。在该报不到三个月，又回到长沙。

一九四八年七月经程晓华（不知此人政治面目）的介绍至南京《中国时报》任编辑。

以上证明人：

梁中夫（党员，现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邹今铎（党员，现在《新湖南报》社）

（五）一九四八年底至苏州（因发表进步言论被注意，自己溜走），和李牧子（党员，现在上海）在一起。为计划至苏北解放区筹旅费。

1. 卖稿，书店不要。

2. 演戏，找关系，李金声的表哥在常熟国民党的青年军××师××团做政工队长（五人拿二十五人的饷粮），和他联系，用他们的名义演戏。遂至常熟，演出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系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

同时参加演戏的共九个人，除杜高外，有：

陈琦（共产党员，现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李金声（青年团员，现在上海音乐学院）

张仁富（团员，现在中央歌舞团）

其他有：白天保、刘大庆、张弘、曾先治等。

临近解放时，青年军××团撤离常熟，以上九人一部分回到上海，杜高又回到苏州李牧子处，直到解放。

证明人除以上说过的尚有：

孟远（党员，现在上海福利会儿童剧团）

以上系根据杜高自传整理的。

根据“青艺”转来的旁证材料，谓：

1. 杜高系青年军复员军人，被介绍留下的。（此类均系中统或政工人员）（常熟市黄忠谈）

2. “四八年有一批青年军复员军人到常熟，杜高是在伪军中搞政治戏剧工作……他通过姚蒙柯认识姚丹，住在他家中 个时期，后人《新生报》任副刊编辑，表现一般。”（常熟市宋以天谈）

a. 姚蒙柯即纪芒，曾任国民党上尉书记，现在青艺图书馆工作。纪芒谓他和杜高相识是通过一个剧本的排演，杜高是导演，后二人又同在《新生报》任过职。

b.《新生报》是中统特务办的报，负责人石民庸已被枪毙。

再，“青艺”转来的抄录常熟市县公安局材料谓：

“杜高（土低?）是随伪青年军二〇二师六〇四团来常，在政工队内当导演，又是《中国时报》的记者，在青年军调往上海时，他留在《新生报》当编辑，也在《新常熟报》工作过一个时期，同时参加顾锡九的一二三军政工队（七九一一）工作。

“来常前他在报纸上标题很进步。解放前夜口头上也出现反动，如‘中共杀害和平婴儿’等（有剪报可查）。”

根据以上材料，我认为必须首先搞清楚杜高在常熟时的活动情况。

1. 曾否在《新生报》工作，何人介绍，表现如何?

（自传无，可问纪芒、李牧子）

2. 在青年军政工队演剧的真相。

(可询问当时与他同时演剧的陈琦、李金声等同志)

另外:

a:杜高的原名为何? 旁证材料的"土低"是否原名?

b:材料中所谓反动言论的剪报在何处?

(六)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后,上海解放后,杜高与李牧子同回上海。经孟远同志介绍在《新少年报》编辑文艺版。

同年,经胡德华同志(党员,《新少年报》总编辑)、孙毅同志(党员,现任上海《儿童时代》社社长)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五〇年调至上海总工会,又调至铁路文工团工作。

五〇年底,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分配在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工作。

五二年调回北京"青艺",后调剧本创作室。

以上系根据杜高同志自传整理的,参加革命工作后之鉴定材料等均无。

黄悌整理

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

(1955.7.31)

一、所谓"小家族"的几个人

汪明、杜高、田庄、罗坚、陶冶、蔡亮、杜鸣心(一年前去苏联)。

二、"小家族"是怎么形成的

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陶冶,他是育才的学生,比我小一岁,我过去是新旅的学生,一谈就很好。后来,一九五〇年秋,我到了北京工作,他也到了北京,我那时初到北京一个熟人也没有,常到青年艺术剧院找他玩。他和汪明住一个院子,介绍我认识了汪明,汪明那时从香港到北京不久,也是重庆育才的学生,又搞写作,一接触就很谈得来,汪明对我很好,有对弟弟的感情,很热情,留我在

他那里住过一夜，谈他要写的一个剧本故事。我也很喜欢汪明。后来我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去体验生活了，当时正有一群美术学院的学生也在体验生活，其中认识了蔡亮，他年纪很小，很有才能，大家都欢喜他。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所以特别容易接近。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便抗美援朝去了。在东北又遇到了汪明，而且恰巧又分配到了一个文工团里工作，又一道去朝鲜，一九五一年又一道合写了剧本，感情就更好了，更深了。在北京的时候，汪明就认识了田庄，两人感情就很好了，我在汪明处认识了田庄，可是不熟。只谈到过去小时候都在桂林演过戏。而且恰巧西南剧展时欧阳予倩先生排演《旧家》一剧中的一个小孙儿是约我去演的，后来因我要上学，改请了田庄演了。我们在东北时，田庄也有信给汪明，也提到我。一九五二年我和汪明从朝鲜回北京以后，和陶冶、田庄、蔡亮的接触就密切而又深厚起来了。最初是汪明、我、田庄、陶冶四人常常在一起，谈工作、思想、苦闷、想法各种问题，又在一起玩。这里而谈得最多的是各人的梦想，梦想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大家又都喜爱文艺，而且特别喜欢谈文学界的事。知道这些事最多的是田庄，因为他一直在北京，而且从小就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他又较早到的解放区，而且是做陈波儿同志的助理，接触老区的文艺工作者也多。其次是陶冶，他也是极喜欢谈。那时他们谈这些是不抱恶意的，也没有偏见的，是出于一个想做“文艺家”的年轻人的好奇，羡慕，夸耀，这样的天真的心意的。我也是，从小就抱着这样的梦想，知道许多文化人的名字，听起他们的事来就特别地羡慕和入胜。在谈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常谈到许多外国的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他们是那样亲爱，而且那友谊的品质是那等高贵。而且也谈到中国的我们知道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友谊。我们一边沉醉于对他们的谈论和羡慕中，一边就渴望我们自己的友情更好，更深厚。而且我们在过去少年时代的境遇相差不远，都流过浪，都演过戏，都接触过文化人，我们也谈过去。这样，不知不觉地，我们脱离了周围的别的同志，怀着热烈的爱心结合在一起了，生活上也不分，星期六和星期日成天地在一起玩，大都是坐在公园里喝茶、谈天。这时，不知是谁先想起的，说我们是一个“小家族”。是我，或者是田庄。大家立刻觉得“家族”这名称好。还应该

特别提到，在我们的谈话中，对于艺术的才能是特别崇拜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作家是天才，那个也是。而且我们居然觉得自己也是很有“才能”的人，因此，就相信我们的“家族”是一群“天才”的“集合”。这时，我和蔡亮有时候碰面，他不认识其他的人，他只是来找我，谈的全都是文艺方面的问题，他比我小几岁，还抱着一些“崇拜”的心情的。我看他画的画，欣赏他，夸耀他，这样，介绍他认识了汪明，汪明对他好极了，这样他又认识了田庄，接触久了，感情深了，他也就成了“家族”的一分子。我们说：“他也是家族的。”他也觉得我们很好，就自然地参加了。还有一个罗坚，我本来也是不认识的，他也是育才学生，和汪明、陶冶小时候就在一起，一直感情好，他也认为我们都是有“才能”的人物，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觉得“学习”了许多，认为这种友谊的结合是“好”的。和我们感情一天天深了，便也进了“家族”。杜鸣心也是育才的学生，大家都说他钢琴弹得好，参加过“布拉格之春”，又留苏，和我们也很密切地一起玩，便也进了“家族”。于是，这小“家族”便由这七人组成。我们觉得，七人中，搞文学的，美术的，音乐的，艺术行政的都有了，真是“美满”。

三、“小家族”形成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最初，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搞的这个“家族”是一种错误的、违反革命纪律的、甚至是违法的政治性质的活动。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家族”很公开，甚至以此炫耀，毫不觉得有什么坏处。我们向外宣传我们的“家族”，宣传我们的友谊，甚至宣传我们都是多么“有出息”的年轻人，好让人们来羡慕我们。是什么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这七个人虽然情况有所不同，思想错误的严重程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来自旧社会，而且特别是认识过旧文化界，受那种旧文化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竭力想模仿旧文化人之间的由于宗派主义所结成的“友谊”或小圈子。以为没有这么一群朋友则不是“艺术家”似的。因此，我们狂热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天真的一面。初时，我们虽然参加了革命，由于没有经过深刻的自我改造，我们每人身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狂妄自大的情绪，自命不凡，瞧不起同辈的同志，更严重的是我和汪明在东北工作时就表现了反组织的情绪和行为。我们觉得和革命同志的相处是“枯

燥"的，无"趣味"的，不能畅所欲言的，因此，我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尽情地倾吐，说什么话也无顾虑。因此，这个"家族"实际上就成为了传播反革命的谣言蜚语、包庇互相间的错误，成为了对抗革命的一种非法的组织。应该说明，这里主要是汪明、我、田庄三人的反革命情绪和思想错误的程度最为严重。其他的几人是受着我们的影响。

四、我们干了些什么？接近了些什么人？

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看来就是"游荡"、"玩"。每个星期日，我们照例的就在一起了，最初是专谈文学和梦想的，后来不了，多了谈女人——几乎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大家都没有爱人，而都想恋爱了。再就是认识了一些人了，到那些人那里去玩，听来了许多"小广播"。这里，主要接近的是吴祖光。他成了"家族"中的大哥哥。他那里是我们的自由天地，七个人全去过，他对七个人全好，"承认"了我们的"家族"。他跟我们谈话中传播了许多的政治性的消息（我在前几次材料中写到的），我们觉得在他那里玩得很愉快。又能听他讲各种有"趣味"而滑稽的故事。同时，他又能满足我们另一方面的虚荣心，我们羡慕的正是那些既有名气而又特别有"才能"的作家，到他那里的又都是一些有名的人物。在他那里是从一九五三年秋开始密切起来的，一九五四年更为密切了，这一年我不在北京，从汪明给我的信和后来我回来后所接触的所看到的。我们在他这里认识了夏衍和艾青同志，夏衍同志甚至开玩笑地说"吴祖光领导的一群小朋友"。



其次接触的就是在养病中的洪遒同志。他在香港就认识汪明，又住在电影局，和田庄在一起，我在桂林看见过他，他对我们也极好，也是公开叫"你们家族"、"你们家族"的。他在养病，我们去是陪他，和他聊天，减少他的寂寞。他和蔡楚生同志住一楼，友谊很好，所以我们认识了蔡楚生同志。在洪遒家，也是东南西北什么都说，有时就把从吴祖光处听来的消息告诉他。

"家族"的再一个朋友就是萧崎，他因为和汪明、我在东北工作时就有"友谊"，回北京后仍是比较接近，要好的。再加上他和田庄在桂林时演过《旧家》，他看着田庄长大，也很熟。罗坚他在重庆也就认识的。他年纪较大而且单身，很寂寞，所以找我们一道玩。另

外他简直真有些羡慕我们这个"小家族",真把我们看成一个个都是"小天才"似的。他长期搞戏剧工作,书读得当然不很多,每次听我们大谈外国文学时,也真以为我们很不错。他是夸奖我们的,并且真希望我们搞得好,有些出息。同时,他也有一套腐朽的、由于旧社会的长期磨难得来的哲学,在他工作的单位当然找不到这样一些人来发表,来共鸣,于是就和我、汪明谈。主要是谈"工作中碰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罪不得人","狂妄了要吃亏","东北工作的教训"这一些。还有就是谈戏,谈文学问题。他在剧院是做副导演,要回答演员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回答不出很"丢人",所以他背地经常来找我谈。他写的总结性的文章也找我替他在文字上帮忙。他比我们大,比较慎重,所以也常提醒我们言行要注意,群众关系要搞好一些。我们住在剧院时,他听到了谁对我们的反映就立刻来告诉我们。这次运动开始后,他因为知道我和汪明和路翎接近过,很担心我们,加上后来剧院领导上果然要他写我和汪明的材料时,他就约我们出去,把这事告诉我们,他非常害怕我们出问题。

上面说的是认识我们的全体,并有过比较密切来往的人。

另外,田庄、汪明认识的文艺界的人就很多,他们常谈起的有:刘白羽同志,章泯同志(我也认识),胡可同志。田庄因为在电影局工作,熟识许多电影界的人,也常谈。

另外,就是因为我和汪明的关系,介绍田庄认识了路翎。

路翎因为是近年来文学界的一位"名人",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会不注意他。和他的关系不如前面的人密切,其原因是,他对我们的"家族"并不怎么热心,同时,和他接触时是感到他有些"阴郁"的,不如吴祖光他们那样热情、开朗,有说有笑,无所谓。但是我们总觉得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是文学界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很愿意接近他。我们三人到路翎家去吃过饭。和路翎在一起时主要是谈文学,谈文艺界对他的批评,有时很枯燥,我和田庄还抱着兴趣,汪明是坐不住的,汪明平日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也不乐意长谈。我觉得我们开始接近路翎是抱有一部分虚荣心和好奇心的。而且阶段不同,这是有发展的,变化的。五二年至五三年初,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并不怎么的密切,我记得那时,我

和田庄是同意对他的一些批评的，但也觉得批评得太简单，说服力不强。我记得那时，田庄甚至对我说过："你是搞过理论的，你要能影响一下路翎，那你就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当然，这是何等的天真，但可以表现我们当时的看法。后来，不同了，五三年初汪明和路翎一同到了朝鲜。我到了青岛。我在青岛写的剧本《祝福人们》不但说明我对于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错误了解，而且在我的这个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我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倾向，我开始以寻求抽象的所谓"爱"、"内心的斗争"来代替反映火热的现实斗争。这不证明别的，这证明了我认识路翎以后，以及和他在交谈文学问题时，已经受到了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

同年秋天，我回到了北京，汪明、路翎也回来了。路翎开始发表一些散文，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我们更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了。同时，汪明在和路翎一起到朝鲜的日子，无疑地增进了他们的友谊，汪明在和我们谈到朝鲜生活时，特别谈到路翎体验生活的态度很好，写作很努力，我们就也认为他做人的态度也是"认真"和"严肃"的了。恰好这时期召开文代会，会上批判了过去粗暴的批评，路翎很高兴，我们也就相信过去对他的批评是粗暴的了。从这时，我和汪明就更在碰到他的时候就给他谈我们的工作，我请他看了《祝福人们》，他支持了它（我已写过材料），汪明准备写的反映朝鲜的作品也和他谈过，请他提意见，帮助。一九五四年的旧历年，我、田庄、汪明三人到他家里去吃了一次饭，他还请了李维时，那天因为只是顾着吃饭，问了一些他正在写什么，没有多谈别的。不过，从那时，我就感到我们三人已经完全和他有了"友谊"了，而且明显地在精神上接近和支持了他。他很知道我们是喜欢他，也很崇拜他的，他也很知道我们这几个人是他可以好好利用来为他宣传的。但是他大概也知道我们的另一"弱点"，即是我们在文艺界工作还不久，对人的成见还不是那么深，而且是普遍地抱着交友的乐趣和对一切进步作家都很崇拜的文学青年的心情。这大概就是他不能把我们当作更"亲密的人"的原因吧。但是，在这期间我个人因《祝福人们》剧本的失败而怀着对组织不满的情绪，在他那里得到共鸣，而他利用了这一点，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已另写了材料）

一九五四年初，我就出去了。直到年底才回来。

我在外面的时候，主要是和汪明通信。我在那些信里倾吐了我对"家族"几个朋友的怀念。他也来了许多信（信已交给组织），我感到很温暖。我从这些信里看到和感到，我不在的时间，"家族"的感情是更加巩固和亲爱起来了。他们和吴祖光的接触更多了，感情更好了。这时期，汪明、田庄又接近了刘白羽同志，我记得在一封信里，他曾写给我："白羽同志很喜欢我们，我们讲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白羽同志笑着说，你们将来是中国的'强力集团'呀。"这时期汪明写了《第一次功勋》剧本，得到刘白羽同志和路翎不少帮助——他告诉我。可见和路翎也还是接触着的。不久后，对路翎的小说的批评展开了，我在工地也读到了这些批评文章。汪明来信中，提到路翎又苦闷起来了，这次批评得很厉害。并且说路翎常问到我，希望我给路翎写信。我当时因为忙，二来对路翎的小说也有些意见，同时批评文章我觉得有"过火"的地方，再加上跟路翎的这样一种"朋友"关系，觉得很难写，就没有直接给路翎写信，就请汪明转达了我的问好，并要汪明多安慰他，帮助他，尽一个朋友的力量。后来，汪明自己的剧本也碰了一些意见，其中尤其是宋之的同志的意见使他不满，便从情绪上完全吻合了路翎的那种也不满批评的情绪，他就更同情起路翎来了。年底，我回来了，正展开着对《文艺报》的批评，这时，我们就更觉得错的是《文艺报》，而不是路翎了。那时候，我们完全搞不清路翎等人的真实目的，我们从吴祖光那里听到路翎发了言，连吴祖光也有些同情路翎的"遭遇"了。这时，汪明和我也都表示了对《文艺报》的不满，对路翎的同情，甚至要求去发言（我已另写了材料）。后来，在李维时那里碰到路翎时他说吴雪反驳了他，吴雪连自己说过的话也不承认了，我们当时听了路翎的一面之词也当真相信他，我说"这一句话我们都记得"。（已另写材料）

《文艺报》事件以后，我就埋头写我的剧本了。仅仅在阴历年和汪明一道去看过路翎一次。那时，我们已知道胡风理论错了，想劝他摆脱胡风的影响，他是完全按照胡风指示那样回答我们的：只是投稿关系，没有别的，等等。他和我们谈话中，除了提到过陈亦门以外，他们集团里的任何一人都没有提过。我甚至记得一九五

三年我看到耿庸的那本《阿Q正传研究》后，和他谈过我觉得耿庸是别有用心的人身攻击，我问他这是一个什么人，他也不清楚，说他自己和“泥土社”也只因为出过两本书的关系，闹不清楚。他并说上海这种二流子很多。而后来，就是我的一篇文章（《单纯和美及其他》）受了批评，我告诉过路翎，并告诉他我预备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联系着批判自己，他也在写，只是要我不必联系自己，主要批判胡风。这一次以后，我们就没有接触了。

在和路翎的接触中，由于我们的反组织情绪从他那里得到共鸣和支持，我们从思想和情绪上便支持了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且实际的成为了反革命的“好朋友”。（如我在前几次材料中写过的一些事实，我们为他作过的宣传，并把我们听来的小广播也转播给他）

另外，我们在“家族”中也传播了路翎的影响，除了在文艺思想方面，另外，我们也常谈到路翎如何刻苦，如何朴素，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他这些方面。使得不认识他的其他几人也都很崇拜他。

五、“家族”的一些变化

从今年三月开始，“家族”开始了一些变化。在长时间的接触以来我们互相也积下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使我们感情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还有一层是，我们也开始感到在一起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以后应减少玩的时间。同时我们个别的交换了一些意见，觉得我们过去对互相间的错误和缺点太缺乏批评了，所以，觉得有必要聚在一起严肃地作一次谈话，互相提意见。（后来没有实现）从这时起大家碰面的少了，只因为我和汪明住得近，还常常玩玩。有人说：“你们这几个人因为都没有爱人所以才这样密切，以后各人结婚了就不会这么好了。”我们当时不相信，后来事实果然是这样，因为各人都恋爱了，接近的时间就自然的少了。但这个变化不是从政治认识上的提高得来的，真正的变化是从这次严重的斗争运动开始后，我才从痛苦和沉重的政治教训里猛省，我们的活动原来是一种政治性的小集团活动，而且是有利于反革命，破坏革命的活动！如果让它发展下去了，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就我和汪明两人所做的事来看（如传播的消息，在讨论我的剧本时表现的宗派情绪，和路翎的“友谊”）就都已经是带着鲜明的政治性的、以反革命情绪为基础的活动了。

杜高在斗争大会的坦白材料

一、"家族"的成员是：汪明、我、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陈敏凡(田庄的爱人。在今年过年我们到电影局去跳舞回来在西单等电车时，我们开萧崎的玩笑，说我们现在考虑你进"家族"，要给你半年"候补期"，陈敏凡笑得最厉害，我们说："你别笑，你自己呢？"她说："我当然是'家族'！"田庄说："她是自己进来的。")

二、"家族"之友：吴祖光、路翎、洪道、萧崎。

三、还有几个自己说是"家族"，而实际上不被我们承认的：谢容明、吕伦(在上海歌舞团工作的，是田庄、罗坚的好朋友)。为了谢容明的事，我们争执过一次，罗坚说："应该要谢容明，陶冶不应该有。"我和汪明说："我们喜欢陶冶弟弟，你们不懂陶冶弟弟的可爱处。"我还说："陶冶是家族最早的一个，没有他不行。"

还有一个自己也说是"家族"，而实际上不被承认的：尤在(天津《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我们的感情还是比较好，五三年过年的时候他和他爱人在邓初民先生家里请我们吃过一顿饭，大家一块儿玩得很好，但是他不满意罗坚和田庄。我从外面体验生活回来，尤在要请我和汪明吃一次烤鸭，汪明就邀了田庄、罗坚一道去，尤在说："我凭什么请他们？"汪明说："那凭什么请我们？"就不吃他的了。汪明回来告诉我，我也说那就不要吃他的了。从这以后他就不和我们来往了。汪明说："这是什么家族？以后不许他那么家族家族的讲了。"我说："他连家族的这点性格都不了解。就凭他这一点，不配入家族。"

四、现在还不是，但我们认为可以进入家族的是王蓓。王蓓先是和田庄认识，后来介绍和我认识了便有了很好的友谊，今年初我又介绍她和全体家族认识了，她立刻喜欢了我们全体，和我们全体玩过两次。最热情的是汪明，以后和她通信，并写信给在苏联的杜

鸣心说我们多了一个朋友。如果时间再长一些，王蓓一定是会被我们拉进家族的。

五、田庄说，我们中还应该有一个年轻的歌唱家，那就全了。这人一直没有碰到。可见家族的成员是不断发展的。

六、由田庄、陈敏凡带来和我们认识的还有一个文椿，在电影局工作，和陈敏凡年纪一样大，一同读书，一同参加工作的。我不在北京时，她常和汪明、田庄一起玩，和罗坚、杜鸣心、陶冶都认识。她的家在北京，她请全家族到她家里吃过饭。今年过年时，我回来后，她又在家里请我们全体去吃了一顿。她的大姐和我们都熟了。我不在北京时，汪明有一个时候喜欢文椿，田庄坚决反对，因为文椿年纪太小，而且和电影局的一个男同志很好，后来他们正式恋爱了，汪明也没有再进行。

七、还有一个王正，去年一年中经常和汪明接近，立志要做批评家，和汪明、我感情都很好，他认识家族全体，但始终不能和我们像家族一般打成一片，我们嫌他的性格不明朗，有些世故。有一次我们提到他是不是算家族的，田庄坚决反对，说他根本不能进家族，他和我们的感情不深。我们一直不把他当作家族里的。但是，据汪明告诉我，王正是很想加入家族的，很想和我们做朋友的。我和汪明说，我不喜欢王正的是，他做人太谨慎，不像我们有话就乱说（指的是牢骚、小广播这些），他和我们玩实际上是因为想吃我们的东西（因我和汪明常请他的客），是贪我们的便宜的。他有了钱的那几天就不来找我们玩了。和王正的关系是一时好，一时又不好，不是经常的，长久的。

我们全体去过的：吴祖光家，洪遒家，陈西（我的表姐）家。

我、汪明、田庄、罗坚、陶冶去的：孟超家，朱琳家。

我、汪明、田庄三人去过的：路翎家。

我们家族内部是这么相约定的：一、对各人的大事（写作上的、工作上的）家族应该关心，要互相帮助。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我们有句口头话："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我们互相常讲："你千万不要找个乏味的，那以后我们都不敢上你家去了。"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我们有很深的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和我们是一样的。

五、有时甚至讲，家族不许增加人了，就是我们几个。不许逢人就谈家族（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说，守不住秘密，所以这点特别叮嘱）。六、家族是排好了哥哥弟弟的，按年龄排，不称现名，而是叫本来的名字或小名。

家族的最厉害的一条处罚是开除家族，轻者记一大过。五四年初我出去以前，陶冶随一个外国文工团工作回来，我们听人反映他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我们就"熊"他一顿，曾以"开除出家族"来吓他。后来就说"记你一过"。再轻者就是平常用的一个办法，改叫"同志"相称。譬如，有个星期天田庄约好九时来的，结果十一时才来，害我们等了很久，我们一见面就喊："田庄同志，你近来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呀，再见。"装出已经疏远了的样子来罚他。对陶冶用这个处罚最多，他从外国回来总给每人送一样东西，分配得不均匀时，拿到坏的东西的人就喊陶冶"同志"

为了表示家族互相间的关系，凡是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的人回来都自动地带一些小礼物每人分赠一样。平日则可以互相乱拿对方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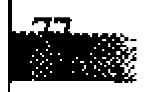
家族的全体团聚是每年过年，"五一"、"十一"这些节日。总要找一个地方去吃饭，大家说些祝福的话，每人说新的一年的理想和计划，然后大家在一起再找个地方去跳舞或玩玩。一九五三年的除夕是在洪遒家过的，然后回青年剧院跳舞。一九五四年除夕仍是在洪遒家过的，然后到电影学校跳舞。第二天上午在尤在处吃饭，晚饭在路翎家吃。第三天在吴祖光家吃饭，第四天在朱琳家吃饭。一九五五年除夕仍在洪遒家吃饭。第二天吴祖光请我们和夏衍的女儿一起到和平餐厅吃西餐。路翎请我们三人吃饭。——除了过年过节一定得聚在一起外，其他星期日、星期六晚上也是在一起玩，但人不一定那么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的内容是聊天，就是谈文艺界的、我们听来的各种各样的事；其次就是到公园去，去的时候多半是喝茶，仍旧是聊天；再就是到吴祖光等人家里去玩，仍旧是聊天。再一个内容是跳舞。在这些聊天里面就是传播许多各方面听来的流言蜚语，消息，或自己工作中的对领导和同志不满的牢骚，和谈读一些作品的意见。

家族在今年大家觉得要用集体的力量鼓励帮助做的事，头一件

是蔡亮的《借宿》这张画。从开始画直到完成，这中间我们和他谈，启发他想，提意见，去看。其次是帮助田庄写完他的长诗《杨根思》，这诗的开头几节写得十分好，但田庄一向不努力实践，多空谈，我们就商定非激励他写完不可。再其次是要帮助汪明找到一个爱人。对于汪明的《第一次功勋》上演，我们都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成功，我甚至决定写一篇批评文章。我们说"汪明会红起来的"。

平常我们在一起时谈文学，谈这个文人、那个文人的事，有时都谈腻了，于是说："以后禁止星期六星期日谈文学。"那么，谈恋爱问题谈女人成了我们在一起谈得很多很多的内容。

今年中，本来还有一个打算的，是田庄、汪明和我合写一个电影剧本，由汪明写初稿。田庄说，反映抗美援朝的剧本一个也没有，写出的要不得，他把几个打字的剧本给汪明看了，他们说："看了这些剧本更增强了信心。"我回来时，他们早已把剧本故事拟好了，只差写。田庄对这事最急，他并且说如果通过了，稿费有五千万，我们拿了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用，流浪儿要疯了。我们谈着这些的时候，兴高采烈，在汪明的床上乱滚，把头钻进被子里。田庄还要我把勘探队也写一个电影剧本，他说，电影局的那些人反正写不出。我们商定，凡是电影剧本不管是谁写的都用三个人的名字。还说要是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也要买它一座小四合院，大家住在一起，那时就真成了一个"家"了。



家族还有一种性质的活动，是为了家族中某一人追逐某一女同志时，全体陪他一齐去，从旁为他出主意，帮忙，并且，用我们的话说，是要在这个女同志面前"显示家族的威力"。事实有：一、一九五四年除夕，我们全体到电影学校去跳了一个通宵的舞，是为了罗坚追求一个叫贺小书的女同志。我们大家都对贺小书热情，使她感觉这一群人都好。后来又由新凤霞去向贺小书提出，此事没有成功。二、陈敏凡在电影局她接触的女同志中宣传"家族"，有一年纪较大的女同志（俄文老师郁虹）对汪明很有好感，我是最极力主张汪明去和她恋爱的，汪明不干，我和田庄甚至对汪明说"我们用家族名义劝你"，他仍不干。在这之前，我们到电影局去跳过舞，陈敏凡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位女同志，我们也显示了一番所谓"家族威力"。三、王蓓年初来北京时，因为她和我的友谊确实很好，这友

谊中互相都有一些朦胧的爱意。田庄等是极力主张我追王蓓的，我自己不能决定，但她来北京时，我们家族聚在一起和她玩，也是这种一显“威力”的举动，使她羡慕我们这一群。四、美术学院和蔡亮的爱人张自疑一起的一个女同志，人很好，是个党员，蔡亮说“汪明大哥可以试试”。我们也一齐到张自疑那里玩，认识了她，故意地捧汪明。后汪明感到了“痛苦”，他也不干。

这个“显示家族威力”也成了我们的一句口头禅。我们的这种得意忘形的“显示”，不仅用在追逐女同志上，就是接触年长的人，我们也是显示我们这种“友谊”，想使人来羡慕我们的。如在洪遒家、萧崎等面前以及凡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我们都“显示”。对于同辈的青年，则更是“显示”。我们有句话：“要使他们感到怪，为什么这几个人总是在一起？”在青年剧院，电影局等地方的晚会上，我们总是一起去，在一起。目的就是要使人们“羡慕”，要使人们都知道我们。

家族还有一种顽童式的流氓恶作剧活动，如在公园里偷看接吻的情人，故意站在他们附近，使他们接吻不成。如在电车上高呼对方的名字，喊汪明叫“汪静轩”、“小汪”，喊我则“李传惠”、“惠惠”，过年时请路翎到西单去吃饭时挤在电车上，我们故意高声喊“徐嗣兴”，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恶作剧。还有就是在电车上的对话故意引人注意（汪明最爱这样），如“你刚从苏联回来”，“我们在平壤的时候……”等，使人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如在大街走着走着忽然大家蹲下。还有一次我和汪明在街上走着，前面有一个女同志拿了一本《人民文学》，我先喊汪明一声：“树理同志，慢走。”以为那人会回头看汪明，结果没有，汪明再大声一点叫我：“俞平伯先生呀！”那人仍然没有回头，我更大声喊：“胡风兄呀！”那人回头看了一下汪明。这种恶作剧不计其数。我们彼此间也互相进行恶作剧，我们都有一些遇事就紧张、夸张，神经过敏的毛病，尤其是我，所以汪明常编造消息来使我神经紧张，慌乱。譬如，他有一次从外面跑来，说电影局贾霁正在写批评我的文章，《文艺报》即将发表，害我一夜都恐怖。我也报复过他，如我学许克城的声音打电话给他说：“蓝光同志要你重新检讨……”把他吓得很厉害，等等。我们还有一种拉拢人的活动。譬如汪明在剧院，为

了和剧院的关系搞得好些，就和剧院的某些同志把关系搞好。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汪明和王正是特别好的，因为汪明的戏在剧院里排，王正在剧目组工作。有一件事，我在成都时，曾托吴一铿同志带一双质料很好的布鞋送给汪明，汪明穿大了些，田庄穿正合适，可是汪明却把它送给了王正，田庄对我说，因为王正在剧院搞剧目，汪明这样做是为了把关系弄得更好。（当然，和王正的关系不完全是利用）我回北京后，因为写剧本，王正也常来关心，我也是像汪明一样对他很好，常请他吃东西，把关系搞得很好，这里面也有因为他是搞剧目工作的，关系好了，剧本会得到介绍、支持和更多的帮助的便利的成分。汪明在剧院还请过一些人的客，这也是为了"把关系搞好"。

我们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能说会道"的小文人，我们以"许多文人的朋友"自居，而且晓得许多的事情和消息。在我们的朋友中，路翎是重要的一个。我们先是以认识路翎为荣，后来在另外的人面前我们就是路翎的好朋友。关心文艺界的人常问起路翎的情况，我们就说路翎最近在搞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很亲密。有些人想知道路翎的一些情况就来问我们。

在我们和路翎的接触中，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去尊敬的，很相信他说的话。尤其在写作上，求他的帮助。和路翎的友谊的形成，在我们是主动的，我们先以生活上和他关系搞好，请他的客，拉他和我们一起玩，后来就发展到我们完全支持他，并听他的话，受他的利用和支配了。

我们除了向别人去宣传路翎的为人和写作努力这一些以外，我们自己也常背地里谈路翎，而且想学他的样，我们说路翎那样的生活才像一个作家的生活，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专写东西。田庄说："我们在恋爱上谈得太多了，浪费时间，空想也太多了，你看路翎就是和那么一个普通的女子结了婚。他在这上头不浪费时间。"我补充说："一个真正想在文学上有巨大成就的人，他就不能不在生活上牺牲另一些快乐。"汪明更是羡慕路翎那间屋子，那种生活方式，甚至他已经开始学路翎写字了。——这是在生活上。

在文艺上，就是我们更强调作家的写作实践，更强调作家的想

象力，而轻视艰巨的生活实践，以及对革命的忠诚这一些根本的问题了，这在我表现最明显。路翎的书出得多，是我顶羡慕的一件事。这种影响最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因为它最容易实现，只要努力写就行——这是最容易做到的。所以正投合了我们的口味。

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对人对事的看法和在政治上所持的态度。这是路翎看准了我们的思想弱点的要害而进行毒害、争取最厉害的一点。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虽然在革命队伍里，还摆脱不了对人与人之间的许多旧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处在逐渐改变和动摇状态上的，路翎就在这个时候来一击，我们就很快站到他一面去了。譬如我们在青年剧院的时候，在闲谈中，他就说朱漪、吴一铿、吴雪、赵越、金山这许多人的坏话，我们当时以为他到底是作家，看人看得深刻，看到复杂面，看到里层里去。在谈到每一件事时，他总是渗进人与人的利害关系进去看。如剧院演《方珍珠》、《保尔》，不演他的戏，这些。把这些一联系到创作上，我们就以为一个作家看事物不能太简单，要看复杂面，就更是相信他了。路翎对我和汪明讲的"同辈青年妒忌心理可怕"这一句，使我们受害最深。因为这话好像又含有捧我的意味，以为自己真有什么可以让人妒忌的。所以我们就把在东北受到的批评完全归于"同辈青年的妒忌"里去了，而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另一含义就是又好像我们和他之间的"命运"是有共通的，只不过他今天的"成就"更大，遭到的"妒忌"更重罢了。这以后，就使得我们更相信路翎，什么话都去和他谈。我们在写作上和体验生活上的计划总先和他去商量，听他的意见。好像他的主意总是多一些，看得远一些。

路翎联络我们的方式是以汪明为中心，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只要和一个人密切就是一串。路翎因为和汪明一直在一起，很熟，从汪明那里知道我们全体的情况。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找我们两人，而他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时，是他说："再找一个田庄一块来玩嘛。"

我们为路翎服务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为他作义务宣传，扩大他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把听到的事告诉他，和从他那儿听来一些事又传播到别处去。其次……

（以下缺，档案原件如此）

在杜高斗争大会上电影局岳野给剧协李超的便条

（1955.8.12）

李超同志：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

岳野

（此件边上李超批示）杜高问题材料

李超　8.12

专案组与杜高谈话记录

第一次之华、蓝光找他谈常熟一段，杜承认隐瞒此段。

第二次七月十六日谈话

《小春秋报》——娱乐性黄色报纸（经理李力邀去）

《晚晚报》——进步报纸，由阎怪如关系（阎父总编）进《晚晚报》（一同进的）

《××报》中间去过一家小报，与王晨牧一同。（此即以后承认的《新城日报》）

没有写这些报的原因是由于忘了，不是故意隐瞒。

又原因，纪芒不可信，这段无可靠证明人。

主要谈常熟及南京到常熟之间的情况。

《剪烛残余》——原美国电影。

《新生报》——帮助改稿子，标标题。

离南京到上海找范泉出版稿子。

由于李金声要找一批人去解放区，找到戏剧学校学生，又找到杜高。

梁中夫经常收到《大众月刊》，《新华日报》，公开阅读。

叫杜高骂共产党，骂得不让人相信了。在香港陆诒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香港，廖沫沙、陆诒叫杜高去夺取阵地：《罗宾汉报》、《国民日报》，不会广东话而没去。

在南京《中国时报》先在外勤后在内勤工作，每天去抄新闻。

和曹明不太熟，只一日看过一次《小城之春》和杜谈到过骆宾基解到特刑庭，他们报社（人报）有人被捕。

没有见过路翎。

承认隐瞒了《小春秋》《××报》《新生报》及李金声往来南京常熟之间的情况。

在贵阳民教剧团小徐叫杜参加国民党，没有干。

旧社会没有骂过共产党，问心无愧。

在《新生报》写过反动文章，想不起来了。没标过反动标题。

七月十六日（竖排稿纸）

《小春秋》不清楚面目，晚报，娱乐性报纸，共四版，主要一版本市新闻，第一版一般新闻第三版副刊，第四版连载黄色小说，四八年因湖南竞选参议员出了不少小报。

《小春秋》原来是程晓华办的，后来卖给姓李的。

原来在《湖南日报》，后来才到《小春秋》去的。

不涉及共产党和进步艺术家的。与此报相对的是《晚晚报》，进步的报纸，由于阎怪如是一同学的爸爸，在《晚晚报》当总编，我们一块进的《晚晚报》。

进《小春秋》经该报负责人李力（?）邀去的。由于在《湖南日报》跑外勤认识的。杜主要写地方新闻，如剧场花絮之类的，当时是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中间又曾与王晨牧进过一个小报。当时的稿子有的靠捏造，有的靠投稿，稍加改动。

到《力报》是邹今铎写了封信就去了，与邹并不太认识，当时曾

征求梁中夫的意见，梁说这个人还不错，可以去。

当时没写，主要是忘了，并不是故意隐瞒。像《新生报》那样。

当时不写《新生报》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明人，纪芒这人，对他也不信任。一九五二年曾问过纪芒他弟弟，曾与一个被镇压了的人有关系。和这些人搞在一起不光荣。又看到纪芒弟弟被捕了，纪芒又当过国民党军。曾给过我衣服，是国民党军官的衣服。

李牧子谈起来对纪芒也不满意。解放后到北京也感到他不好，(但所有材料都写纪芒如何好)不能凭印象来说他不好。

一九五四年田兵谈过话，又曾找纪芒谈过。田兵说有人检举纪芒说有人写过骂八路军的文章说是杜高写的，杜否认，田说天下同名同姓多得很，可以查报的。谈完回来又找到纪芒谈。〔第二三天，在剧院收发室门口，问他杜在常熟写过什么文章，他说写过《剪烛残余》，骂美国电影的。问他报纸性质，说负责(人)已镇压了，姚丹与石的关系是老关系。〕

当时把田兵告诉的话也告诉了记芒。

一九五二年纪芒的妹妹在李维时家，问他家中情况，姚丹在新华书店，妹妹人党了。

杜在《新生报》帮忙标标题，改稿子。他们也没什么正式记者、编辑，稿源不知什么地方来，只知道有些店员爱写稿子，写些东西，改一改就发了。(在《新生报》是一九四九年初到解放共两个多月)

离开南京记得是直接到的上海，找范泉，在刘艺家住的。同时记不清是和李金声先到的常熟还是先到的上海。

李金声和钱其在上海同学，放假到长沙去玩，住在钱家，由此认识的。

李金声，张仁富，当时在上海军乐学校学吹铜管。

当初李金声要到解放区去，住在戏剧学校，有一批学生要到解放区去，当时李知道我在《中国时报》便来找我，相邀一起去解放区。

汤炜的爸爸是国民党《湖南日报》当经理，所以可以公开朗诵马凡陀的诗。

到北京之后才知道梁中夫不是地下市委，说地下市委的是湖南文工团小熊说的，之后回家遇到汤炜，说不是市委书记，只是领

导新闻界。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回到长沙，梁中夫在搞《湖南日报》，常接到《大众月刊》、《新华日报》，毫不隐讳的。在他家玩，谈到写文章，梁中夫讲不要太过火，可以骂共产党，骂得不狠就行了。在香港，陆诒也说过同样的话，陆和廖沫沙叫杜去夺取两个阵地(《罗宾汉报》、《国民日报》在《华商报》隔壁)，当时主要没做过记者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不愿去，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报纸。

在南京《中国时报》做外勤，后在内勤工作，每天下午去市府抄新闻，四八年九月十月，当时看到演《悬崖之恋》改编的《卖油郎》和《原野》，当时没演《云雀》，所以没看。当时和曹明不熟，只与他看过一次招待场《小城之春》。当时骆宾基解到南京特刑庭，扯到他们报社有人被捕。

当时在南京不知道路翎。没有读过蚂蚁小集。

《小春秋》，《退伍军人小报》，《新生报》，"和李金声来往与上海南京常熟之间的问题"，是隐瞒了的。

《常熟日报》

在贵阳民教剧团演剧，小徐叫杜参加国民党，没有干。

在旧社会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问心无愧。

有个困难在《新生报》写过什么反动文章，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标过反动标题。

下次老实地把一些真实的事实写出来，包括历史与北京小集团的问题。欺骗做假的纠正过来。

七月二十一日杜谈话(活页纸)

湖南省党部曾省斋(原稿字迹不清)《湖南日报》社长，

当时正在竞选。经常招待记者，当席发表新闻，

湖南《晚晚报》康德、傅白芦。

谭惕吾(女)当时也在竞选，曾介绍过她。

当时以 TK 发表关于修路拆民房的消息，为警局注意，之后写过小条消息说政府正在安抚。

戴哲民《湖南日报》总编辑。此人一方面与国民党关系很密，

同时又与梁中夫等人也很密。杜高人该社也通过戴和汤(汤炜)。

每天写经济消息,汤炜这一栏,杜跑外勤。

长沙的情况当时政治情况不怎么紧,不像衡阳,从衡阳回来后才紧张起来的,当时民盟尚未解散。

邹今铎当时在《中央日报》副刊当编辑,由投稿关系认识邹,当时杜写的稿子比较进步,邹到衡阳找不到人才找的杜。回长沙问汤炜当时傅紫获解放前人的党,邹今铎说是从新四军来的,地下党员。

从香港来带了许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放到书架上,桌子上,邹到屋子里,和他谈到新四军来的。

从衡阳回来后,汤炜说邹不要是特务吧。因为有一个特务当时与梁中夫很要好,梁并介绍了许多进步书报给特务(赵××)看,当时梁未被捕。

在衡阳写了许多特写,没有一篇反动的。

当时以记者身份列席参议会,写写"花絮"。

当时主要为曾省斋捧场。

当时回长沙失业,杜母见到欧阳敏纳,叫杜去看欧阳敏纳,在没在《国民日报》做事记不得了。可能试了两天。

在一九四〇年桂林李仲融接到过一封信,里面有一条报纸新闻,李声玄自首的消息,李仲融当时很气愤。失业时也曾找过李声玄,也没搞成。

到《小春秋》去时主要认识该报的记者。

在《国民日报》记得吃过饭,对过新闻看过打球,

《小春秋报》的社长是李力,程晓华是名誉社长,与程无关系,主要把牌子卖给了李,后来程到长沙住在报社里,见到程。

陈襟湘,是个老记者,老油子,平时不大接近,退伍军官(地主)很老的军人,××与陈同乡当时生活很糟糕,常打牌,便有时到他家去打牌,当时他想办报,很愿意和记者一起打牌吃饭,很傻的样子。

有一次打牌谈起办报,要托这些人去帮忙,主要有个王晨牧,编第一版,杜编第二版,另外又介绍六队某人去做记者,待遇比较好(几块袁大头),六队人做外勤,杜做编辑。

当时社长要为他们退伍军人讲话，这些人经常打妓院，乱来，而报社便主要为这些人呼吁。

《湖南日报》参议会写了一些特写，参议会为何热烈，与汤炜合写的，汤炜标题《米价又贵了，参议会先生作何感想?》。

经济特写主要是粉饰太平，米价小涨。

当时主要立场是盼望参议会能为老百姓办事。

在南京发表教师复课，物价平稳。

在南京见到吴满有在茶话会与记者谈话，会后出来蓝岗说这消息中央社已统一发了，不必再写了，回到报社有一个油印的稿子，当时没有发，第二天第一版登出来了。

在长沙、衡阳一篇反动稿也没写过，只有反动标题。

在长沙介绍过杜斯屠也夫斯基，之后才发现是反动的。

纪德的《窄门》当时很流行，在《力报》写过《我们要走窄门》。

八月十日与杜高谈话记录

为何离开《中国时报》?

到南京去的目的是想出版剧本，混到上海去当作家。

到《中国时报》，报纸初办，都住在一间楼里。

社长袁××美国留学生，不常来报馆。

程信上说是民营，到京后见到信纸是"国防部"。

宋冲有手枪，很害怕宋冲，

马丁，画漫画(中央大学学生)的，当时北京要解放了，当时告诉他要到北平去他很吃惊，并告诉他宋冲是特务。

退剧本不是范泉，是熊佛西。过去剧展时认识的。当时熊看后便退给杜，后持《中国时报》名片找范泉，把剧本留给范泉，之后范寄信退到南京，经宋冲转到苏州，离南京时没留地址，只在上海告诉刘艺(中报记者)

宋冲信说杜误会了他，他并没有恶意对杜，这种解释可能是由马丁把杜的话告诉了宋。

离南京想到上海做作家，出名。另外非常羡慕剧专的一群人，想去解放区。由于社长请吃饭，问杜高父亲到哪里去?曹明告诉

抓人，怕被抓。最主要原因，一个是想与李金声搞在一起，能走就走，不能走在一起流浪，另一个想出版剧本。

离南京时正在十月，徐州吃紧，当时跑去告诉刘年（现在武汉）。

程晓华曾告诉杜，“中报”主要以民营面目出现，当时拿国防部津贴，今后办到自营。

《罗宾汉报》在上海，香港可能是别的报纸。

当时想到《中央日报》一些大报去，更好一些。当时有一种想登龙的思想（登反动派之龙）。

《小春秋》待遇很低，而《新城报》每月十块大头，待遇比前者高得多，便跑到后一报纸上去，《新城报》只有两个人编，（王晨牧与杜）每天搞得很紧张，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种奴才思想。

到大二条之后与妈妈写过一封信，给白天写过一封信。给舒巧父亲（告诉搬了家）。

李之华　范景宇谈

八月十八日与杜高谈话记录

之华　景宇

去香港的目的，汤炜有个朋友赵克盾，汤本人也都想去香港达德学院学习。

蒋牧良写信给梁仁农。

去香港找父亲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读新闻学院。进报馆没有资格，年纪小。新闻学院夜校，一年，很快便可以出来做事。

同时去的有张自强，（与蒋牧良编副刊）谌震的爱人，蒋给我写了个《湖南日报》驻香港记者证明（路上要检查的）。

到香港之后新闻已停办。

廖沫沙见了一面，引见刘思慕，说是李仲融的儿子，廖问杜读中学，要杜继续学习，学英文，廖自已也因为会英文，在新闻界比较方便。

当时介绍给陆诒进民治新专，要出一部分钱。

带金圈（约九钱）卖了七十元港币。

原写的约半年，实际三个月，因为在湖南要以香港学历混新闻界。

当时与长沙的两个人（两个新闻学校同学）住了间小阁楼，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蒋牧良介绍考达德学院的。（此人认识赵克盾）这个人带赵克盾来，谈到汤炜认识赵克盾。

三月初到长沙，六月回来的。

（原来住在国际新闻社——陆诒主办）

后与蒋牧良介绍姓唐的住在一起，

去香港一个读书，一个找父亲，一个汤炜写驻香港记者证明。所以要我写经济新闻，《湖南日报》，以后写过稿子，发表了。

找到廖沫沙，廖说你父亲已去了山东，留在这儿学习吧。这一段是假的（现在说法是真的）。

离开《中国时报》的原因，主要是李金声要我去搞政工队。

原来要被抓的说法，是夸张的，假的。

当时主要与程晓华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好，泡文化沙龙）

并没有因为小学教师罢课、被扣钱，挨骂。鲁迅纪念的文章根本也没发。根本没给《中国时报》写文章，给曹明写过《论〈原野〉主题思想》。

社长问杜父亲的事是没有的，夸张了的，只问过香港听过邓初民的演讲。

二次大会后，八月二十三号晚范与李悦之找杜谈，无记录，杜只讲填过两个表（《中国时报》及“政工局”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与杜高谈话

之华　蓝光　赵寻　景宇

汤炜，解放前参加民主同盟。

由贵阳到长沙之后，见到一种《文艺周刊》的小刊物，是汤炜编的。

当时高宇组织演出《雷雨》，到后台找到高宇、认识了他们，之后又去找汤炜，而后我们三个人便都熟了。

四队的小徐在贵阳便认识，常去找他。

后与汤、高三人编了一种《戏剧艺术》周刊在《湖南日报》上连载。

在《中国时报》，写过发刊时的祝词。写“特写”写过几篇。其中有一篇写三轮车夫罢工，其中有共产党从中挑拨的字样。

在《中国时报》填的表格上，参加党派的一项填了“国民党”字样的，不但在这张表上，别的表上也可能填，向别人谈话时也吹过自己是“国民党”。

一九四八年杜姑姑告诉杜，王西彦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杜非常惊讶。

《中共杀害和平胎儿》一题是纪苦标的。

八月二十五日杜高谈话

蓝光　赵寻　景宇

在《中国时报》，填过政工局表之外又填过似乎是“调查局”之类的表格。（可能调查统计局）

《湖南日报》、《力报》、《中国时报》三张聘书和一些剪报丢在上海总工会（走的匆忙）忘了带了，以后没去找。（聘书除《中国时报》是印的样式，其余都是八行信纸写的，盖了一颗印）

在香港，有一次陆诒和几个学生闲谈，谈到昨天和廖沫沙谈到，像《国民日报》、《骨报》（不是罗宾汉）一些黄色报纸我们也可以到里面去工作，夺取新闻阵地。《骨报》是家用广东地方话编的小报，内容很多黄色新闻。

叫杜去《国民日报》、《骨报》工作，是另一次谈的。

长沙舅，大：陈国钊（教书），二：陈国铭（学徒），只有这两个舅舅。北方只有陈西夫妇，和陈西哥哥在张家口教书。别无亲戚。

陆诒谈过可去《国民日报》、《骨报》去之后，杜过后又向陆谈找工作时，陆劝他去《国民日报》工作，可以跑跑经济新闻，和《华商报》记者一同跑，当时答应代杜去问问，后可能没问妥，问过一次就没再问。

《青岛新闻》记者马路，张见（李仲融学生），山大学生贾世兴看

过杜。与贾讲话内容：

1. 胡风问题，有人批评胡风派反对体验生活，现在路翎已去朝鲜，做出来给人家看，路翎这些人（胡风派）是很厉害的。

2. 文艺整风有人打瞌睡，（起得很晚）乱扯，扯到马连良很卖座。

3. 对胡风展开批评展开不了，有很多人写文章同情胡风，听路翎讲的。

4.《战斗在朝鲜》正在修改，谈到出版，贾问到稿费，国家出版社稿费高。

（之后曾找贾问过向学校谈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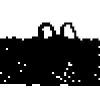
之华写信后曾写信给王里，田庄北京传了些什么。王里曾去青年剧院打听陶冶。

耿林莽、孟力都是下厂的当时认识的。

孙子健（工厂工作组）

当时耿林莽、孙子健要在工厂找爱人，谈找爱人问题。

知道李希凡反映的事之后问马路（党员，比较可靠），马骂了李希凡一顿，说原先吕很看重李希凡，在吕荧受到大学批评时，李反过头来批评了吕荧，吕荧恨李希凡。



问到贾世兴，贾说没和李希凡直接谈，和别的同学谈，传到李的耳里去了是可能的。

孟力在不远另一工厂搞工人文艺小组，邀去讲文艺问题。和孟谈到李希凡事，孟力说他也是《文艺报》通讯员，也可以反映一些意见。（张见也这样说）和他们吹嘘是有的。

李纳在厂体验生活，找他们玩，回来孙子健说过，他也可以为杜高写证明意见。（说是给创作室）

李之华写的信曾给党委会的人看过。（刘俊卿、马路，孙子健、贾世兴，张见，孟力都看过）

关于青岛文艺界主要是孟力谈，对文联不满，他与领导关系搞得不好。

马路讲吕荧了不起。

张见很佩服路翎。

他们说高兰排斥吕荧。

没有谈过方未艾，不知道这个人。

贾世兴来后多谈的路翎胡风这些人。

王毘写的信比较多。田庄的信比较少。

九月一日上午杜高谈话记录

赵寻　蓝光　景宇

路翎刚回来，在李维时的房内，和汪明三人说去作家协会去汇报，我当时刚出《祝福人们》，正在召开文代会，他们要把我剧本说一下，我当时不要他提，他们回来之后汪明与严文井说到创作室有个同志，写了个剧本摆了很久，很苦恼。

还有李维时的女儿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我到李维时的房里，路翎和李维时正在谈把李女儿介绍给张羊尤。

小家族，有一次陶冶想调工作，到艺术局去，要我写信给沈贤，要求到艺术局。说服沈贤，以他名义写了两封信给沈贤、李超，结果调到艺术局去了。

三批材料出来之后在公园见到陈西，当时没谈什么，时间很短，回来见到汪明说不要他们也和胡风搞到一齐吧。(因为潘在日本和胡风在一齐，常问到胡风)当时很紧张，当时在院子里逛了一下，遇到陈西、问他潘开茨为什么不出来，(不要和胡风问题的事搞到一齐吧)。这个话对汪明也是扩大的，因为汪明呆得不耐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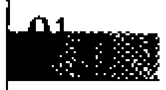
和汪明当时也总是扯谎的，当时并没有见到陈西。

和汪明在“来今雨轩”主要扯萧崎、王肇烟的事，当时提到写一个剧本，主要以我们和路翎为题材。

当时六月二十几号，上午去了一次，前面谈的是下午的事。

我那天在公园里正喝茶，见到一个女人，穿红衣服，一个人走过去，很可疑，汪明指给我看，见到后来有几个男人跟着女的后面，就好奇地跟上去，怀疑是个妓女，一直跟着一个多钟头，见到汪明时还在跟着那个女的，回来之后，一个人坐了三轮车，十一点又去公园，第二次没见到那个女的。

第二次，又一个星期六，又见到那个女的，我向汪明说一定是个妓女，汪明说不是，跟上去，见到那个女的，在黑暗中垂头在那



里，汪明说是失恋的。

我这说谎倒是连累了陈西。

有一次，潘开茨到我家里，汪明也来了，在路上碰到（饭厅旁边），我们就问他，我们这样有没有什么，他问我和胡风写过密信没有，只是向别人说胡风的作品很好，他说这样就没有什么。

在家里，（不晓得是否这一次）谈到刘雪苇，说到批评刘雪苇了。他问在那天报上，告诉了他，回去看了报，又一次来了。许仪耀来了，介绍一下就走了。当时就谈到和刘雪苇在延安认识，后来，就打算去找汪明，在路上就见到汪明。

前面谈到刘雪苇，是许仪耀谈到刘雪苇被捕了。

我单独去找潘开茨，都是为了找陈西，家里的事，他非常关心胡风，问到胡风的事怎么样了。（当时正在批评胡风）

潘开茨所以对胡风感兴趣因为他在日本读书，后来在上海以为胡风是党派去的，办了很多杂志，是萧军带他去见的胡风。

还讲到胡风解放后还搞宗派。其实周扬对他不错，人民代表不是周扬，他怎么当上代表。

我们接触到的陈敏凡，文椿，罗坚追的贺小书，汪明追的贺小书朋友，和张自疑在一起的女同志，打算介绍给汪明，汪不干。

罗小华、（以下我认识的）舒巧、王英之、徐小俭、爱莲、邵景坤（王里介绍的）最多是接吻，性的关系一次没有。

到潘开茨家只看到过《金瓶梅》的木刻春宫。谈性关系的只有陶冶、杜鸣心。

和汪明曾谈过，说“我想和××发生性关系”，他不懂．后来又问到萧崎。

有一次和蔡亮到潘开茨家要看木刻《金瓶梅》，陈西找没找着。

（谈女人，谈性交）为了维系感情，因为没有什么更坚实的基础。

生活上，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也是维系感情的办法。陶冶这次到印度尼西亚，是吴祖光向夏衍说的。吴祖光说夏衍带队，陶冶很愿去，听吴说后，便要吴祖光去向夏公说，田庄在旁也帮着说。

潘开茨谈到胡风，在上海提到民族文学问题，他主要搞宗派，但在进步文学上还是有贡献的。

二流堂的人——吴祖光、郁风、黄苗子、冯亦代、丁聪、张正宇、

张光宇、艾青、戴浩、盛家伦，只有田庄全部认识。

他们的活动——谈女人，吃吃喝喝，谈论文艺界。

九月二日（晚八时）与杜高谈话

之华　赵寻　叶群　景宇　戴再民

开会以后我是想把问题交代清楚。在沙土山（赵寻所住剧协宿舍　崇文门外）的谈话我态度很不好，主要有些问题的确搞不清楚。组织上一提出叫我交代组织问题我就慌了。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我以为只是交代一些隐瞒的反动报纸工作的情况，当时把南京曾填过两个表格，其中有一个特勤处的表（国防部政工局特勤处）这个表不是我一个人填，是《中国时报》记者都填了这个表。我当时编了一些新闻都是"特勤处"名义。

杨铁山，杜高母亲讲是特务，投稿关系（杨编副刊）在《湖南日报》同事。

在常熟和李金声认识的一个王国昌，少爷，要拿钱演戏。

上海《新少年报》比较好的郑马、郁青，同事，还有个唐微风（现在出版社）画插图，后听说开除党籍，很少接触。当时谈到党内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党龄长工作上便好搞一些。

另外还有个邢舜田，他告诉我唐开除党籍的事，包蕾到北京之后曾约我给《新少年报》写稿。唐湜（已写过）

邓西愚在北京铁路工厂技术工作，回北京后找过我一次。

在青岛曾为我写信的老干部叫孙子健，青岛市委干部，他写信给艺术局。

陈国铭，（长沙）曾写过信给我。

陈国健，在北京读书时见过几次，在去朝鲜之前见过。

杨明志，表哥，逃难到贵阳，一直在一起。（父亲报纸消息便是他告诉我的）这次到重庆曾看过他一次，已入党，在师范当校长。

徐保衡，在常熟认识的，到北京曾邀我去机关讲过朝鲜故事，他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会计。

除去七人之外，还有陈敏凡、张自疑、胡秀玉，（田庄、蔡亮、陶冶的爱人）谢容明、吕伦。

所以不同意谢容明，因为见到过给田庄的信，他不满意领导，生活上很颓唐，主要与田庄很要好。田庄和罗坚要他参加，我认为不应当要他。

家族之友，有萧崎。

到吴祖光家去时，曾常见到王肇烟，我今天见到他还那样……我想检举他。他讲的话比我们严重得多。东北小集团主要是他领导的，有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

回到北京之后，在屋里曾嚷着，说有人说他有血债，说"在东北时（正镇压反革命时）他说他在重庆……这次学习时开会在文联见到他，他说你们没有什么，我在部队写自传，有许多历史没有讲，这次都向党支部讲了，好像他说在矿山当过老板，后讲到东北文工团时有人检举他有血债。

他现在还担任《新民报》驻北京记者，一月一百块钱薪水。他主要写文联听到的一些消息，在批评路翎时，他写了消息的。他当记者的事是告诉萧崎的，他们接触比较多，常谈一些国内外大事。

我回来以后，听汪明说，陶冶认识到公安局一个人，专管房产的。他准备结婚租房子，后汪明和我都要租房子。陶冶回来又走了，没租成。又一次吴祖光要买房子，我们要他把曾住过的房子给我们。后盛家伦要租房子，要他租后让给我们几间。

赞成招待小家族的，有朱琳，我们常到她家去，另外还有孟超，我们到他家去，无话不谈。朱琳最熟的是陶冶，对其他人也都很好。和田庄在一起工作的一些人都比较接近，还有小文椿，到她家吃过饭，她不是小家族。

想参加，而且他知道，他曾要求我领着他搞文学，便是陈刚。他和王正一样，很羡慕我们，到东北后找过陶冶爱人，到艺术局之后不大接近了，他和陶冶比较接近。还有一个许仪耀，也比较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罗坚还有一个朋友程若，搞党的工作的，也很愿意和我们一道玩，小家族他是知道的。

电影局有个俄文老师，曾介绍给汪明，汪不愿意。

尤在曾在邓初老家里请我们大家吃过饭，当时谈到丁帆。尤在顶恨丁帆了，他们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罗坚、程若说，没想到

丁帆碰到我们小家族的人啦，将来把……写成材料，搞他一下子。（丁帆正调到罗坚的团体工作）。

在重庆招待苏联专家，尤在举杯"为我们家族"。吴一铿问过什么家族，搞小集团不大好，当时也没在意。

上海王蓓，当时没说她是否小家族，将来很可能成为家族。

"十年之后便登上文联主席台"，只有一次向蔡亮说，明年有希望参加文代会，几十年之后我们都老了，便都希望列在主席团的名单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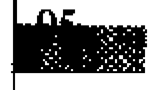
汪明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接触多的便是公刘，他们在香港便认识的，田庄也去，常请吃饭、送书。汪明还有一个人，和小家族认识的，在电影局当科长，青岛田庄，（名字我忘了）还有巴鸿，李露玲，和汪明很要好，在香港认识的，汪明单独去找巴鸿，汪明也常找陈卓猷。

田庄经常去找葛一虹，常吹聂绀弩。

最早认识吴祖光的是王肇烟，汪明，田庄关系也很好，最密切。第一次是王肇烟拉我去吴祖光家的，汪明在香港便认识吴祖光。洪道也是从小认识的，和小家族最要好。

通过我认识的有潘开茨、陈西、王里。

路翎只认识我和汪明、田庄，其他人都不认识。



汪明出版《第一次功勋》是我介绍给邢舜田，交涉出版，先付稿费的。邢见到报纸上发表儿童剧团写《红领巾》消息找我，便介绍他们认识。邢在上海工作认识的。

大会前（今天）和我握手的叫西彩，市文联工作。原在铁路文工团创作室工作。

遇到潘开茨的一次，在大庙，我去打开水，碰到了汪明，我和汪明问潘开茨会不会有第三批材料，不要提到我们。潘说不会有第三批材料了，胡风面目已很明显了。

在洪道家田庄与洪道争论肖洛霍夫的发言，又提到中国的文艺界只能一律的讲话，不像苏联那样自由。蔡楚生进来，也发了一通牢骚，马上把胡风三十万言意见书初印稿拿来，把组织部分翻开议论起来。

第二天到吴祖光（家）也看了同一文件，大家读了一部分，吴祖

光说你们可以找来看一下，这里面很有道理。

田庄最感兴趣的是现实主义问题，过去他……并不同意胡风意见，之后回来田庄反而对胡风的意见很感兴趣，他以为电影局对现实主义解释得不统一主要是周扬的关系。

我刚回来时，他说周扬不当部长，恐怕是发生了问题，主要是没有搞好工作。很起劲地说这一次青年人恐怕要抬头了，毛主席谈到青年人如何如何，他说这一次我要好好整一下电影局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主要发泄自己对他待遇不好，又举出电影局一个整编掉的青年作者，到海军不久寄来的剧本被采用了，简直是讽刺。

看三十万言稿时，田庄叫我读现实主义这样一段，说胡风谈巴尔扎克，证明通过现实主义达到马克思主义，又翻到阿扎也夫是一个非党作家(我立即补充阿扎也夫是在监牢里写的书)，马雅可夫斯基被逼得自杀了。

一开始学习时，汪明说过田庄如写材料不会写他，写我，说田庄对我有意见。

在思想批判时，罗坚刚从乡下回来，到北海一起喝茶，告诉罗坚我们准备交代小圈子的问题，不会扯到他。罗坚说小圈子没有什么，这里面是有好的方面，这一点一定要坚持。他说"我交待一定这样讲"。

我们当时少牵连一个人便少牵连一个，我们三人(汪明、田庄)承担了，他们不搞创作，有些无辜似的，汪明也提到不要扯到小蔡吧，我当时以为不要谈陶冶。

路翎授意我做的事情：有一次在工地写了一篇小说，搞了很多心理描写，《人民文学》退回来了，叫路翎看了之后叫我再寄给《人民文学》，或直接寄给邵荃麟同志。

关于汪明的剧本有很多也是路翎授意的，汪明曾向我说过路翎对他剧本帮助很大，精神支持很大，这里面也一定会有很多接触。

关于田庄去苏联的问题，也征询过路翎，路翎没有发表过意见，态度很冷淡。

萧崎的小广播多带有政治性的，记得有一次谈到肖洛霍夫签名，派农民去苏联的问题。又如马林科夫辞职时，他说美国很注意这事，说肖洛霍夫排斥马林科夫。萧崎本人是脱党分子，而他的朋

友也都是这种脱党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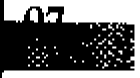
他讲三次大战还有考验我们的机会。

（晚十二点）

有一次好像在《湖南日报》，有很多老记者都是国民党员，我印象当中记得，专管写聘书的一个女办事员，跟我讲过，加入国民党，填表没有忘了，因为当时填的表很多，有没有国民党的表记不清，介绍人可能是社长（陈大仁），可能是女办事员盖的章。

检举田庄的反革命罪行（杜高）

一、去年底，我回北京的当天，田庄到车站接我，那时正当文联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时，他就告诉我北京发生了大事，《文艺报》受批评了，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反对压制新生力量等等。另外他就讲到周扬同志领导的文艺界是有缺点的，说周扬同志在离开文化部的大会上也作了一些检讨，承认自己工作上有缺点等，他说这一次以后文艺界会出现新气象了。尤其是对年轻人，他说团中央也已经派人对电影局调查，他要给中央写一个详细的材料，说电影局压制新生力量最严重，对年轻人根本不培养，说有一个青年编剧人员被整编了，调到海军文工团去工作，结果，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拿回来，写得很好，又把他请来修改。他说，这简直是对电影局的讽刺。他发泄了一些电影局对他不培养的牢骚。



二、胡风的《意见书》刚印出，在内部发给一些负责同志的时候，田庄就从蔡楚生处看到了。那天，我，汪明，田庄都在洪遒家。大家都对胡风在文联会上的发言关心，谈了许多，刚好蔡老进来了，带来了一份《意见书》，洪遒是看过《意见书》的，他觉得有一些问题，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他说要好好研究一下，更引起我们的兴趣。田庄立刻借了，一晚上就看完。第二天，我和汪明在吴祖光家里也看到了这份《意见书》，我们读了一段，田庄下班后来了，他是读过了的，便要我们特别注意读“现实主义”一节，说这一节提出

的问题很新鲜（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并且指到"阿扎耶夫是非党作家"这句，说"他还是个非党"，我就补充了说我听吴一铿讲阿扎耶夫犯了法关在监牢里写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后来吴祖光回来了，他看了一下《意见书》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来，只说"应该仔细看看"。田庄之特别注意"现实主义"一节是因为他说现实主义的问题在电影局很混乱，他说，周扬和雪峰同志的解释都不同，引起大家混乱应该领导上负责。田庄并说刘芝明同志是提倡公式化的主要一个人，他在东北指导下写成的《新事物面前》等就是概念化最突出的例子。在我这次回来后，和汪明田庄等谈起创作的一些问题时，我是明显地感到田庄的不满领导的情绪是最强烈的，他直接提出对周扬、刘芝明同志的不满，这在我们当中是唯一的。而且田庄的这种情绪使我奇怪的是在我五四年出去以前，我们谈一些文艺问题时，他的态度是不像现在这样激烈的。那时我们谈自己应如何努力这一类话较多，批评领导较少。（田庄的对胡风的同情是直到我那天听了周扬同志《我们必须战斗》以后晚上在吴祖光家传达给他和汪明听后，才有改变）

三、我回来以后，汪明、田庄都说想在外面租一间房子住，因为陶冶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同志专管房屋的，租房子很方便。汪明和我谈时我也非常赞同。那时吴祖光预备买房子，他说过他现在住的那房子很便宜，我们希望能让给我们住。后来听说盛家伦也在找房子，想找一些单身汉一起住，汪明便去和他约好了，如果租到了给我们留几间。

四、我回来以后，觉得田庄和路翎的熟悉程度也超过了我走之前那样。去年一年，汪明和路翎的接触是很多的，汪明说路翎对他的剧本帮助很大，所以，我想这一年中汪明一定带着田庄和路翎有过一些接近的。而田庄从他告诉我的批评《文艺报》等的事情时，是非常同情和支持胡风、路翎等人的。今年过年时路翎要请李维时和汪明、我到他家去吃饭（因李维时请过我们）时，还特别要汪明叫田庄一起去。（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俩人去年中曾带了路翎到过刘白羽的家）过年时，田庄告诉我们电影局的领导上要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正在考虑，我和汪明是极力鼓励他去的，碰到路翎时我们告诉了路翎，希望他也鼓励田庄去，路翎对这事的态度很冷淡，

只说了："学习，也好嘛。"田庄、汪明和路翎一起时，还谈起陈卓猷、黄若海的情况（田、汪二人对这两个人也都是很熟的）我记得的是过年吃饭时，田庄告诉路翎黄若海的剧本写好了，还不错，比他以前写的好，等。好像路翎和田庄还谈过葛一虹，路翎和葛一虹好像也是很熟的，而且对葛一虹很好似的。（这只是我的印象）

一份交代（杜高）

我印象里好像刚进《湖南日报》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坐在经理部的一个负责人员登记，发薪等事务的女职员和我讲过入国民党的话，我记不清是否填过一张表，也没有提什么介绍人之类，也没有发给我党证之类，也没有开过什么小组会，因为《湖南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大概把入国民党看作是一种很轻便的事，（我不知道别的职员是不是也这样）我当时也没有很注意这事。以后也没有提起过了，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转什么关系。（九月四日）

——整理者注：此件写在揭发田庄的材料后面，字很小，有反复涂改的痕迹。

检举王肇滙的反革命言行（杜高）

我认识王肇滙是在一九五〇年底，参加抗美援朝后分配到东北后政文工团一起工作时起。那时他和萧崎、汪明就已经结成了一个青年剧院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志中的小圈子，我被分配到和他们同组（编导组）工作后，卷进了由王肇滙为首的这个小圈子，所以我对王肇滙的一些言行是比较深的了解的。参加文工团的初期，王肇滙就在我们当中散布对领导的不满（因为他在行政上负责，接

近领导），他和当时的副团长李兆澄是老朋友，他说他了解他无能，什么事都由王肇湮顶替着做。他也在我们当中说了许多团长储虹的坏话，说文工团的三个领导之间如何不团结，如何闹人事纠纷。他刚参加抗美援朝不久，就借故回北京，从北京回来后就用散布文艺界的消息来吸引我们，并且拼命夸青年剧院如何好等等来引起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动摇我们的抗美援朝的长期观念，他熟悉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他以谈论这些人们的趣事来联络像我和汪明这样的正在学步的文学青年。我们很喜欢听，他会讲，每一次总是听得我们哈哈大笑。当我们谈到周围同志的时候，他总是轻蔑地好像说笑话似的说："我们不和他们计较，我们写东西。"我应该说，像他类似这样的许多许多的话对我们当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看到了像我这样的青年的思想上的许多弱点而加以利用的。他当面用各种吹嘘我们的话来笼络我，使我益发瞧不起周围的同志。在生活上，他带头领着我们破坏纪律制度（如到外面吃小馆子等）。最初，像我和汪明还有些不安，觉得太特殊了些。他便说许多文人"自由主义"的笑话来使我们觉得这样做并没什么了不起，我记得的是他讲过史东山等的故事。那时，我自己和一个女同志发生恋爱，而部队纪律不许恋爱，我很苦闷。他就说恋爱是不能禁止的，这个纪律是违反《共同纲领》的，这是禁止不了的。他劝我不要恋爱得太明显等。当部队实行检查信件的时候，他也说这是违反《共同纲领》的，他要控告。那时，许多同志对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正视的时候，他用各种话来挑唆我们对这些同志的不满，骂他们"幼稚"，"不懂得我们"，"我们不要去争，我们是服从抗美援朝"，"不是抗美援朝都不会认得他们这些人"。后来，他又到了北京，回来后更说，这些人对他的批评、打击，他已经汇报给统一战线部，他说："我要告就告到大头头那里，我要问部队里有没有统一战线。"他就向我吹嘘了一通他和郭老、阳翰老、夏衍同志、邓初老诸人的友谊，说他过去在重庆做了多少有益革命的事，等。使我们对他羡慕，而且我们也帮他在群众中做了宣传。要同志们对他的批评不要像对一般年轻同志一个样，等。

当我和汪明写的一个剧本《到汉城去》写完后，后来领导上提了一些意见时，是他最先挑拨我们对领导的不满来的，他说："这是

第一个反映朝鲜战争的剧本，只能鼓励！”他说：“楼老头子（指楼适夷同志）有些狭隘，”他说，“我们排了这个戏到北京去演。”等到我和汪明对抗领导的情绪在他的挑唆下强烈起来的时候，他又说：“稍微改改，稍微改改。”当朝鲜战争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都关心时局，他和我们谈许多内幕新闻，他是有本领钻到领导干部那里看到“参考材料”的。我们之所以特别喜欢接近他，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从他这里听到许多新鲜的事。譬如他说过麦克阿瑟要在朝鲜扔原子弹，又有一种带原子头的子弹要在朝鲜用。当我们又听到部队将要我们参军的消息时，王肇湮首先说他是不会被留在部队的，他是民主人士，他有老婆孩子，部队没有适当的职位安插他。然后他指着我和汪明说你们俩是会编人的，那你们一辈子写后勤。我和汪明都不愿意参军，抗美援朝以后还是要回北京去的。他说，以后如果留你们，你们都可以写信给周总理的，周总理说的战争结束后就回原单位。后来，和谈开始后，他又从《参考消息》中看到许多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仗打不长了，说了许多（我现在都记不太清了，反正我们知道的消息都由他来）。

当北京有一批作家到大连写东西，他尽力夸耀，使我们都想参加到他们里面去写东西，而不愿呆在文工团。他从北京回来，带了一本油印本的《英雄母亲》来给我们看，他从那时就向我吹嘘路翎，吹嘘他在重庆时碰到胡风时，邓初老如何向他说胡风有本领。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刘盛亚到文工团创作组来玩，介绍我们认识。这个刘盛亚在解放后还写过一本反动小说，而王肇湮还开玩笑要他把这本小说改成剧本给我们演。王肇湮说这所有反革命的话的时候都像是说俏皮话，把我们逗笑，所以时间长了，我们根本就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好，相反认为和王肇湮一起有说有笑很“轻松”，认为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不严肃惯了的，没有什么，甚至当他告诉我们有人检举他过去有血债时，说这样重大的事也是很滑稽的样子，我们连追问都不追问。据我平常听他说的，这个王肇湮出身地主阶级，过去很有钱，是一座矿山的主人，做过投机生意，有很多金条美钞，自己还有过一部小汽车。

他的地主阶级的悭吝与剥削，损人利己的本性从生活小节—

直到工作上都表现得露骨惊人。抛开平日生活小节上他对我们这些接近他的人尽情地利用以外，可以说他参加文工团以后没有踏实地完成过一两件工作。他不劳动，他只是吹、跑、交际，好像样样事都有他参加。他是当时编导研究室的主任，他没有编过一个字也没有导过一个戏，他把我们平日做的事当作他的成绩去宣扬。最恶劣的是他挑拨我们对领导的关系，他接近领导，把领导上对我们批评的一两句话又传给我们，好像是关心我们，我们就信以为真，互相包庇，和领导群众对立。和丁帆对立的关系最初是他引起来的，他说丁帆一到文工团就在一个会上否定了全体编导研究室的工作，他告诉我丁帆看上了正在和我恋爱的那个女同志王英之。当同志们对我们提出了批评时，他引一句列宁的话来鼓励我们坚持错误："不工作的就不会犯错误。"意思是指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而那些批评我们的没有做一件工作，使我们更自以为是，对批评更加抗拒。这个王肇湮平日旧社会习气严重，他向我们不断吹嘘他过去生活的豪华来腐蚀我们，他对同志从无半点诚意；即使是对我们这个所谓小圈子的人也是一样，他只是利用我们平日的工作他拿到上面去吹牛。后来，我们到了朝鲜，他和李兆澄一道利用志愿军后勤部要成立文工团，把我们先派到分部去后，就回北京了。他们俩人在北京住了一两个月后回到朝鲜就因"志后"要整编，我们就一道回国了。可说，他是没有做过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的。

回到北京以后，我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他仍常来找我们，传播了流言蜚语，他的消息奇多，文艺界的名流他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所知道的，所传播的消息很大的部分是从他这里听来的。他同情胡风"佩服"胡风，并且告诉我们领导上如何重视路翎，使我们对路翎也更加崇拜。他所告诉我们的消息不胜枚举，我很难逐条写下，有一些我们后来又告诉了别人的，我已当着我的材料交代过了。从郭沫若先生和女秘书恋爱一直到老舍和胡风是好朋友，文艺界的各种动态、消息。我所知道的他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在大连××工厂当工程师的朋友，他们有经济上的来往，那人还预备接他老婆去休养，给他买收音机。另外，他和吴祖光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在香港时曾闲住吴家，他吹嘘他们的生活如何享受，夏天是不喝开水的，满冰箱的可口可乐等。他在香港没有职业，而黄金

美钞很多，真是怪事。

他告诉过我们他目前除文联工作外，还担任了上海《新民报》特约记者职务，每月收入一百元，专门写文坛消息。譬如路翎在剧协发言批评胡风时，他便赶紧往上海递讯。

他和路翎胡风也有过单独接触，关心他们的情况，又把从他们那里知道的事告诉别人。他和葛一虹家的人们接触很多。

我要求组织彻底地检查他的底细。过去，我因为自己的许多错误，而且和他混在一起竟不觉得他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和行径对革命的损害，尤其是觉得我们有好多事也牵连在一起了怕惹出麻烦。今天，我要检举他，并且，我沉痛地告诉组织，从一九五〇年认识他以后，我自己是受了他的许多恶劣影响和毒害的。我想，同他在一起的萧崎、汪明也是非常清楚他的，一个长时间是他领导我们的工作，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预备继续写一些具体事实和言论来检举他。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最近半年来接触王挚湮时他的言论

一、当我刚回北京时，正是批评《文艺报》的时候，第一次碰到王挚湮时他就告诉我，胡风发了言。他非常得意的样子，我因为非常关心，就问他情况，他说："胡风有些道理。""冒火了"，"胡风的发言惊住了所有的人"，"别的发言根本没人听了"，"事情要搞大了，胡风批评的是整个文艺界，不单是《文艺报》，"有人支持胡风"等等，从神情到话的内容都是赞扬胡风、佩服胡风的。

二、他把胡风和路翎的发言的群众的反映和从领导同志处听来的意见告诉路翎。（还把领导上要全面批判胡风思想的计划告诉路翎）

三、王挚湮攻击老舍在文联会上的发言，说他油滑，说他明明对文艺领导是很不满的，但说得比胡风油滑多了，不像胡风"冲"。

四、王挚湮在我们面前不止一次地说吴雪的坏话。他说他过去帮过吴雪很多的忙，现在吴雪是把所有的旧情都忘了。……另外，

他还诽谤吴雪是不读书的，学识是浅薄的。以此来破坏领导同志的个人威信。他在谈到吴雪的时候每每以吴雪老友的姿态，似乎是最了解吴雪的人的口气来说的，以此来博得听他讲的人们的信任。

五、他和路翎的口气是一个样的骂吴一铿，骂吴一铿刻薄，小气，仗势欺人。

六、他说郭沫若是风流人物……

七、他说史东山是不服批评的，有些年轻人批评了他，他就不拍片了，后来周总理关照电影局领导不要采取对年轻人的批评方法来对他。王肇湮说，史东山是"老包袱"。他的目的是宣传这个来要大家都抗拒批评。

八、……

九、当批判《文艺报》的错误的会刚开过时，他就来告诉我们，要全面批判胡风了，他说今年要拉"二胡"：即胡适、胡风。他是从个别领导同志那里打听来的，而且把消息告诉路翎。这以后，他又告诉我们："等着吧，梁漱溟又要开始批判了。"

十、胡风的意见书刚印出来时，他见人就问看了没有，见人就谈。他说，胡风是有学问的，是懂文艺的。他说胡风胆子大，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做法和理论。

十一、后来，展开对胡风理论全面批判以后，他又说过胡风和胡适不同，胡风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胡风只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满意。

十二、他宣传胡风、路翎有学问，有才能，努力也是很突出的，他没有说过他们一个字的不好，总是夸奖他们而且还代表着比较高的负责同志的意见来讲，使听的人以为这是领导上的看法和意见总错不了。

十三、和这同时，他也是诋毁比较好的、正确的文艺作品的价值，他说过《春风吹到诺敏河》一类作品的坏话。

十四、当《红楼梦》问题正展开时，他立刻说，李、蓝两个年轻人要好好学习了，不要写了，越写下去就要"露相"了（指他们没有根基越写越空洞）。

十五、批判胡风思想的初期，他访问了孙定国、艾思奇等哲学家，从那里知道胡风思想来源于贝格森主义，他于是到处谈，并且告

诉路翎说哲学家正在研究从哲学思想上做批判胡风思想的工作。

十六、他并且告诉我们，也告诉路翎，批判胡风要搞大半年。不是几篇文章就能收场的。

十七、路翎的假检讨做完后，他立刻写消息到上海《新民报》，说路翎已经在批判胡风了。他认为这篇检讨很“诚恳”。而且说领导上对路翎是抱着希望的。说肯定他努力、年轻，有才能。

十八、当第三批材料发表后，他因老婆去世住在汪明处，我遇到他时，他谈路翎如何讽刺他，讥笑他，以表明他非但和路翎等关系不密，反而是受他们攻击的。

十九、当这次运动展开时，他去找萧崎，对萧说，领导上此次决心很大，要清洗一批人，宁愿让这些人失业。

九月四日

检举王肇湮(二)

一、王肇湮和张逸生的关系：王肇湮和张逸生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关系很密切。从生活到工作，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张逸生是很清楚王肇湮的底细的。王肇湮到东北去工作时，一切都托张逸生代管。王肇湮和张逸生在剧院工作时不满领导，常在一起发牢骚，议论这，议论那。后来王肇湮调到剧院后，他所知道的剧院消息都从张逸生处得来大半，而他自己则将外面的消息传播给张。

二、王肇湮和萧崎的关系较同我与汪明密切。他俩常常单独聚会，或同往张逸生处聊天，也是无话不谈的。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不仅纵谈文艺界的消息，而且爱谈国内外大事。他们从无线电听来“美国之音”的广播消息或从别处打听来一些消息互相议论。

三、王肇湮和青年剧院田禽、王正的关系也很密切。和田禽也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也在一起工作过的。王正则是喜欢打听文艺界消息，并且对文艺界目前情况不满，和王肇湮在一起时也是批评这，批评那。而听到王肇湮广播的一些消息，他也在另一场合就广播出去。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



摘杜高给陶冶的材料

一、我正式认识陶冶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在青年文工团工作的时候，通过的关系是王里。但在这以前，我是看到过他的，一九四八年冬，我和李金声、张仁富到上海曾到"育才"学校去过，因为张仁富是"育才"的学生，"育才"隔壁的一个小弄堂里有一家小茶馆，剧专的和"育才"的都在那儿喝茶，我也在那儿呆过，在那儿也见过陶冶，但没有接触。

二、陶冶在青年文工团时就和王里很要好。一九五〇年七月，我在上海总工会下厂去体验生活，那时王里来找我，谈到有一个到北京工作的机会，是北京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长到上海来调人，到过青年文工团，陶冶和他认识了。陶冶说铁路文工团条件好，我们都由陶冶的关系认识了铁路文工团的团长，调到北京来，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三、陶冶在青年文工团时，就和王里、吴俊生、吴乐、吕伦搞了一个小集团，不满文工团的一个教导员。群众关系也不好，只想着调工作，到北京来，结果王、吴、吴、陶一起来京。吕伦随后也就来学习。一到北京青年剧院，陶冶、吴俊生就和汪明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时我刚来北京也常和他们一起玩。吴俊生不久调回上海，汪明和田庄很好，所以，由田庄、汪明、陶冶、我就在北京开始了我们的"家族"。

四、他是我们"家族"中基本人物和活跃人物，"家族"要是少了他就会搞不成。因我们结合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聚在一起乱谈一气，他最会说，也知道得最多，说起来就没个完而且不准别人打岔，说话最多的是陶冶，其次是田庄。他们认识的人多，知道的事也多，谈起劲大。他搞小圈子也是特别有劲的，他到那儿，很快就能搞成个小圈子，总觉得陶冶对朋友很热诚，所以常常从他这点来原谅别的缺点，结果是纵容了他。在这方面我和汪明的责任是特别

大的，因为他过去什么人的话都不听，比较听我们的话，而有许多次的确觉得他太不像话了，以所谓“家族”的“处罚”来开玩笑地吓吓他。比如谈女人，他是最狂热的。他并且说，他亲耳听见田汉同志和洪深同志一起谈“性交”，好像这完全不是一种丑恶的事，而是文化人的“潇洒”之一似的。在这方面他讲过许多，凡是有些名气的文化人的事他仿佛都知道。他是到处听，到处探访来的。

我们都有这种“爱好”。故意夸张自己的缺点来取笑别人，我们常常说自己是“坦白”的，我们没有“秘密”这是我们的口头禅之一。田庄更是用过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来壮胆：“只有知道自己美德的人才敢于嘲笑自己。”这成了我们古怪的哲学。在正常的人们看来，我们是可悲的，而我们自己却很得意。

我们以为一个人总得有几个好朋友才能活下去似的，陶冶尤甚。一离开了我们，他就感到“孤独”，他和别的同志不能正常地相处，所以他特别热衷于小集团。他有许多根据，这根据就是他知道别的许多文化人都是因周围有自己的特别亲密的一些朋友，而特别羡慕这些人们。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做的，这些人在一起就是无话不谈，就是互相扬善、隐恶。

他和我谈有关政治性的一些事：

(1)他说，周总理从日内瓦经印度的时候，在住过的旅馆里，每次给的小费都是几万，他说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感觉我们制度的优越，他说他们也是这样的，总是随手就撒钱。

(2)他和李和曾两人打前站时，在新加坡飞机场碰到了一场很危险的阻挠，大意是在飞机场被一个警察不让他们上飞机，要检查他们的行李(那里面都是宣传品)，李和曾应付不了这局面，陶冶则用外交官的身份巧妙地应付过去了。塞给了那警察一些钱。

(3)为了不使外国人瞧不起，他在飞机场的酒吧间里如何撒小费给招待员。

(4)在新加坡一个大旅馆睡过一夜，如何惊心动魄，冷气管安在墙壁上，李和曾以为是录音机，两人一句话都不敢说。

(5)我国驻外国的大使馆，说什么事都要征求苏联大使馆的意见的。

(6)他在香港时住在新华社，那地方很秘密，说香港很复杂，他

们不敢上街。

(7)说在印度演出是一种斗争,印度政府并不愿意让更广大的人民来看演出,故意阻挠,控制票的售出和演出场数。

另外,他讲代表团内部的事。

1. 他在代表团和非党同志关系好,戴爱莲等人闹情绪,都和他谈。他说这些艺术家经常闹情绪。

2. 他说郑振铎是大少爷,照相要用五彩胶片。他说代表团本来可以早回来的,因他要游广州的某名胜呆下来的。

3. 他说同辈青年对他工作上有妒忌心,总爱挑他生活上的错。

4. 他和汪明、田庄一起到吴祖光家去过两次,我没去,在那里他们更会谈得多一些。

5. 陶冶和路翎也很熟,他叫路翎为徐大哥,因路翎曾在"育才"教过他的书。但我知道并没有更深的关系,和我们一样是崇拜。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楼适夷致汪明的信

汪明同志:

来信收到。丁帆同志曾经说要用个人名义写批评杜高文艺思想的文章,后来他把稿子给我看,说要送《文艺报》发表,我看不合适,在稿后批了,大意是应从杜高已对外发表的作品分析批判,不是用揭发隐私的态度来批评一个作家。退稿给他,以后的事我都不知道,现正查问。

在这以前,文工团支部由直属党委给剧院党的材料,事先亦未经部领导同意,事后检查底稿,我个人对其内容精神是不同意的,并当面指出丁帆同志处理此事不够冷静,有私人意气成分,他也自己承认,向我作过书面检讨,但在思想上仍未搞通。

我认为丁帆同志处理此事缺点很大，对同志缺乏与人为善精神，心胸狭隘，意气用事，必须在长期教育中提高其认识，予以纠正。但杜高同志等在此一段工作，所暴露的思想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在三反运动深刻教育之后，经剧院组织正确领导下，能痛下决心，改造自己，是值得欣慰的。组织上一定会根据你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和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来衡量你们，有缺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对你们不会有什么损害，不必因此而极度不安。《文艺报》和剧院组织如需要我个人和部领导上的意见，我可以提供。对于这件事，我个人和部领导上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敬礼

楼适夷

六月十四日

〔此件批注：关于杜高思想批判的信(4)〕

历史信件：王英之给杜高的信
(1952年3月23日)

〔之一〕

这只是一封私信，谈及私事的多。但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以为仍可帮助组织对东北情况多作一些了解。

杜高

亲爱的：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有那么一大堆话要讲，已经是再不能容忍了。亲爱的你不会知道，也不会了解，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精神上受着多大痛苦。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对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以前我是胆小的，有些怕，现在我不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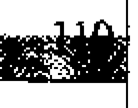
你们"志后文工团"的确是有很大变动，尤其是近来，你们到剧院后，剧院的负责同志曾来信要关于你们的意见(当然剧院这样做是对的)，信寄来后，群众不知道，也没公开宣布，只找了全团三分之一的同志组织了会议，给你们提了意见。这个会可以说开得乌

七八糟(这是参加会的同志偷偷告诉我们的,至今尚未宣布曾开过这个会)。有几个人在会上大骂,但是大部分同志很少发言。这个会造成部分同志不满,有几个参加会的同志想往上反映,团长一直没发言。后来洪纬在大会上欢迎团长讲话,团长不得已将大家的意见又重复一遍。这个会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多讲。

会后,丁帆发动几个同志给剧院的负责同志写信,让剧院同志知道并不是私人报复,而是群众意见。今天早上又在大会上团长读了一篇信,信是给剧院领导的,是谈你们五个人的情况。我不想多讲,你只管去想最脏的字眼,卑鄙龌龊等字句是满篇的。当时我听后,气得我发笑,信的中间还有你在前方给我写的信,他们把它抄录下来。信中写的是群众一致要求给剧院写的这封信,当时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另外关于你们的鉴定群众要求读一下,但是没给大家读(信是准备寄往剧院领导,共十几页)。

传惠,我真是气得不得了。他们叫赵清给你写信,写完后,还给洪纬看,据洪纬讲"写得很动人"。我真不懂难道想玩弄你吗?

你们的鉴定和信如果寄到剧院后,剧院会对你们有很坏的印象。在信中写,对党对人民疯狂地进攻,流氓作风等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这一类的话是满篇的。亲爱的,我告诉你,你必须牢牢地记住"好好的,努力的工作,一点都不能放松。"因为现在我们必须这样做,使剧院的组织不相信这种鉴定。



不但如此,他们计划着给《文艺报》写信,然后要求在《文艺报》发表,最初是让傅增祥执笔,但傅增祥同志推说有病不愿意写(由此你可了解群众是否赞成他这样做),他当时很生气说"好,我自己来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上级是否通过寄去了。

传惠,你该会知道,我绝不能容忍别人这样继续毁谤你的,在你的工作机关毁谤已经够了,我再不能容忍别人继续在社会上毁谤你。我现在变得大胆了,我准备去找代理宣传部长、黄科长,将这一切都和他谈清楚。我想尽办法绝对不能叫他把这封信发出。淑之他们几位同志已经去谈过了,组织上非常支持群众的意见,鼓励大家继续斗争。我想这件事情弄清后,你们的鉴定也会重搞(这份鉴定和信已寄出)。

传惠,也许你会想"恐怕不太严重吧!"不要这样想,不要过于

相信团长，因为他有把柄在丁帆手中，他怕他。名义上他是团长，但实际是丁帆掌握一切。上级领导对文工团的领导非常不满，又听说有这种事，他们已经准备好好搞一下，将文工团清理。

在某些地方我写的恐怕是不够详细，淑之也写信了。你可以好好看一下，我不想多写了。我的心绪的确是很乱的。

亲爱的，我盼望你能好好地安静地读信，不许冲动。你的冲动会破坏好多事。我最怕你不冷静。淑之告诉我说，你还没长大，让我多原谅你。我也时常这样想："我的大孩子真麻烦，我每件事都必须关照得很仔细，不然就会坏事，就会给别人坏的影响。"传惠对吧？你真是像没长大，可是样子又像是个大人了。由于这样，使好多人都不了解你。我真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地了解你爱护你……

我知道你在北京会非常愉快的。可是亲爱的别忘了，高兴的时候，往往会冲动，会没顾忌地谈笑。我希望你能高兴，当我听说你很愉快的时候，我也得到很大的欣慰。虽然高兴，但决不能忘记，愈是高兴愈是应该保持自己内心的冷静，不能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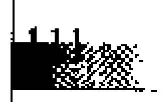
你近来的生活、工作如何？我是亟待知道，来信告诉我。《俄华字典》已经买好了，我找时间给你寄去。

这封信收到后，不要和别人讲，只可以和其他四位同志谈谈。

你们近来是否三反学习，除此而外还干什么，我好像对你们现在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我真想知道。不写了。

好好地安心地等着我下一封信。

你的英之 52.3.17 夜



我们现在是在开会，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好的，我坐在墙角假装记录写了这封信。

淑之和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讲，愈是话多，愈不容易写清楚。所以我们就不想写。

告诉你，我还要重复，我记得上次的信中告诉过你，你的周围有那(么)多人鼓励你努力。

英之又及

〔之二〕

亲爱的传惠：

每天都在盼望着你的来信，这已经是你走后的二十三天了。二十三天中我只收到了你一封信，这是使我很难满足的。虽然我知道你的三反学习会很忙的，但毕竟是我很难一点都不责怪你。因为你写信写得的确是太少了。这让我对你增加了许多怀念。望你能收到信和很快的回我信。

今天收到了姐姐的来信。我已经盼望很久她的信了。收到了她的信我高兴得什么似的。她的信中曾谈及你，你去看了我的妈妈。从妈妈的来信中我知道她是很爱你的，像爱我一样地爱着你。你知道妈妈是很善良的人，她几乎爱所有的人，当她刚刚知道我认识了你的时候，她就盼望能见到你。

昨天张逸生给淑之来了信，我看了一点，信中曾提及你们。从他的信中我知道你是很积极地参加三反学习的。他谈那几个老包袱有很大进步。我想你究竟不是什么老包袱。你比他们要年轻得多。我相信你在三反运动中会有很大进步的。当三反学习后我见到你时，你会变得更值得别人来爱了。我听了这许许多多的事真是说不出来的愉快。亲爱的，我为你的进步提前向你庆贺。



告诉你，亲爱的，上次的信中所谈及的事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这几天我们正在开民主大会，公开给领导提意见。我所有的意见都提了，关于你和我的问题我也谈了。这件事是我们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们绝然分开。这两天开民主大会基本上是很友善的，但也可能我为这件事情受到处分的，没有正式决定。我相信我是为着真理而斗争的。我是敢提意见，同样的，我也是敢于承认错误的。关于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的事，还没完全分清是谁对，谁错。

你的生活、工作如何？我都不了解。望你来信。你的妈妈有信吗？请代我问候她好，哥哥的身体如何？不写了。

亲爱的，再见！

英之

一九五二．三．二十三

田庄坦白材料摘录 1955.8.9

（此件前批注：这是田庄初步坦白的材料，保留尚多仅供参考）

我们这个小集团——“家族”事实上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我、杜高、汪明三个都从小离家，很相投，加上他们熟识的育才同学、剧专同学如罗坚、陶冶、王正、杜鸣心等等，还有蔡亮这些人，大家在一起，自然地形成了小集团，杜高说我们这是个小家族，大家也就这样称呼起头。大家互称哥哥弟弟，“流浪儿童”“大流浪儿童”等。

杜高和汪明在家族中的地位，比方说是一等，我就接近一等。我们三人是主要的成员。杜高把大家拉到一起，在思想上影响大家，真正把家族叫起来，把大家搞起来的是杜高。汪明与每个成员都好，能团结大家，他没有杜高那样复杂。杜高为人有些小气，有时闹意见，跟这个不好了跟那个不好了（如杜高跟李维时老婆吵一架就不好了）。

跟杜高好的人有上海熊梦远，有王攀烟，季芒（以后杜高又跟季芒不好，季芒说杜高在南京被抓时，是季芒掩护的）等人。

跟汪明好的有《人民日报》的陈有为，有洪纬，有刘娜，李维时。上海跳舞的吕仑跟汪明、谢蓉明好。

张逸生跟汪、杜都好。

王蓓不算家族里的，杜高追求过她。

上海实验歌剧院的谢蓉明跟我熟，杜高说他怎么能成为我们家族里的呢？“陈敏凡算是家族里的”，批准陈敏凡为我们家族成员，有一次杜高这样说，“可是萧崎还得考验半年”。但田庄又说陈不算成员之一。（按：陈在电影局交代说算是成员之一）

萧崎有一次说：“你们老是这样家族家族地叫，早晚要出事的。”

我在家族之间扮演的角色是一方面团结了大家，一方面在理

论上影响大家。

我、杜高、汪明三个在一起常是不欢而散。杜高谈起话来总要以他为中心，汪明听了不感兴趣，我和杜高可以在一起谈理论，又可以与汪明在一起谈创作，杜高说汪明是从实践达到马列主义的。我们三人没有共同语言。

我觉得杜高这个人有些两面，例：在欢迎日本作家的会上，他跟别人说真没意思。可是在休息室有一个党员同志高羽要走，他却说这会很好，怎么走呢？

他们说我对“家族”是不忠实的，我对“家族”这个词儿不大爱叫。陶冶从印度回来每人给了一件东西，杜高就说最忠实的是冶弟，不忠实的是小田。

至于我和他们讲的有关电影局方面的事，只要有兴趣的，我都讲，讲得太多了，多如牛毛，一时也记不清。我曾绘声绘影讲及革命分子刘志英斗争会的情形。

关于刘白羽、黄钢、华山、翟强的互相不团结的情形我也讲过。

我们这外围组织事实上是胡风分子路翎通过杜高汪明来领导的。例如：我们扩大《洼地战役》的影响，杜高说路翎收到许多祝贺信，杜鹏程也祝贺他。汪明说，路翎的《洼地》许多中学生很感动。人家批评他，他写反批评等等。



还有胡风“卅万言”未公开前，也是他们先告诉我，我才找蔡楚生拿来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对胡风斗争开始时，我不了解为什么这样搞，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搞得这样简单？杜高说：我们俩化名写封信好不好，我没吭声。也没写。

说舒芜“无耻”是杜高告诉我的。有一天舒芜去胡风那里，胡风说舒芜无耻，并说在全国文联扩大会上当时没看到舒芜，不然一定打舒芜的耳光。

我把《攻克柏林》的内部文件拿给他们，他们就拿给路翎看了。

我把十来本抗美援朝的(未通过的)剧本拿给汪明看，他是否给路翎看了，不晓得。

我们供给路翎情报。

汪明的剧本上演了，我说你得感谢大家的帮助，他说应该感谢路翎。

我和汪明每写剧本，汪明把故事讲给路翎听，路翎说故事不错，可以写。汪明说，要写成剧本，要依靠路翎。

杜高喊路翎为"词典"。我关于胡风方面的知识三年前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他们向我传播，我又转播。

汪明说路翎讲：我每年劳动每年挨批评。我也把这话讲给别人。

和他们在一起，我在理论上比他们偏激得多。有一次在东单电车站候车，杜、汪警告我不可乱发议论了，叫我少讲话，时间是胡风命令退却的时候，可是我没退却，一直还在进攻。（在另一处交代说：我没转过这个弯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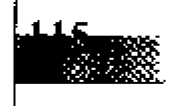
我觉得他们"太没政治"了。我告诉他们我当团支委，他们说乏味。杜高要求入党，把自传念给我听。他们认为做社会工作没味道，他们说入党和做支部工作没有关联，说乏味，我没有受影响。关于高饶事件，没跟他们讲过。

（此件后批注：田庄在继续交代中，如有新东西，当送上。望将杜汪新材料送给我们。）

田庄是我们支部的重点斗争对象之一，过去一直很顽强，一再向我们申明说他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搞错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他等等。经过上次斗争会之后，才开始低头，并初步交待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目前态度仍很不老实，尚在交代中。他所写的材料，在全部问题未弄清之前，只能作为参考。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支部

五月十七日



补充材料（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

田庄

（一）吴祖光从朝鲜前线慰问回来，告诉我，他和老舍离开慰问团到前线某军访问的时候，贺龙同志特别接见了他们，在要他们好

好体验生活的指示后，谈到文艺界的情况，贺龙同志说："文艺界领导薄弱，周扬不行。"（跟杜高、汪明讲过）

（二）……

（三）……

（四）吴祖光在一九五〇年时曾经跟我讲过，说是茅盾同志一九四六年访问苏联回来后曾在闲谈中说，卖淫问题不只是个金钱问题，还包括一种性欲问题在内，所以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现在也不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莫斯科街头有时就会有个别卖淫的，主要是没有丈夫的女人，而且根本不要钱。他还说苏联的杯水主义的残余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茅盾同志开玩笑说：莫斯科淫风甚炽。（跟杜高、汪明讲过）

（五）一九五四年，吴祖光有天告诉我说，他陪陈毅同志去齐白石家里要老头子画画。他说是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找他的，他说王昆仑跟陈毅同志是老交情，二十年的朋友。并说王昆仑和陈毅同志的认识是这样的：王昆仑年轻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失恋了，跑到西山去，住在一个旅馆里，有月亮的晚上就在山上散步散心，发现隔壁有一个年岁差不多的青年，也在散步，原来就是陈毅同志，而且也是因为失恋到西山来的。（跟杜高、汪明讲过，陈敏凡可能知道）

（六）……

（七）一九五四年吴祖光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到周总理那儿吃饭去了，同去的有曹禺夫妇和老舍夫妇，他说总理跟他们谈到刘芝明同志的事情，总理说，刘芝明同志在东北领导的工作，受了高岗的错误影响，特别地强调东北先进，例如刘芝明同志亲手领导与组织的几个剧本创作，《堤》、《在新事物面前》，就没有反映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单纯是好的和更好的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的理论的反映，就为了这个原因，所以就不让刘芝明同志做部长了。（跟洪遒、杜高、汪明、王黎拓讲过）

（八）一九五〇至五一年时，老舍因为《龙须沟》一剧，受到广各方面的称赞。吴祖光告诉我说，把老舍捧得这样高，他有点糊涂，他说老舍的剧本浅，语言过分贫。还说老舍的思想从前挺糊涂的，他保留了一封老舍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其中老舍对美国民主大加

称赞。我看过那封信(跟汪明讲过)。

(九)今年,亚非会议期间,我参加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的飞机被破坏的消息在报上披露的那一天,我有别的事给吴祖光打电话,偶然谈到飞机失事的事情,他说他很担心有朋友在里面。过了好几天,我碰到他,问他担心什么人,他说他有点担心那群工作人员中是不是会有潘汉年,因为潘汉年据他知道是在那一时间到香港去了的,而潘汉年可不可能会化一个名字呢?而且还说有空要打个电话去问问陈家康同志。接着他就跟我讲了下面有关潘汉年去香港的事情,并且是用讲故事的态度讲的。他说:捷克国庆的那一天,夏衍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去了,夏衍同志的女儿阿妹和他的秘书李子云一起跟潘汉年吃了晚饭,回到北京饭店,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潘汉年忽然推开夏衍同志的房门对阿妹和李子云讲:"我下去有点事呀。"接着就下去了,李子云不多久就回到吴祖光家里睡觉。第二天,吴祖光夫妇正和李子云吃饭,夏衍同志忽然打电话问李子云,说昨晚怎样和潘汉年一起吃饭和分手,原来潘汉年不见了,但接着又说知道他去哪里了。吴祖光说,原来潘汉年下楼去后,就没有上楼来,只打了个电话给柯庆施同志,说总理派他马上到香港去。柯庆施说:总得做两套西装才行吧,潘汉年说:"到香港做吧。"就坐当夜的快车去广州了。吴祖光说:"报上不是说,我们在飞机失事前就已经告过香港政府呢?我估计那就是小潘到香港去的目的,一定是知道国民党派了大批特务到香港活动,我们这回派他(潘汉年)去主持斗争的。"吴祖光并说:潘汉年在国统区就是一直跟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唱对台戏的。潘汉年从前专门做帮会等的工作,所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可以扬长出人,如人无人之境。吴祖光又说:可能这里面(遇难人员)不会有他,他要去大概不会以工作人员身份去的。反正过一阵子就知道了,等小潘回来,一定可以听到好多紧张的故事。我回来后把这个"故事"告诉过杜高、汪明、陈敏凡和洪遒,洪遒说:"潘汉年从前是专门跟国民党特务唱对台戏的。"以后,吴祖光忙于拍戏,我没再问过他此事。

(十)吴祖光在平日(多是去年)还跟我说过潘汉年好几回,说这位市长太"帅"了,职务那么高,没有什么架子,平日还老爱吃点心西餐大菜,他(潘)老婆还是个大银行家的女儿。潘汉年的老婆

给潘汉年写信，是由吴祖光转的。（没有讲过）

（十一）我仅仅看见过潘汉年一回，是去年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吴祖光家，潘汉年和夏衍同志两个人坐着在和吴祖光谈天，我刚一进去，发觉有陌生人在屋，吴祖光就给我介绍了一下，我因为觉得他们跟我不熟，而且都是大干部，不方便，没有坐就出来了。

（十二）我把我们创作所打印的电影剧本拿过好多本给吴祖光看过，有些至今尚在他那里。

（十三）一九五〇年夏秋，吴祖光告诉我，夏衍同志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的故事提纲，叫"张经理诉苦"，要他写成文学剧本，他提议我帮帮忙，把提纲分成两半，一半由我大致把对话写下来，然后由他总起来理一遍，我照做了，后来，我拿到一百万元（旧人民币）。（没有告诉过人）

（十四）一九五四年，吴祖光告诉我，美术出版社要他编一套连环书，以《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做题材，他苦不得，而又没时间，要我代他写写，我代他写了，送去，可是嫌太长，他改了一下，缩短了很多，后来在《连环画报》上刊登了。最近我还看到上海给出了个单行本，书名《王冕》，署名吴祖光。第一次发表时得稿费三十万元（旧币），因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出力不多，受之有愧，拿来请客，我们"家族"的人，和吴祖光全家一起吃去二十万元，另十万元我留下了。（全"家族"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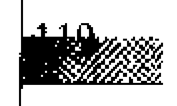
（十五）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吴祖光忽然笑着跟我说，有人告诉他，说台湾国民党的广播，要"大陆"上的文艺作家猛省，直接提到的有他，还有陈荒煤同志，他摇摇头说："我实在不懂得，为什么要提到个陈荒煤同志，我嘛，还有个道理吧，就是我是个党外人士，陈荒煤同志，就完全不同了。"（没有讲过）

（十六）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间，有天吴祖光告诉我，说盛家伦被电影局把工作转到音协去了，他不满意盛家伦，说盛家伦不好好干工作。但是他说，盛家伦告诉他，说他（盛）跟王局长谈工作时，王局长要他做编译处长，并且提名程季华同志做副手，问盛愿不愿意，盛当时是愿意的。可是后来忽然就把盛的工作关系转到音协去了，连招呼都没有跟盛打一声，直到艺术局通知盛去谈工作

时，盛才知道。所以盛在大骂王局长，说王局长有官僚架子。（跟洪遒谈论过）

（十七）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电影演员剧团的贺小书同志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去接洽学跳舞，认识了我们“家族”的罗坚，罗坚追求她。后来知道，贺小书是吴祖光八妹从小的同学，喊吴祖光的母亲做妈，称吴祖光夫妇为大哥和大嫂。吴祖光说可以帮罗坚的忙。他的确给他们帮过好几回，但后果不大。有一次，吴祖光夫妇到上海去了，他回来说，在酒席上碰到刘晓同志，刘晓同志问他说：“听说我罗坚喜欢你的妹妹?”吴祖光解释了一下，他对我们说，看来这下我更是要帮忙了。过不多久，有一回我和杜高、汪明到吴祖光家里去，他又问起罗坚恋爱的事，我们说进度不大，他忽然说：“告诉贺小书，罗坚爸爸要做大使了”、“要她嫁给大使公子吧。”那时刘晓同志的大使还没宣布，据我记得，大概一个星期后才宣布的。（跟鲁军讲过）

（十八）史东山同志去世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在吴祖光家里，新凤霞从外面回来，她说：“再雯（小白玉霜）说，东老的死，这里面有黑幕。”我给她作了解释，说我们所长作了报告，“没有那么回事儿。”（没有讲过）



（十九）今年六月初，学习刚开始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我和陈敏凡、罗坚在北海仿膳茶馆喝茶，罗坚告诉我，他经过汪明杜高的介绍，认识路翎。见面一次，时间地点没说。（没有讲过）

（廿）一九五四年春天，有一回我和杜高汪明在一起，他们告诉我，说是路翎和鲁煤下乡去了一趟，他们说路翎对他们讲，乡干部宣传总线路就是“有余粮就是总路线”。（没有讲过）

（廿一）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我在李纳家里玩耍，谈到菡子的《吴运铎传》没有写出来，她说：吴运铎骄傲了，对菡子说：“我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又说：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是请一个什么别的同志写的，但书销得那么多，吴运铎不给人稿费。我讲给杜高、汪明、洪遒听。

（廿二）一九五三年，有一天和陶冶聊天，谈到玛卓夫舍歌舞团，他说，波兰人与苏联人之间，由于以前历史上波俄经常冲突，所以强调波苏友谊是很大的事，还有就是强调苏联老大哥是和平阵

营的首领也是大事。他说那个玛卓夫舍歌舞团的领导人就常常不自觉地强调中国伟大，而且还附带一句，比苏联还好(没有讲过)。

(廿三)羽山这次从外面回来，我碰到他，跟他讲："你还是再出去一趟吧，家里学习忙得很，沾上了没得完。"后来他和李英敏同志谈话了，回来就要我不要再理他了，我很害怕，因为讲的时候冲口而出，等到仔细一想，完全就是破坏学习，于是我就跑去跟他借书，并偷偷地跟他讲，你没有把我的那句话告诉李英敏吧？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要讲吧。""我没讲你什么？"这是跟他订一种攻守同盟的意思。

(廿四)羽山告诉我，他的处分问题又延期半年，他说，当时他和骆佩珍继续保持关系是征求过杨沫、林杉他们的意见的，可是到了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却依然责难他，这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情。

(廿五)学习开始后，我不能外出，有一个星期天，我要陈敏凡跟他去公园里走走，陈敏凡回来告诉我说："羽山还想去上海一次，不过偷偷的，谁也不告诉。"(没有讲过)

(廿六)对昨天写的材料中关于"家族"的组成的原因作一些补充。我现在觉得"家族"的组成表象上是大家偶然凑在一起，实际上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来，是由汪明和杜高操纵和主持着，因为今天当我回顾汪明和罗坚的关系时，特别有些感触，为什么他和罗坚如此熟，甚至口口声声说比我跟他的友谊还要深刻，但他就不把罗坚经常往路翎那儿带，而单单带我呢？这是使我不能不怀疑的，现在我一点也不信任汪明了，我相信他是听了路翎的命令，按照路翎的指示，在"家族"中活动的。

(廿七)汪明和另一胡风分子陈卓猷也很熟的，陈卓猷的《演员创造论》还送了他一本，他们认识的经过，我不知道，但据汪明声称，陈卓猷跟他很好。

(廿八)我和吴祖光讲过本所王礼易的恋爱事件，还有黄钢同志跟胡英远离了婚，但是关系仍然很亲切，我也讲过。(没跟别人讲过)

(廿九)王黎拓刚来本所时告诉过我，陈局长跟他爱人关系不好，我也告诉过吴祖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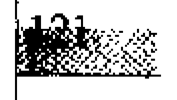
(三十)去年，反对胡风反党集团斗争初步展开的时候，文协扩

大会议举行了好多次，就在那一时期，有一天杜高告诉我说："现在《文艺报》的事情搁在一边了，主要是搞胡风。"他又说，某次大会上聂绀弩同志说："舒芜脱党的时候，你们(指胡风集团)欢迎他，他向党靠拢，你们就打击他，这里头实在有问题值得研究。"于是胡风就站起来说："这样谈问题，我就只好不发言了。"杜高的言下之意是为胡风抱不平，并且又说，后来老舍站起来说了话，说这会又不是斗争会，"大家冷静一点"。(我可能跟洪遒说过)

补充材料(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

田庄

(一)公刘来本所不多久，我在洪遒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后来汪明也来了，他和汪明在香港就认识的，据我记得，大概还在一起住过，因为他告诉我，汪明开夜车的功夫是惊人的。而后我们一起吃过两回饭。有一次是我陪他去看汪明，有一次是汪明来我们这里，因为汪明剧本刚出版，拿到稿费，似乎两次都是汪明给钱的。



(二)有一天，我跟公刘在他房里聊天，不知怎么谈起路翎来，他说他觉得路翎很有才华！他想认识认识，我说我认识路翎，汪明跟他很熟，可以给他介绍。过不几天，是一个星期六，我和汪明、陈敏凡一起到西郊苏联展览馆看捷克展览会，下车碰到路翎和他老婆、儿子三人也去看展览会，路翎叫："汪明。"我们把快步变慢在他们身边走，我说："有个写诗的公刘想认识你。"路翎说："公刘？我看了他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写得很好嘛。"照我当时想，汪明一定是会跟路翎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的，我心里并没有觉得不可以(那时材料没公布)，并且已经放慢脚步了，但是汪明忽然快走起来，朝着展览会的售货部走去，我和陈敏凡也就跟着走了，没有说其他的话。回家碰到公刘我把和路翎的那段对话告诉了他。

(三)有几天公刘非常烦恼的样子，我问他烦什么？他说是关于《阿诗玛》的事，说以后他再不干《阿诗玛》这种事了，吃力不讨好，我

问他具体的事情，他说：他搞《阿诗玛》，一共只拿了五十元稿费（说这话以后不久黄铁又给他一百元），开始在《云南文艺》登的时候，还只写了个“公刘润色”。而其实他是出了相当多的力量的。为了《阿诗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整理《阿诗玛》的经过，当时在云南要谁写谁也不写，推给他写，结果最近这篇文章出问题了，外文出版社一个外国顾问给提了一大堆意见，说《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是粗糙的，主要就把公刘提了出来。外文出版社要他和黄铁写个答复，他和黄铁说，黄铁要他写，说她署个名字，他写了，周扬同志批下来说这个答复太骄傲了，对外国顾问不够尊重，应该拿到《文艺报》公开发表讨论，到了这时候，黄铁又说她最好还是不署名的好。

后来，他又说过黄铁对创作《阿诗玛》电影剧本不够负责，下圭山是他，构思是他，写诗是他，黄铁拿去就是轻飘飘地提两条意见。原来黄铁自己在写另外一个剧本。

他还说过黄铁的关于《阿诗玛》的署名问题，在云南就有人给提过意见，据说省委还研究过这个问题，但黄铁在外面讲，她没有什么错误。（这事我简略和王黎拓谈论过，是王黎拓跟我提起的，他说他和《人民文学》的几个同志听说黄铁现在以作家身份住在创作所都觉得奇怪。他又说黄铁在武汉时曾写过一封信给陈局长，要求到《长江文艺》工作，信他看过，文字都不通，他们坚持不要。）

（四）我和汪明同写剧本的时候，刚刚讨论完故事的第一部分，分工是由汪明执笔，他还没有开始写，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把故事告诉路翎了，路翎说不错，可以写（没跟别人说过）。

（五）杜高和汪明跟我讲过，吴雪和孙维世不对头，吴雪干预过孙维世，孙维世是留苏的，而且有事情就上总理那儿去了。他们说，将来吴雪一定给孙维世排挤掉。并且说孙维世跟吴雪不对头主要是因为金山被开除党籍的缘故。在讨论金山的错误时，孙维世就始终没有发言（没跟别人讲过）。

（六）杜高从西南工地回来不久，有一天跟我讲，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在监狱里写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是在工地上听一个苏联专家说的，那个专家在远东领导过阿扎耶夫的工作，不过他不是犯的别的什么罪，是工程上出了错误。（跟洪遒、王黎拓讲过）

（七）我最后一次见到杜高和汪明是在文联扩大会议开除胡风会籍的那一天，往外走的时候，我碰到他们两个，杜高对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呀（湖南话）。"（感叹之意）我埋怨他："你看，我跟你讲，《攻克柏林》那个文件不能给别人看，你拿给路翎，还说，路翎么，有什么关系，看怎么得了。"他也很着急，说："路翎该不会讲吧。"因为会散得晚，我们没有再说其他话就各自回机关了。以后，汪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交了），还打过一次电话，意思是要跟我谈谈学习的事情，我没有答应他，那时我的问题已经初步提出来了。（这个电话也向领导上讲过的）杜高没有再通过消息。（没有跟别人讲过）

（八）《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受到了严正的批评，有一天我和汪明在东单到王府井大街上散步，他对我说，他问过好几个中学校的学生，他们都很喜欢这篇小说，我们都对于这种批评感到愤愤不平。他又说："我真不同意他们这种搞法，我一冲动就给《文艺报》写封信去。"后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材料发表了，他还对我说："好在我那封信没有写。"

（九）我曾经听本所王黎拓（也可能是洪遒，记不清楚了）说过，电影局用人不当，有一个什么会计在我们局里做了半年出纳，后来到另一个什么工业部门去，就做了会计处的副处长。这话我跟杜高、汪明他们说过的。后来我还听洪遒告诉我，电影局在干部问题上是有缺点，文化部知道，还给了批评，说电影局"赏罚不明"。这些话在闲聊天时，我也跟杜高讲过的。

（十）由于我对创作所领导不满，觉得这里不培养年轻干部，跟杜高、汪明他们常常发牢骚，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儿的到我们这儿一做作编辑，坐编辑部，我们这儿做编剧的全是省文联主席呀这样的大干部。"杜高和汪明就感叹道："你跑到电影局是没搞对，你应该到我们这儿来。"据汪明告诉我，他说他有一回还跟李之华谈过，但我说："没有可能，算了吧。"

（十一）我到杜高姐夫潘开茨家里去，每次都是有杜高在场的，除了已交代的有关胡风的谈话内容外，我和潘开茨还说过关于《水浒传》中宋江的典型问题，金圣叹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孙悟空到底是不是农民典型的问题。

补充材料(八月十三日)

田庄

一、一九五三年上影剧团秦怡来北京参加妇代大会,曾借住在吴祖光家里几天,后来才搬来本所。有一天我到吴祖光家玩儿,秦怡刚刚外出,吴祖光告诉我说,秦怡一直是跟他友谊很深的,因为秦怡当年离婚时,就是他(吴)给她主持公道,并领她逃出家庭来。所以秦怡有时连老金(金焰)都不告诉的话,都告诉他。

二、东老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头天就在生病、发热很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上班,所以不知道。九、十点钟时,柳正午跑到我房子里来,告诉我东老死了,并且说是死在灶间里,生前还写了字等等,还说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自杀死的。后来唐忠琨又到我房间里来,他说东老生前是有很多阴暗思想,很可能是自杀。以后,我再没听见过别人谈论此事,我也没跟别人谈过。

三、汪明和陈怀皑、刘燕驰都是剧专的同学,感情很好,汪明跟我一起去他们家里两三次,汪明也单独去过。

四、汪明和巴鸿、李露玲都很熟,汪明自认是巴鸿的儿子小鸿的干爸爸,他们似乎在香港熟识的,汪明单独看过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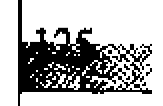
五、我跟巴鸿两个议论过电影局的领导,觉得电影局人才多,但是不会用。他告诉我他要离开电影局回舞台去。

六、有一次在青年宫听中国近代史报告(一九五四年),我碰到陈怀皑,我们相互发牢骚,说电影局培养干部没计划,搜罗人才最多,但是不大胆使用,他说:"唉!在电影局就是一样糟糕,今天不晓得明天会让你干什么,不像剧院里一样,前途发展如何,清清楚楚,做导演就做导演,不会明天又让你去做个什么别的。"并说:"电影局现在这种情况不好。干部涣散,浮动不安,应该改正。"

七、一九五四年某天,我到洪道屋里去,我告诉他跟吴天玩儿去了,他对我说,吴天这个人,听说摆官架子。我不同意,问他坐在

屋里，怎么会知道吴天，他说是陈卓猷刚来讲的。

八、我的问题已被提出后的第七个星期（七月下旬），有一天黎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说我出去了，既然能够外出，问题一定是完了，要找我聊天。我说没完不能出去，他就说找陈敏凡八点半去恩成居宵夜。到了八点半钟，我和陈敏凡还在一起，不想分开，而且我没有吃晚饭，也想宵夜，自己觉得自己问题不大而且恐怕是快要完了，没有关系，所以就跟陈敏凡一起去了。到了恩成居，黎铿见我很高兴，请我吃东西，我说现在跟我接触，给他惹麻烦，他一点也不觉得如此，非常轻松愉快。后来我就问他，陈卓猷是不是隔离反省了，他说："这一点我真佩服他，简直连房都不出，好像根本没这个人一样。"又说主要是谢铁骊来主持对陈卓猷的斗争。还说："谢铁骊很行的呵，是不是。"我问他如何碰到杜高汪明蔡亮的，他说在中山公园里碰到的，还问他"小田怎么样？"他说他们情绪轻松极了，完全和从前一样吊儿郎当，跟我是"天上地下"之别。我因为出去没请假，不敢多坐，很匆忙地吃了点东西就先回来了。临走，我告诉他："如果有人问你跟我谈什么，就说谈陈敏凡考试的事儿好了，免得给你添麻烦。"那天还谈到他的私生活问题，值得交代的就是如此。当时我们都以为我的问题简单，很快就完了的。



九、汪明和《人民日报》国际组的陈有为很熟，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陈有为我见过一面，但没有交谈。陈有为和汪明经常通信，并且送过汪明一支英雄钢笔。今年初，汪明还告诉我，陈有为准备给他介绍一个爱人，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同事，并且约定一个星期天晚上去《人民日报》跳舞，就此介绍认识。那星期六我没去，他们到底介绍了没有，我也不知道。陈有为常去汪明那里，汪明也去过陈有为那里，每次总是谈上好几个钟头，并说谈得非常愉快，汪明还借过陈有为代借的材料（剪报），还有陈有为给他的《人民日报》的通讯员通讯（大致名字，确实名字记不起来了），很多本，是一种小册子，似乎不是密件，汪明随便搁在桌上，我还翻过一两本，是指导通讯员写作的。汪明和陈有为的关系，是离开"家族"，单线发展和联系的，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

十、一九五三年某天，杜高拿一本李健吾翻译的高尔基著《华

沙·席列日罗娃》给我看，说他要写一篇文章批评李健吾给该书写的译后记，论点他先不说，要我看看是不是那译后记真有错误，错在哪里。我看了告诉他，说是有错误，错在李健吾对剧中主题思想的错误理解，支持他写文章。他写了给《文艺报》，没有登他的，后来他收在他的论文集里。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事件发生后，我还跟他谈过这篇文章，我们说这是《文艺报》向名人低头的一例，并鼓励他有适当机会要提出来。

十一、胡风的反党的三十万言发表后，我曾经跟杜高汪明说过，胡风有些地方真是厉害咧，你看他在一九五四年三月给党写的报告中，就把俞平伯划到胡适那边去了，而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是胡适思想的问题，我们却直到六月里才提出来。杜高和汪明他们说："是呀，恐怕党中央从这个报告中也的确发现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了，不然《文艺报》的事情，不会搞得这么严重的。"

十二、我已交代过的那次汪明、杜高告诉我胡风有个给党的报告已经印出来了的那次谈活中，有遗漏，就是他们还告诉我，胡风的报告是四部分，有些是讲他（胡）跟周扬的关系的。具体内容没谈。

十三、今年我跟王黎拓一起写剧本时，他曾几次跟我讲创作所压制徐启恒，有一回还跟我说，创作所不接受批评，具体的事情，就是他说他碰到徐启恒在哭，原来徐启恒挨了一顿斗争，他对张起，张健这事大为不满。同时他还跟我讲过好几次鞠盛如何有前途，努力肯干，他说："编剧班这些同志将来都比我们编辑部的人行。"（按：田庄在编辑部工作）

十四、一九五四年某日，吴祖光和新凤霞两个来我这里，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说有人请客，吃饭回来。我问谁请他们，他们说名字不能告诉我，只说是我们对外做情报工作的一个机关负责同志。吴祖光说："你（指我）听说过敌伪时期上海的一个有名的汉奸叫做袁殊的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就是袁殊请他们吃饭，袁殊是给党做地下工作故意打入敌伪机关的。但是袁殊的现名他说不能讲，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有廖梦醒，因为我记得新凤霞说到廖大姐的。这事我没跟杜高、汪明说过，可能跟洪遒说过，记不清楚了。

十五、……

十六、胡风的三十万字公开发表以后，有一天荒煤同志给艺术会议作有关此事的报告，说到三十万字中曾提到文艺界养了一批人，培养一批不能做作家的人硬要他们做作家，荒煤同志说："你们（指开会的人）听着，你们都是胡风的报告中硬要培养的人。"说罢就笑了，到会的人很多也笑了。会开完以后的某天，我碰到杜高、汪明，跟他们聊到这事，我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事情要咬紧牙巴骨说，明明我们是有硬让不能当作家的人当作家的情况嘛，我们那儿就有，我不懂得有什么好笑。"我并举了杜谈同志作例子，说明我的看法，我说杜谈身体又坏，文字也差，体验生活要带采访员侍候，简直不能写东西，但电影局就宁可培养这样的干部，不培养年轻的。类似的话我可能也跟王黎拓说过。

十七、我和王黎拓一起，议论过林艺同志。他说他看过林艺同志为了什么事写的一张条子，简直文句不通。我说林艺同志的《金银滩》是最概念化的，可是居然让他去做过编剧班主任。

十八、我和杜高、汪明议论过《土地》，还是远在《土地》公开发行以前，大概是在谈艺术的特点的情况下开头的，我说《土地》的编剧，像郭小川，指导土改的社论都常常由他写，但写出个《土地》来，就是概念化。

田庄交代材料中关于蔡亮杜高的材料

五人小组：

这是田庄近日来所交代的材料的副本，请迅速转给剧协五人小组，他们亟须这样材料。并请剧协五人小组将"家族"小集团有关材料抄转给我们一份，是盼。

敬礼！

田庄在继续交代中，如有新材料，继续送上。

田庄问题专案小组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

一、我认识蔡亮是一九五三年初，由杜高介绍的。杜高先已经跟我讲过他有一个年轻的美术学院的朋友，是个天才，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他在长辛店机车厂体验生活时认识的，有机会要给我介绍。后来，杜高又谈到蔡亮要给他介绍一个爱人，也是美术学院的高才生。并定于一个星期六到王里家里碰头。那天我也去了，蔡亮还和一个姓吴的男同志领来了邵晶坤，这是我第一次和蔡亮碰头。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个天真的青年，他大概那时也正是刚满二十的样子。这次会面以后，杜高去青岛了，我们当时不熟，没有一起玩。可以肯定，杜高和邵晶坤谈恋爱，蔡亮是出了力帮忙的。

二、一九五三年夏天，杜高从青岛回北京后，蔡亮开始常常跟我们玩，当时他主要是作为杜高的朋友出现的。他给杜高画了一张像，杜高拿镜框框上挂起，几乎逢人就夸蔡亮天才，有时也当着蔡亮面夸。据我记得，杜高也带他到潘开茨家里去过，他给潘开茨画了一张像，潘开茨也拿来挂在墙上。杜高告诉我，潘开茨很满意，说蔡亮了不起。蔡亮跟我们大家玩儿的初期，是不大说话的，几乎总是沉默地坐着，或者就是给这个那个画速写。但是"坐"得很有兴趣。常常来找杜高，并跟大家在一起。据我知道，当时他还是学生（现在是研究生）。很少钱用，杜高是给过钱给他的，并且几乎经常请他吃饭。

三、从一九五三年夏天起，蔡亮陆续认识了罗坚、杜鸣心、陶冶等人，跟他们偶尔也有直接交往，大概就是这一时期，蔡亮自己也就有了"家族"观念了。杜高和汪明曾经在我面前讲过，"家族"中除陶冶外，蔡亮也是"忠"于"家族"的。但应该指明一点，蔡亮主要的是跟杜高直接交往，尤其是他做研究生以后，下午不用上学，他常找杜高的，我从杜高的话里知道，他们两个人经常聊天，内容不知道。

四、带蔡亮去吴祖光家大约是一九五四年初，我和汪明带去的，他和吴祖光两个谈起来，还要算是吴祖光的外甥（什么来由我不清楚），于是他喊吴祖光做舅舅，新凤霞做舅妈。吴祖光很喜欢他，还专门请他画过一张梅兰芳演《醉酒》的画，登在自己的散文集《艺术的花朵》里。后来知道蔡亮有爱人，还专门请他们两个吃螃蟹。他也给新凤霞画过速写。但是据我所知，蔡亮并不常去吴家，

恐怕他一个人从来没去过，几乎都是跟大家一起去的。

五、一九五三年年末，杜高曾经告诉我，说美术学院本来决定要派蔡亮去苏联留学，因为蔡亮骄傲自满所以作罢。这事我没有问过蔡亮，但后来杜高又讲，蔡亮不是由于骄傲自满不能去，而是由于身体不好，没检查合格。

六、蔡亮在"家族"内是以小弟弟的姿态活动，杜高和汪明完全以大哥自居，对蔡亮极尽拉拢之能事，一九五四年蔡亮去乌鞘岭工地体验生活，汪明给他呢上衣御寒，大概还借毯子给他。今年他去地质勘探队体验生活，汪明给了他皮大衣，并五十万元（旧币）。一九五四年有一次我、杜高、汪明去蔡亮宿舍，看到蔡亮的铺盖破旧，杜高讲要我们大家给他买套新的，并要蔡亮自己提出要什么，说："我们要跟你来'家族'温暖的。"当然，终于也没买。一九五三年蔡亮没鞋子穿，我也给过他带毛的皮鞋的。

七、蔡亮从乌鞘岭回来后，想画画，首先是跟杜高商量的。杜高告诉我，他给蔡亮出了主意，但蔡亮也终于没接受，还是按照他自己想的画《借宿》（已刊登）。有天我碰到蔡亮，他把《借宿》的构图和含义告诉了我，并说团中央要送一批画去参加青年联欢节美术竞赛，要他画张画，因而他可能再有时间去补充生活，他要求听我的意见。回来时我写了一页短信给他，说我看《借宿》的含义等都很好，但我觉得去参加联欢节竞赛的话，就应该更欢乐而有朝气一些，我赞成他去补充生活时注意这些方面，如果有灵感就改，没有就画《借宿》。后来他去了，回来还是画的《借宿》。



八、蔡亮和张自嶷恋爱的事情，我是一九五四年秋天才知道的，有一天我去美术学院找蔡亮，门房说："他爱人刚才在找他没找着。"于是我才知道蔡亮是有爱人的，当时非常奇怪，因为蔡亮跟我相识一年多，从来没提起有爱人一事。后来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早跟杜高讲过的，我问他怎么讲的，他说他告诉杜高，学校里有个女孩子很爱他，年纪比他小，但是却入了党，还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们两个在一进学校时就很好，还亲过嘴，可是就是不好看，他自己有点不太愿意。杜高跟他说："你这么年轻，谈什么恋爱，别理她，将来你准能找到一个漂亮的爱人。"于是蔡亮就不和我们谈此事了。我问蔡亮实际情形到底怎样，蔡亮说他听了杜高的

话以后，回来曾经跟张自嶷讲过他们分开的话，张自嶷哭了一大顿，他们两三个月没有说话，可是后来依然对他很好。蔡亮说："看起来我没办法，她跟我的关系全校都知道，我那阵不跟她好，连先生都说我没良心。"我问蔡亮到底爱不爱张自嶷，蔡亮说他是爱的，尤其是他有一次挨了江丰同志的批评以后，他很消沉，张自嶷还对他好，给他打通思想，使他很感动。他说："那次批评是蛮严重的咧，江丰同志在全校干部会上批评的我，我好几个月都非常痛苦。"不过他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就是不大好看，而且很胖，比我胖得多，我们都喊她小胖子。"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蔡亮是真爱张自嶷的，可是杜高的讲法起了坏作用，我跟蔡亮谈了很久，我觉得他应该爱张自嶷，并要他把张自嶷领来我们一起玩儿了一阵。从此以后，张自嶷就跟蔡亮一起出来跟大家玩儿了。我没有听到过张自嶷使用"家族"这一名称，但她没用蔡亮对我们的喊法"杜高哥哥"等等，所以可以说，她实际上也因为蔡亮的缘故，带进"家族"来了。

九、张自嶷跟着蔡亮跟我们一起玩儿过很多回，但一般说在我们谈天时她不大说话。今年初，蔡亮去绥远地质勘探队体验生活，她一个人也去找过杜高，因为杜高跟我讲："张自嶷老来找我，我跟她谈不上来，又不能不理她，真乏味。"她跟蔡亮一样，也是对杜高特别亲的。

大约是去年末，蔡亮和张自嶷很正经地说要给汪明介绍一个爱人，是他的同学，跟张自嶷同宿舍，叫权正环，党员，张自嶷还把我和杜高领去她宿舍看了一下，但后来没有进行，汪明说那人不好看，不愿意。

十、去年末，或今年初，有一天杜高告诉我，说蔡亮在他那里写了一夜的文章，杜高说："蔡亮看到一篇钟惦棐论美术的文章，有些论点，他不同意，他跟我说，我就帮他把论点归纳了一下，鼓励他写，他用功地写了一通夜，写好我又改了一遍，他就拿走了。"后来杜高告诉我，说蔡亮的文章登在墙报上，很受赞扬。

十一、今年二月起，我决定留苏后，由于准备功课，我几乎没有再碰到蔡亮了。我在和汪明议论对杜高的不满时，曾经谈起，受杜高影响最大的是蔡亮和陶冶，汪明说要找他谈谈，免得他被杜高带坏。过了几天，汪明告诉我说："蔡亮已经糟了，有人告诉我，说他

在学校里骄傲自满，对人说，当年列宁也有好些文学家做朋友的。”于是我们又慨叹，汪明又说要找蔡亮谈，但现在看来，汪明跟杜高不好，在我面前骂杜高是一种撤退的策略，那么可以肯定，他是不会真正跟蔡亮谈的。在这次学习中，陈敏凡告诉我，黎铿在中山公园碰到杜高汪明和蔡亮张自嶷在一起喝茶，非常快乐，黎铿说：“简直没事一样。”就证实这看法是正确的了。所以，蔡亮和杜高汪明的交往是一直进行到这次运动中的。

十二、蔡亮当然是“家族”的基本成员，连张自嶷也应该说是。蔡亮自己已充分具有“家族”观念，并使用“家族”这一名称。但蔡亮的位置不高，因为他小，他主要是由于杜高的拉拢，跑到“家族”中来的，他跟杜高的关系很深，这需要他自己交代。蔡亮在“家族”中虽然位置不高，但起的作用是大的，他是我们“家族”的领导者杜高最常夸的天才，并且是我们“家族”吹嘘自己是天才集团的第一个幌子。随便到哪儿，杜高要卖弄我们的“才智”和“聪明”，总是要蔡亮画速写，杜高要追罗啸华也是蔡亮画速写，杜高要追王蓓，也是蔡亮画速写。蔡亮可以说是我们“家族”要向人们进攻的前哨。我曾经目睹蔡亮在一九五三年初的情况，我觉得，他是由于在“家族”中，由于和杜高的关系，变坏了的，尤其是杜高，给了他很多极坏的影响。蔡亮后来显然是骄傲起来，就拿我们当面夸他天才，他受之无愧一点，也就够了。而最早，他是年轻和天真的。蔡亮的变坏，不能不是我们“家族”的罪过。

田庄交代情况报告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二日

兹送上田庄交代情况报告一件(共5页)请检收为盼。

此致剧协五人小组

中共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支部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甲）田庄最近的表现

自从六月七日在编辑部小组会上，进行了一般的揭发与斗争，继在八月九日第二次斗争会上抛出一些材料后，田庄的问题已基本被突破，当专案小组接连用两天两晚的时间让他口头交代后，田庄便逐日陆续以书面进行交代，目下仍在继续交代中。十一日，我们让他交出信件和日记，发现他此前对组织对斗争会上积极发言的同志深怀恶感，并对运动表现抗拒。在运动开展以来有意地隐瞒他们"家族"反革命小集团，及其他的问题。经过我们反复地交代政策，劝压兼施，他才开始交代。由于其中还有较为严重的破坏性的流言蜚语及其他反动活动事实，他自知问题比较严重因而害怕起来，对着专案小组连呼："我怎么办哪？""我完啦！"并捂脸哭泣，不到饭厅吃饭；又说"我对不起陈敏凡（他的爱人，未婚）"，"我恨杜高"等等，并吞吐地表示请组织对陈敏凡宽大些。近三天在参加全电影局大会回来后，专案小组对他施加压力，他说他的问题只有若干可能忘记的事实尚未交代，但肯定他自己"不是特务"、"如果杜高、汪明是特务，这个'家族'反革命小集团就是个特务组织，那我就是特务，这我可以肯定。"但他紧接着又说："我糊里糊涂地当了特务，不过我自己清楚，我并未加人特务组织。"翻来覆去这样为自己辩护。经过专案组说理斗争之后表示愿意继续坦白彻底交代。

（乙）交代的主要问题与事实

一、"家族"小集团的成员、"家族之友"及经常来往的

据田庄交代，"家族"的基本成员是"杜高（李传惠，在剧协）、汪明（静轩，在剧协）、田庄（景岳、田连，在"家族"中被称为"湖南才子"）、罗坚（中央实验歌剧院民间戏曲团乐队）、蔡亮（美术学院）、陶冶（对外文化联络局，现在国外）、杜鸣心（现在苏联），此外，田庄交代说是"经常来往的"，但我们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也是"家族"的一员的，有：王里（美术出版社）、江荧（美术出版社）、谢蓉明（上海实验歌剧院）、王正（青年艺术剧院）、王亦放（王正，青艺）、季（纪）芒（青艺）、陈敏凡（电影局）、张自疑（蔡亮的爱人，美术学院）、胡秀玉（陶冶的爱人）、舒巧（杜高的爱人，上海歌舞团）、尤在

(大公报)、孟力(在青岛,特务,有血债,和杜高单线关系)、王蓓(四姑娘,上影)、王肇烟(全国文联),此外,据田庄交代,和这个(家族)经常来往的或和杜高、汪明等很熟的,有:吕伦(上海歌舞团),朱琳(人艺),孟健(人艺,是天津"四大金刚"之一余晓的爱人)、陈怀皑(演员剧团),常虹、刘燕驰、巴鸿(演员剧团),黎铿(演员剧团),王黎拓、鲁军(剧本创作所);此外,青艺的萧崎,据交代说只是"家族之友",还有半年"候补期",要再"考验半年"才能人。据田庄交代,他们"家族"的人,曾和黄苗子"一见如故",经常来往。吴祖光等曾有意让田庄与黄苗子的小姨子郁怡民结婚,(黄是对外贸易促进会已破案的特务)和电影局胡风分子黄若海、陈卓猷也都关系密切。

据供,这个"家族"有两个大哥,一个是"洪遒大哥",一个是"祖光大哥"和"凤霞大嫂"。他们和潘开茨也很熟,潘是杜高的表姐夫,是农业部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他们和潘的弟弟潘开佩也有来往,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汪明和公刘在香港就认识。汪明和蔡田是在伪国立剧专(江安)的同学。

据田庄交代,杜高还认识上海人艺的陈琦。并且田庄到杜高家去时,还遇到过本局导演张客,据说他们在上海就熟识。



二、"家族"小集团的形成

田庄由胡风分子黄若海介绍认识了汪明(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由汪明介绍认识杜高,和陶冶是在没进解放区时就认识的,最初是这四个人常在一起,后来逐渐加人了蔡亮(和杜高在长辛店认识的)、罗坚、杜鸣心(和汪明、陶冶、罗坚,在育才学校同学)——这七个人是"家族"的基本成员。还有个谢蓉明,是汪明在国立剧专的同学,是田庄在上海市立剧专的同学。这个名称,据田庄交代,是杜高喊起来的,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以"流浪儿童"自命,因此觉得"家族"这个称呼很亲切,就喊起来了。

这个"家族"里面的分子,都觉得自己很有"天才"和"能力",自以为都是"大有天才"的青年,干哪样的都有(戏剧、音乐、美术、理论、文学、电影……)将来都是"前途无量",觉得组成一个"家族"很有意义,他们曾狂言过:"十年之后,文联主席团,就要换上我们这些人了!"(这句话,田庄不承认他讲过:甚至说,他连听都没听说

过，当我们给他揭发后，他说："假如有这样的话，一定是杜高讲的。")

据田庄交代，他们事实上是以"天才集团"的面貌活动的，有些人虽然跟"家族"很熟，但他们觉得没"天才"或"没出息"，就不能跟他们更加亲切起来，如：鲁军和谢蓉明。另外据田庄交代说：他们觉得"家族"只应该有青年人，所以王肇烟、萧崎，都不能在他们心中构成"家族"成员。

三、"家族"小集团的罪恶活动

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据目前的材料看是以杜高为首，汪明、田庄为核心骨干，又是受路翎直接领导的。

他们过从甚密，一星期至少会见一两次，经常集会的地方是在公园、饭馆，而最多的是吴祖光家，潘开茨家也去过几次，而两次过年，他们都带着酒肉到洪遒家里"过年"，并为"家族"干杯，他们的罪恶活动如下：

（一）打探和互相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以及种种诬蔑性质的谣言。

1. 诽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

2. 诽谤、诬蔑中朝、中苏，世界各国青年间的友谊关系。……

3. 诽谤、诬蔑所在机关的领导。如田庄向他们"家族"说了许多关于电影局和创作所领导的坏话，他说电影局老干部排斥新干部，章泯很苦恼，白了双鬓；电影局使用干部不当，一个出纳，调到其他机关当了副处长；说创作所压制新生力量，而"老干部党龄长得吓死人，却写不出剧本来"；说王震之"不学无术"，不懂理论却放在理论岗位上，"把胡说当真理"等；说陈荒煤"不懂装懂、好为人师"等等。

4. 散布流言蜚语。①田庄听吴祖光说，习仲勋说贝利亚是不是党员，还没有查清楚，田庄就向汪明、杜高讲了。②田庄听盛家伦说英国工人日报载，贝利亚先是勾结了他的几个副部长和南俄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书记，订立了暴动计划，准备以内政部的武装逮捕马林科夫，然后宣布马林科夫脱离了斯大林路线，由于贝利亚的一个副部长的告发，才未得逞。……这话田庄又传给了杜高、汪明、洪遒等人。③杜高听完田汉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报告后，就向

田庄讲了，内容与我们一般听到的有出入，如说贝利亚案件公布以后，铁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南斯拉夫问题与贝利亚有关，这里面有私人问题，后来果然查出了贝利亚的挑拨行为。田庄把这话讲给洪遒，洪遒补充说，南斯拉夫党内有两派，铁托一派主张恢复苏南关系，另一派公开投靠美国，索性走资本主义路线。后一派的代表就是前不久被南共开除出党的那几个人。……④公刘跟田庄讲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情况，田庄又跟杜高、汪明说了。公刘说：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领导一个地区；当时的中央委员们，几乎都在一九四五至四七年牺牲了。那时，他们犯了右倾的错误，结果资产阶级叛变了，把党掌握起来相当多的力量断送了，公刘还对田庄说过，越南有我们的武装部队、奠边府是我们打的等。⑤法中友协摄制组里创作所的袁也同志回来跟田庄闲谈说，法国人听说中国的党员常因爱情总是被开除党籍大为吃惊，说如果那样的话，法共就没一个党员了。田庄又把这话讲给了杜高、汪明。⑥杜高对田庄说："阿扎耶夫在监牢中写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田庄说杜高是从一个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

（二）互相传播消息和情报。创作所的情况，田庄经常讲给他们的"家族"听，杜高、汪明也常把青年艺术剧院和创作室情况讲给田庄听。例如，抗美援朝的剧本很缺乏，田庄就告诉了汪明创作会上荒煤讲了什么，田庄也告诉他们；青艺演排什么戏，创作室要改组，杜高他们就告诉田庄；吴祖光对田庄说台湾广播让"大陆"作家猛醒中，提到吴祖光和荒煤的名字，田庄又告诉给杜高、汪明等；把所里的未通过的剧本十数本偷拿给汪明看，把创作会讲的内部文件斯米尔诺娃谈影片《攻克柏林》材料给汪明、路翎等看（原交代说由汪明给杜高，杜高又给路翎看的，现在更正说路翎当着田庄的面拿去的）。杜高在青岛宣传胡风反动思想，北京知道了，陶冶就让田庄写信去叫他注意一点；路翎交出密信了，他们就互相转告；杜高开完文联主席团扩大会，就把会议内容告诉田庄和汪明；汪明入朝前集中学习，把讨论内容和学习情形告诉了田庄；胡风写了三十万言"意见书"，杜高就告诉了田庄等等。

（三）供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情报，传播他们的言论，替他们拉拢人、扩大影响：如杜高、汪明把田庄、罗坚等介绍给路翎，还要把路

翎领到吴祖光家去。田庄答应给公刘介绍路翎，田庄在编辑部吹嘘路翎，朗诵路翎的小说，还说胡风的文艺理论是有道理的。杜高说总理叫胡风编《文艺报》，胡风不干，田庄也把这话讲给别人听。又从吴祖光那里听到说，总理说过：胡风培养了干部嘛，他们也加以传播。田庄曾对路翎讲我们剧本创作概念化公式化情况，并且态度很激烈。汪明说路翎年轻有为、朴实热情，田庄也在编辑部里照样宣传。等等。

（四）诬蔑、破坏党和国家的政策。如杜高、汪明跟田庄说过，路翎下乡去了一趟，回来就说乡干部宣传总路线就是"卖余粮就是总路线"。

（五）互相帮忙，互相吹嘘，卖弄才学，诱惑女人。这些家伙几乎每星期日都要聚会，携带着女朋友说说笑笑。所认识的女孩子，都被他们进攻得晕头转向，这个说谁是稀有的画家，那个说谁是我们青年别林斯基，谁出了多少书，谁又正写什么、画什么等等。杜高在一九五三年追求邵晶琨，田庄、陶冶、王里就都去和邵认识，一起请邵吃饭，同时大家就为杜高吹嘘卖弄。杜高追求王蓓（他们的四姑娘），田庄也用力帮忙；以后陶冶又给杜高介绍舒巧，替杜高吹嘘，领舒巧找杜高，终于成功。田庄领陈敏凡去看他们，陈敏凡也被他们整得人了迷，总之，他们恬不知耻地在女孩子面前"造成一种气氛"，使对方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了不得的天才，青年作家、画家……前途无可限量"，这样来进行诱惑。田庄一二年之间就跟李子云、唐敏南、文椿、陈敏凡等几个女孩子沾过边，有时同时"恋爱"两个，终日神魂颠倒。

（六）使用隐语，搞下流勾当。他们把男女关系的事说成"老鹰抓小鸡"、"冒黄油"、"敦伦"、"铁的棍"等等。"小鸡"是指牺牲在他们"鹰"爪下的猎获物——女孩子；"冒黄油"是从新凤霞评戏班后台那里学来的一句暗话；"敦伦"是路翎在朝鲜说男女发生关系的代称。在电话中汪明就同田庄谈这类的下流话。"铁的棍"是杜高、汪明两人讲印度散文《廿夜间》启发得来的，书里说大匠造女人是取"月的圆、水的曲"，他们就说造男人就应该是"地底平、铁的棍"了。陶冶、杜高、汪明他们经常谈性关系事；谈论女人，品头论脚，描写得猥琐详尽之至。

（七）互相介绍社会关系，认亲访友。田庄把“家族”的人们介绍给吴祖光认识，杜高又把大家介绍给农业部的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潘开茨认识，田庄、汪明又把大家介绍给洪遒认识，田庄还曾打算把公刘介绍给路翎认识，只因运动一开展未介绍成功。一经认识，男的必以哥哥弟弟相称，女的必以姐姐妹妹相称。全“家族”人，往往在节日假期，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吴祖光住所名为“二流堂”，就是这样的地方。

（八）“家族”成员中除了党员，他们几乎个个申请入党，但又个个对组织生活不满，认为“乏味”，觉得“很苦”，说团生活像小孩子玩艺儿。他们写自传也互相传阅提意见，如杜高、吴祖光的自传都“请教”过田庄，汪明写自传“请教”过罗坚，谈了一夜，事后罗坚告诉田庄：“给了汪明以指示。”他们（如杜鸣心、蔡亮、田庄等人）都想法争取出国留学，杜鸣心已在莫索尔斯基音乐学院学习，蔡亮因思想作风太坏，未去成……

（九）他们曾张罗买（或租）一幢房子合住，做为他们活动的据点，房间分配都已有了计划，吴祖光、王肇烟曾分头奔走找过，只是因未找到房子才未成为事实。

（十）运动开始后，他们互订“攻守同盟”。如：

汪明给田庄信（六月三日）：“……一方面要斗争胡风分子，一方面要和自己的各种缺点斗争……我和杜高皆如此。”“……不久我大约又可重整旗鼓了……”杜高、汪明、田庄等到吴祖光家，说：“……学习很紧张，我们在交代和路翎关系！”吴祖光说：“你们是‘年幼无知，交友不慎’，会被原谅的。”为他们规定了问题的性质，以便统一交代。

运动开始之后，田庄在创作所、陈敏凡在电影局同时散布：“和杜高早就不来往了。”杜高常托闻樱（王黎拓的爱人）带话给田庄说：“你告诉田庄：你每天还看见我哪！”汪明曾问袁也：“你们那里胡风分子是谁？有没有我认识的？”

七月末，黎铿曾约田庄、陈敏凡到恩成居吃夜宵，告诉田庄，在中山公园遇到杜高和汪明，他们非常轻松，什么事也没有，后来又说：“别人问起，就说我们是谈的陈敏凡考大学的事！”陈敏凡隔离后，赖明两次去找她，并给田庄带信他交代的谈话内容，也是“问陈

敏凡考大学的事。"羽山自外边回来后，田庄向他说："你还是出去吧，家里学习很紧张，一沾上就不得了。"后来他又告诉羽山："别告诉李英敏。"羽山说："不告诉。"

四、目前对田庄交代问题的初步估计

（一）田庄自被我们斗争突破以来是交代出来一些问题，如上边所列举的，而且至今看来仍然比杜高、汪明、陈敏凡等交代得多，但，杜、汪、陈等所交代的材料中田庄仍有未交代的，而且有较重要的问题仍有多件未作交代，如杜高交代出来"家族"小集团是有组织、有纲领，并且有赏罚制度等（重则开除出"家族"，轻则呼为"同志"而不以哥弟或姐妹相称，以示警告等）。

（二）就我们所获得的检举材料及田庄的表现来看，田庄仍有较重大的情节隐瞒，就在写这报告的时间，我们又找他谈了一次话，并要他交最近已写出来的材料，内中便说到曾把在朝鲜所得知的有关军事的秘密泄露给陈敏凡，他自己供称，为了这件事曾五六晚睡不好，写这材料时，心都提到胸口，怕得很，务希组织上宽大。又如我们指出他历史上有问题也应快些交代，便冒了头说从前在他父亲处认识过一个特务等，当我们指出应打消顾虑彻底交代时，他并未敢抗拒，只是仍然有些惧怕，答应继续坦白。

（三）就我们手头掌握的他们"家族"中来往的信件中所提到的材料来看，田庄还有一大部分未作交代，特别是有关"家族"的形成问题及他与汪明、杜高、路翎的关系等。另外田庄交代他所知道的杜高的历史与杜高自己交代的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仍计划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让他快些彻底坦白。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

田庄专案组对《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的补充意见

（一）田庄现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部担任助理编辑，打

印稿"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应改正如上。

"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应改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官吏，田庄曾隐瞒其政治面目，现已死掉。"

（二）尤在似不是党员，可调查一下。

（三）鲁军现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室工作。

（四）文椿现在电影局艺术研究室工作。

（五）"八一制片厂"之赖明（张冠球）据现有材料来看，他只与田庄、陈敏凡关系较密切，因为新来北京不久，可能与小"家族"关系较少，列不列上请考虑。

（六）田庄致汪明信中原句为："……每天开会写总结，提意见，这是一个行政干部小科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我逃不脱这种悲惨的命运。不要对我有什么希望，我是一个平常的人，让我在平常的生活中打滚吧。"

我们基本上同意《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这一材料，另，提出以上几条具体意见供参考。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

田庄专案小组

九月十二日

陈敏凡的有关交代

据陈敏凡交代问题摘录如下："……参加反革命集团的'家族'成员，有北京剧协剧本创作所杜高、汪明、舒巧（杜高的爱人）。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参加这个"家族"是经过审查的手续，并有候补期，吸收之后要履行一定的仪式（请客、送礼等），性质极其反动。"家族"的活动：(1)传播国家重要机密。(2)散布路翎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如：杜高常常夸路翎有学问，"家族"的人经常与路在一起吃饭。(3)掩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如说胡风是思想问题等。(4)在文艺见解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相一致

相呼应，如汪明不学马列主义，杜高的文艺论文《单纯与美及其它》完全是反动的；对待新的正确的文艺作品采取嘲笑，如对《时代列车上》，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则大肆宣扬，彼此倾慕。受批评后“家族”都大为不满，写文章进行反批评。(5)两面派手法。(6)腐烂的生活作风及赌博搞男女关系。(7)互相吹捧并对外宣传拉拢人。(8)企图组织集中活动未成。(9)胡风问题揭露后家族布置撤退等等活动。汪明、杜高曾授意陈敏凡，要陈很好地到蔡老处(蔡副局长)，目的是为了窃取机密，实际上陈已照办了。

陈敏凡系青年团团员，思想较落后，是该“家族”成员之一。此材料供参考。

此致

剧协剧本创作室

电影局局本部五人小组邱

八月十九日

据陈敏凡交代的问题摘录如下：

与反革命集团“家族”有往来者，有剧协李维时，这个集团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活动，参加这个集团的人，须经“家族兄长”看过，根据对象分别有不同的候补期，被吸收之后要进行宴会送礼等。这个“家族”的反革命活动是：传播国家重要机密，散布路翎反革命分子的影响。掩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面目，进行赌博，胡搞男女关系，集团内的人互相吹捧并对外宣传、拉拢人，扩充组织，企图组织集中活动未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后“家族”布置撤退等活动。

此案情较严重，牵扯较广，如该人尚未交代，希严加追查。

陈敏凡系青年团员，思想较落后，是该家族成员之一，此材料供参考。

此致

戏剧家协会

电影局局本部五人小组邱秉经

八月十九日

杜高小集团(家族)重要成员罗坚交代材料(抄录)

(一)我和他们几个接触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汪明认识得最早,来往最多,谈得也最多。(怎样认识的在以前材料中已谈)和杜高田庄还有陶冶(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但不认识)的认识是很晚的(五四年年初)都是通过汪明的介绍,因为他们和汪明很熟悉的缘故,所以我和他们是一见如故的熟悉起来了。但是我和这几个人的接触却少得多,杜高是在我认识他以后的不久便到工地去体验生活去了,一去就去了十个月。在他外出的时期常常写信给汪明,有时也问到过我,(这些信都保存在汪明那里)和田庄陶冶仅是一般的接触,到田庄所属的机关里参加过几次跳舞晚会。陶冶请我去看过戏,(有时文化部审查什么节目)在这几个人里我接近得多的是汪明。去年我常到院部开会,会开完我常常就绕到青艺去看他,在那里吃一顿饭。有时礼拜六晚上我就住在他那里,我们就是在这些时间里谈一些问题,而在这些谈话中,除了谈一些我以前材料里所写的那些问题之外,更多的是谈到我们在爱情上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知心话"。在一九五四年里,我曾经很喜欢电影演员剧团的一位女同志,我和她仅只有先后同学的关系,我很想有机会和她建立更深的友谊。而汪明和田庄都认识她,他们在这个时期里给我打气,帮助进行分析和策划,因此我和他们接触中,这件事是我们主要的话题,在院里和我接近较多的是程若、梁克祥也了解我这情形。

另外,我认识杜高、田庄以前,他们三个就已经非常接近非常熟悉了。就在我认识杜高田庄之后,也是他们三个人接近得多一些。汪明杜高的生活非常自由,田庄也是每天晚间没有事情,他们就常在一起做彻夜的谈话,他们自称是谈文学与创作问题,而实际上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研究了些什么,我是不了解的,我没有参加这种深人的谈话。并见他们三个人常常来往于路翎的家里,我

从没有跟他们去过，我并不认识路翎，只是在去年十月间，我从青岛回来，到汪明那里去，偶然地碰到路翎也在那里，汪明给我作了介绍，握了一个手，没有讲一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对方很严肃很傲慢。随后路翎就很快离开。这是我和路翎唯一一次见面的情形，上次材料里说得不很清楚，现补充说明。

据我知道和路翎熟悉的还有陶冶，陶冶从外地回来时还给路翎送过礼，表示和他有深交。他并常在一些人面前夸耀他认识路翎。据以往汪明告诉我的，当第一批胡风集团的密信公布之后，陶冶还在饭厅里（文化部）吹嘘过自己和路翎很熟，当时汪明还非常不满意陶冶，骂他荒唐，说他这种时候还说这种话，还说不知道他在文化部里还乱说了我一些什么呢等等。陶冶现在跟文化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了。现在我看得很清楚，在他们检查交代的过程当中，正因为他们想掩盖他们那些肮脏的不可告人的东西，而拼命地缠住我，用缠住我的办法来回避他们另一面最本质的东西。我自己应该承认，在过去和他们的交往中是表现得很亲密，我自己的确是由于某种虚荣心理所驱使，而和这些隐藏着反革命的所谓“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交了“朋友”，而这些在今天却成了他们隐藏自己的烟幕，因此在这里我提出以上这些实际情况，这些经过我实事求是地考虑过的情况，请组织上对这些情况进行具体调查。

（二）在上次材料里我提到过，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广，他们接触许多社会上的知名之士，并从这些地方获得一些消息，在这个问题上再作些补充。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和吴祖光非常熟悉，其中特别是田庄，常到吴祖光家里串门、聊天。我也曾跟他们去过，而吴祖光又接触了许多上层领导同志，如阳翰笙、夏衍等。他们在那里得到一些消息，然后又来广播，我所写到有些关于去年文联扩大会议的一些事情，据他们讲就是从那里听来的。我所知道的还有另一件事。去年十月我从青岛回来到汪明那里去，杜高当时也在那里，（他刚从乡下回来）一见面他们就对我说：“你知道关于你父亲的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可知道了。”于是他们告诉我，父亲将任驻苏大使的事情。我问他们从哪里知道的，他们先是不肯告诉我，后来才说是吴祖光说的，吴祖光是从夏衍那里知道的。

田庄和蔡楚生很熟，也常从那里听来一些小广播。如我所知道的，在去年全国人民代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选举结果尚未公布，田庄就告诉我，谁是主席，谁是委员长，谁是总理，并说副总理是五个文官五个武将等，据他说这就是从蔡楚生处知道的。

另外，他们和文联的一个干部叫王鞏湮的很熟，我听见有一次王鞏湮把文联讨论关于剧本上演税的事情告诉给汪明。（当时大概是刚讨论完）详细的细节我记不得了，大概是关于独幕剧和多幕剧出版上演的一些具体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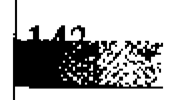
和他们熟悉的还有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洪遒、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鲁军，青艺的萧崎等。

汪明在《人民日报》还有一个朋友，不大来找他，但是交情很深，互相之间有时也通信，那个人大概叫（刘）或者（何）大为，在《人民日报》搞国际资料，据他们自己讲，他和这个人的认识是他在朝鲜时向《人民日报》投稿，于是那个人就要求和他通信交朋友。我在汪明那里看到过这个人两次，汪明并没有向我讲过很多关于这个人的情形。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关系好像是十分不正常的，在接触中他很少提到这个人。

以上这些是我和他接触过程中我所了解的他们社会关系的一些线索。

（三）我曾经帮助汪明做了两件事：第一，我妈妈认识一位曾经参加过大革命、有着许多革命斗争经验的朱老太太，她的女儿和我妈妈是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五四年春天我妈妈来北京时告诉我，朱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应该有人把她一生的斗争历史记载写下来。我当时就想到了汪明，我很希望汪明能把这些材料写成文学作品，于是我曾经请这位朱老太太到汪明那里去谈过一些材料，但是以后汪明对这些材料并不感到兴趣，因此作罢。第二，今年年初，汪明想写关于在上海就义的烈士王孝和的剧本，他要我能在什么时候问一问我父亲，在了解这个英雄人物上应该掌握些什么东西，我只把这事问了我父亲一起工作的一位同志梅达均。梅达均同志只简单地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王孝和就义时的一些情形，我把这个转告了汪明。

——抄自中央实验歌剧院罗坚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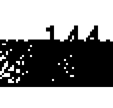


根据罗坚所交代的材料补充以下两点情况

一、罗坚在“家族”小集团的作用

罗坚是以自己是党员和是我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被人看中的，并以在解放前“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关系，和用给他介绍爱人的办法被拉入小集团的。罗坚曾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分子。

根据罗坚所交代的材料来看，罗实际上在小集团中起了政治上的参谋作用。如汪明、田庄的入党问题都是和罗坚谈；杜高申请入文联的申请书及履历表写好后也念给罗坚听，问他这样写是否“通得过”；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有意见有时由罗坚进行谈话。运动开始后杜高、汪明感到了运动要搞到自己头上来，罗坚也主要地帮助他们分析、提供意见。在订立攻守同盟时也征求罗坚对家族的看法，罗坚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温情的小圈子，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汪明就把这些意见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此外罗坚曾不止一次地在小集团内泄露党的机密。

二、补充“家族”小集团和吴祖光的的关系

据罗坚交代：

(1)他们曾在吴祖光家中看过台湾(或香港)的画报，共有五六本，内容有选举世界小姐等。据吴祖光讲是由华侨联谊会借来的。还看过香港的《周末报》，及内容淫荡的《十日谈》。

(2)吴祖光与潘汉年的关系很密切。罗坚说在吴家中时曾好几次听他们谈到潘汉年，罗听说潘汉年到北京来时曾到吴家中去过，并曾在王府井原国际书店附近的饭馆谭家菜(?)请吴祖光吃过饭。吴祖光在上海时潘也请吴吃饭，新凤霞在上海演出时潘也请她吃过饭。

(3)吴祖光和东单“和平书画店”关系很密切，吴在那里可以随意将好画拿回家去先看，吴曾带领家族中的人去和平书画店看过

书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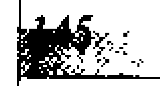
(4)吴和他住处附近的四川馆(益康)、云南馆(康乐)关系也很密切。而且罗坚曾听吴祖光说过,说"益康"的老板过去是党员,一九四九年才脱党的,说老板娘是川岛芳子的妹妹,还说有一个厨子过去当过公安局长。

请将有关吴祖光的材料专摘抄至文化部办公室转有关方面。

李超

陶冶关于杜高的重要补充

我自从和杜高结交了"朋友"之后,在政治上一天天地走着下坡路,一直走到了悬崖的边缘。这次运动就像悬崖勒马一样地把我拉了回来,我在由衷地感激运动拯救的同时,我不能不愤怒地控诉这位引我走向深渊的反革命胡风分子杜高。



杜高,这个反革命分子,他是怎样想把我拉下水的呢?

一九五三年他在青岛写给我一封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和所有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中的密信一样,他对我作了"几点指示",并且要"坚决执行"。杜高和一切胡风分子所采用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他首先"歌颂"了一番我对于新的工作环境的热爱,继而又用了许多"美丽的"形容词如"看得出来你对于自身缺点的猛力震撼"、"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等话来对我加以"鼓励",接着就是他要灌输给我的"两面派"思想了,他要我"靠近组织",要我"不要给别人感觉是个旧习气很重的人",要我"多买些新书来读"等等一连串的"指示",并且嘱咐要"坚决执行"。

狐狸尾巴就在这里露出来了。一切坏的东西都是经不起分析的,杜高显然是要我和他一样地搞"两面派"。这就是胡风分子杜高对我的阴谋策略之一。那封信就是他的罪证。

平素在日常生活中，杜高也没有放松过对我灌输这种两面派的思想。他要我“穿灰布制服，不要老是穿得那么笔笔挺挺的”。要我“对人不要过分热情，你那样热情有什么好处呢？人家不一定领会，不会用同样热情来回答你的。”要我“不要把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到处送人（指送给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志），那反而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只送给家族兄弟就行了”。他的这些思想，只能予人得到这样的认识：嫉妒、冷漠和虚伪。

杜高不仅在做人上给我灌输些虚伪、冷漠、嫉妒的观念，同时还培养对于人生的虚无主义思想。他说，“我把什么事情都看穿了，不过那么回事”。并说，路翎就是个虚无主义者。在文艺观点上，我也受了杜高很大的影响，我很少看到他读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新文艺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他妄想自己要做中国的契诃夫，他宣扬着要写“人的爱”，他要创立“独特风格的剧本”。据我知道，他在创作室是没有一个剧本获得通过的。即使是被否定了的剧本，他还念念不忘地要将它出版，以达到他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杜高经常给我们读别林斯基、契诃夫、罗曼·罗兰这些伟大的作家，鼓励我们读他们的东西，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谈论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从揭发的材料看，翻译这些大师作品的人很多都是胡风分子，如满涛、贾植芳；杜高也给我介绍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恰巧翻译这本书的吕荧也是个胡风分子，杜高和吕荧也是有联系的。这些胡风分子都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歪曲这些伟大作家的先进思想的。

杜高和路翎的关系，有如路翎和胡风的关系，不，他们根本就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黑帮，一个系统，一个反革命集团，即：胡风反革命集团。

我曾亲眼目睹杜高翻阅路翎抽屉中的胡风给他们的密信，杜高并告我说，“胡风要路翎多写，多出版……”果不然，路翎写得又多又快，而且都一篇篇地发表，一本本地出版了。路翎的写作计划，路翎口袋里有多少字，杜高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事业上是互相支持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相同的反革命事业。

杜高倒在路翎的脚下，并且把路翎看成他将要效仿的人物。他盛赞路翎的“才华”，吹嘘他的“创作能力”，说路翎曾经写了几百

万字，说时并用手比，让你看到如果摆在书架上，有这么厚一摞。说完这个还嫌不足，又说他现在身上又有几十万字。

当路翎作了假检讨后，杜高于是又说："路翎也在批判胡风，但是批判激情不够。"杜高在替路翎和他自己掩饰他的反革命面目时的说话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是别具一番苦心的。他不只说"在批判"，而且也说"激情不够"，这种说法就使听众信以为真，并乐于传播，以达到他们"退却"的目的。

杜高也是按照胡风给他的喽罗们布置的策略"退却"的，杜高不断地假检讨；他和汪明一起商量合写路翎的材料，在《光明日报》刊出他写的《胡风是我们的敌人》这种骗人的花招，这种虚伪的文字把戏；他给年轻同志们作批判胡风的报告，在我们这些和他亲近的人中树立他是"反胡风"的印象，以便帮助他"退却"，以便掩饰他的做为胡风分子的反革命面目。我就是一个完全失去政治嗅觉，受到他的蒙蔽，受到他利用的人之一。我做了胡风分子杜高的帮手，我犯下了严重的过失，给革命利益带来了许多的危害。我在反省，悔过并决心赎罪的同时，我要在这里控诉杜高，控诉这个反革命胡风分子，他是企图把我拉下水的，他已经把我拉到了极危险的境地，要是没有运动，我就毁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上了，而今我已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杜高这几年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除了上述以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我们对他的"忠诚"，培养对于整个"家族小集团"的"温暖"、"友爱"，藉以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分庭抗礼。在日常生活上，他则施以一些小恩小惠，用与胡风分子们惯用的办法，如给你一些"同情"、"鼓励"、"体贴"、"关怀"，所以他常说："还是惠哥好"，"还是家族兄弟温暖"。

杜高是具有他的反革命的个人野心的，他一本本地出书，他利用我们做他的义务宣传员，都是为了达到他的"十年以后坐上文联主席台"的卑鄙目的。

杜高在家族小集团的地位，是为首的，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他是直接受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翎领导的，因此，他在家族小集团的活动，他的野心和追求，都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都是反革命的目的！

必须把胡风分子杜高从文艺界中清洗出去，以纯洁我们的文艺队伍。

批注：陶冶为“家族”小集团骨干分子，所写材料供参考。

中共文化部办公厅支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

蔡亮的交代材料

（系中央美术学院杜高反动小集团成员蔡亮张自疑交代）

（原件缺页）

三、胡风运动开始时，杜高说：“胡风都病了，他算完了。”“路翎这下也跟着倒霉。”

有关小家族的问题

1. 第一批材料尚未公布时，杜高说他正在写关于胡风的文章，蔡亮和杜一起去潘开茨家，潘说：“不能因为胡风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就说他全盘不对，有些用语还是有创造性的。”杜说：“胡风在个别问题上还是对的，但整个的理论是错的。”

2. 大约六月底，张自疑和杜高在中山公园见面，杜高说：“这次的教训是党叫你向左你就向左，千万不要向右一点，以后有牢骚在我们朋友之间发发还可以，千万不要向外面发。”又说，“人家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玩意，不过家族以后不要再提了。”后来蔡亮果真没有向组织谈到家族两字，因为杜高说：“家族可带来不少麻烦，这次可把我整惨了。”

黎铿揭发材料（关于杜高）

在运动开始时，我写的揭发材料中就提到杜高、汪明、田庄和

他们有一个什么“小家族”。现在我补充一件具体事情。

在四月第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志到中山公园喝茶，见到汪明、杜高、蔡亮（中央美术学院的）以及一个女的（我不认识她）也在喝茶。在简短的交谈中，杜高和汪明问我：“小田呢？很久没见他了。”我说：“他还在学习吧，我也没见他几个礼拜了。”他们两人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咦，怪了，他怎么搞的？”当时我感到他们非常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还问：“你们学习完了？”他们说：“没有，正在学习呢。”他们那种轻松的表现使我奇怪，我当时想，他们两人跟路翎的关系比田庄要密切，怎么他们俩倒那么轻松没事呢？

关于他们那个“家族”的成员，在杜高给田庄的信上，我看到提到的是除田庄、汪明外，还有罗坚（据田庄说，他是我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儿子，是党员，现在大概在歌剧院工作，去年他常到吴祖光家去）。

常跟他们四个有来往的，有：蔡亮、陶冶（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还有一个姓谢的，大概是在上海工作的，去年来北京实验歌剧院跟《草原之歌》那个戏学习导演。

（单位批示）黎铿为群众，思想落后，他本人问题尚未弄清，此材料可供参考

演员剧团五人小组
谢铁骊　杜粹远
8月15日

王里（美术出版社）提供杜高材料
（1955.6.8）

我有一个朋友杜高，一九五〇年我和他在铁路文工团工作，后我调铁路画报社。……一九五二年他从朝鲜回国，调青艺工作，和路翎同住一个宿舍，因此我找杜高时有时碰到路翎，就这样认识了，见面打打招呼，从未单独谈过。……

在我认为，起码杜高对路翎甚至胡风的人或"作品"是有些崇拜的。

一九五二年，可能是批判胡风思想的时候，我曾陪同杜高跑遍东安市场的书摊搜罗胡风的书，记得只有《在混乱里面》一书没有买到，我想杜高本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需要这些书来研究以便更好地批判胡风的唯心论，可是后来他赞扬了胡风的某些文章，说他写得好。他向我推荐了胡风的《和新人物在一起》，说胡风所以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东西，是因为他是以艺术家的宇宙观来描写生活。现在想来，这不正是胡风的论调吗？

文艺界批判路翎《祖国在前进》剧本和一些小说时，杜高说路翎的作品是有它的错误，但他更认为这些批评文章过于幼稚，说服不了人。同时讥讽写文章者都是教条主义。杜高和我聊起它（路翎作品），说《初雪》是近几年来最好的短篇小说，它没有什么攻击、冲锋，从两个司机帮助朝鲜妇女搬往安全地带这一平凡的生活中体现了中朝人民真挚的爱和血肉关系。杜高还说过路翎年轻有才华，写过那么多的东西，真了不起。

王里交代杜高材料

1949年6月苏州解放时相识他和纪芒、李牧之、李痕同在苏州租一民房同住一起，无职业，那时他和纪芒在改编《俄罗斯问题》话剧并和苏州一些中学生接触，以青年导师自居，在他们的住处给学生们谈马列主义（还谈解放区的一些出版物）。杜高能写文章，写剧本，开始对他崇拜，他才二十岁，是"天才"，于是盲目崇拜，他那时无经济来源，全靠李痕负担。杜高喜欢跳舞，天黑就请他去跳舞，在苏州不到一个月，上海解放，我们就一同到了上海。

1950年杜高调总工会工作，晚上住儿童剧团，改编苏联《红领巾》剧本，（他与剧团的孟远是朋友），杜高要周泽（又名萌子，在儿童剧团工作）请他上舞场。记得上海第一次开文代会时，和杜高曾在少儿报工作的一位党员同志被选为代表，杜高认为没有选上自己大为不满，因为他是根本瞧不起这位同志的，他在我面前发牢骚

说，这位同志什么都不懂，文章都写不通，完全是靠党员的招牌被选上代表的，显然他是从个人出发嫉妒别人甚至仇恨党的组织，他要周泽请客去跳舞，他说不能当文代会的代表太痛苦，太不甘心，要去找刺激来麻醉自己，他毫无坚持地丧失了青年团员和革命干部的立场。这一时期我所知道和他接触最近的是儿童剧团的孟远和虬江路小学校长李牧子。

杜高的父亲是老干部，在山东大学教书，杜高出版的《在思想战线上》论文集，就是他的父亲介绍给私营文光书店出版的。后来杜高的另一本论文集《战斗和战斗者》是王西彦给他介绍到上海文化社出版的。王西彦是杜高的姑父。

杜高给王里信抄件转去剧协。

人美社五人小组办公室

亲爱的王里：

前次给你寄过一页短信，那是写于一种烦恼和急躁的感情中的，没有接到回信。

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好消息，今天接到一封李之华同志的感人的信。首先是我的剧本的构思鼓舞了他很大兴趣。其次是你前次告诉我的不愉快的，而且奇怪的信，有了下落，原来是山东大学一位《文艺报》的通讯员，叫李希凡的，他自称来访过我（我却一面未见过此人），说对我印象不好，说我讲文艺界虽然整风，但大家仍看张君秋和吴素秋的戏，说我讲胡风不作检讨。于是《文艺报》把信转到创作室，对我在这里的工作作了真实的鉴定，且提出表扬。又有一位市委宣传部老同志写了热情的信给艺术局提出表扬。我听了很感动。（此均系内部问题，除田庄外，不必对任何人说）对冶弟也不必说，他的口不稳，而且对此事他也不甚关心。我相信正义是会胜利的。

我现在匆匆给你写信是希望你安心，不必为此事忧虑。

亲爱的朋友，我感激你和你的关怀。

田庄寄了封信来，我很感动，已作复，也是封长信。

友情啊！朋友之爱啊，永远地支持着我和我们。



我正在写戏，这一晌心情不太好，现在又安心了，创造吧！把善良给人们。把爱给人们。

回北京的时候，再畅叙离愫吧！

拥抱

（这封信是杜高1953年在青岛四方铁路工厂体验生活时写来的）

杜高和汪明的补充材料

由于吴院长的几次报告和参加一两次斗争会，使我彻底地认识了敌人的真面目。文件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不是历史上有问题，就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石羽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些话。石羽历史的复杂、恐怖，使我吃惊，他的伪善的面目被揭穿了。于是，我便联想到杜高，这几次为了清理自己的问题，将解放以来的言行回忆了一遍，我突然发觉到，我的所有对组织不满的牢骚、怪话、“小广播”以及对许多问题的错误看法，对这次运动的不能全身心投入，主要是受了杜高的影响（当然，我自己也有许多思想问题）。我说这句话是通过思考的，而且是受到党的不断教育和启发而逐渐明白的。我过去写杜高的材料之不能彻底，原因是我被他过去的假相所欺骗，我一直以为他是思想问题，以为他只是为人有缺点。我提起笔就考虑，运动过去后大家还要见面，生怕写得过火了，当运动展开不久，他故作轻松地到剧院来打乒乓球，吃饭时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他还告诉我，说创作室主要对象是鲁煤，他不过是思想问题，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又一次地被他欺骗了！我为什么这样容易受他的欺骗呢？原因是我从感情上希望他不是政治问题，免得连累我。由于这种思想的阻碍，我不能全面考虑和研究他的问题，仅仅是孤立地去记忆他给我说过什么，所以怎么想也想不完全，近几天，我从他的为人、一贯的言行、生活态度、思想品质以至他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忆，我发现杜高的问题十

分严重，有必要写这一补充材料，以供组织参考。

（一）我首先对杜高的历史表示怀疑，他经常对我说什么"革命家庭"，什么他是"流浪儿翻身"，如何被国民党特务迫害，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证人，他不像别人，谈到自己的光荣历史总不免会谈到某人知道或与某人一起，可是杜高的"光荣历史"没有任何人知道，好像他"干革命"完全是单枪匹马的，现在愈想愈不可信。他从桂林时期一直到解放，他没有谈过一个老朋友或知心的同志，尤其是在贵阳和香港两地，好像普通朋友也没有，不知道他这个"流浪儿"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实在可疑。他在吹嘘他的聪明才智时曾透露过，他逃难到贵阳后，在《贵州日报》当过编辑，而《贵州日报》是国民党官办的反动报纸，能在这样的报纸当编辑还能做出什么好事？他到北京后，认识的人非常多，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而且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就搞成了他们的所谓"家族"的小集团，而且他是以家长自居的。就以他这样一个会交朋友的人，在国统区的漫长的岁月里会没有大量的"朋友"？不是的，不过是那些"朋友"是不可告人的吧！总之，我对他的历史表示怀疑，他是一个来历不清的人。



（二）杜高是个没有爱国主义感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我随便举几件小事情来说明我的看法。今年的"五一"节，许多同志去观礼，他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他是第一次观礼。别人观礼回来，总有许多感受，不但看见了毛主席，还看见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伟大的领袖们。别的人都兴奋异常，可是他无动于衷，好像不曾看见似的。还有，当我们谈到担心今年天旱歉收，以及我们国家在外交上的每一次胜利的时候，他一贯是不感兴趣的。

（三）杜高不论到哪里爱乱翻人家的东西，在小组会上，兰樱同志曾指出反革命分子路翎也爱到处乱翻，而他们到处乱翻，绝不是过去我们说的仅仅是一种坏习惯，和他们整个人回味起来，我认为他们这种举动是别有用意的。

（四）杜高的《星星照亮的天边》拿到创作室讨论，同志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光未然同志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叫他修改。由于光未然同志关心年轻人，提出意见之后，不免要鼓励几句，可是杜高回来就造谣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他的剧本了，他硬要我在吴

院长和孙副院长面前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他的剧本。他还说，剧院选择剧本主要是听光未然同志一句话。他企图用这种手法欺骗剧院领导，我没有受他的骗，因为我不相信他的那个剧本会得到光未然同志的肯定。（这话他和许多人讲过，但谁也不相信）

杜高一面说光未然同志如何肯定他的剧本，如何重视他；一面又污蔑光未然同志，他说，现在领导上开始重视新生力量了（他指的领导是光未然同志，好像光未然同志过去不曾重视新生力量似的）。还说：我们的剧本能否在《剧本》月刊发表只要他一点头就行了，能否上演也是他一句话，今后必须靠近他，他也需要抓住一批能写的人作为他的势力的。

（五）杜高对丁帆同志的仇恨之深是难以理解的，他说他终有一天要报复丁帆同志，他的剧本中的反面角色丁一凡就是为了在精神上报复丁帆同志而取名的，而且他说以后的剧本的反面角色都要取名了凡。

我们在后政文工团和丁帆同志对立，以至发展成与组织对立，主要是由于杜高的挑拨，（我自己也有严重的缺点）就拿我个人来说，过去不认识丁帆同志，和丁帆同志在文工团也只相处一两个月，而且我和他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为什么一碰就不和了呢？我也常想，到底是为什么呢？找不出答案，我们也常互相问，到底是为什么，杜高说："起因是丁帆同志和他同时用一个题材写了文章。"可是，丁的文章发表了，丁是胜利者，如果说恨，应该是对方（杜高），所以这也不成其理由。到底为什么，要杜高本人来解释了（杜高可能回答是由于丁帆同志在《文艺报》写文章"破坏"他，这已经是到了北京以后的事，我所说的是在文工团的时候）。

杜高不但挑拨我和丁帆同志的关系，他也用各种方式阻止我接近进步的同志。洪纬同志从东北回剧院后，主动地来接近我，帮助我，所以那个时期接近比较多，杜高和汪明就恶毒地讽刺说："你和洪纬发生感情了？"

（六）在运动初期，杜高曾给我说过，他说："胡风的问题可轻可重。"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坏的后果，当时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认识不清楚，是思想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我也拿不定，他这一讲，我以为胡风问题只是思想上反动。这样一来，我对杜高的问题觉得更

不足轻重了。因此，在运动中，我一直相信他是思想问题，和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关系也只是受到一些文艺思想上的影响，所以我迟迟不能彻底地揭发他，他所作所为也不能够很快地记忆起来，当然，我自己也存在着许多旧思想阻碍着我，不能很快地投人运动，站稳立场，对杜高、汪明进行揭发，这我也要作深刻的检查，可是杜高的这种话对我是有影响的。

更值得提出的是，杜高一面说他是思想问题，创作室的主要对象不是他，而且说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他另一面又表现得那样害怕，运动展开后到处乱打听，两次约我到外面去，告诉他剧院对他提出了什么材料，尤其是东北回来的那些年轻的同志说了他什么。（一次在公园一次在和平餐厅）很显然他是要我传达剧院同志们对他提出的材料，以便伪装坦白交代，如果剧院没有提到的就企图隐瞒。

（七）杜高、汪明和我说过的话，现在又想起了这些，我不作分析，将原话写在下面，字句上可能有错，主要内容我是仔细地回忆过的。

①杜高对我说过，汪明也在场（汪明我记得也同时说的）他说："吴祖光说，艾青同志在吴祖光家里说，胡风如果是长期潜伏的特务，当时在上海为什么不害周扬同志夏衍同志？"

②杜高在运动初期说："胡风不是'特务'。"

③杜高说：萧军常到胡风家去，萧军说，现在我比你轻松了，搞什么文艺批评！搞创作就不会惹这许多麻烦了，你看我现在，他们（指党）要团结，我就来，要冷我，可冷不死我（字句可能有出入，意思没有记错）。

④杜高说："刘（芝明）部长发生问题后，萧军非常高兴，大请其客。"

⑤汪明从朝鲜回来后，在谈他的创作计划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志愿军里也有开小差的。"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起的，我都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供组织参考，我还要继续地回忆，只要我想起哪怕是一句话，或是一种感觉，我都将不断地作补充汇报。

萧崎　八月十七日晚



萧崎本人反省态度很不好，正促其交代中，材料仅供参考。

抄送局，在东后文工团反领导的活动，及在运动中的两次会面(中山公园，和平餐厅)还要他详细的写。

田蓝　八月十九日

萧崎的检举材料

(1955.8.20)

1. 杜高每一作品写完后，总是先给路翎看，路翎也非常欣赏他的作品。

杜高拿着自己的剧本常说：路翎肯定一个作品是不容易的，谁的作品他都瞧不起。

当杜高的剧本被否定时，他说：今后写剧本须改变作风(意思就是写概念化的作品)要想争取剧本上演，只有写概念化的作品。



2. 杜高说《钢铁运输兵》根本不能算是一个话剧，没有人物性格，黄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

3. 杜高约萧崎在公园见面时，萧崎说运动开始就轮到我首先检讨，犯一次错误(指在东北后政文工团时)要检讨几年，杜高接着说："东北的事不要回来谈，现在麻烦已经够了。"萧崎说：我已承认是小圈子，而且已经批判过了，没有必要怕人讲，田蓝要我写你们的材料，田蓝说我和你同流合污，现在形势逼着我非写不可了，不过我不会为了自己就乱编材料，你们说过什么，我就写什么。临分手时，杜高说：有些话是无意中说的，不能代表我的思想，不要把什么话都端出来呀！

4. 杜高说：潘开茨说：潘汉年被捕了，我姐姐还不让他胡扯。

5. 杜高问萧崎，你们吴院长和孙院长之间可能有矛盾，萧当时说："可能，可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有一天，孙院长有张戏票，请金山打电话转告萧崎(萧曾向孙院长要过戏票)，这时萧崎到孙院长处去拿，正巧吴一铿同志打电话问孙维世同志要票，这时孙院

长感到为难，萧崎说，给我吧，吴一鏗同志看过彩排了，这张票就给萧崎了。事后萧崎对杜高说："这张票为什么不给吴一铿，孙维世一定对吴有意见。"杜高接着说："怎么样，两个人都是搞业务的会没有矛盾？"

6. 运动一开始，杜高对萧崎说："创作室对象是鲁煤，我不过是思想问题。"

7. 今年"五一"节观礼回来时，别人都很兴奋地谈到毛主席，他是无动于衷，他想的是如何拿剧本上演，广告上把他的名字和名导演的名字登在一起，如何出版拿稿费……

8. 从东北回来后，杜高把《到汉城去》的剧本，改为《向三八线前进》出版之前，杜高跑到田局长那里请田局长题字，不知他怎样糊弄田局长，总之田局长给他题字了，于是就用田局长的题字大为宣扬。萧崎说，楼部长知道会出问题的。杜高说田局长都同意了，他有什么办法，而且他的那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见得就是对的，在东北没有办法给他争论，到了北京他还管得着？

9.《星星照亮天边》写好后，杜高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我的剧本！让萧崎在吴院长和孙院长面前也这样说。



杜高说，剧院选剧本主要是听光未然同志的一句话，我们的剧本能否在《剧本》月刊发表，只要他一点头就行了，能否上演也是他一句话。今后必须靠近他，他也需要抓住一批能写的人作为他的势力的。

舒巧的材料

(1955.10.17)

即转文化部中共党委　周而复

据我了解在杜高周围的人有：陶冶，他称杜为"惠哥"（杜高原名李传惠），杜高亦称陶为"冶弟"。杜自己说在生活上给陶一些关心、照顾，陶有困难或苦恼就来找杜商量。陶在国外期间经常在我们面

前吹嘘他的朋友，特别是杜高，"青年作家"、"小才子"……之类。在我面前就谈得更多些，从缅甸回来，就介绍我和杜认识（约三月里），汪明，自称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差不多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我认识杜高期间经常在杜高家遇见他。罗坚，歌剧院的乐队队长，他们把他当做大哥哥看。蔡亮，杜高说是他最喜欢的弟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据蔡亮的爱人张自疑说：蔡亮比较崇拜杜高，在文学上，有时杜和他谈谈，对他的画提提意见，使他很信服。大概在两三年以前认识杜高。王蓓，上影演员，据杜说她是来青艺演《屈原》时认识的，他们很熟，有时谈话到深夜，青艺有人以为他们在谈恋爱，杜否认。杜给她写信称她四姑娘，他们互相经常地通信。萧琦和他们也很接近，他们称他萧老琦，或萧琦大哥。陶冶的爱人胡秀玉也认识杜，胡也托陶带礼物送杜高、汪明等。上海实验歌剧团（即我在的团）谢容明、伍黎亦认识杜高，杜高并未告诉我，但罗坚到上海找过他们，而且从他们那儿知道我和杜高的事，所以，他们应该是互相认识，而且有联系的。谢给杜高一封信，称他"惠兄"。

陶冶常说："我们的家族……怎样怎样！！"他称他们这一伙人为家族，而且说杨秉荪（现在匈牙利学小提琴）想参加，但他们不要他；说过：要参加是不容易的，要有一定的条件的，轻易不吸收人。

运动开始之后：文联扩大会那天中午我在他那里，从会场回来他情绪很紧张和激动，而且说到过吕荧太傻。钱部长曾和我谈过他和路翎有一般的关系，要我作思想准备，同时可以对他作一些了解和启发他交代。我和他谈了，他说他只是看路翎被批评得可怜，太孤独，所以在生活上和他接近，照顾他一些。可是别人由此怀疑我的，这很糟糕，没有这件事就好了。他说他是曾经很崇拜路翎的才华，说路翎俭朴、刻苦，简直看不出是个坏人。说他写了《祝福人们》，路翎鼓励他出版，这点他要控诉，也检讨自己在路翎面前说过坏话，牢骚，被利用。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胡风分子。鲁煤被看起来，他想不通，他说他怕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在路翎的密信中提到他。又说可能不会这样，因这几年他们都在北京，不用写信，口谈就不要紧了，还说幸亏没见过胡风，他给我写信曾说运动在月底（六月）要结束。他又说过，人是有二元性的，他能写英雄人物，党的优秀党员，那他本人的思想水平也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他对我说:你从我作品里可以了解我整个的人。

他说《淮上人家》是现象的罗列,对它完全是蔑视的态度。他自己写勘察队的剧本,也说这样的东西以后不写了。他说他就要写像《雷雨》这样的剧本,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曲折甚至离奇的,他说这才叫戏剧,他和我谈过他的一些创作计划。故事、主题都是虚构、伪造的,我对他提出意见,他说我是文工团员的观点。

那次谈话,他知道我从钱部长那儿回来,又问我钱部长还问了他一些什么。情绪亦很紧张。他有个姐姐,似乎称"纯姐",不是亲姐姐(她丈夫在农业部工作),和杜高等关系比较密切。杜和他父亲关系不十分好,据他说是他不满父亲在解放区又结了婚。和他哥哥关系密切,常写信,寄过一次稿纸和钢笔,杜的作品他哥哥很重视。

肃反运动以前曾和我父亲谈过一次话,大概是谈文学。

我对他的了解,绝大部分是听他自己讲的,所以确实与否,我不知道。

供参考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
汇报"小家族"

徐明同志:

剧协为审查杜高"小家族"专案,向我院要与这个"小家族"有关人的简略材料(现在写的三份材料就是照剧协的要求和规格写的),请局办公室审查后速转剧协李超处为盼。

此致

敬礼!

八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转剧协艺术局五人小组

王正　原名：王正　曾用名：黎焚　王亦放

性别：男　年龄：二十六岁　籍贯：湖北省云梦县

文化程度：大学肄业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教员）

个人成分：学生　政治面貌：团员

此人历史上尚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但其父系一革命叛徒，现在汉口受管制。王正在很长期间内未能从政治上和他父亲划清界线。

和汪明、杜高等的关系

王正由于在剧院担任剧目工作，和杜高、汪明有密切接触，后来因本身思想反动，立场模糊，逐渐被杜高、汪明拉拢，接受他们影响反对剧院领导。并为他们传播反革命谣言。加以此人素来崇拜反革命分子路翎，和政治上可疑分子纪芒一道宣扬胡风、路翎及其作品，攻击党的领导，更为杜汪"小家族"赞扬和支持。

在此次运动中由于党的严格教育，王正立场有明显的转变，不但在斗争中大胆揭露了纪芒的反动活动，同时还检举了路翎、杜高、汪明之流的反革命言行，现在已被提拔为战斗中的骨干分子。

八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纪芒　原名：姚瑞焕　化名：姚蒙柯

性别：男　年龄：三十二岁　籍贯：江苏省武进县

文化程度：同大学一年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小商人）

个人成分：小资产阶级（蒋匪军佐新闻工作者）

政治面貌：群众

此人在1942年参加国民党，曾在蒋匪交通警察总队任中尉书记。在蒋匪第六十二师任上尉书记，抄发作战命令，掌握机要工作。

和汪明、杜高等的关系

纪芒在解放前（1948年—1949年间）与杜高关系极密切，杜高

离开伪青年军政工队后即到常熟与纪芒一起演剧、编报。常熟解放后，他二人一起从中统特务头子石民庸处索得路费往苏州，与李牧子、卞里等人会合后转赴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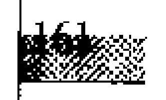
纪芒与杜高先后转来北京工作后，表面接触虽形疏远，但纪芒与以杜高、汪明为首的"小家族"的关系还是较密切的，特别是纪芒一贯反组织、反领导的情绪，以及他公开攻击党、顽固地支持反革命分子路翎及其作品的行动，是与胡风集团及杜汪"小家族"如出一辙的。"小家族"所散布的许多恶毒的反革命谣言，有一些就是通过纪芒来传播的。

纪芒在运动中揭发了一些"小家族"散布反革命谣言的活动，同时也初步揭露了关于杜高历史情况的材料。

八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萧崎　原名：杨斌毅　化名：杨绍乔

性别：男　年龄：三十三岁　籍贯：贵州贵阳市

文化程度：初中二年肄业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

个人成分：自由职业　政治面貌：群众

此人在1937年曾参加过共产党，1939年脱党，以后始终未接上，这段历史，目前尚无证明材料。

和汪明、杜高的关系

据他自己交代是他们"家族"的朋友，不在"家族"内，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时他们即是一伙小集团，狂妄自大，谩骂领导，除佩服路翎和他们之间互相吹嘘外，看不起一切人。在群众中吹嘘他们集团的作品，打击别人的创作情绪。回京后，他们来往密切，常在一起污蔑党，污蔑同志，并互相小广播及制造政治性的谣言。

运动中订攻守同盟，萧崎给杜高、汪明通风报信，并多次约会密谈。

八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有关人员的材料及检举抄录

杜高一九五二年四月来青年剧院，与路翎结识，很快便成为路翎的崇拜者，认为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的作家"，经常在别人面前称赞路翎，两个人经常谈创作问题。

杜高曾有一时期大量搜集胡风的著作，声言准备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但之后并未写出一篇批评文章，反而对人赞扬起胡风的文章来，而且推荐别人去读。

在这之后，杜高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份的《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单纯和美及其他》，实质是在宣传胡风的"真诚""爱""日常生活"之类的谬论，又曾写过一个话剧《祝福人们》对今天的工业管理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做了极大歪曲。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体现。

杜高的生活特点是欢喜搞小圈子，在东北后勤文工团和汪明、王肇烟、萧崎结成小集团反抗领导，挑拨同志关系，互相吹捧，发展自由主义，直至回北京后这一小圈子仍继续存在，之间经常传播一些流言蜚语，如"契尔卡索夫在上海电影院里摸女同志的大腿"、"刘芝明同志垮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各国青年在一起乱搞男女关系"等等。据说有些是从吴祖光那儿听来的。

在《文艺报》检查工作时，杜高刚从福建铁路工地回来，听到路翎发言了，很兴奋，立即要求参加会，要在会上发言批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因为一九五二年《文艺报》内部通讯上曾发表丁帆反映杜高等小集团在东后文工团的情况的一封信），当时被领导劝止，会上未发言。

杜高在北京与另外一些青年，如田庄、汪明、陶冶、蔡亮、罗坚等人自称为"我们的家族"称兄道弟，相互吹捧以"青年天才"标榜。其间也经常传播"小广播"，田庄甚至把电影局的内部秘密文件，关于批评《攻克柏林》《宣誓》的译文拿给杜高、汪明阅读。在一起乱

扯男女关系的秽事，叫做"介绍经验"。

以上仅据青年剧院的一些同志的揭发材料及杜自己在学习会上的初步检查所谈出的情况，虽未达到彻底揭发的程度，但已看到其性质是严重的。

杜高说，毛主席讲胡风的意见书中很多论点是正确的，当然基本上是错了。

杜高是个伪君子，恶劣，善于拉拢人，打击人……

杜高的继母是胡风的妹妹。

节录王正1955.6.9的材料

赵青、李珊、王正三同志对杜高的反映

一、杜高等人的小集团的成员及其状况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汪明、杜高、萧崎、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等人，他们自称为一个"小家族"，这些人与吴祖光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间经常互相吹捧、包庇，和组织对立，散布不正确的文艺思想，详情见下边。

二、杜高与反党分子胡风、路翎、鲁藜等人的关系

王正同志说杜高说过"胡风的妹妹是他的后母"，直到胡风的"意见书"出来时，杜高还说胡风的一些理论如何正确。还公开说过"在对于古典遗产这个问题上，我是个胡风派"。



赵青同志说："鲁藜赴朝体验生活时曾住在我们那里(和杜高住在一起)，当时他们和鲁藜很接近，说他是个天才诗人，要求领导上尽量照顾他……后以集体朗诵的形式演出了鲁藜的《英雄万岁》。"

李珊同志说："他们中间经常提起路翎如何天才，一星期写出《英雄母亲》，向我们宣传路翎的作品如何伟大。"

三、对待组织和同志的态度

赵青同志说："当青年团要过组织生活时，他(杜高)就感到厌烦得不得了——他认为没意思，是和小孩子在一起胡缠，他告诉团支委，他只能给团一个钟头来过组织生活，他要写作不能多浪费时间。团里进行团章测验，他的抵触情绪也是极其强烈的，认为没意思，结果他不及格。"

赵青同志又说:"五一年当我们在各医院巡回演出时,有一次演出完了,杜高曾对我说《绞索套着脖子的报告》一书中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要对我说的,即——'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可是要警惕呀!'当时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曾问过洪纬、当时的了解是他是爱我们的,可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太恶劣了,应该警惕……"

王正同志反映:"他说创作室和他作对,他认为剧协是光未然把持,《剧本》月刊是赵寻一伙人的天下,贺敬之这个人世故、狡猾,在幕后操纵,乔羽陈腐、黄悌等浅薄。"

李珊同志又说:"杜高回东北文工团后,前方把部分的材料寄到我们团,提出他的怕死保命思想,支部开会批判他,他痛哭流涕地作检讨,内容又极不深刻,但,汪、萧、王等人都争先发言,表示为他的检讨所感动,企图替杜高掩护,杜高本人也装着倾听意见,不断点头,在本子上记着,其实却在画王八、小乌龟,根本没有诚意。

李珊同志又说:"另外,他们四人轮番到团长(储虹同志,现在中铁总工会文化部)那儿谩骂组织,说他们当时鉴定作的不对等的话。

四、杜高在朝鲜的表现

杜高五一年和汪明写了一个剧本叫《到汉城去》,因剧本有些地方不够真实,当时后勤文化部拒绝出版。李珊同志说:"杜高等把剧本换名《向三八线挺进》投到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并发牢骚,说组织上有错误。"

李珊同志又说:"杜高到前方去体验生活,在前线只在山洞中等着,不敢出去,并且告诉别人说:'我是新中国的青年作家,我对于祖国,比什么都宝贵,死了太可惜……'"李珊同志说:"杜高在《文艺报》投过一篇题为《完整的人》的稿子,写一位朝鲜人民军伤员在中国养伤的英雄事迹。当时这位英雄已截去了四肢,杜高去搜集材料时,用手巾堵着鼻子和他谈话,但稿子上生动地描写他如何感动了,拥抱这个没有四肢的人。"

五、杜高的小广播(造谣)

王正同志又说:"杜高接着说:'刘芝明垮了!总理有一天请老舍、吴祖光吃饭说,我不要刘芝明当部长了,问题不简单。'他说原因是刘芝明同志在东北领导创作、产生了大量的概念化的作品,另

外与高饶事件也有关，他还听说：有一次毛主席召见刘部长问到高饶的事，刘芝明同志听晕倒了——所以刘部长休养，并不是真病。这一番话是吴祖光告诉他的。”

王正同志又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宣传李之华是写不出东西了，李之华领导路翎，我想不通！”

有关汪明、杜高和王肇烟

鲁藜从朝鲜返东北，住东后文工团，和杜高等人非常亲密。他们为鲁吹嘘、说鲁是了不起的诗人，天才洋溢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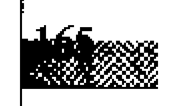
王肇烟等人为杜高吹嘘，七岁能文，才华非凡，引起王××、赵×（女同志）的崇拜，对杜很表好感。杜对她们抓得很紧，使他们脱离组织，脱离了团支部。

汪明给赵青的信中说：“我厌恶这些乌鸦与麻雀的噪杂，这些蛆虫、蜘蛛……”

杜高是青年团员，很少过组织生活，支部找他开会，他说：“我只能给你们一个钟头……我的任务是写作。”

节录李珊 1955.6.8 的材料

关于杜高和汪明



杜高、汪明、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自称这小圈子为“家族”，常在一起聚会，标榜青年天才，互相吹捧、传递小广播。杜高曾对王正说：“二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文联开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坐主席台上了。”杜高等的“家族”和吴祖光等人的关系非常亲密，经常去吴祖光处，许多小广播的来源则是吴家。

杜高从福建归来，向王正说：刘芝明垮了，他说也是从吴祖光那里传给他的。杜汪等人经常说些“有趣”的故事，如公刘讲到佤族的落后野蛮，向解放军“借头”的故事。罗坚从福建回来和杜汪讲了许多有关解放台湾的故事，其中有牵涉到军事配备的。

杜高曾说吕荧如何好，文艺整风时错整了吕荧，写文章的青年又向吕道歉，华岗请吕去山东大学执教……

杜高不满丁玲同志提出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他说我们的搞

法不同。

杜高不止一次地宣传李之华写不出东西来了，他说："李之华领导路翎，我想不通。"

杜高说创作室和他作对，他说光未然把持剧协，《剧本》是赵寻等人的天下。

青艺纪芒的检讨中谈到关于杜高的部分的摘录

(1)杜高说："贺龙同志率领赴朝慰问团在东北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周扬不行，毛里毛糙'，好像是说有一次在谈起《四十年的愿望》这个戏时，吴祖光说的。"当时说起这问题有这样的意思："文艺领导很差，周扬也不一定正确。"

(2)杜高说："蔡楚生说现在文艺界只有两个人最可爱，一个人是田汉，一个人是洪深，因为他们仍和解放前一样，别人解放后当了官，都变得不可爱了。"这是王正转告的。

(3)杜高说："契尔卡索夫来中国时，有一次在上海看电影《南征北战》时，调戏坐在旁边的秦怡……"(王正转告我，我曾和方召谈过)

纪芒交代 1955.6.22

据青艺反映：杜原来在铁道部文工团去抗美援朝回来后，自己要到剧院，后到剧协工作。

江苏常熟县小学教员苏昵喃检举：杜高在常熟县《新生日报》当编辑，参加过中统特务(可是青艺孟毫同志去该地调查没有结果)。他与青艺研究组员纪芒，原名姚瑞焕、姚梦柯同在《新生日报》一起工作。可是杜与纪关系密切。互相包庇不谈问题。

杜与汪明、李维时，路翎，萧崎(青艺)王肇烟(文联)是一个小集团，常在一起小广播。

文化部艺术局关于杜高的材料

许仪曜交代与杜高的关系(艺457)

杜高我与他接触过几次,问他的剧本通过没有,他告诉我需修改。不久他又下去体验生活,回来时团的关系转到剧协,我就很少接触他。直到陶冶要到东北时,我又到他的宿舍,他并且也来过几次。第二批材料发表后(五月三十一日)我送了一个闹钟给汪明,杜高也在那里。因为汪明有事出去,杜高邀我到他那里玩。这次会见,他和我谈他与舒巧的恋爱,后来谈到反胡风学习,他说他写了批评路翎剧本的文章,并问我部里有没有人谈到他。我问他说,听说你与路翎来往很密切,他说就是这样才洗不干净。他说他担心第三批材料要给他来上一个名字,说此人可以争取,那就完了。他告诉我说,他问过陈白尘他是否有问题,陈告诉他没什么,检查一下思想就是了。他有一双皮鞋穿不着,他要给我穿,我说我也有一双,如果他能穿就与他对换。后来那双皮鞋被我哥哥转让给别人了,我就给了十五元给杜高。六月五日他到部里来开会没开成,后来他同我一道去吃冰淇凌。他对我说方玉很不错,让我还是与她谈恋爱。我告诉他我已和另一个人在进行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又问我部里是否有人谈他,我说就是上次和你说的那些。后来他到部里听报告,到我屋里喝水,他又问我同样的话,并问陶冶是否说了很多与路翎的关系,我说他告诉我一些,他说其实他与路翎没有什么关系,就和田庄一样普通交往,我说同志们要我检查与陶冶的关系,我说揭发材料是另一回事,思想检查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不能把这混起来。不久他又到剧协来开会,会前到我屋里听唱片,并对我说,他的检查已经在小组会上通过,他现在很轻松,要我与他及汪明在星期天一起找个地方跳舞。在这之前他还告诉我路翎已被隔离,并说鲁煤在反省。



许仪曜交代材料部分(艺467)

杜高到部里第一次听陈部长报告时,我告诉过他刘雪苇给搜查,那时陈部长还没宣布学习纪律,我也和平时一样好广播,就告诉了他。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现在在争取满涛,他很有才能,翻译别林斯基选集。讲这话时在座的有他的姊夫(听说是农业部的一个局长),他并拿别林斯基选集给他姊夫看。

(艺414)

我和杜高的关系,过去我到他宿舍去总是和陶冶一块去的,到他那里之后,虽对我还很客气,走时还说有空到他那儿玩,但不是很热情和我谈话的。他偶尔说说我长得潇洒、现在就是恋爱苦闷等等话。这次我从西南回来之后,对我是特别热情的,曾给我长谈舒巧如何爱他,他得到舒巧的爱是如何的幸福,并且我对他谈了我有恋爱对象之后,他开始给我分析,说还不是很乐观的等等,但最后给我出了主意,并让我进行之后告诉他。这样使我在这个阶段不得不接近他。一次谈学习问题时,他对我说:他曾批评过胡风集团分子的作品(没说明是谁),胡风集团很恨他,并告诉我他正向路翎的剧作开火,(到局里来时并拿着剧本给我看)直到后来告诉我他的思想检查在小组会上通过了,要我星期六与他同汪明一快好好玩玩。他说这话之后,星期六到人事部跳舞,那时我很放心地告诉他,叶林要我检查与陶冶闹生活小圈子,我说:这我可作为思想来检查,但与揭发问题不能并论。他接着说,对,把他扯在一起是搞不干净的。



摘录许仪曜交代材料

张健揭发(艺412)

关于许仪曜的小集团,很早就形成了,他们小集团的成员有:陈刚、杜高、陶冶、高骏千,他们集团的简称是"废协",意思是废话协会,专门说废话,据说陈刚是秘书长。他们鬼混,密切得穿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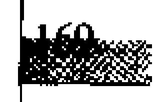
裤子。有一次陈刚说我在资料科："行啦，你够参加废协的资格了！一天没别的都是废话。"这个小集团不是一般的好的革命同志，而是一帮别有用心的政治小集团，也绝不只说废话而是在说废话的外衣掩盖下，宣传反动思想，进行破坏革命事业。他们集团的秘书长陈刚曾散布过这种论调："路翎是个青年作家，很有才华。"同许仪曜那种疯狂的推荐反动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是有着血肉关系的，这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问题，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作反革命的勾当。以上是我知道的情况，供组织参考。

艺术局　张健

7月27日

中央戏剧学院崔开明检举关于杜高、汪明(剧协)

我从前在志愿军后勤一分部文工团工作，作家杜高、汪明曾到我部体验生活，他们表现得很不好。战士们反映，他们不是"作家"，他们是"作洞"。因为他们怕飞机，整天坐在山洞里不出来。到医院去搜集材料是掩着鼻子出进，后来在《文艺报》看到杜高写的《为战斗者才能为诗人》。当时我非常气愤，曾把他们的行动表现写给《文艺报》，主要揭露他们的言行不一致。《文艺报》回信说："已把信转给杜的工作单位。"



我队与朝鲜平安南道艺术队联欢，杜代表中国文艺工作者讲了话。现在记不得他所说的内容了，后来收在他出的一本书里。

在我们政委的谈话中知道杜曾有这样一个计划："冰桥"来反映我们后勤部队对敌斗争，政委说：我们后勤部队不是吊子、二百五，《冰桥》迎着初升的朝霞，那不化了吗？

在东北后勤部队时，杜、汪曾写了大型的话剧《到汉城去》来反映后勤的斗争，内容有错误，后来停止上演。楼部长听说他们要出单行本，曾去信制止，结果改为《向三八线前进》在上海一家书店出版的。

关于剧协杜高

以下根据青艺候补党员段承滨检举材料摘录

……他们(杜高、汪明)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散布着一些极为诡秘的"新闻",看来很轻松地谈来谈去,实质上却是一些有损我党利益的"流言"。

杜高对王正还说过这样一件"秘闻":刘芝明部长为了高饶事件被撤职了","周总理请吴祖光、曹禺吃饭,总理对吴祖光等说:我对你们的刘部长很不满意……"(王正检举材料里也有此条)

我揭发杜高的反动言行

孔庆珊

今天吴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揭露出反革命分子纪芒和杜高的关系,才使我知道杜高原来是一个胡风分子。过去,我认识他,就现在想起的,他的确宣传过一些反动言论。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揭露出来,供领导上参考。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去找他玩,碰见他和路翎正在讲说什么,我一进去,他俩就停住了。他向我介绍了反革命分子路翎。我当时觉得人家在说话,我来了多不好,但即刻走吧,又怕不礼貌,就勉强坐下了。我记得杜高说:"他(指我)是吕荧的学生。"路翎点点头,即走出去了,说是下楼看看别人。我觉得扰了他俩谈话很不好,即坐不一会走了,我记得当时杜高送我走时说:"今天我们谈些问题(指路翎谈什么)不大方便,希望你改天来玩吧,对不起。"我当时不在意,即走了。现在想来他与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密切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谈话时,他是说到路翎的小说很有才能的,而且说有些批评是不大得当的。我当时因为认识不足的确觉得这些话还有一定的道理哩。现在看来,他的确是路翎的应声虫,替他宣传。

而且我记得他两三次对我说到,希望我转告吕荧,他想看看他,我记得在本年春节看吕荧时提了一句,但吕荧似乎不愿意见,我也觉得说说就算,愿不愿在你。后来因为觉得不如杜高所愿,就没告诉他。直到吕荧被揭发后,杜高见我就说:"亏得没看吕荧。"我才把吕荧不愿见他这句话告诉了他。可见他过去是非常倾慕胡风分子的。

我记得在批判胡风阶段，他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胡风去找过袁水拍一次，谈了一晚上，回去了又打去一个电话说："我今天说了许多话，但有一句话忘了说，就是：我今天去是为了道歉的。"并且杜高添油添醋地说：胡风这样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些日来对他的批评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今天看来，很可能这是他假造的，在替胡风打掩护。

在文联扩大会上，揭露吕荧以后，吃饭时碰到他，我记得他表示非常痛恨吕荧的样子，说吕荧纯粹是一个反派形象，就和《伟大的公民》上那个小山羊胡子一样。可是，过了两三天又碰到他，他又说：他们在剧协(?)交谈，有些人又说吕荧是个严重的书呆子。的确，我当时因为对吕荧的反革命行为认识不清，觉得可能，曾相信了这句话，以致好长时间认识不清。现在看来，的确是上了他的当的。

总观以上几次事实和印象，我才较清楚地看到这个以"青年作家"面目出现的家伙，原来一直向我宣扬胡风的东西，是一个胡风分子！

我自从来剧院认识他以后，一直觉得他"年轻"、"热情"、"有前途"，把他当成了"文学朋友"。有时觉得他以"年轻"自命，夸耀他的作品，有一点骄傲，是年轻的原因，而从来没想到这正是他胡风分子的外形。我也曾觉得他的理论是受胡风一定影响，但总觉得这仅仅是"影响"；而且在批判胡风时，看他案头堆了许多关于胡风的材料，他自己声言是受过影响要进行批判，而且说批路翎，就信以为真，觉得他是一个被骗者，是思想问题。

运动开始，记得他还对我说过：因为我们(因为我也曾受吕荧的欺骗)过去只从表面看人，年轻轻信，面对敌人不认识，以至被敌人利用，替敌人宣传了好些东西。

我真觉得"的确"是这样，因而我就从未想到这正是他掩饰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的花招，以致今天我才想起这些，来揭发他！由此可见，我平日根本谈不上什么警惕性的，又因这许多时候，考虑个人问题，而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个敌人，检举他，足足表现了我政治思想上的极端麻痹，想来是极为痛心的！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孔庆珊是群众，我院思想批判重点，材料仅供参考

中共青艺总支委员会

九月二十七日

补材料：

我忽然想起，杜高在和我谈到我的同学和朋友李希凡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他在山东青岛体验生活的时候，李希凡作为《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给《文艺报》揭发他（内容我不知道）有一些事实是不真实的。说李希凡说到曾亲自去看他，而他高傲自大不接见。事实是李希凡根本未去看他。接着他说：当然了，李希凡现在是新生力量了，但这件事是一种品质问题。希望我有空问问李希凡。我因为当时想的确从未听说李希凡在青岛去看过杜高，到底是真是假，就没有问李希凡，过后忘了。但记得他还曾催问我一次，我说没问，他才不说什么。现在看来他不是有意污蔑，大概就是挑拨我和朋友的关系。

我记得由此事引出了他的牢骚，他宣扬了一番他是如何“善良”，他的例子是：

《文艺报》内部通讯曾揭发他在朝鲜怕死不敢上前线，躲在防空洞里。他说这是歪曲，是一个志愿军的文工团员（?）为了表现自己，把他被命令在防空洞里整理英雄材料说成躲避，而《文艺报》不了解情况发了稿。并且说，那个文工团员后来回了国，还亲自来找他道歉。他还请他吃了饭。据我看事实不见得是这样，很可能这都是他的捏造，企图蒙混他的行为，不惜以可耻的手段来掩饰的。过去，我是半信半疑的，但今天我觉得这简直是扯谎，他的目的不过是想叫我这个青年不满现状，不满文艺界的领导。

检举胡风分子汪明、杜高

当我参加抗美援朝工作时，曾与这两个胡风分子同在东北军区后勤文工团工作，当时由于对敌人警惕心不高，认识不足，对汪

明、杜高这两个阶级敌人没有认识。

现在回想当时，他们的论调完全与胡风一致，谩骂组织，破坏领导威信是一贯的作风，经常在下面同志们面前（王英之、胡萱、许俭、罗忠恕、高焰、郭常敦、刘宣宜、赵大愚、赵清、洪纬等）骂当时的文工团团长（储虹）无能，政治指导员是半瓶子醋，讽刺那些靠近组织的要求进步的（如洪纬）是走上层路线，孤立她，那些忠心耿耿终日忙于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如梁燕生，当时的分队长与团内干部等）是庸俗者，不懂得生活，不会生活。

在他们的集团里还有王肇烟和萧崎，他们四人都搞创作工作，生活上也非常接近，整天混在一起，王和萧还不敢肯定是胡风分子，但自由主义作风也相当浓厚，不习惯严格的部队纪律生活，在生活上要求特殊待遇，自命不凡。他们这几个人的言行影响了全团，因为团内极大部分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同志，政治思想模糊，认识不清，容易轻信他们的话，结果造成全团的思想混乱，同志之间互不团结，不安心于长期的抗美援朝工作，直接削弱了抗美援朝的一部分力量。

杜高到青年艺术剧院以后，曾企图拉拢陈刚，挑拨同志间的关系，如那时陈刚与杜同一宿舍，1952 年 5 月，我偶尔路过北京，去剧院时发觉陈刚对那些由后勤文工团回剧院的同志的看法，就是原来杜高的看法。看不起那些要求进步的洪纬同志（当时是团员）。具体情况可由陈刚处了解。

说明上列同志的现在所在地：

王英之、胡慧萱、洪纬、赵清等在青年艺术剧院。

储虹，当时的文工团团长，在铁道部总工会。

陈刚，文化部戏剧报编辑部。

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
实习翻译俞慧钧　8.13

内蒙古党委转来的材料

刘复之同志：

兹转去我区粮食厅索要材料一封信，希予了解后急转我区是

荷是。(原件如此)

附:索要材料一封信乙份

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章)

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

发检字第16769号

中共内蒙党委反胡风斗争办公室:

请将本材料转北京中国戏剧作家协会。

财粮贸、计委系统反胡风斗争办公室

八月十一日

财粮贸系统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

我片干部陈国键,共青团员,男,现年二十四岁,于一九五四年八月由北京大学分配我厅工作。其平日爱好文艺,不仅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所著各种文章和诗等阅读很多,并且还向别人散布。根据陈坦白: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在北京时常到中国戏剧作家协会杜高(系陈国键之侄)处,并通过杜高认识了反革命分子路翎(其详细情况没有交代)。

内蒙古转来的陈国键的材料

根据陈国键目前情况,似有被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之象征。故此,请向杜高工作单位了解是否掌握和发现杜高与陈国键有现时联系。因亟待处理,请速见复。

内蒙粮食厅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

八月十日

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章)

1. 陈国键是我厅的重点，胡风嫌疑分子。

2. 他的这份材料不老实，特别是和杜高的关系，根据陈曾搞恋爱的李聪交代，陈曾向她谈和杜高非常密切，经常接触，在人大时差不多每周都要一同去看电影戏剧，（当时有很大成分是属于吹嘘）因此，材料内所提到的平淡关系是很不老实的。

3. 我厅发现他在厕所内偷着撕毁过东西，是否杜高的其他证件尚待追查，陈这份材料内没有提到。

内蒙粮食厅肃反五人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保卫科（章）

内蒙公安部李文同志来京时谈的材料

陈国建（又名陈万师）内蒙粮食部工作。二十多岁，青年团员。（五三年入团。一九五一、五二年与杜高经常来往，当杜高去朝鲜时，寄放在陈处一个箱子，内有书籍及杜高在报社工作时的证件（共五件，已交剧协支部）。

陈国建第一次交代，与杜高是叔侄关系。

第二次交代与杜高是舅甥关系。

陈是杜高母亲陈璧登的弟弟。

陈原来的丈夫叫艾烽，艾死后改嫁李仲融。（此说有误原件如此——整理者注）

陈国建去年（一九五四年）八月由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去内蒙工作。

陈国建曾向人讲，在北京时，杜介绍他和路翎认识。现在发现陈国建在内蒙搞小集团活动，其中有其他机关的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

陈曾写信问陈西（杜高表姐）和潘开茨（杜表姐夫），杜高是否胡风分子。未得到回信。

杜高和汪明从朝鲜回来，陈曾请汪明去人民大学报告，因团支未批准，没有成为事实。

陈五个姐姐。但陈国建只交代了两个，一个是杜高母亲陈璧



登，又一个叫陈国戡，做文教工作（团员），又一个叫舄田的不知是哪一个。另外陈西给陈国建的信上又一叫果舅的不知是什么人。

内蒙是五五年六月开始学习的。

陈平时谈话中提到过，他曾读过胡风的著作。杜高曾介绍他和路翎认识，说杜高是个进步作家，胡风和路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

后来又发现陈国建和马永宾（中统特务）蓝现文（胡风分子）三人，在一块阅读《天津文艺报》寄给他们的一份油印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小册子。（他们说订阅《文艺报》的都有）问他们为什么阅读，说是研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当时第一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已揭发、

开始问他时，什么也不谈，什么也不承认（在人大学习时经常找杜高认识路翎）。

陈与一个女托匪影响分子李聪关系很密切，搞恋爱，学习开始，和陈国建等三人订立攻守同盟，光谈文艺，不谈实际问题和小集团。

陈去内蒙后不安心做财经工作，曾要求做文艺工作（人大财经系学生）。



陈国建和中央食品公司陈华林认识，今年七月此人去内蒙开会见陈国建，不知谈了些什么。

陈国建和人大教员赵宗真的关系也很好。

内蒙转来的材料之二

陈国键写的材料

一、解放前我所知道的情况。

杜高十一岁左右在攸县湖南第四保育院读过书。该院院长李融中是他姑子。当时李融中姐夫王西彦在该院教书，因而就培养了他对文艺的爱好。他很胆大会演戏唱歌。约在1943年他独自去湘西洞口国立二十中读初中，后来听说他因为盗窃事就离开了学校（不知是否逃跑还是开除的）。之后他随母亲哥哥逃难去桂

林，他参加了剧团，后来又去了贵州等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回到了长沙。他妈在教小学，他哥在养病，他就混上记者了。他和长沙当时戏剧界的人物很熟，如高宇等人。他最接近的朋友叫汤永安，也是个搞报社工作的。我只听说过这个人家里很有钱，爱吃爱喝，是个花花公子。此后杜高去过香港、衡阳等地，当过《湖南日报》、《力报》、《新城日报》、《中国时报》等伪报社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他去上海不知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去的。听说他去是为了一个他写的剧本《春来的序曲》，找熊佛西修改帮忙出版的。解放前我们因不在一起，很少见过面，从家人的谈话中以及凭片断的印象，对他的认识，是一个性格虚伪、善于吹牛夸张、活动能力很强、生活作风极端散漫的人。

二、在北京时我们的联系

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和他相会过两次。这时他在东总布胡同铁道部文工团工作。第一次是找他同去看亲戚。相别多年这初次见面，他没有谈别的，就把自己大吹了一通，什么他在上海为大学生作过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学生都惊奇他年轻，羡慕他的天才，什么他已经是个青年作家了，上海文汇报对他很重视等等。第二次见面是他上朝鲜我去送行。他临行时送了我些东西，如衣裳、皮鞋、围巾等，同时还有一口小皮箱，里面装着稿件、书等。



杜高从朝鲜回来后，他已调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宿舍在北极阁。我去找他，他和汪明及另外一个青年住在一间大房里。当时他和汪明都在写作。杜高向我介绍了汪明。说他是青年戏剧家，之后就我和杜高在谈话。我谈了些家乡的情况，同时也谈了同学们爱读他的朝鲜通讯。他非常自豪地把自己又夸了一通，说他在剧院中是最年轻的作家，与他一起工作的都是著名的作家。这院子里住的也是一些有名的人物。他指着前边一间小房说，路翎就住在那儿。我问路翎是什么人，他说路翎是天才的作家，年轻文章写得很好。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过魏巍李庄的通讯报导在我们同学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学们都喜爱他们写的东西，杜高却摇头回答，意思是并不怎么样。

我参加土改后将近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和杜高联系过了，回学校后我又去太原生产实习了。回北京时学校已迁郊区四道口，离

他们那儿很远，我也很少进城，只在亲戚家中碰到过杜高，而且会面时间都很短，只谈过些家常。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们学校和人民大学合并。我住在铁狮子胡同。从这时起我去杜高那里的次数才比较多，但碰面的时间是不多的。因为星期天他常不在家，在家时客人也挺多。我找他主要是同他上亲戚家去玩，或者问他要戏票看戏。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谈话内容大约如下：

1. 关于文艺方面：我问他现今我国有哪些很好的写工人的作品，希望他给我介绍。他回答的意思是，我国现今关于写工人的作品一般都很公式化概念化，没有什么介绍的。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一篇《评金星英雄》，于是很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很多同学都看了这篇文章，我说我们最喜欢看《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你为什么不多向它们投稿。他却冷笑着说，写这些都是为了赶任务，拿点稿费，说教式的文章写起来没啥劲头。他常夸耀他从某工厂体验生活回来所写的一个剧本，说是充满着天才，连吴祖光也给以好评。在亲戚家中还戏剧性地夸耀了其中某些情节，我亲戚曾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这种思想感情未必健康。在归途中杜高却讽刺他，对我说，他只懂得农业，麦子、稻子，哪懂得艺术。这个剧本没有通过，让他重作修改。当时我去他那里，说我因为恋爱在闹情绪，并且把我的恋爱过程说给他听了，这是一个极不健康的恋爱过程，然而他却很爱听，说给我增加了灵感，给我写剧本有所启示。

2. 关于恋爱方面：这是我们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不是罗啸华爱他就是王蓓对他也钟情，他还要我给他介绍一个会俄文的女同学，他认为女人都是盲目崇拜的，在女孩子面前要把自己表现得很高贵，她才会爱你。当我失恋了，他说我太钟情，愚蠢，不懂得方法。于是向我传授了一套资产阶级式的方法，说必须要使别人把你看成了不起等等。他还向我作过一些表演。

另外就是谈他的生活了。说当个作家太舒服了。既容易受到别人的尊敬，而且待遇也高，投篇稿子收入也不会少，吃花由你，生活不但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过得很高级。

在我们接触中也常听到他夸耀他的同伴汪明、田庄、蔡亮、陶

冶等人的天才。除了汪明外，他的其他伙伴我都不认识。由于杜高常向我夸耀自己，我也很崇拜他的聪明才华，因而我常在同学们中宣传他，吹嘘他不错，是个有为的青年作家，扩大了他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这班人是个小家族，是个反动的小集团，搞过什么活动，在北京时我确实是都不知道的，也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玩过。只在亲戚家中听到过杜高的介绍，蔡亮准备去苏联学习，田庄是审阅脚本的，陶冶经常接待外国来的文工团，汪明也参加过赴朝慰问团，而杜高本人也常说自己正在申请入党。所以当时在自己的思想中反而认为他们都年轻有为，很羡慕他们。

三、关于保存反动证件的问题

1. 当时的情况：一九五〇年杜高去朝鲜时我去送行，当时他房中闹纷纷的。有的在帮捆行李，有的在帮补衣裳，我也在帮他捆被子。他将多余的衣裳，一条西服裤子、一件夹克、一双皮鞋，还有围巾、手套等送给了我，后来他就在桌屉中清书，有的书送给别人了，将他爸及他熟人送给他的书有关哲学的书及理论书还有稿件放在一口小皮箱内，这是一口没有锁的皮箱。他说了一声给你吧，稿件和有些书回来恐怕我还要。我带着皮箱衣物等回到学校后，我即将他的书放在我的大皮箱的下层，和我的书夹在一起的，我的皮箱也是一口烂了的没有锁的皮箱。当放书时，我并没有发觉反动证件，我只看到这些书都是哲学理论书籍，与我当时的学习无关，所以也就没有理会它。他的反动证件是夹在两本很大很厚的俄文初级读本内，当时我只看到一本薄书里夹着一个很大的上海总工会的信封，这信封里装着杜高的几张照片，一颗民治新闻学校的证章，一个他在上海工作时的鉴定，还有一封短信，信纸已破，我给撕掉了。信是从常熟寄出的，大意是向他探问他们过去几个熟人的情况。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不了(大约是两个人)，只模糊地记得下面的签名很大，大概写的是"柏森"，其他就只空白的明信片了。这些东西我都给扔在我的箱中了。他的那口小皮箱则剩下来装了我的换洗衣裳及他的稿件。杜高的东西和我的书我是用布皮包着放在我箱子的下层，上面放着我的衣裳，所以我很少去理会过这些。我参加土改，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和杜高联系过，因而自己就忘记了这些东西，而杜高也一直没有向我问起过。

2. 我为什么要保存反动证件

约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去太原参加生产实习，我在该小队负责总务工作，所以很忙。临行时我清理了箱子，同时也发觉了这些证件，但由于自己觉悟低，立场观点是反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引起我对这证件及杜高在政治上的任何怀疑，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保存了这证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相反地自己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认为这是杜高的历史证明，过去各阶段如果找不到证明人时这是最好的证明。因而应该给他交给他机关的组织。以为解放初期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所以没有交给组织，当时我就想把这些以及他的书、相片等都交给他，曾打电话找他，他不在。我因为要带小皮箱走，就把其中他的稿件交给了我姐姐。我是去平安里取款时顺便带给她的（她在平安里中央民族印刷厂工作）。当时我要她交给杜高，如果杜高不在，她回去时就给杜高妈妈（我姐当时准备回家）。同时我还对姐姐说过，杜高还有东西在我那儿，我都拿来你帮我给他。我姐姐说不行，我没有地方放。一九五三年春我从太原回来后仍没有见到杜高，这一段时间他大概去工厂体验生活了。此后我就从没有想起过这些东西了，也没有问过姐姐稿件是否给杜高了。而杜高也一直没有向我要过这些东西。只他准备去重庆我在人大学习时，有一次他叫我把小皮箱及毛主席论文艺问题拿去，我就把这两件东西拿给亲戚家了。直到来内蒙时，我清理箱子，才又记起了这些东西。当时他已经去重庆了，同时还有他爸爸及熟人送给他的书，相片，我想将来一并寄给他。来内蒙以后我又忘记这回事了。因为自己心情还有些不安定，也从没有和杜高他们联系过，更由于自己的思想基础是反动的，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从没有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在自己的思想上一直没有重视它，所以杜高的反动证件及其他东西就这样长时期地在我这里保存下来了。

3. 在运动中我为什么想交不交

在运动中学习了关于胡风第二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自己曾联想起过杜高，因为他和路翎接近，恐怕他被胡风分子利用过，这时自己想起了杜高的反动证件和其他的东西，因而思想上就背上了包袱。想到了杜高如果也是胡风分子而自己又保存了他的东

西，这是一种隐瞒包庇的行为，是自己的罪过。因而就把证件从宿舍拿到了办公室想交给组织，当时自己思想还在斗争，主要是害怕，因为这些联系到自己出问题。同时还不相信杜高会是胡风分子。这时突然看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广告栏内剧本月刊上标出了杜高的文章《路翎的英雄母亲反映些什么》，而第四版上登的又是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这时自己就认为杜高不是胡风分子，不想交证件了，才采取了不但不向组织忠诚老实反而不相信组织的态度，恐怕一旦交出了反而会引起组织对自己的怀疑惹出事来。当时自己认识到了这毕竟是保存反动证件，不管怎样这总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同时又站在同情杜高的立场上，心想他既不是胡风分子我交出这东西来反而会给他生出事来，增加他的一份罪证。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认为不交比交好，想运动后烧掉它完事。所以就仍然将它收存了起来，这说明了自己是有意识地隐瞒和包庇杜高，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罪恶。

一、解放前我在岳阳读书，离家很远，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家过。同时家在长沙乡下，而杜高在城内。过去我和杜高是不接近的，很少见过面。他去香港和衡阳等地当时我都不知道。只是他妈来我家时，在闲谈时听他妈说的。杜高去重庆是在一九五四年去的。只听他说过是去体验生活，他走时我不知道，后来才听到亲戚说他已去重庆了。他去重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和他通过信。所以他在重庆的情况我也是不知道的。

二、交给我姐姐的全是杜高的稿件，没有其他文件，共有二卷，一卷是原稿，一卷是登了的剪报。这些都是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间解放后杜高在上海工作时写的，都刊登在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副刊上。稿件内容大都是讨论文艺创作问题及学习笔记等理论性文章以及影评。这些文章他后来已经综合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在思想战线上》。稿件我交给姐姐后就没有问过姐姐了。后来不知她是否已经给杜高或者交给杜高妈妈了。

三、杜高去朝鲜的消息我是在亲戚那里知道的。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要去送行。这正是他出发那天的上午。我去时他们房中闹纷纷的。都在帮助他们捆行李、补衣裳，同时还在勉励他们。我也在帮捆被子，也谈了些勉励他的话。只在一个女同志给他毛袜以

后他才对我说“她是胡风的×妹子”。我问胡风是谁。他说“是文艺批评家，中国的别林斯基”。后来他在清书籍，他把书扔在小皮箱后才对我说了给你吧，稿件和有些书回来以后恐怕我还要。这时房中仍闹纷纷的，外边锣鼓在响，有人喊车子来了。我就帮他搬行李。他在辞行，他是乘车，我是步行去车站的。在路上我们没有谈话，只在车站里他和我说过，朝鲜战场可厉害呀，这回去了不一定还有命回来。当时铁道部赴朝同志挺多，电影摄影机在摄影，他就在抢镜头了。同时他还在和其他同志谈话，我是站在月台上送行的群众当中的。所以没有和他谈其他的话。

四、撕毁信的原因是看到这封信信纸已经很破烂，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大水印。因而当时认为这没有什么可留下的就给撕掉了。这封信很短。是刚解放不久从常熟寄上海的。署名模糊地记得大概是“柏森”。信的内容是他听说杜高在上海工作，来信探问是否属实，同时向杜高探问他们过去的两个熟人的情况。这两人的名字记不起了。另外就是说他自己的工作，记不清他是在戏剧队还是在报社工作。

五、解放前在长沙时只听说过杜高有个朋友叫汤永安，这人我没见过，现不知在何处。在北京时我所知道他的社会关系如下：

陈西：是杜高的堂姐，我的外甥女，现在农业部工作。住址：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农业部宿舍。

蔡亮：杜高朋友，现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当助教。

汪明：杜高朋友，现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田庄：杜高朋友，现在北京文化部电影局。

陶冶：杜高朋友，现在北京文化部交际处。

以上除陈西外我只认识汪明。在北京时我只和汪明相见过三次，没有和他谈什么。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杜高其他的社会关系我都不了解。

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

杜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和“小家族”反动集团的首

要分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参加伪青年军政工队，历任伪《贵阳日报》校对，《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衡阳日报》采访主任，长沙《新城日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等职，并进行过反动宣传活动。解放后，伪装进步，编造历史混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杜高思想反动，品质恶劣，积极组织小集团，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党组织和党的负责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腐蚀青年，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对以上问题虽然作了一些交代，但态度是不够老实的，拟予劳动教养。

徐光霄

1956.3.24

(一)解放前自四五年至四九年曾先后服务于反动报八处，曾发表过如《沉默的祈祷》《剪烛残余》(前者系为蒋匪祝寿后者系讽刺我当时的和平政策)等反动文章，所编之《新生报》曾用《中共杀害和平胎儿》标题污蔑解放战争。

(二)曾多次参与反动分子、匪特分子组织的戏剧活动。

(三)解放前即开始崇拜胡风、路翎、吕荧等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并推行其反动文艺思想，推荐其作品。解放后直接参与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

(四)解放后一贯伪装"进步"阴谋搞小集团施行两面手法，进行危害革命的活动，并企图打进党内来进行破坏。

(五)在北京组织领导反革命小集团"小家族"进行腐蚀青年，毒害青年，传布流言蜚语，造谣污蔑，参与胡风集团反革命罪恶活动。在文艺界制造类似胡风集团的另一"黑帮"，进行阴谋破坏。

据以上罪行判断，杜高系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反革命小集团首要分子，历史上的反革命。

(一)简历

杜高，原名李传惠，笔名土氐，李黎，澌非，DK，晓里。男，现年二十六岁，湖南长沙人。青年团员。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工作。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贵阳《贵阳日报》做校对。此时即结

识反革命分子程晓华、宋冲及汉奸胡危舟；并在胡危舟主持的《力报》副刊写稿。

一九四五年十月，脱离《贵阳日报》参加贵阳民教剧团演出《春寒》。

一九四六年二月参加"中国胜利剧团"至柳州，同年五月随该团到衡阳，离团回长沙。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长沙"大麓中学"读书。同时和《湖南日报》记者汤炜主办《戏剧艺术》副刊。并参加国民党省党部主持的行健剧社演出《这不过是春天》。

一九四七年初，经傅白芦（《新湖南报》社中共党员）介绍去香港新闻学校读书。同时由汤炜介绍兼做《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

一九四七年返回长沙，进《湖南日报》做记者。同年十月邹今铎邀去衡阳《力报》做采访主任。同时参加"新闻界"组织的《裙带风》演出。其间结识了女特务分子萧潇，及流氓坏分子萧功浩。

一九四八年三月回到长沙，先后在《小春秋》做记者。在《新城日报》做编辑。

一九四八年九月，程晓华邀去南京《中国时报》做记者。同年十月与南京伪军乐学校学生李金声等经上海至苏州参加伪青年军二〇二师六〇四团政工队。十二月初政工队至常熟演出后返常熟，与三青团反革命分子纪芒等合作演出《原野》同时经纪芒介绍先后进《新常熟》《新生报》做编辑。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京沪解放，随纪芒等人，借《人民社》社员名义，由孟远介绍混入上海青年团少年儿童部，后调《新少年报》任文艺编辑。（《人民社》自称为党的地下组织，实际系一特务流氓分子所组成之投机集团。详见旁证〇一八号）同年经孙毅介绍参加青年团。不久借下厂体验生活机会，经铁路工会调"铁路文工团"，同年参加抗美援朝，编入东北后勤文工团。

一九五二年文工团编制撤销，调青年剧院创作组，次年随创作组并入剧协创作室。

（二）反革命活动

一、解放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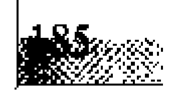
甲、杜高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曾供职于以下反革命报纸:《贵州日报》(地方性"官办"反动报纸)《湖南日报》(CC分子陈大榕主办)衡阳《力报》(复兴社分子雷锡龄主办)长沙《小春秋》报(中统特务分子李礼主办)《新城日报》(军统特务分子章苏主办)南京《中国时报》(伪国防部政工局机关报)《新常熟报》《新生报》(中统特务分子石民庸主办)。(以上各报皆有"聘书"及旁证材料)(参阅旁证〇〇一—十六号)

杜高供职以上各反动报期间曾有以下反动言行:

1. 一九四五年在《贵州日报》日常谈话中曾为三青团的反动性质做辩护。(见旁证〇〇三号)

2.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长沙伪《中央日报》发表为蒋匪"祝寿"的文章,称蒋匪为"我们的伟大的领袖""这是如椽的大笔写出了光辉的历史"(见物证〇〇二号)(当时正值蒋匪疯狂发动内战时)。

3. 一九四七年在《湖南日报》发表"贺衷寒谈社会问题"把贺匪衷寒所谓"用经济的方法去消灭阶级斗争……列宁关于工人的政策,史大林以及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创造实施及斗争……中国之所以落后……更重要的基本的经济问题的存在……"荒谬的胡说称为"站在新的进步的观念上给现实问题作一种正确解说与认识"。(见物证〇〇三号)



4.《湖南日报》同年七月七日发表的《胜利纪念日在长沙》把一个叫嚣"发扬抗战精神、完成戡乱工作"的反革命动员大会,做了以下描写:"坐在黄包车里的一位外国洋人,被这热烈、庞大的场面给鼓舞了,他用指架起'V'字来表示今天是胜利日,他向车窗口的孩子笑着,孩子们对做鬼脸。……孩子们热情的充满希望的歌声响遍了整个长沙市,市民们在歌声里醒来了……沿江大道的工人们,赤铜色的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他们工作的更有力。"(见物证〇〇四号)

5. 一九四七年在《湖南日报》经常发表的"经济评述"把蒋匪反动腐朽的政治上的崩溃,经济上的危机都归咎到战争的"失利"上去。当魏德迈来华后,杜高写道:"魏德迈抵华后,在军事上的反映战争稍有好转,在财政上据消息灵通方面表示,战争经费已有少

法。因此人心不再紧张，亦刺激物价下跌。"最后更圆滑地补充道："在更猛烈的内战加速地展开时，经济风暴再袭来是有绝大可能性……当我们更深一层地了解中国主观现实情况后，我们对魏德迈的希望也不能过高。"（见物证〇〇五号）在另一篇"经济评述"中把蒋匪帮的临近覆灭描述为"整个国运遭到一种不宁静及大风暴的袭击"。（见物证〇〇六号）

6. 一九四九年全国临近解放前夕，杜高在常熟匪特小报做编辑，以《剪烛残余》为题，连续发表讽刺短文，向革命阵营放冷箭，污蔑党的和平政策。

四月二十二日《新生报》（当时系杜高和纪芒负责编报）用特号标题诬称"中共杀害了和平胎儿，内战炮火复炽，生灵又要涂炭"，同日"社论"是用同样调子污蔑"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的要求超越了政府约法，和正统法治的观念和容忍的限度……"杜高在《剪烛残余》中这样呼应："和谈终于破裂，这和平之神竟斗不过战魔，然而战者的挣扎也就是最后一次了。"（物证〇〇七号）

四月四日《剪烛残余》对傅作义起义的嘲讽："据说苏北已发现傅作义的部队……先前大军只顾后退，如今拼命向前冲，我们不了解傅将军的意思。"

四月五日《剪烛残余》："江北共军突然后撤，有人说这是由于有利和谈进行，华中大战序幕揭开又将如何解释？"（见物证〇〇九号）

四月十三日杜高所编副刊曾登载以《毛泽东的嘴脸》《邓子恢何许人》为题的极恶劣的反动文章。（见物证〇一〇号）

乙、杜高在为反动报纸服务的同时曾参与以下反革命分子所组织的戏剧演出活动：

1. 一九四五年在贵阳曾参加反革命分子程晓华、宋冲组织的"小春秋剧社"演出臭名昭著的陈铨的剧本《野玫瑰》（见旁证〇〇四号）和反革命分子麦放明主持的贵阳民教剧团的演出活动。（见旁证〇〇五—〇〇六号）

2. 一九四七年在长沙曾参加伪民教馆剧团和国民党省党部主持的行健剧社的戏剧演出。（见旁证〇〇七号）

3. 一九四七年在衡阳参加特务分子宋冲等组织的《裙带风》

演出。(见旁证〇〇四号)

4. 一九四八年在常熟参加伪青年军二微二师六徵四团政工队演出。(见物证十一号及十一号)

(甲)杜高解放后对过去的反革命罪行非但毫无改悔,反而有意对组织隐瞒了全部反革命历史,并伪装进步,编造假历史,施行两面派的手法,企图钻进党内来继续其破坏活动。

1. 伪造"革命历史":一九五一年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曾向组织交过一份题名为"关于我自己"的假"自传"把自己吹嘘成一个从娘胎里便已经久受过"革命考验"似乎命中便已注定他非革命不可的人,十五岁当报社的编辑(实际上是当校对),并且"……在这灰色的战场里作了勇敢正义的呼喊"(见物证〇十二号)(实际上已经成为汉奸胡危舟的副刊撰稿人)。之后到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写的自传更加倍吹嘘说:"从我生命开始那天起,我就是属于党的,属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受着党和共产主义思想哺养的。除了矢志做一个马列主义者……在我生命里从来没有过第二个理想……我简直没有勇气承认我不是一个党员。"总之,他把全部反革命历史都翻改成"进步"的甚而是"革命"的历史。(见物证〇十三号)



2,伪装进步:从一九四九年常熟解放时混进了"人民社"这个投机组织开始,便进行了一连串伪装"进步"外衣的活动。首先是大肆剽窃,抄袭赶造进步文章。半年前尚在常熟《新生报》写反动文章骂共产党,解放后到了上海,立即在《文汇报》连续发表塞满了马列主义词句的文章。经过抗美援朝,不上两三年,便出版了五本"著作":《在思想战线上》《我会拿起枪来的》《战斗在朝鲜》《战斗与战斗者》《向三八线前进》。这些书的内容,有的是剽窃拼凑成的,像《在思想战线上》中的一些文章有的是改头换面的抄袭,例如《向三八线挺进》这剧本就是偷窃电影《桥》的情节,和苏联波列伏依的小说《为祖国而战》的情节和对话,七拼八凑出来的,《战斗在朝鲜》《战斗与战斗者》除去自我吹嘘之外,便是些向壁虚构的假报导。这几本书,之后便成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资本。(这些书都是通过他父亲李仲融关系在私营文光书店出版)(见物证〇二二号)

3,企图钻进党内来的阴谋活动:杜高从一混进革命队伍,便一

直企图钻进党来。一九四九年在上海《新少年报》曾经向报党的负责人胡德华同志谈，要求入党，当时曾表示“入党更神气一些，牌子硬一些”，不愿意入团，后来以为入团之后，入党较为方便一些才入团。（见旁证〇二十号）在东北后勤文工团“自传”的末尾又表示“我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它将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获得”。一九五二年在青艺曾向党组织“递上”了“申请书”，说“我请求党知道多少年来有一个青年人一直地在追随着，未曾离开过一步”。一九五三年在四川铁路体验生活时，曾企图乘铁路组织不深了解他的情况之机钻进来，当时曾给小集团分子汪明写信表示“如果可能我当努力争取解决党籍的问题，我们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先入了党，其余的人就会便利些……”其阴谋动机便暴露得很清楚了。（见物证〇一四号）

由于五二年常熟公安局转来检举杜高在常熟参加反动报纸活动，及参加中统特务的材料（后经调查，除中统问题尚无确证外、检举皆属事实）。（见旁证十五——十六号）因而组织上一直没发展他入党。

（乙）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腐蚀青年，造谣破坏、策应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

杜高混入革命队伍之后，一贯搞小圈子，并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危害革命利益的活动。

1. 一九四九年在上海《新少年报》工作时，便和孙毅（杜高入团的介绍人，孙的父亲系中统特务，本人历史不清）、郁青、郑马（以上二人皆系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新专是中统的外围组织，政治上很反动）等人结成小圈子，经常背后议论领导，挑拨同志间的关系。（见旁证材料〇二〇号）

2. 一九五〇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后勤文工团和青艺的萧崎、汪明、王肇烟等人结成小集团，反领导，破坏部队纪律，挑拨同志关系，杜高的行为尤其恶劣，部队因战争环境不允许搞恋爱，而杜则扬言“一定要搞一对战地鸳鸯”，很短时间里面便玩弄了两三个女孩子。（见旁证又二〇号）（第七页）当部队号召参军时，便背后对人讲：“千万别参军，谁愿意打一辈子仗，当一辈子兵，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又说“部队这些人没有事业心，什么也没有自己的意

见，只知道服从组织分配，是块木头。"(见旁证〇二一号)

3. 一九五二年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便和青艺的汪明，电影局的田庄，文化部联络局的陶冶，美术学院的蔡亮，歌剧院的罗坚等人组织一自称为"小家族"的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连串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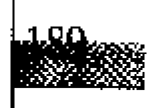
a. 这个反动黑帮形成不久，即已相当迅速地几乎扩展到文艺工作机构的所有部门里来，包括：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央电影局，实验歌剧院，中央美术学院，作家协会，上海歌舞团，上海电影厂、苏联莫索尔斯基音乐院(留学生)，他们企图在将来的时间里把持住中国文艺界的领导权，杜高曾在"小家族"里说过："十年到十五年之后，文联主席台上已经不是现在这些人，而是我们了。"(见旁证〇二二号)

b. 为了达到前一目的，便在"小家族"里大肆吹捧，互封"天才"，企图用"多出版""多演出""多写多画"来窃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制造出"天才集团"的印象，以此更多地网罗青年、杜高对此颇费心机，在给小家族首要分子汪明的信里，关于正在排演中的汪明的剧本《第一次功勋》这样说："让我们把全家族的喜悦和期待都寄托给这个演出吧。""我们每个人的成功和每一份成就对于我们家族的前途都有着怎样一种特殊的意义，都有着怎样的重要啊。"(见物证〇一四号)

c. "小家族"的直接破坏革命的活动，就是通过小家族分子来传布流言蜚语，散布谣言。谣言内容包括这样几方面：一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诽谤……二是对国际关系的污蔑。……

d. 配合和策应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

(1)到处宣传胡风思想，杜高几乎无时不在推崇路翎，当他到成都下厂时还写信给汪明，嘱托汪明说："我觉得你应该多安慰他，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用一个最真诚的感情去爱他尊重他，并且为他分担一些困难，这是必要的，你把我对他的怀念和关心转达他吧。我始终觉得路翎的作品感情是真挚的，是以一颗最仁慈的心去同情别人的痛苦，并且歌颂了人的精神上的美点，鼓舞着人去追求光明的……批评他的文章，我都仔细地读了……总之我是不平静的。"(见物证〇一六号)当和他一齐下工地的女同志对路翎作品



提出与其相反的意见时杜高便写信给家族分子说“我和吴一铿为这篇小说（指《洼地上的战役》）争论得很厉害，这女人有时是很讨厌的，好在我能忍耐。”（见物证○一七号）另外小家族首要分子如杜高、汪明、田庄等三人，除在言论上赞助宣传胡风思想之外，并在一些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

（2）在二次文代大会期间，杜高、汪明，曾和路翎在一块讨论代表名单，认为反革命分子阿垅、吕荧、绿原这些人没列人代表是不公平的，认为像孙犁、刘亭艺这些青年作家做代表是不够格的。

又如当舒芜《致路翎公开信》发表前，杜高便在路翎那儿看到打印稿，听路翎说舒芜历史上曾叛过党，便支持路翎上书中宣部，对舒芜打击报复。

当文艺整风期间，杜高正在青岛下厂，便向山东大学的一些青年，如李希凡等同志散布谣言，为胡风、路翎做宣传，说“文艺界整风根本是胡闹……批评胡风搞不起来，没人批评，胡风自己也满不在乎，整天在茶馆喝茶，谈笑自若……路翎也是如此，根本不怎么检讨。”（见旁证○二四号）

又当《文艺报》检查工作、文联召开扩大会时，杜高和汪明听说路翎在大会上发了言，便兴奋地向路翎说：“你为青年人出了一口气。”看了路翎的发言记录稿之后便说：“你为我们发了言。”并积极向文联提出要求，要参加大会，“控诉《文艺报》打击新生力量”来策应胡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未公开发表之前，杜高、汪明、田庄等人都已先后在路翎等处看到了油印稿，刚一发表，杜高便到处向人讲：“胡风文章写得太好了，批评得太尖锐了。”“在文学遗产问题上我就是个胡风派。”（见旁证○二二号）

当胡风发觉“冒进”布置“退却”时，杜高、汪明便积极帮助路翎“撤退”，在会上为路翎的假“检讨”喝彩，在会下为路翎的发言探听意见。当第一批“密信”揭发之后，杜高急忙在《剧本》月刊上发表批评路翎剧本的文章，假装“争取”路翎，来为路翎开脱和胡风的关系。

e. 有意制造淫靡风气，诱惑青年，腐蚀青年，办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经常找一些结过婚的人，向一些未婚的家族分子乱扯一些性的故事，他们叫做“传授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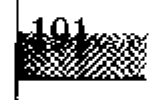
一是介绍一些淫书淫画给一些未结婚的家族分子看，例如杜高便曾把田庄、蔡亮、张自嶷一些人带到潘开茨家去看《金瓶梅》插图。

一是结伙进攻异性，他们的黑话叫“显示家族的威力”。例如杜高打算追逐歌舞团的舒巧，便邀集了所有在北京的家族分子到他宿舍去，预先布置好了，要陶冶当着舒巧的面，有意从书架上抽出杜高的“著作”来朗读一段，其他人齐声赞赏杜高的才华（见旁证二三号）。

又例如罗坚追逐另一个女孩子，这伙人便成群地跑到电影学校去包围这个女孩子（见旁证一二四号）。

杜高在这方面有一套“理论”告诉小家族分子“搞恋爱不要写情书，搞不成反而把柄落到对方手里。当你单独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大胆地去抱吻她，假如她反对便证明她并不爱你，散了也没有什么可惜。”（见旁证二五号）

小家族分子当中有好几对已经发生了男女关系，至今尚未结婚，如陶冶和胡秀玉，田庄和陈敏凡，蔡亮和张自嶷。（见旁证〇二五号）



f. 小家族内部有领导分工，有“家训”“戒规”，有一套秘密活动的制度。

杜高在“小家族”内，他们自称他为“政委”，主要从思想上领导家族分子。把汪明比做“大哥”，主要做家族内部的“团结”“工作”。

有经常集会，在北京的家族分子，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在公园聚会。每逢节日多半举行“聚餐”，此项聚餐多在吴祖光家或潘开茨家举行。（见物证〇二三号）

接受“新成员”入“家族”时，一般都进行聚餐，也多在吴祖光或潘开茨家。

属于“家规”之类的必须共同遵守的如“家族”成员之间须互相关心“创作”“恋爱”等“大事”。不准拉“乏味的人”（家族的黑话指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又不能资其利用者）进家族后做为恋爱对象、“对家族没有自尊心”（意思是在家族内部可以胡言乱道，无话不

说),但家族内部的谈话又不准随意向外人乱说。

家族分子彼此互称兄、弟、姐、妹,不用现在的名字,多叫原来的名字或绰号,如杜高是"传惠兄",杜鸣心是"歪头鹰"(杜鸣心现在苏联莫索斯基音乐学院留学),称陈敏凡"小妹",王蓓为"四姑娘"。

通讯或谈话有一些"隐语"如追求异性叫"抓小鸡""冒黄油",善于谈情话叫做"会说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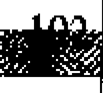
家族分子有不"忠"于家族的行为时,轻者改称"同志"并且讽刺"你进步了"以此警戒,重的则要开除出家族。

g. 整个"家族"打进党内来的阴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是拉党员"下水"。已被拉下水的如歌剧院的岁坚,上海歌舞团的舒巧……杜高在给汪明的信里说:"我们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先入了党,其余的人,就会便利些……"(见物证○一六号)

(丙)解放前后一贯积极地宣传胡风思想。

杜高远在一九四七年在衡阳《力报》发表的《论〈原野〉的主题和人物》(见物证○一七号)便已显然成为胡风理论的宣传和拥护者了。不但在文章的开始引用了胡风分子吕荧的谬论"作者(注:指曹禺)优美的文笔……却近乎金属性的复制品……人工的涂彩晦暗了自然生命的真纯……"而在结尾杜高又用着胡风的腔调结论道:"总之,在整个《原野》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原始的爱和憎,复仇与反抗……"(见物证又一七号)

一九四八年在常熟曾向人推荐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和路翎的《云雀》。在常熟初解放时,杜高在他自己编辑的《新生报》副刊"群众"(这是匪特小报在解放后,继续改版发行所出版的副页。该报出版不几期便被我军管会查封停刊)上刊载了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见物证○一八号)



一九五二年到北京之后,除在日常谈话中到处吹捧胡风、路翎等人之外,杜高一九五三年曾在《长江文艺》发表《单纯和美及其他》,主要内容,宣传胡风所谓的作家要写日常点滴生活,不要只是"政治性"的大题材(见物证○十九号);同年所写的剧本《祝福人们》不单在大肆宣传胡风叫喊的"仁爱""友谊",而且恶意地对党、对工业的领导方面进行了诋毁和污蔑。(见物证○二○号)

胡风思想在杜高身上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杜高在给汪明的信上讲到"小家族"时，便用胡风的口吻写道："我们的集体是用爱、理想和人性的忠实结合起来，它必将巩固和爆发出热烈的火。"（见物证〇二一号）直至这次运动中在斗争会上还说"我对蔡亮这些人，情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只要帮助他们有所成就，就像胡风对待路翎那样。"

（丁）一贯施行两面派手段欺骗说谎。

为了掩盖其反动面目，经常在同志或领导面前故作"进步"，但背过面来立即又是一套。

例如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时，便经常对文工团领导同志当面"握手言欢"，背后恣意谩骂。

当五三年从四川工地回京见到创作室的同志就说："收获很大，政治上有很多感受。"转过来和小家族分子田庄说："以后我就来这种，要求进步呀，来这种热情的。"

又如他在下厂心得的文章里特别引用了光未然同志的话，表示听了光未然同志的话才去做的。背后对田庄说"捧他一下，来点世故的。"（见旁证〇二六号）（最末一页）

又例如五三年从四川工地回京时，途经上海，曾至《新少年报》，公开给报社作报告，讲了一些志愿军战斗事迹，但在背后却通过郁青、郑马散布"志愿军首长用手枪逼迫司机，冲过敌机封锁"等诬蔑性谣言。（见物证〇二七号）

（三）运动中的表现

在运动一开始，杜高在思想检查会上，尚为路翎的假检讨打掩护，当第一批"密信"揭发后，杜高立即写文章用批判路翎的《英雄母亲》的题目，来为路翎开脱反革命罪行，称路翎为小资产阶级作家，路翎只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感情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而已。（见五五年六月号《剧本》月刊）

在思想检查一开始时，便和小集团分子汪明、萧崎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在会上一直顽抗，并且会下和别人说："运动这样搞下去会逼人说假话的。"

在思想检查过程中，表现得十分不老实，对在东北、北京组织小集团问题一直不谈，而且狡辩反动"小集团"是从革命工作出发



的友谊结合。

当群众当场揭发了他在东北的很多卑劣行为之后，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大家讲的都是事实。”

直至另一个“小家族”首要分子汪明交代出他们之间“攻守同盟”和一些小家族的材料，在会上及个别谈话中一点点给他指出来之后，才逐渐交代了有关小家族的部分罪行，直到现在还是不彻底的，例如关于他如何布置利用家族分子进行罪恶活动，至今还是拒绝交代。

关于他和路翎的关系，及崇拜胡风的反动思想，从没有彻底的痛切改悔的表示，反而把一切都推脱是上了路翎的当。有些具体事实，当众扯谎，例如关于路翎的小说，他一直都在热烈称赞，但在会上却说他“最初就感到《洼地的战役》有问题，不喜欢这东西。”

关于历史上的罪行，经过大会多次动员，交代政策，小组会帮助，个别谈话帮助，一直拒不交代，一直到大会上揭发了他在常熟的一段历史罪行之后，才开始交代了过去一直隐瞒的反动报纸名称，及一些时间过程。但具体的反动行为，罪恶事实，除去讲了一些赌博、逛妓院生活堕落的琐事，只承认十六岁那年曾写过一篇《用沉默来纪念》为题的为蒋匪祝寿的文章，但结果推脱责任，说是编辑蒋牧良把他原来文章的讽刺意思给修改掉了。因而成为相反的结果。（见物证 002 号）

另外有些问题，例如他解放后曾把反动报纸的聘书证件藏于他舅父陈国健（现在内蒙粮食公司工作）处，但至今他关于和陈国健的社会关系，证件的下落，都坚决拒绝交代，扯谎说证件在上海总工会时遗失了。（见旁证二八号）

又例如在贵阳民教馆集体参加国民党问题，据旁证材料证明，在四六年，正在演出《春寒》时，民教剧团全体参加国民党的，杜高正是此时参加的民教剧团，但他一直拒绝交代这一问题。（见旁证零零六号）又如与《湖南日报》汤炜（即汤永安）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解放后尚有通讯关系，但关于他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交代得很少，在上海《新少年报》工作的情况，和郁青、郑马、李牧子的来往关系都未交代。

第二编　反右运动时期(1957年—1958年)

第一部分　有关“小集团”的材料

这里包括以杜高、汪明为主要成员的、两次小集团活动的情况概述,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过程中,杜、汗等人在东北后勤部文工团时所结成的小集团。另一次是在五二年回到北京后,杜、汪和田庄等人所集结的所谓“小家族”。前一种材料,主要系根据肃反中青年剧院一部分参加抗美援朝回国的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汇编而成的。后者主要系根据肃反中“小家族”成员所交代出来的,并经过核对之后的书面材料编写的。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他们经常做政治资本的“抗美援朝”对人炫耀的所谓“天才集团”的真实状况,和他们所经常叫喊的所谓“真诚”“狂热”“爱”的一般内容了。

一、杜高、汪明、王肇烟(王少燕)、萧崎四人在“抗美援朝”中的小集团活动

一九五〇年杜、汪等四人参加“抗美援朝”,调到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后,立即结成了小集团,他们表面上装得很积极,在领导同志面前低声下气,奉迎拍马,相互吹捧。对一些年轻同志,则以“老大哥”自居,对他(她)们表示关怀。背地里打击领导,挑拨离间,贪生怕死,破坏纪律,腐蚀青年,散布流言蜚语……其具体活动,分述如下:

(一)反党反领导——他们刚到文工团就挑拨李兆澄副团长与姜微教导员的关系,后丁帆同志调到文工团任教导员,他们又挑拨丁、姜关系。小集团请姜微吃饭,当面奉承,骂丁帆、说丁帆掌握大权整姜微。

五〇年冬几个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志所组织的宣传队和原部队的宣传队合并，他们破坏部队同志与地方同志的团结，对部队同志说，地方同志看不起他们，说他们不懂业务，对地方同志说部队同志净鸡毛蒜皮挑地方同志的刺。

杜高把这样一个由几十个志愿献身于抗美援朝运动的青年所组成的文艺队伍，看做是"黑暗的角落"，"阴暗的没有阳光的地方"。对闹情绪的同志说："不要只看现实，只要有自己的美丽的幻想就够了。现实是肮脏的。"说文工团是"误人子弟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生活，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思想，不受他们的组织支配。""什么也不要对组织讲，组织这些人是不可信的。"对一些年轻的同志说："不要让这些庸俗的事把你拖住了，你需要读书，你是有天才的。"当领导同志号召团里的同志参军时，杜高说："千万别参军，谁愿意打一辈子仗，当一辈子兵，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又说："部队里的人没有事业心，只知道服从组织分配，是块木头。"

他们经常说领导同志的坏话："××不学无术。""××靠组织吃饭。""××没出息，白革了这么多年命。"谩骂申请入党及靠近组织的同志为"钻营""往上爬""小妇人"。

杜高是团员，团组织找他开会，他说："我一个礼拜只能给你们一个小时。"他说文工团的生活是"囚犯生活"，说："和团员在一起开会，无聊痛苦极了。"

(二)互相吹捧——杜高自己吹嘘说："在安东书店里，很多人都拥挤着买他的书。""我的书在柏林青年联欢会上，是受欢迎的书。"小集团的人又替他吹嘘说："杜高出身革命家庭，是天才，十岁就写文章。"当团里排演杜高、汪明合写的《到汉城去》的剧本时，小集团又散布：它是中国第一个反映志愿军的，将来要到北京演出，又出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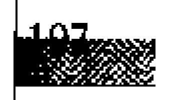
他们到朝鲜之后，又以"祖国派来的作家"自居，和部队首长经常在一起，对首长说，他们到朝鲜是专写师一级干部的，小集团称杜高是"中国的西蒙诺夫"。在一次中朝纪念会上，杜高居然狂妄地说："我是祖国派来的作家，我代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向你们报告中国文艺界的情况……"杜高还自称是"中国的普式庚"，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上说："再过十年我的著作不但会摆满整个书架，你在书

店里到处也能看到我的著作，我的思想也会传给后人。”同时骂别人“这些人都是半瓶子醋，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是靠组织吃饭的，而我不同，我是作家。……我的工作是需要劳动和天才的。”“我这样的人做一个团员太不相称，我应当入党。”“我得到过人的赞赏，他们说我是天才。在前方我被作为一个有作为有贡献的青年作家而接待。”

（三）破坏纪律——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任务，文工团内是不许搞恋爱的，而杜高、汪明对这条纪律十分仇恨，在小集团里说：“不许搞恋爱，老子在地下搞。”

杜高对年轻的女孩子，完全采取一种极端恶劣的玩弄态度，在“抗美援朝”临行之前曾对人说：“我要搞一个地下鸳鸯。”

他一面“爱”着一个女孩子的同时，又追求另一个，又在背后污蔑诽谤她们。如他在朝鲜时，拼命的一封信接一封信给他的“爱人”写信，说：“我每天除了读书、学俄语等之外是想念你”，“我要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一样的书，镶上金边和金字，掀开第一页就写着献给我的爱人××”，而在给另一个女同志的信上却又骂他的“爱人”是“庸俗的，没有发展前途的女人”。又在这同时，他又假装酒醉，向另一个已有了爱人的女同志说：“我很早就爱上你了。”并去强吻对方。



汪明把文工团的一些女孩子排列起来，一个一个地去追，第一个××，第二个××……并轻蔑地对杜高说：“喂！咱们换换吧！”

他们常向一些女孩子说，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有多少女孩子都在追他们。

（四）谩骂群众——他们说群众，都是“头脑简单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儿科，半瓶子醋”。汪明的日记上说群众是“乌鸦、麻雀、蛆虫、蜘蛛”，骂同志们“不是用人的眼睛看人和事（按：指小集团的活动），而是用耗子的眼睛在窥探。”对同志的批评说：“乌鸦、麻雀的噪叫，给我们带来一种从心底的厌恶，我以为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虐害，我抗拒，我以沉默的怒眼来抗拒。”

小集团中支持每一个人对群众的谩骂，骂得越凶，他们越得意，越欣赏，越称心。

（五）可耻的怕死保命思想——杜高第一次去朝鲜是随同一检

查小组去检查工作，到了龙登，杜高向领导表示不愿再往前去，说："国家将来还要我们这批青年人，到前面飞机厉害，无所谓牺牲了，真太冤枉了……"到某医院检查工作时，别人都紧张地热情地把伤员从汽车上背下来安顿到病房里，他却站在一旁用手帕堵住鼻子皱着眉头，嫌脏也嫌臭。

一九五一年二月，杜高二次去朝鲜体验生活，当公布完了名单时，他却假装有病，要检查身体之后再去。领导上看他的表现，知道不能勉强，考虑结果留下了。他自己虚伪地说："很可惜这次机会错过了。"九月领导上又决定杜高、江明、萧崎去朝鲜，他们到了安东就不敢过江了，杜高曾写信回来描写他这一段生活："整天遛江沿，看晚霞，泡茶馆，吃咖啡，不受黑红点限制（当时文工团的奖惩办法），可以大自由主义一番……"就这样在安东玩了一个月（当时对岸就是炮火惨烈的战场）。

一九五一年冬，团里又派杜、汪、萧、王四人去朝鲜，他们到朝鲜后，怕敌机轰炸，成天躲在大山洞里，把志愿军英雄调回来，向他们谈材料。当时天冷敌人成天打炮，烧柴困难，每一个人都要亲自上山打柴。他们怕吃苦，叫通讯员为他们冒着炮火打柴。

一次王肇湮在外边遇上敌机，吓得他把头钻到洞子里，屁股露在外边，以后同志们讽刺他说"以后飞机来了不用带炸弹，只要带板子打屁股就行了。"战士给他们起外号叫"祖国的少爷""坐洞子的坐（作）家""第一、二、三、四大包袱"，曾向部队领导同志提出，要把他们的表现寄到报上发表。

（六）写作态度——杜高、汪明认为"材料加技术就是作品"，杜高的很多通讯都是虚构的，如在《渡清川江》（发表在《文艺报》三卷八期）这篇通讯里，他说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在清川江里搭起一座人桥来，走在人桥上的战士思想着"踩的轻些吧！别踩痛了同志们的肩膀……"清川江是一条宽而深的激流大江，"搭人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是诬蔑我们志愿军的领导视战士的生命如草芥，和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诬蔑我们用"人海战术"是一样的。

另一篇通讯《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其中还提到大同江江桥被炸断，汽车从江水里通过，人站在水里指挥汽车，同样是荒谬绝伦，大同江水深，

流急，江面很宽，没有桥是无法通过的。

杜高的抄袭作风也是很严重的，他的通讯《和坦克搏斗》是参照一九五一年某月《东北日报》上的一段报导而编写的。另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通讯员小谢"改头换面编成的。

杜高、汪明合写的剧本《到汉城去》的第四幕就是从电影《桥》里面抄袭的，还有好多对话是抄袭苏联小说"为祖国而战"里的。

《到汉城去》是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个剧本，领导上叫他们修改，他们不改，说领导上不懂文艺。"七一"演出时，戏没演完，战士纷纷退出剧场，当时的政治部部长楼适夷同志批评了剧本中的错，不许他们私自出版。杜高、汪明大骂楼适夷部长，说："他妈的，楼适夷我和他有什么仇！"并通过私人关系，改名《向三八线挺进》在私营书店出版。

(七)腐蚀青年——在青年中宣扬主观战斗精神，鼓励个人主义思想，说这个有才能，那个有天才，杜高对一个同志说："梦想是好的，要多多地去梦想，梦想一个伟大的前途，要知道一个伟大事业的创造和成功就是从一个伟大的梦想的基础上开始的。"汪明对一个受了批评的同志说："这些琐事，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我不希望你掉到这种气氛中去，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应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自己的学习上。"杜高说："我早就够入党条件了，但我就不在这儿(按：指部队)入，这儿的党不好。"还对一些年轻的同志说："部队生活很苦，你们经常到我这来营养营养吧！"(按：当时杜高有些稿费，房里常有吃的)



(八)散布谣言——一九五一年夏，文工团调青年剧院参加东北后勤部文工团工作的罗忠恕调到朝鲜去工作，他们小集团散布说，文工团领导要拆散青年剧院的同志，造成许多剧院同志对文工团组织的不满。

一九五一年冬，小集团被调去朝鲜。当时团里许多同志都想去前方，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志愿军总政已批准青年剧院参加后政文工团的同志去前方，而后政文工团的领导本位主义，不肯调这批人去。"引起大家对组织的不满，要联合写两封控告信，一封给志愿军政治部，一封给廖承志同志，由汪明执笔，后被领导上劝止了。在临行前萧崎又向一同志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个月以后就

可以去，储团长已经答应了。”使一些同志不安心文工团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冬，部队一再要同志们树立抗美援朝的长期思想，而王筝烟竟造谣说：“快要停战了，我们要回去了。”

二、“小家族”小集团概况

（一）“小家族”主要成员：

杜高——现年27岁，现在剧协戏剧出版社工作，“小家族”的首要分子。解放前一直在反动报纸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编写过反共文章，四九年曾在常熟“伪青年军政工队任导演”。

汪明——现年32岁，现在《剧本》月刊工作，“小家族”首要分子。解放前据他自己说一度流浪，后考入伪国立剧专，在剧专参加了三青团，四七年到香港在《华商报》《中国学生丛刊》《星期报》等处工作。

田庄——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亦为“小家族”首要分子，在“家族”内地位仅次于前二人。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

陶冶——现年26岁，现在文化部联络司工作，为“小家族”骨干分子。

罗坚——“小家族”骨干分子（肃反后已调贵州工作）。

蔡亮——“小家族”骨干分子（肃反后已调西安工作）。

杜鸣心——曾在苏联莫索斯基音乐院学习，“小家族”骨干分子。

另外尚有候补族员，家族之友等十余人，而吴祖光是“家族”的“族长，大哥”，新凤霞是“大嫂”，如据杜高交代说：“‘吴祖光’成了‘家族’的大哥哥，他那里是我们的自由天地，他‘承认’了我们的‘家族’。”

（二）“小家族”组织情况：

这个小集团他们自称是一个天才洋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的“家族”，他们自称有理论强的（杜高），有组织、团结能力强的（汪明），也有兼而有之的（田庄）。参加“家族”是要经过“审查”、“批准”和“考察一个时期”“候补期”，等等规定，是有资格的限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入。如果批准为小家族后，全家族要举

行宴会庆祝，这种宴会大多是在吴祖光家中进行，以便让他们的“祖光大哥”作最后一次审定。此外家族中还有种种家规和做法，兹分述于后：

一、对每个人的大事（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家族应该互相汇报，互相提供意见，必要时还要予以干涉和给任务。

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他们有句口头语：“家族内没有自尊心。”

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

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他们有很深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潇洒和他们是一样的。

五、不许逢人就谈“家族”（对一些爱说的人，特别叮嘱要守秘密）。

六、按年龄排为哥哥弟弟，不称现在的名字，而叫绰号、原名、代号或小名。（如称汪明为静轩，称杜高为传惠或惠惠，称陶冶为“陶油”或“陶色迷”）

七、违反规约者，轻则予以“训诫”，重则开除出“家族”。还有一种处罚，就是对犯有“过失”的分子停止“弟兄”之称和本名的称呼，称之为“同志”或讽刺为“同志你‘进步’了！”



八、他们相约每逢节日——“五一”、“十一”“新年”，即举行“家族”团聚宴会，或相邀去某处跳舞。平时星期六、星期日经常聚会。

（三）“小家族”的活动内容：（肃反运动以前的活动情况）

一、以“家族”做基地搜集、散布政治性的流言蜚语，传播的谣言有以下几方面：

甲：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诽谤污蔑，如说“×××中央首长他们在一块一定也在谈女人、吹牛，和我们一样”之类例子很多，皆系对中央首长的恶毒造谣，使人极端愤慨，不胜枚举。

乙：对文艺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制造宗派言论和情绪，当刘芝明同志因病休养时，他们即谣传：“刘芝明的部长垮了，他和高、饶事件有关。”又说“文艺界是宗派对宗派”。“××部长的老婆是胡风以前的爱人，因此他们之间有私仇”等等。

丙：挑拨国际关系，对国际友人恶意诋毁……

仅据“小家族”成员自己交代出来的就有四十余条，不能一一

写出，这些谣言的来源，主要是从吴祖光、王少燕和路翎处听来的，有些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二、为胡风路翎反革命分子“创牌子”、“壮声势”，无条件地为他们做义务宣传，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支持他们。

小家族的骨干分子们每到一处必定吹嘘胡风的理论，推崇路翎的作品，当路翎的《初雪》发表以后，杜高、汪明立即向人宣称“这是中国近年来最好的作品”，《洼地上的战役》发表时更加倍称赞，如杜高给汪明的信上这样写道：“路翎的这篇小说在感情上是比《初雪》更加深刻些，在处理这动人的人间关系时，作者的痛苦很大，《初雪》比它年轻，比它新鲜，是用快乐的调子写的。而这一篇，我觉得涉及的问题更大，更严重，搏斗的更残酷，这是用坚强的调子写的，因为作者的信心是那样大。”

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胡风集团常常通过路翎，去指使小家族的首要分子，以配合行动。例如第二次文代大会时，路翎曾召集杜高、汪明讨论名单。认为孙芋、白桦这些人不应当选为代表，而应当选阿垅、绿原、吕荧。又如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之前，路翎写了一封“揭发舒芜的历史”内容的信，准备“递上去”的，事先也找到杜高汪明等人进行讨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未发表前，杜高便从路翎那里看到了打印稿。《文艺报》检查工作时，路翎在文联扩大会议上发言后，把发言记录读给杜高、汪明等人听，杜高这些人马上表示“你为青年出了一口气”。并立即要求参加会为路翎“作证”。胡风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发表以后，杜高逢人便说胡风的“意见书”“文章写得好极了，批评得太尖锐了。”并在吴祖光家里，和汪明轮流给新凤霞高声朗读。当《文艺报》“内部通讯”登载要开展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消息时，杜高又将这本“内部通讯”拿给路翎看，讨好他和胡风。当时剧本创作室改选理事，小家族分子尚在为路翎竞选，企图篡夺创作室的领导地位。路翎始终被小家族奉为“师表”的，杜高等人给小家族分子写信总在谆谆“训诫”要向路翎学习，路翎是他们的“榜样”。杜高本人所写的论文《单纯和美及其他》即根据胡风文艺观点写作的。

杜高这个小家族的“首脑”，在肃反运动的思想检查会上竟直言不讳地讲“我对小家族的一些人，像胡风对于路翎那样，宁愿牺

牲个人的一切，培养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有所成就。”

三、小家族的“友谊”基础是吹捧自己，打击别人，以达到“强固阵地”，扩大社会影响。他们的野心是表现得很露骨的，他们公开宣称“十年后文联主席台上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那时就属于我们的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便有计划地互相吹捧，彼此可在作品上挂名，以企图混得社会地位“一步步爬上去”。如杜高给另一家族成员写的信上说：“我们每个人的成功和每一分成就对于我们家族的前途都有着一种怎样特殊的意义，都有着怎样的重要啊！”汪明刚写完《第一次功勋》，杜高由四川写信来给他说：“我虽然没看到它，但我相信它不错，因为它是用另一种方法写出来的……《功勋》要争取上演，我们全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演出上……要赶过那些正在得意的人们！”蔡亮要为世界青年联欢节画画，杜高等视为“家族”内的一件大事，亲自为他想题材，并说：“你再画几张以后，我们就可以写文章为你宣传了。”如杜高叫蔡亮为他画了一张像便逢人指着镜框啧啧赞赏：“青年的天才画家。”在电影局的小家族成员田庄没有什么作品，杜高便宣传他如何聪明，很多电影剧本都经过他加工润饰，如说《渡江侦察记》当中有很多成功之处都是田庄加的。杜高自己更是不可一世，自称是“中国的别林斯基、西蒙诺夫”。他的资本便是几本抄袭来的集子，并且自己出资精装，贴上小照，写上“题词”，逢人夸耀。凭着几本“集子”便进了作家协会。

除了吹捧自己以外，他们经常攻击别人（绝大部分是都是党员）如“××党员作家是靠组织吃饭”，“×××党员作家理论说得漂亮写不出作品来”，而他们自己又想钻入党内，如杜高夸大、篡改、隐瞒历史申请入党，并写信给“家族”成员说：“我当努力解决党籍问题，我们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入了党，其余的人就会便利些了。”

四、拉拢腐蚀青年，玩弄妇女。杜高等除了宣扬“小家族”每个人都是“才子”、“青年作家”来迷惑青年外，经常以谈论恋爱婚姻为名，大谈女人，并介绍性生活经验，使得一些男性青年神志不安，逐渐受其腐蚀。

男女关系不严肃是“小家族”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特别表现

在杜高身上，尤为严重。解放后他从参加工作到五五年，四五年中，和女性发生过所谓恋爱关系的已达十几人；有的是小集团中其他成员的爱人，他借口帮助他们，取得接近的机会，然后就对女的说"××年纪大了，你和他两人不合适"，就慢慢地说服那女的和他要好起来。有的是他在喝多了酒，好心的女同志怕他出乱子，送他回去的路上，乘机把人玩弄一番，有的还和他发生过两性关系。杜高在玩弄女性上自称有一套完整的"法术"。据小集团成员交代，他向他们得意地说："如果遇到一个不能舍弃的对象，就应该紧紧地盯牢她，在她的周围造成一种对你的深刻印象，但不要立即去接近她，在必要的场合下，如单独地见了面，就必须做出最热情最关心她的样子，就是给对方一个暗示，如果得到了相应的一切，又要冷淡一下才行，让对方着了急，然后再在单独碰面的情况下，就不能再冷淡了，需要'采取行动'，'拥抱她强烈的吻她'。"接下去，照杜高的习惯说法就是"要表示自己的强大存在，要明朗地去显示自己全部的优越性"。他又说："跟一个女孩子有了感情，要不吻她，就会蚀本的，没搞成以前不能写情书，不能让把柄落在别人手上。"

小集团的人都用杜高的"理论和经验"去追逐女人，追逐女性为发展女青年成为"小家族"分子的主要手段。他们有一套黑话称没有找到对象的叫"老鹰在飞翔"，"鹰眼瞭望"，追女性叫"老鹰抓小鸡"。又从吴祖光那儿学来搞男女关系叫"冒黄油"。他们为了抓取一个女性，有时采取成群结队去包围，黑话叫"显示家族威力"，有时集体参加舞会追逐包围女孩子，有时在公园和马路上盯梢，方法多种多样。

"小家族"聚会在一起时除吃、喝、赌分（输赢十几元）以外，最有兴趣的是谈女人，谈性交经验，把两性关系谈得低级下流，不堪入耳。小家族一个成员说："听了这些使得我们夜间睡在床上想入非非，危害了身体健康。"他们还在一起传看淫书淫画，裸体画报，色情诗集。这些东西，主要是从吴祖光家里借来的，吴祖光在这方面被他们叫做"参谋长"，在男女关系上为他们出主意，鼓励他们大胆，并传授一些"经验"。

第二部分　小集团在肃反后的活动

按：以下材料都是在反右斗争后，一些同志们的揭露及小集团成员杜高、汪明等人所交待及相互揭发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显示出来的，小集团在肃反后，尤其在鸣放前后活动得猖狂剧烈，而且和吴祖光、王少燕等右派分子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的活动中心，一个是借肃反翻案，来向党肆行攻击。另一个是乘鸣放之机到处对社会主义放冷箭。和吴祖光的疯狂进攻相互唱和，互长声势，用心十分险恶。可以看到这些人对党的仇视更变本加厉，更露骨地显现出来。

另外这些小集团分子所写的材料中，有很多是在互相推诿，自我辩解，难免有很多矛盾、混乱、重复的地方，因而仅供研究批判时作为参考之用。



一、"小家族"在吴祖光的怂恿下，积极进行翻案活动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交代材料）

小集团肃反后的聚会

1. 一九五六年冬杜高到我住处来找我（肃反后第一次），从这个时候起，我和杜高的接触频繁了，小集团的人，除了在外地的，在北京的都碰头了，而且这种碰头，又是以我为中心联系起来的。田庄、陈敏凡常来找我，跟杜高的接触自不必说，陶冶也常来找我。

2. 为什么要恢复小集团呢？小集团里的人都有一肚子的所谓"怨气"，而这些怨气又无处发泄，这些人同时又是喜欢寻求所谓"温情"的人，别人谈不来，认为别人是枯燥乏味的人物，只有小集团里的人好，只有小集团可以得到这种所谓"温情"，在别处是找不到的；既有了怨气，对人即有了仇恨，就要发泄就要寻求报复。要

报复就不得不有人商量，只得找这些人，找别人是不行的。于是，小集团便自然而然地恢复起来。

3. 王少燕每次谈的时候，总不是很有系统的，只要一提到肃反，他也总是这几句话，因此，对我印象很深。他说："好么！以后瞧么！"他鼓励我们申诉，并且还向我和杜高献策，告诉我们应当找什么人谈话，如李超、孙福田、李之华，说："千万别找整过你们的人，找不得找不得！"这些人原来的不满，加上吴祖光和王少燕的煽惑，便展开了一个经过研究的一系列的活动。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有杜高、陶冶、陈敏凡、田庄和我五个人在崇文门的国际友人俱乐部的楼上茶点部里，几个人吃东西便议论起来了。田庄说："我在电影局已经提出来了，领导还没有答复。"我说："我前些时候找王杰（按：王杰是《剧本》月刊编辑部负责人之一）谈过话，王杰答应把意见反映上去。"杜高说，我找了孙福田同志谈过了，正式说他没有政治问题。杜高还说他已写好了一份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的信。我和杜高告诉陶冶，要他先别在文化部提，等有了结果再提。田庄说："你们先别管，我反正已经提了，只要我这边一解决，你们都会解决的。"

4. 一九五六上半年，当小集团里的人先后做了结论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批人又开始接触了。他们虽不像肃反以前接触得那么频繁和嚣张，但他们的反动性却远比过去深沉而严重。由于这种重新的接触，于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憋在肚子里的一股怨气找到了发泄的对手。由于电影局田庄在肃反后的拉拢，这些人先后和吴祖光再次见面，重复旧好，一发而不可收拾，又由于王少燕的串联，一个真正的以吴祖光为核心的小集团便形成了。

整风前有一次，我对杜高和陶冶说："小集团硬是打不烂炸不散。"杜说："运动中相互仇恨，到最后，现在又言归于好，这是考验了的友谊！就让我们好下去吧！"陶警告我说："不能乱说，说了又要倒霉。"

5. 杜高答应在新侨饭店请蔡亮吃饭，这样，我便成了这次约会的召集人。吃饭的是四个人，我、杜、陶、蔡，胡秀玉（因有病没来）。因大家和蔡亮是第一次见面，于是又各自重复了肃反中的情形。杜要蔡提出申诉来，谈得很直接，蔡说他"又发号令了"。后来

我又给他谈，谈得曲折，但根本之点，仍要蔡申诉，不要承认什么小家族，小集团。

6. 除平日接近，有时他们也在我处过夜，杜、陶在我处睡过几次，我也在陶那儿睡过几次，陶睡在我这儿的一次，是为了合写我的申诉书，我说我不会写这类公文呈式，他说帮我合写，于是商量着写到三点钟，即是交给李之华同志的那三份。〔按：以上用红笔批注：一、活动更加隐蔽而猖狂。主动发信取得联系。二、安排策略步骤，制造混乱，发信否认原揭发材料，与汪共策。〕

7. 我在小集团的作用，还反映在陶和胡的结婚上，我为他们积极筹备，我和田庄还去约吴祖光和新凤霞以壮声势，故意在签名绢上把名字写在一起，而且写的是两个名字，这次婚礼是表示了小集团的顽强的存在，我曾说过"小集团是拆不烂、打不散的。"

8. 有一次吴祖光说要请陶冶夫妇吃饭，他感到结婚时送礼送得太坏了，需要补请一顿。于是，我告诉了陶、胡，约集了他俩和杜高一块到吴家，那天吴祖光大约是开完文联鸣放会后，便给我们大家谈会上发言的情形（已作交代），胡秀玉和新凤霞便在另一边谈天。我从断断续续的谈话里，知道胡秀玉在谈她在东北受到搜查的情形，新凤霞对胡秀玉不断表示同情，我、杜、陶便听吴祖光谈会上情形。我们说我们正在申诉，他说他已建议文联出小册子，他又重述了不应当承认小家族小集团的说法。

9. 恢复了小集团，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反党的目的的，这种反党的思想在鸣放期中便得到暴露。这些人虽然没有公开地直接地骂党，但在思想和实践上是反映了的。如我和杜高的一段谈话，总觉得不自由，限制多，清规戒律多，认为臧克家提出了六亲不得认对。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出来时，我和杜高便说葛谈肃反这点谈得很对，他说他很能理解葛的感情。陶冶说葛的发言很大胆，虽然也说了葛的反动言论太过火，但仍然在肃反一点上取得了共鸣。对储安平的发言，除大和尚小和尚的说法不同意外，认为他谈得对，说现在有些地方确实是这样，并且说只有像这样的大民主人士才敢这样提。当章乃器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出来时，我和杜高也有同感。

10. 陶冶在那边攻击领导，写文章，陈敏凡贴大字报，而且同

一些有问题的人间贴，我、杜高则在攻击赵寻和领导同志，给吴祖光谈论剧协，给他的发言提供了资料，对《剧本》月刊我攻击它为无生气的、僵化的，说《剧本》月刊编辑部三位主任做这样全国性刊物的主任不够资格，攻击剧本月刊编委会是多余的，想把它变成一个同人性的几个人办的，也就是不要党领导的刊物。

11. 对于和小集团有关系的王正，不但赞同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他反领导，他写骂吴雪的"黑丝袜"，杜高立即改为小说，他要写攻击赵寻、光未然等同志的文章，我和杜高也全力支持。〔按：以上红笔批注：集体——有组织的〕

12. 这时吴祖光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煽惑，吴祖光："什么小家族不小家族的，根本就不承认那回事！"

从吴家出来，三个人一路上就谈起了这件事，我说："看样子肃反恐怕是搞扩大了，不然怎么按着我们整呢？"陈敏凡说："听说胡风放出来了，住在百万庄，千万说不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电影局里有一个人告诉我的。"他没有说出来那个人是谁。我说："肃反的时候我在文化部听过一个报告，说是最初的打击面搞宽了一些，报告还说整出了好些个小集团。"田庄说："我就不服，你们先别管，我在电影局上诉好了。你是晕的，逻辑混乱，我行，我对领导上谈，开除我团籍就是缺席裁判，不合法。"我说："不知道杜高是不是真有政治问题。"陈敏凡说："他要有，还能出来？"



13. 我建议杜高去找吴祖光，因为吴祖光跟彭子冈很熟，杜高去前曾写了一封信给吴祖光，信的内容是：一、谈对吴祖光的感激。二、回忆肃反前和吴相处时的情景。

14. 应该说为杜高找工作，是恢复小集团的第一步，而我在找工作中又是十分积极的。（注：田庄也为杜高的工作事找吴祖光谈过）

15、整风一开始，是小集团搞翻案搞得最凶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杜高、陶冶、陈敏凡和我（田庄到四川去了）四个人，杜高请客在新侨饭店吃饭（他拿了一笔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稿费）。当时谈到了申诉的事，陶冶说他很着急，他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说："你急什么呢？事情都是联系着的，我们没有解决，你自然也不能立刻

解决的。"陈敏凡告诉我们说："田庄早就决定取消处分和退回被降级的薪金，现在就是没有执行。"我说："领导上也说要给我退回薪金，大概是机关单位之间没有完全谈好。"于是杜高对陶冶说："你别先动，免得让人看出好像我们是商量好的。"我重复了一句杜高的话，杜高又说："等到我们全批下来了，你再在联络局闹，反复找领导谈、申诉，如果现在谈，就不好了。"陶冶完全同意了这个说法。

16. 这个时期在方法上是采取了各个进行的办法，但互相之间是通着声息的。

17. 吴祖光说："你们总算经历了一场大风大浪嘛。"杜高便说他要给中宣部写信。于是吴祖光便轻描淡写地好像是不成心地说："那是上诉嘛。"实际上，这便是一种煽动。

还有一次，我单独去找吴祖光，一进门他就告诉我，说陈敏凡给他写了封信，说领导给她作了结论，不算小家族的。吴祖光便说："这有什么高兴的。莫名其妙，小家族还是在，根本就不能承认什么小家族。"我说："家族之称是开玩笑说出来的，现在都当了真了。我一定要谈的。"于是吴祖光又一次对我提出了要申诉。

吴祖光对小集团的被审查者，不只是同情，而且采取了这样一种鼓动申诉的态度。

诚实地说：我原来对申诉是没有信心的，但吴祖光和小集团的一戳，便也产生了必须申诉的思想。

18. 每一次的谈话之后，都是对吴祖光说了的，吴祖光很高兴就是认为不能承认什么小家族。

为了使得几个人向领导的申诉都是一致的。我和杜高两人便商定如何谈得一致，杜高说："什么小集团，我们就不是什么小集团。共产党最头痛小集团，一承认小集团就倒霉。"我说："那家族也是不能承认的，家族本来就是开玩笑说出来的。"这个时候陈敏凡告诉我说，她已经在电影局写了好几份声明，声明过去写的材料一律作废。大概你们剧协就会接到的。这样，我们便以四点相约：

一、不承认这个小集团，只说它是个落后性质的结合，因为，它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小集团总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这几个人只有一种纯友谊的结合。

二、只承认各个人有各个人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也承认每

人过去的言行都有过一定的错误，该承认的错误就去承认。

三、不承认"小家族"这个说法，认为这纯粹是由开玩笑说起来的。

四、对于各自在肃反中写过的材料(即是写过小集团里的人的材料)，尽可能地提出申诉来，说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是被夸大了的。这样好给对方澄清一些问题。至于属于自己的问题，也可以提出申诉的。〔以上红铅笔批注：出钱请客商量，应该承认什么，不该承认什么，如何提法，谁先谁后。互相声明作废(陈)，内外夹攻，组织外围力量。〕

我写了同样内容的三份申诉。一份给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写的是陶冶；一份是转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写的是蔡亮；一份是转给实验歌剧院的，写的是罗坚，内容都是说，肃反时写他们的材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夸大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很不安，请组织重新考虑处理问题。我把这三份东西交给了李之华同志。

我写了三份申诉，据说陶冶也写了申诉。陈敏凡自然是写了申诉的了。在田庄到四川去之前，据田庄说，他早就写了申诉的。

我除了写三份申诉，还给在上海的谢蓉明(上海实验歌剧院)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谈到了领导和我的谈话，谈到了小集团的问题，我记得我在信里说："家族者玩笑之谓也。小集团者，是妄加之辞也。你考虑向领导上谈。"这便给他起了煽火作用。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7.20.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19. 长期以来始终压抑不愉快，对肃反不满是主要问题。

20. 对肃反运动，我认为斯大林同志的一条理论错了，故而认为肃反在中国也是错了。

21."反动小集团"和"玩弄女性"说法都重了，不符合事实，我虽然和几个女同志谈过恋爱，但是从来没有超过朋友以上的关系。

22. 我十岁到十七岁写的文章、剪报(内容是反对当时社会的)已交给组织，但肃反结论却一字不提，只是找到了两篇反动文章(这问题也很复杂)，认为我一贯是反动的，心里不满。我建议写出进步一面。

23. 参加革命后写自传材料，因为青艺有一个人救过我，给我饭吃。他的弟弟被捕了。参加革命后这一段我有意没交代。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7.26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会上的发言）

24. 肃反后，从汪明口中得知，吴祖光对我很关心。二月间我去找他，他在家等我。在谈话中流露了在肃反中被搞得很惨的情绪。他告诉我黄苗子比我搞得更惨。叫我不要难过。

26. 田庄在肃反中因为与我有联系被整了，很不满意我。对吴祖光谈，吴表示田不应不和我接近。我称吴为祖光大哥，在心中非常敬仰他。

27. 我和汪明告诉吴祖光剧协关于肃反问题向我们道歉的事，他笑着说："你们是不是感动地说：'你们再来整我一次吧。'"

28. 反右开始我和汪明两人写了一篇大字报，送给吴祖光看看，吴正在家写文章，他看后叫我们删去处分问题——因不明显，和一句有关杨哲民的话。（编者按：这是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态"大字报）

（又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8.5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大会上的发言）

29. 我对吴祖光主要是谈肃反的事。他对肃反非常不满意，影响了我，他非常同情我，凡是被整的人他都有特别的同情心。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30. 在鸣放期间，杜高提到肃反给了自己行政处分降级的话，吴祖光很不满意，认为他们被整了这么久，精神上的伤害无法补偿，他说，为什么要处分？可以写信给中央……

31. 鸣放期间，吴祖光说："你们那算什么小集团。我现在去开会，办同人刊物（按：吴祖光打算办一个《万象》）中宣部支持的。……要说小集团，我们这才是真的小集团！"

32. 肃反以后，吴祖光问杜高，陶冶、罗坚的情况（按：均系小家族成员）的情况，杜高说没有什么联系了。他说："那怕什么，朋友还是朋友嘛，又不是反革命联系，有什么要紧？"

（编者按：以下系肃反后期杜高对"小家族"的认识）

33. 只有在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丑恶的面貌，自己几年来所站的原来是反革命的立场，思想感情何等腐朽。而这个"小家族"，实际上就成为容纳和包庇这种丑恶思想和行为的垃圾箱。

今天我们都能从沉痛的教训中清算自己的反动的思想和立场时，当我们的觉悟有了一些提高以后，这个小垃圾箱就会粉碎得更加彻底。

（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34. 在办公室，吴祖光拿了一张《文汇报》翻，说："谁也可以指着部长鼻子骂了一通了，我倒很可怜那些部长。……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35. 肃反以后，汪明一篇散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发表了，同时第八版还发表了新凤霞的一篇短文。吴祖光对汪明说："小家族又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团聚了一次。"

36. 吴祖光到剧协开会，回来告诉汪明说："真没想到，田汉现在要整我，好嘛，老朋友，以后还是要见面的嘛。"

（以下是陶冶对杜高的揭发摘要）

37. 杜高对陶冶说："你们那儿大概是把你当作小孩子欺负吧。"



（以下是汪明对杜高的揭发摘要）

38. 杜高和陶冶说："党在整人，真使我吃不消……有一次孙福田同志找我谈话，我觉得孙很不安，态度十分谦虚，极力装出好态度来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你快给领导上申诉吧。"陶冶一听就沉不住气了。……他也同样鼓励我……陈敏凡写申诉书。……这次蔡亮从西安来，他第一次见着蔡亮就说："我们问题平反了……你的问题回去一定搞清楚。"

（按：孙福田系剧协肃反负责人。陶、汪、蔡、陈均系"小家族"成员及受他们严重影响的分子。）

39. 杜高说："党要整谁就整谁，共产党最怕小集团，以后我们不要那么多社会关系了，只要两三个朋友就行了。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小集团了。譬如，谭天荣，他们的政治目的有纲领，说我们是小集团真说不过去。"

〔以上红铅笔批注：以造谣歪曲手段煽惑陶冶、蔡亮、敏、汪。理论：史(大林)错，扩大了……样才算小集团。〕

(编者按：以下摘自王里对杜高揭发材料)

40. 诬蔑肃反不民主，不人道。他认为对他的斗争是冤屈，他说汪明、陶冶等作了降级处分，蔡亮调到西安工作，杜高说这样处理是错误的。他说他自己比他们问题严重，但未作处分(这是杜高撒谎，其实他降了两级)并且组织上已向他道了歉，意思是要陶冶等翻案。他说"小家族"的名字连他自己都不明确，只是陶冶在一次开玩笑时随便的一句话，但组织抓住便做起文章来了。他说把吴祖光作为小家族一员来看是被陷害。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所写"关于陶冶的材料")

41. 肃反结论作出以后，和汪明谈到一同受审查的小集团的别的人的情况。谈到陶冶时，汪明说领导和同志们又逐渐恢复了对他的信任。

陶冶告诉了我，这一段时期来领导上还是很信任他，工作也很起劲，在一次机会里还和毛主席握过一次手。

42. 我们对于肃反运动的谈论，包括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极力辩护我们的错误，陶冶说："说我们称兄道弟也是反动的，那为什么叫苏联是老大哥、中苏友谊要叫兄弟般的友谊？"他又说："说我小集团有黑话，天晓得明明是开玩笑的话嘛！"他还说："什么小集团，我们根本没什么小集团，小集团要有个领导，要有组织的么！我们不过是在一起玩玩，瞎起哄。"

43. 陶冶特别注意读《文汇报》发表的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找出肃反的确是扩大化了的理论根据。

44. 吴祖光是"小家族"的家长，他在小集团感情联系以及后来趁整风时期翻小集团之案这件事上起了主谋作用。

45. 剧协肃反负责人，孙福田同志约汪明去谈话，告诉了他新结论作出来了。汪明当时正式提出希望将"反动性"小集团改为"落后性"，汪明找陶冶，告诉了陶冶新结论已经下来了，并且欺骗了陶冶，说自己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了。而且领导同志当场通知办公室退回他的薪金。陶冶就耐不住了，我授意陶冶找领导上谈，

授意写一个报告给领导同志，他便这样做了。

46. 我和陶冶说过，吴祖光说，你们是什么小集团，现在就鼓励这种朋友的结合么！汪明也和陶冶说过，“吴祖光要找夏衍同志谈我们的问题。”鸣放时期，王少燕曾和阳翰笙同志谈过我们的问题，也提到阳翰老说把我们搞得太凶了，要纠偏。

47. 报纸上已经开始揭露出北大反动集团“百花学社”，杜高对陶冶说：“这才是反动小集团么。他们办刊物、募捐基金，标榜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我们以前说过的没有一句有这些大学生的厉害。整我们真有些冤枉。”

48. 吴祖光的反动言论受到批判后，汪明从吴家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吴祖光的“论后台”一文决定抽掉不发表了。陶冶接的电话，要汪明转告吴祖光说，我们都很为他高兴。

49. 月初，剧协肃反负责人孙福田同志约……(以下缺)

50. 吴祖光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的这种小集团式的结合，记得还是胡风问题刚揭发时，我和汪明开始检查我们之中这种关系时，吴就说：“新社会难道不许交朋友了吗？”

51. 一天张光年和我谈话后，我打电话给汪明、陶冶。汪明即刻告诉吴祖光，王少燕在文联会上见到吴祖光，吴便说汪早已告诉他了，吴对当时的形势很乐观，王少燕也说：“不道歉不行。”于是，吴祖光在文联会上便向肃反公开放了一炮，当我们以为整风之机，可以摆脱反动小集团的这个错误时，而吴祖光就在这时向汪明说了小家族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团聚的话(指汪与新凤霞同时发表文章)。这等于又恢复“小家族”了。当我和汪明、王少燕同在中国青年报座谈会发言时，王少燕也得意忘形地说：“就缺萧崎了，要让人看看，我们又在一起了。”我说：“过了两年，又活了。”汪明说：“这样名字老在一起，好得很。”汪明还特别在我这里剪下了青年报的消息，用红笔勾好，由我用俄文写上信封，预备寄给在苏联学习的杜鸣心(按：杜原系“小家族”一分子)。当我在《新观察》的文章发表时，刚好旁边又是蔡亮(按：蔡系小家族成员)的一幅画，封面便是新凤霞的相片，我说：“又团聚了。”陈敏凡(田庄爱人)也说：“有缘！”新凤霞说：“想不到那次和汪明的文章一起，这次相片又碰到你了。”就是这样，我们在整风中，一边去解脱问题，一边又恢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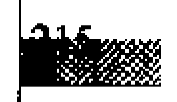
集团的勾当。后来恰好蔡亮到北京来，匆匆见了他一面，我向他讲到开除团籍是不对的，应该恢复，同时又一再说一些感情上的话，如“很怀念他。”“很感到对他痛苦”，但主要鼓动他去翻案，推翻小集团的结论，这实质上就是要保卫我们的错误，不认识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反而希望按我们的认识，去推翻组织上作出的“反动性小集团”的结论。

汪明交代小集团翻案前后经过

搞翻案是小集团在肃反后已经恢复形成了的时候开始的，即1956年底到5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搞翻案，小集团的人都有些要求，翻案形成了，小集团便可公开地出现而无所顾忌了。

初期：

1956年底的一个时期，小集团的人开始接触，但它是取着一种隐蔽的半公开的方式，这是怕在客观上产生影响，主要的是因为小集团里的人还没有恢复工作，不便公开地搞在一块。这个时期表面上看来是不相往来，实际上这是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互相约定：杜高不到我的编辑部来，我也不到他住的大二条去。陶冶和我在文化部食堂见面时，或视而不见，或只做一般性的点头，绝不做亲热状。田庄、陈敏凡很少到我这里来，我也很少到他们那里去，即使见面也是另有约会地点的（见后）。小集团的人第一次团聚在一块儿只五六名，在国际友人服务部。又如陶冶和胡秀玉结婚那晚上，小集团的人为了避讳，也不是一块去的，而是田庄、陈敏凡去了，走了，我独自去的，新凤霞、吴祖光一块去。这一阶段应当说是小集团搞翻案活动的一个酝酿期，彼此交谈肃反中的情形，并通过此，了解对方单位的肃反情况。例如，我对小集团里的人谈过剧协的情况，说搞错了好多人，通过王正我说的“青年剧院肃反全搞错了，没搞到一个反革命，反而死了一条人命。”（王正原话）



田庄和陈敏凡对我也说电影局也搞错了许多人，陶冶则说联络局的肃反也十分主观，仅仅认识小集团的人的许仪曜，因此被斗了好几次。胡秀玉（陶冶的爱人）则谈她在东北被搜查的情况。一天中午，公安部和院领导来找她，并出示搜查证。当时她吓哭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到北京后，她跟我谈及此事，把搜查证给我，我

说:“你还留着它干么?有什么光荣!”便把搜查证撕掉了。杜高就谈他在肃反中的情形。

吴祖光和翻案之间的关系

吴祖光不是很明显的指挥和策划小集团搞翻案,他是一种思想指导作用的。他的谈话最初较仓促,表面上是无动于衷的,但慢慢地他的态度就明显起来了。他是一步步地来煽火的。我们和吴祖光的接触很多,其中谈到肃反我的印象较深的有六次。态度一次比一次鲜明地支持小集团搞翻案,从而也有他和翻案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是田庄在肃反后第一次带我到他家去,谈话的内容已作交代。第二次是五七年春末我独自去吴家,此次他骂田庄偏激,不该对杜高态度不好,说我们政治上没经验。我说我不满意剧协的审查,他说不同意就可以谈,到剧协谈不通可以往上谈,后来我把吴祖光的话告诉了杜高,杜高因此十分感激吴祖光,并和我一起确认吴祖光是热情、厚道、人好、诚恳的。田庄因为在电话里受到吴祖光的批评,于是对杜高也开始有了好转。第三次是田庄、陈敏凡、我三人同去吴家。田、陈谈电影局搞错了许多人,谈柳溪就是此次。田庄还谈到陈卓猷,说陈卓猷一次会上大骂道:“天天,我告诉你,我卓猷又来了。”此次吴祖光说他听说好些地方搞错了。这样就使我们认为搞错的不是一个地方了。第四次是我单独去吴家,一进门他就说陈敏凡给他写了封信,他不满,(原话已交代)他说中央要用两年时间来复查一些搞错了的。第五次便是我和杜高专为领导同志表示了道歉而十分兴奋地告诉他的这一次(已作交代)。最后一次是他在文联鸣放发言后,去的人有我、杜高、陶冶、胡秀玉、胡秀玉的妹妹,我们本已想申诉,他便说要我们也申诉的话,此次便挑开了在会上谈了,形成了翻案活动的一个高潮。小集团的翻案活动,思想基础有三:一是各个人本来有的思想要求,二是吴祖光的在思想上的推动,三是受了整风初期右派分子在报上发表的反动言论的思想上的共鸣。

二、"小家族"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敌视、攻击、污蔑、诽谤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的交代材料）

1. 鸣放初期吴祖光是十分兴奋的。他说到处都找他写文章，简直写不过来。约稿的到头上也挡不回去，但是他说他也想写，有一些话是要针对时弊来谈到的，他谈他非常欣赏他写的那篇《相府门前七品官》，说现在到处都是门禁森严。写张会客条也像写件履历表。那电话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保密的，样样保密，事事保密。

2. 提到陶冶我想起一件事：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如此人事处长》的文章要我帮他修改一下，以后转给《人民日报》。我看后觉得无法修改，便转给《人民日报》杂文组的顾明同志，这篇东西，又由《人民日报》遵作者嘱转给了《北京日报》的徐淙，最后都没有发表。陶冶告诉我说他们人事处长把一对夫妇硬拆散了，把女方分配到了一个托儿所，因此引起了对外联络局很多同志不满。他说他写这篇都得到处里的同志支持的，他还说他都核对了材料，绝对可靠。我看他说的那么有根据而且形容的十分凄惨，虽然没有帮他修改但支持他写出来的。我说你写了我给你转给《人民日报》。他说的那个事情的全部经过，我记得不清楚了。这是鸣放初期的事。

3. 鸣放初期，我要写那个剧本，最早是想写成电影剧本，电影局的田庄去四川前，我、田庄和陈敏凡三人有一天在新侨饭店吃饭，谈起此事，打算田庄和我二人合写。我谈了故事，田庄认为非常好，我还说我对吴祖光也讲过这个故事。

后来我又打算先写成舞台剧，我自以为抓住了大矛盾了。是针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者的。但是我也对吴祖光、田庄和杜高说过，说这个主观主义者我是打算以赵寻、蓝光在肃反时审查我的情形做一些模特儿的，实际上这是对领导的攻击和歪曲。企图在作品里发泄自己对肃反时审查我的不满情绪。这个戏的故事，是我根据武汉纪凯夫事件和我的在勘探队工作的弟弟说的一点点事情而杜撰出来的。

吴祖光说故事很好，但是他也说这个戏的分寸恐怕难于掌握。《沉冤记》这个名字，说实话并不是吴祖光给起的，而是我想到过，

但并不决定用的一个名字。

这些人对肃反的抱怨是很多的，整风前，有一次田庄、陈敏凡到我家里来，谈到肃反，田庄说："王震之就是个王八蛋，整我整得可够惨。开会，创作室的创作干部到齐了，每人把我臭骂一顿。"

4．整风以前还有一次，在我家里，有王少燕、杜高，由杜高的找工作问题谄到了肃反，王少燕带有挑拨地说："让他们整嘛，以后大家总还是要在文艺界见面的嘛，这样很好。"我说："这些人呵（指剧协创作室的同志），是白吃人民小米过日子的。屁事不干专整人。我倒要看看他们作出什么成绩来。"

〔红铅笔批注：写文章，互相供材料，支持、研究、修改，互相顶名，介绍发表，互相赞扬，攻击积极分子，到一起咒骂组织〕

这时候杜高说他最恨的是赵寻、蓝光，我说我最恨的是蓝光。并且，这些人连带着也恨起黄悌来了，杜高说他是最见不得黄悌那个死样子。我说黄悌就死拍蓝光、赵寻的马屁，他的那个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凑出来的，能叫创作？

我还记得，后来当杜高对我说他恨不得赵寻坐飞机摔死的时候，我提到了安娥同志，因为她在运动中对我也是很严厉的，我说："她得的那病（按：安娥同志近患脑溢血症）是报应。我才不去看她哩！"

5．关于肃反，在整风初期我还对青年剧院的王正说过这样的话，那是晚上两人在大街上散步时说的。我说："好哪，现在搞清楚了，剧协的三个不是反革命。别的地方我不敢说，这剧协，肃反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王正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公式。青年剧院就全搞错了。没弄出一个反革命来。"他告诉我："青年剧院还搞出了一条人命。"

6．我和杜高对黄悌的仇恨，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妒忌，主要是认为他因为在赵寻、蓝光面前拍马而得到好的待遇，而恨了他的。因为这样还在创作室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黄悌的不满，经过一次肃反，就加深了。首先，对他的《钢铁运输兵》采取了一种攻击的态度，整风初期，我在《剧本》月刊散布他的剧本是对我的剧本的抄袭。并且，整风以前我和杜高有过一次对黄悌寻求报复的极恶劣

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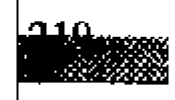
杜高说："他的剧本以后就别想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有我在那里守着，非退掉他的不可。"

我说："他的剧本也别想拿到我们这儿来，我在话剧组还管点用，他的《青春曲》写得就不像玩艺儿，戏不像戏的。我还未退，别人就给退了。"杜高说："他也别想送到电影局。田庄在那儿呢！"杜高问我："听说上海要拍他的戏。你不是要到上海去吗？"我说是的。我去了一定要给他捣捣鬼，叶明我认识，可以去找他的。杜高说："那就好，就要让他搞不成。"〔红铅笔批注：集体抵制黄剧，指示汪去破坏黄剧〕

报复的第二个例子是杜高、陶冶二人合写，用陶冶的名字发表在《北京日报》的那篇文章攻击李之华等同志的《空头作家》。

报复的第三个例子是：杜高说他是能写批评文章的，以后只要蓝光、赵寻、黄悌、王命夫的东西出来，他就打算化名写文章批评他们。

7. 杜高说剧协是标准的主观主义，我就说把一些人捧在天上，把一些人打下十八层地狱。王少燕说这不是宗派是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少燕说的这番话："（大意）让这样一批人来领导中国的戏剧运动，实在是滑稽了！"当他谈到田老的时候，他说："田老是晕的，他是诗人，根本做不好领导。是受这些人指使的。"



8. 陶冶对他们的人事处长不满，要写文章批评，我也是支持他的，并且说这样的官僚主义就该揭露，还答应把他的文章介绍给《人民日报》。

反右初期，陈敏凡要贴她领导的大字报（即王大化同志的爱人，陈敏凡的领导）我劝她别贴了，我说你贴大字报没有好处，会挨整的，一些大人物因为发了言都挨整，何况你呢？你即使要贴，也别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合贴（她曾说她跟电影局的赵美嘉、柳溪合贴过大字报）。我所谓的大人物都挨整，即是指反右初期在报上受到驳斥的人。

9. 这些人都习惯于搞两面派，杜高如此（如我已交代的那些），我也如此，肃反后对蓝光表面恭恭敬敬，背后却怀恨在心，给以咒骂！对李之华表面说他好，背后却讲他不讲真话，写剧本慢吞

乔写不出。陶冶对他的领导，也是这样态度，表面好得很，背后却将小集团的人搞在一起咒骂肃反时审查他的人。陈敏凡、田庄对电影局审查过他们的或者斗过他的，表面上也是好得很，背地里却怀恨在心。〔红铅笔批注：两面派，互供材料，互通声息〕

10. 吴祖光在文联会上说电影局某人弄得妻离子散等等，是田庄和陈敏凡对吴祖光说的。

11. 我记得这天晚上吴祖光重复地说了："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他在以前不会出卖周扬、老夏他们？"

12. 肃反运动当中，我一面在写材料，一面在心里作着各式各样的咒骂。这一段时期我虽然无人可谈，然而这一肚子怨气却在经常冲击着我。当我被再三追问的时候，我说（心里想的，下同）"这是逼供信，这是变相的私设公堂审问"，当让我停职反省并劝告我不要到处乱跑的时候，我说："你们破坏法治，侵犯人身自由。"当有人在会上骂我是反革命和蓝光追问我和杜高的关系时，我说："共产党暂天天理，解放以前国民党给我戴红帽子使我无法生活，今天又给我戴黑帽子。"当运动久久没有结束，我说："这是给我精神上的摧残。"

13. 肃反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陶冶家玩，这时候我跟杜高的接触还不大久，陶冶悄悄地告诉我："杜高的思想反动的可怕呀！他对我说他不想干了，我不想在这个国家呆了。他说他想当华侨去，到海外去。"也就在这天晚上，陶冶也告诉我关于杜高所说的肃反是斯大林错误在中国重复，是赫鲁晓夫救了他。

14. 有一次杜高到洋溢胡同来看我（整风以前）两人谈到了肃反，这一次两人谈话的主要内容我是记得的，写在下面：

我说："创作室的肃反，我看是这些人（指蓝光、赵寻、李之华）找不到对象了，怕报不了账，只好把我们弄去充数，结果只搞出一个路翎来。讲良心话，我还怀疑路翎是不是真的反革命。胡风有真凭实据，这路翎根据他和我们的接触，就未必是反革命？"

杜高说："我也是这样想，要说他是真的反革命，他能写出像《初雪》那样有感情的作品？就说他的《洼地上的战役》一定说那是反革命的东西，真有些牵强附会。运动嘛，反正是整人，我算是被他们整惨了，提起来就伤心，这要一辈子留在记忆里的，蓝光、赵寻

他们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我说：“共产党就是这么搞运动，真是搞得人头痛。”杜说：“你看肃反使人互相仇视，像我们这样的好朋友，在运动当中都互相仇视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搞法嘛！真让人伤心！”

15.《剧本》月刊在北海召集第一次座谈会以后，王少燕、杜高、我三人聚集在吴家。几个人便谈起来了。三个人谈北海座谈会的情况，吴祖光便谈他在文联会上的发言，谈得非常起劲。

我告诉他那位志愿军空军作者写剧本的遭遇的事情，作者已经在会上谈了。吴祖光说他在文联会上提了一下。王少燕说他要跟《剧本》月刊好好算算账。于是，吴祖光说了那句“有冤申冤，有苦诉苦”的话。

吴祖光说：“太乱了，不整不行了，再要不整一下，不知道会乱成个什么样子。”王少燕接着说：“党不整不行了，不整就要完了。到处像个衙门。”吴祖光谈起了他解放前和党员接近的情况以及解放后的情况，于是他说党的威信降低了。他说：“几年来整人整得天怨人怨，现在不整整那些整人的人，实在是叫人无法平气。”

16. 由于讽刺剧的问题谈到了赵寻同志的《人约黄昏后》，对赵寻开始攻击的是王少燕，他把《人约》这个戏形容得一塌糊涂，说什么写这样剧本的也是剧作家，他说独幕剧选由他来作序，还把蓝光的《姊妹俩》排在第一篇。吴祖光说：“大概都不愿写他才写的。”我说：“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非要在这次整风中好好整整的。”王说：“我就抓到他的《人约黄昏后》来做文章。”吴祖光说：“把报纸的通讯拿来一凑就算戏。”我说：“就有读者来信到《剧本》月刊，说这是抄袭。”王说：“这问题希望你也到会上谈，你谈比较有分量。”吴说：“再说吧，其实这个戏连中学生的作文都不如，我真替他害臊。这样的戏还会送到《剧本》月刊去。”吴祖光反问我说：“你们《剧本》月刊到底是怎么搞的，全国性的刊物就发表这样的戏，也不怕降低你们的威信。”我说：“发这个戏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他是编委，戏拿来当然就发了。”杜高说：“可是他出国，作为代表到尼泊尔去。”吴祖光说：“他大概去尼泊尔还是合适的，别人都不去，他去。”王少燕说：“他当然只能去尼泊尔。”这种谈话的嘲笑和蔑视是十分强烈的。杜高还说：“我真希望他坐飞机摔死！”（这是他又一次这

么说）王少燕接着说："呵！当然，当然摔死！"多么疯狂。

也是在这一次谈话里，王少燕又一次对吴祖光宣传了王正发明的那个所谓底版之说——即："赵寻的底版在张光年那里，张光年的在周扬那里，周扬的在乔木那里，乔木的在马林可夫那里。"

17. 杜高在整风初期的一段话。他看了《文艺报》上杜黎君批判周扬同志的文章，说他真想写一篇文章批判胡乔木。我说："胡乔木又没公开写文章，那是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你怎么批评？"于是他和王少燕相约，到处找胡乔木的发言。

也是在吴祖光家的一次聚会里，王少燕也提到胡乔木的发言，他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那意思仍然是说乔木同志提倡了公式化概念化。不但攻击了赵寻同志而且还攻击了党中央宣传部。

18. 我不知道王少燕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说："葛佩琦是肃反时被整过的。"他说："他大概是被整惨了，这一回把牢骚冒出来了。"于是我也拿着鸡毛当令箭，对杜高说了。杜高说："肃反整人恐怕是太多了，葛佩琦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打小报告，真是这样，说了什么就有人反映。"我说："你还记得在'志后文工团'？动不动就汇报了。"杜高一再地说此人真大胆。从这里我们又谈到肃反上去了。

〔此页红铅笔批注：在一起夸赞葛佩琦的大胆〕

19. 我记得，我还给王正说过这样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话……当他出来说《文艺报》不让他写文章批评赵寻了，让他写批评光未然的文章时，我说："你们搞批评的，就要在节骨眼上出来写文章，要在每个运动里写，走在别人的前面才行。"王正得意地对我说："他写了批评刘部长的文章。"但是他又说："文章被磨平了（指青年剧院和文化部）。"王正还把攻击吴雪的内容告诉了杜高，于是杜高写出了那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这样一种形式，形成了一种互相配合，而幕后大将吴祖光却稳坐在马家庙胡同，说什么也不肯出马，开会之前在北海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没有什么可谈，不肯来。实际上呢，他的话已经由这些人谈了。幕后主将何必出马呢。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章乃器的那篇反对斯大林的话的文章，杜高特别择其一段念了一下，他说："这个话，要是以前，没人敢

说。"我说："说了还不是挨整。"后来王正进来了，他看到我们在谈这篇文章，他说他也看了。认为写得很不错。杜高说："没想到章乃器还有些理论水平，敢于批评斯大林。"我说："要是斯大林没有死，谁批评，谁倒霉。"杜高说："他恨斯大林。"并重复了以前说过的话。王正说："剧院里的一些党员就是以特殊材料制成的自居，不把群众放在眼里。"我说："章乃器这话真是不无道理。一些共产党员可真是自命不凡。"杜高说："这是自认特殊。"〔此处红铅笔批注：1. 互相配合，到一起诋毁领袖言论，2. 到一起赞佩章乃器文章，诽谤负责理论的（底版论）3. 耸人听闻：赵、蓝宗派。〕

后来我和杜高到吴祖光家里去，问他看了这篇文章没有，他说看了，而且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我和杜高谈了和以上相类似的话，于是吴祖光便又一次的谈到党的威信问题。他联系这篇文章时说："章乃器的文章真有道理，你看看某些党员，飞扬跋扈的样子，什么事都要问都要管，这是斯大林这条奇怪的定律害了人，把人惯坏了，什么特殊材料不特殊材料的，你看毛主席的文章，就没有这样提过，我不信，共产党员从娘胎里出来就与众不同？"他还说："我看哪，这句话就是根。特殊特殊，当然就自命不凡，一特殊起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党中央提出整风恐怕就是要整整这种特殊！"



20. 吴祖光的那个写女审判员的戏，（按：是一部攻击新社会的戏）倒确是让我王少燕帮他想个名字的。我想的题名为"吹皱一池春水"，后来他自己想的也是"吹皱一池春水"，我还为此很高兴。

小集团的人，在创作上是如此，王少燕写了《墙》，我要写所谓《沉冤记》，杜高呢，也有他的一套，他曾对我说，他要写一系列的像"拟契诃夫幕后"那样的攻击新社会的小说，他说将来出集子就题名为《花瓣集》。而陶冶，却在那里写什么《空头作家》、《如此人事处长》之类的文章。至于田庄，也要搞什么讽刺火车站官僚主义的电影剧本（他曾找我合作，但觉内容空洞未写）。还有一次，和颜振奋访吴祖光后……我说："最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刊物，里面真正搞过报刊编辑熟悉编辑业务的却找不出几个。可是，人倒多得很。"吴祖光说："编辑部也像个衙门。"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6.5.中国戏剧出版社整风会上的发言）

21. 我感到剧协领导在过去，对待知识分子是有些粗暴的。……

22. 我大胆的提出，在创委会，赵寻、蓝光的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并无人敢提，他们职位高，政权森严，在肃反中要我承认"小集团"就是蓝光逼的。

23. 在创委会有两部分党员职位高，他们排斥他们不喜欢的作品。我曾写过一个《星星照亮了天边》，张光年听了觉得很满意，而蓝光排斥。他们不但排斥这样的作品，而且要排斥写这些作品的人。

24. 蓝光的《姊妹俩》在《剧本》月刊登了。是公式化的，受到外国朋友的批评。赵寻搞了一个《人约黄昏后》受到外界的不满，而《剧本》月刊还登在重要之页上。

25. 赵寻、蓝光……他们都有亲戚关系，贴得很紧，以前非常令人尊敬，而现在是不正常的。他们利用了张光年及以往一些演剧二队的同志，连李超，孙福田都怕他们。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7.20.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26. 我一回忆起赵寻、蓝光的形象就害怕。

27. 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经验，缺乏民主。

28. 去北大参观，见到屋上扯的幡（右派分子为肃反运动中受冤者竖的白幡），上面写的是"为肃反被错斗者鸣不平"心中不舒服，如像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就不必搞运动了。听到了学生给党提意见，感到呼吸到了民主空气。

29. 在馆子门口遇见杨薇，吴说："现在到后台找杨薇都不容易了。"

30. 吴祖光谈到曾与陈白尘谈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一年一个剧本。而解放后一个也未写，是否与行政领导干涉有关，行政领导艺术是不行的。

31. 我只认为组织上对我们的剧本重视不够。

32. 我与唐湜合贴的《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是我有意对赵寻的报复……是尖锐的攻击。

33. 我还写了《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有一天我遇见了王正，他讲了吴雪的事，我认为……这是一篇好的小品文，看了李维时的批评，感到自己长期以来在感情上都流露着阴暗心理，长久以来和党的关系弄不好。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8.5.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大会上的发言。）

34. 王少燕的《墙》写完一场就请我帮助写收场，我说最后可以用"墙"倒了收场，同时我看了当中一句台词"交朋友就是小集团"很欣赏，他要划掉，我叫他别划，我很积极地推销这个剧本。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35. 鸣放期间，杜高提到梅兰芳的纪录片，吴祖光说梅兰芳的纪录片不好，因为是苏联专家当顾问……他提了几次意见，就是"反苏"。

36. 王少燕剧本《墙》按照吴祖光的意见改了尾巴……吴祖光想了个敲痰盂的办法，王很满意，采用了。

37. 吴祖光谈到抗战八年他写了八个剧本，而解放后他一个剧本也没有写出……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写作没有什么限制，更没有什么清规戒律，行政领导之类。

38. 赵寻的《人约黄昏后》……吴祖光说，读完以后，他很生气，这种剧本不如一个中学生的习作，王少燕说，今天中国的戏剧就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完全靠了张光年的提拔。……吴祖光说尼泊尔是谁也不肯去的，罚他去……（按：赵寻同志那时正参加代表团在国外访问。）

（编者按：以下系肃反时汪明交代的材料）

39. 杜高从东北回京后，有一次和汪明谈到在东北的情况时，首先是咒骂丁帆，接着他说："丁帆害我害惨了。在节骨眼上我非好好地害他一下不可，只要有什么运动，我非狠狠地整他一下，叫他也吃吃苦头。"（大意）他曾经打算化名写文章打击丁帆，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暴风雨中》，说他是"歪曲志愿军形

象"。肃反运动开展以后,他曾一口咬定丁帆和鲁藜有关系,说"不然他的书怎么能在新文艺出",企图在政治上来陷害丁帆。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40. 吴祖光在天津看了《杀子报》,很气愤,很不满意这种开禁的做法。

41、《新凤霞遇险记》一文,《文艺报》领导要新凤霞自己署名发表,吴祖光很不满,就写了一封信,连文章一齐寄给周总理。

42. 一次王少燕说:"夏衍同志问他为什么解放后文章写的不勤了,他回答夏衍'忙啊! 忙着写自传'。"

(编者按:以下是陶冶对杜高的揭发摘录)

44. 杜高专门会借刀杀人,是他要写《小苍蝇变成大象》,他一定要拉上唐湜一道写。

45. 杜高说:"共产党叫人互相仇视,我们要提倡人道主义。"

(编者按:摘自杜高所写"关于陶冶的材料")

46. 肃反后小家族的第一次团聚是围绕着陶冶的结婚。那天晚上,吴祖光、新凤霞很早就去了。新凤霞帮胡秀玉打扮,吴祖光祝陶冶夫妇永远相爱,因为他们的爱情是不容易的,是经过"大风大浪"(指肃反)的,新凤霞也说,陶冶应该更爱胡秀玉,"胡秀玉为你哭都不知哭过多少场"(也是指肃反)。签名时,汪明说:"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大大的,放在吴祖光旁边,以显示我们(指小家族)还活着,还在一起,又来了!"陶冶也嘻嘻哈哈地说:"真的,他们是不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搞来搞去还在一起。"(按:联络局领导同志出于对同志的关怀,去参加陶冶的婚礼)田庄、陈敏凡也送了礼物。田庄且用"田景岳"(按:这是家族内互称用名)的名字送礼,还把名字故意写在汪明一起。

《空头作家》这篇文章中的模特儿是李之华和范景宇,这两位同志在肃反中都负责过我和汪明的专案。陶冶把他写的初稿给我看,要我帮助修改时,我带着肃反后的那种个人的,阴郁的报复的感情给他的杂文加重了语气。如其中"八年来,他慵倦了,他发胖了……""读报看书,逛琉璃厂,然后坐在首长席上看戏,然后打呵欠……"这些恶毒的攻击这两位党员的句子就是我加上去的。我

对陶冶说过："你的文章发表了，我和汪明要倒霉。"陶冶也怀着阴暗的心情说："这些人不工作，专整别人，应该给他们狠狠批评一下，不要怕，文责自负，我负责！"后来文章发表了，汪明一方面来告诉他青年剧院的一些同志看了，反应都很好，一方面又和他说："你拿稿费吃水饺，我们吃汤饱"（四川话，"沾包"的变音，意即被连累）并且说："我前几天碰到范景宇，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由我修改的这篇充满了恶意的文章，据陶冶告诉我受到吴祖光的赞扬，有一次陶冶在汪明家碰到吴祖光，吴对陶说："你的杂文写得很辛辣。"

（编者按：下面是杨哲民揭发杜高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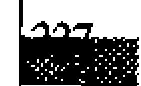
47. 杜高还说过不能理赵寻他们，说他们这些人就是专门害人的人，太坏了。

48. 关于诬蔑黄悌抄袭汪明剧本事，早在整风以前杜高在二条院里说过，而且说："黄悌最近写的这个剧本，也是抄袭杜高的《星星照亮天边》。"但当黄悌的质问出来后，杜高又矢口否认。

（编者按：下面是鲁煤揭发杜高的材料）

49. 杜高说电影局一人，我记得可能是柳溪，在肃反中被审查，他爱人和他离了婚。（按：此乃恶意歪曲）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材料）



50. 我的大字报贴出以后，王少燕警告我，"不要树敌太多"，而过了些日子，又来告诉我"情况变了"，"风头不好了，最好写个检讨。"我于是又在他这一指示下，张贴那张检讨的，不久后，果真开始反右了，王少燕还几次向我提过这件事，表示他"有远见"。

51.（汪明交代）小集团可恶可恨还表现在小集团的人在所在单位表现的一种挑拨离间破坏领导威信和钻空子的恶劣表现，举例如后：

陈敏凡曾在小集团里宣扬说蔡楚生同志在电影局受冷淡的。而王兰西局长却十分凶，她说《文艺报》上的那篇"扇形地带"谈到的事是事实。她说她就见到过，她还说他们的老科长十分无能。

和小集团有关系的王正（青艺的）咒骂吴雪不学无术，咒骂罗伯忠、沈贤、段承滨等领导同志是霸道，不学无术，一本书没有看过而硬要搞领导，并特别受到领导同志重视。他还说光未然同志就

是那种“常有理”人物。对李之华同志我也作了歪曲，《太阳里的黑斑》座谈会后，吴雪同志对会议不满，谈到李之华同志的发言，我便说没有把剧本看完就把剧本全盘否定实在不对，我还把此事告诉了杜高和陶冶，陶冶又要写“如此编委”的杂文，写了，我没有同意他这样干，他才没有发出去。对创作室，我和杜高则扬言它存在着裙带关系，当整风开始，剧协要成立整风小组，听说葛一虹是小组的时，我和杜高便打算找葛谈肃反的事。因为杜高听说葛一虹和剧协其他领导同志有些不对头，便想钻这个空子。

52.“小家族”散布了大量流言蜚语(略)

〔此页红铅笔批注：他们的“小”(集团)，一起祝贺婚礼，敌视党，用族名向党示威，猖狂？撒谎？集体文章，还在迷惑“小”以外之人〕

三、“小家族”与其他右派分子、落后分子之间的呼应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年7月20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1. 关于肃反，大家提意见我都很注意，并结合自己情况，又联系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觉得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不应该搞运动。

2. 我对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感兴趣。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年7月26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3. 我读了费孝通的文章，感到过去民主空气不浓厚，感到过去知识分子不能畅所欲言，是受压抑的。

4. 读萧乾的文章《革命世故》感到自己不应与人把心里所想的谈出来，要有革命的世故。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年8月5日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大会上的发言)

5. 鸣放时王少燕说：“这是我们时代民主运动的高潮”。我就和王一道到北大去了，而且替吴祖光带了一封信给三个学生。

6. 梅朵在《文汇报》时，我给《文汇报》写过文章，梅朵约我写

一篇批评教条主义的文章。

7. 关于我找工作的事我去找子冈。他当时介绍了《旅行家》的情况。他非常不满意培养记者的一些情况。他主张《旅行家》成为同人刊物。他说要我做编辑。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8. 吴祖光说，他很想到北大去看看……他说北大三位学生给他来信，欢迎他去。……学生告诉他最反感《人民日报》了……学校的消息一字不透露。……又说，"如果你们谁去，帮我捎封信给那三位同学。"（后来王少燕带去北大）

9. 杜高、汪明说：趁着整风的机会整整赵寻和黄悌。杜高说希望赵寻坐飞机死掉。（按：赵、黄均系党员）

10. 在整风时，杜高说，"潘光旦认为现在共产党把盖子揭开了，但是还得看看他们在里面怎么跳。"

（编者按：以下是汪明对杜高的揭发的摘要）

11. 杜高说，看了罗隆基的倡议后，他要给政协写申诉书，给《人民日报》支持罗的倡议。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所写"关于陶冶的材料"）



12. 这段时期，陶冶也给《文汇报》投过一篇通讯稿，是报导出国艺术团的活动的。后来《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和他打过电话联系，据我所知，他和姚芳藻过去不熟，也没有见过面。但陶冶那个时候很欣赏《文汇报》，他说："这是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比读人民日报有味。"他和我讲过，他很想多练习写一些文章，将来能长期为《文汇报》写艺术方面的通讯。

13. 汪明曾先后去过师大和北大，回来后散布过那里的肃反问题，也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也赞美过学生闹事，就是"民主空气很浓厚"，"北大的党转入地下了"等等。还带回过一本师大的《苦药》（按：系鸣放期间师大右派反动刊物）杂志。

（编者按：以下摘自杨哲民同志揭发杜高的材料）

14. 杜高同志攻击"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反动说法，他拥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说要给《人民日报》写信，问我签名不。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交代材料）

15. 当我们俩人谈到路翎的时候，我再一次的称赞了路翎的才华。我说："在文学技巧上，从路翎那里我可学到一些东西，他常对我说，写一篇东西要细水长流，感情不要一下子摆出来，要越来越大，到顶点的时候突然收住，给读者很多想象的余地。"我接着说："我受他的影响不算小，你看我写的一些字，都是学他的。"这时，杜高开玩笑说："你还跟胡风下过象棋。"

提到黄若海，我想起了一件事，即是这些人对搞肃反工作的同志抱着仇视的态度，而对一些肃反对象呢，则抱着一种暗暗同情的态度，以上提到的路翎就是一例，黄若海则是二例。整风期间，黄若海写了一个题名为《谬工程师和他的周围》的多幕剧寄给《剧本》月刊，这个戏是我处理的，我转给了戏剧出版社，知道这出戏会由杜高处理。我对杜高说："人家被斗过，剧本你们看看，能出就出吧！或者你们提些意见，让他修改修改再说。"杜高说："没有问题，有我在这里，如果还可以，就尽量让他出版。"

整风之前，杜高告诉我，他去看了路翎的爱人，我问他是怎么去的。他说他到芳草地去找肖里玩，顺便去看看她，杜高详细地给我形容了她生活的如何惨，精神如何痛苦，杜高又说："连路翎的孩子在学校里都受到别的孩子的欺侮。"杜高又对我谈到她怎样谈路翎的。我问杜高："你的胆子也不小，怎么敢去看她的。"杜高说："这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看她也不犯法。"

还有一次，我告诉杜高说："今天我到编辑部上班去，坐在三轮车上看到路翎的老婆，她也在三轮车上，带着两个小孩，他见到我没敢向我打招呼，我对她招了招手，车子就过去了。"我还充满同情地说："猛一看到，几乎都不认识了。瘦成那个样子，带着两个小孩，怪可怜的。"

16. 反右的初期，住在芳草地宿舍的肖里，请我和杜高到他家里去吃饭，饭后谈起了储安平，储安平是肖里的岳父的老朋友。肖里已经职业化了，他说他要到《光明日报》做特约编辑了，每天只去几个钟头，给文章做插图。就在这天下午，储安平找肖里谈了话，要他先别去，说自己已经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了，等以后再说。肖里说："报馆整储安平整得才凶哩。"杜高说："整归整，整

完了他大概还是总编辑，这种大民主人士是有影响的。”从这里，谈到鸣放和反右，肖里说：“这样搞，以后谁还敢讲话，一讲话就挨整。储安平就是例子。”杜高说：“我实在不懂，党中央明明说好的要大放，现在突然收了，没有人敢放了。真是把握不住。”接着他又说：“其实也很简单，无产阶级专政么。”

17．黄悌同志的大字报（按：是一篇反击汪明杜高的大字报）贴出来的第二天下午，王少燕匆匆地跑来了，他非常神秘地低声问我：“告诉我，王正是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听说已调他回来了。”他说：“我要找他谈谈，不谈不行。”他对我说：“听说他的那篇文章（即指《致刘芝明同志》）出了问题，报上已经有反映了，《文艺报》还要搞。”当我追问他详细情形时，他不说了，并且问我：“黄悌那事怎么办？”我说我决定不贴大字报。他说：“你应当把你的剧本和他的剧本一块公布出来，他就没话说了。”他又一次宣传吴祖光没关系。他只坐了一下就匆匆地跑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不行，你这里不能久待，我得走了。”

他和青年剧院的王正过往甚密，从婚姻到创作，无话不谈，他的那个戏《墙》，王正给他出了不少主意，他以前的几个戏，除了《葡萄烂了》，都是和王正商量下写成的，王正还非常强硬地把他的《春光明媚》推荐给剧院排演，剧院拒绝时，王正为王少燕骂了剧院一顿。据我知道的是：他们两个那么相投的原因，是因为王少燕给王正的被管制过的反革命爸爸介绍了工作。王正曾说：“组织部没有办法帮助解决我父亲的工作，少燕却帮助了我。”于是王正又发了一通对组织的牢骚。我曾对杜高谈过一件事，我告诉他说，人民大学的王德州自杀了。他说：“大概是被斗的，斗急了就自杀了，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

18．对胡风、路翎是反革命则加以怀疑。王少燕说的那话我也说过。即：“现在大鸣大放，同人刊物，同人剧团都在搞在演，这跟胡风的那个意见书里的一些意见不是相同吗？恐怕是吸收了他的意见。”杜高跑去看了路翎老婆的事，我也告诉了吴祖光，说他将来也是要搞创作的。

19．这个时候陈刚形容了肃反时芳草地的情形，说谁也不敢跟谁讲话，空气十分紧张。他说这种情形真不能再搞了。说孙福

田同志(按:孙福田是剧协肃反负责人)是靠肃反起家的这句话,我第一次便是此时听陈刚说的。

20.我和肖里从认识他(杜高介绍的)到这一次,一共不过见了五六次面,但我感到他有着一种向这个小集团走来的趋势。据杜高说,他们是老朋友。肖里和王少燕也是认识的,而且有过接触。

21.王少燕在整风之前,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玩,因为我不认识刘大海,他指给我看,说:"他就是刘大海,肃反的时候给整惨,很好的同志么!"王少燕虽然只讲了这么一句,但他在这一句话上所倾注的感情分量是不小的。他同情刘大海,好像整他是整错了似的。王少燕还不遗余力地到处宣扬,说文联的汪巩是冤枉了的,完全整错了,又说汪在运动中整得非常惨。〔此处红铅笔批注:有组织的排挤、同情;杜看了路妻,汪碰见过,都要交换带着同情——惨。告吴〕

四、"小家族"在"反右"期间的活动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交代材料)

(一)当《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的那天,杜高匆匆来找我,说:"恐怕是要收了。"我说:"以后还是少说话的好,免得倒霉。"我和杜高在谈论中,并没有像王少燕那样怀疑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是假的。但是我说:"把卢郁文收到匿名信的事,《人民日报》这样处理恐怕是有些小题大做了。"杜高说:"你看好久没有在报上公布的破获反革命案件,现在又开始公布了。恐怕是不会鸣放了。要搞反革命了。"

(二)当黄佛同志的"质问杜高、汪明"的大字报贴出来时,杜高突然打电话来说,糟了!对着我们来了。当天中午他叫我到和平宾馆的冷食铺碰头,说有事跟我谈。我去了,原来是要我跟他订攻守同盟。他说我害怕得很。他要我订攻守同盟的内容是:

一、当人们谈起时,不要像肃反时那样天真太冲动。

二、他还要我说他只到吴祖光家去两次。

三、他和吴祖光没有关系。

四、还要我少扯王少燕。

五、不要承认有什么小集团。

说以前(指肃反)都是自己互相扯,扯坏的。

我说:“一、就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为肃反时被整发发牢骚。二、平时的日子都是在一起谈文学谈写作的时候居多。”

他说:“要谈就这样谈,千万别扯远了。”他还说:“我们平时讲一些没有原则的话,千万不能谈。”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胡扯的。”他还说:“这一次如果整到他,他非死不可的。”

(三)范景宇、刘莎、蓝光等六人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那天晚上聚集在我家里的有杜高、陶冶、胡秀玉、田庄、陈敏凡六个人。

我说:“别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呢?前年的大风大浪都经过了。总不会送公安局的。该怎样就怎样,怕什么呢。”

杜高说:“豁出去了。我什么也不怕,搞急了我们就给它来油的。(他要来“赖”的一点,已作交代。油即油滑意。)”我说:“来油的,对。开会开好了。随他去吧,反正也公布了。(指六人大字报)没有办法了,要是弄到了我,我也会来‘滑’的”。

杜高说:“弄得不好,我就拼了算了!”

我说:“你用什么拼?你拼得过蓝光他们?越拼越倒霉,只有忍了,忍了算了。”

杜高说:“算了,不干了。我卷铺盖回湖南(老家)去算了。”

我说:“明明讲好了整风的,学习提意见,这一下就不算数了,难怪有人说这是‘诱敌聚歼’哩。”

杜高说:“这叫整人,非整得你不准乱发表意见,我真怀疑这叫什么民主。前年搞了,我刚抬起头来,这又搞到我,我真伤心。”

我说:“我痛苦得很,这样活着没有意思了,人是经不住这几下子的。”

杜高说:“这堆人太凶了,打人往死处打。我的团籍也不要了,回老家做老百姓去,我写我的东西。”

杜高说:“共产党就会搞运动,一个接一个,这样搞下去就会失掉人心的。”

我说:“我很怀疑这样搞会不会得人心,以后谁也不敢讲话,憋

在肚子里。"

杜高说："大概是毛主席一看这些人的发言，就发了脾气了，湖南人的性格我是知道的。"

（四）反右以后，还有一次我和杜高由在国统区生活情况谈到了香港，以前，我们都在香港呆过，但不认识。他说："以前生活虽然苦些，但是可以自由自在，写东西不像现在这么困难。"我说："以前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他说："那时候出了事，可以跑，现在跑都没处跑。"他说他就是跑到香港的，在香港生活虽苦，但没有什么限制。杜高在这种言谈之间，是充满对香港生活的眷恋的。〔此处红铅笔批注：不民主，恋香港〕

（五）开始反右时，我的情绪很正常，认为反不到我，但批判到祖光时，我一方面紧张，一方面对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是小题大做无事找事，认为把吴祖光揪出来整，是为了凑数。大概是他平时爱说两句俏皮话得罪了人。

（六）吴祖光文章受到批评后，那天晚上吴祖光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时，我对他讲了许多非常错误的话。而且情绪也非常激愤，好像批判的是我而不是他。他谈田老是成心整他，我说："田老是诗人，晕的，他倒不一定要整你。一定是贾克，伊兵他们要整你，拖出你来做典型。"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七）我和汪明告诉吴祖光剧协五人小组道歉和安慰的事，我们心里非常感动……吴祖光说："感激得恨不得向他们说'请你们再整我一次吧！'"汪明答应晚上就联系抽《后台》的事。（按：时间是1957年6月23日）

（编者按：以下是汪明揭发杜高的材料的摘要）

（八）蓝光六个同志写了大字报，（按：系反右开始批评杜高等人的大字报）杜高说："看样子可整到我头上了，整吧！我来'油'的，要不，一卷铺盖不干了，再不然就自杀。……我非拼了不可。"

（九）杜高跟杨哲民说赞成罗隆基的倡议，组织平反委员会，我说："你看，你说了怎么办？"杜高说："我可以赖。"

（编者按：以下摘自鲁煤同志揭发杜高的材料）

(十)反右开始后，剧协曾组织看反右斗争的纪录片，杜高看后说林希翎长得如何漂亮。很帅。简直想和她谈恋爱。

五、其他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1. 王少燕谈到工作……常常用羡慕的口吻谈起吴祖光来，他说："总理都关心祖光，曾约曹禺、老舍、祖光一起吃饭。……我们还是沉着气，努力工作几年，先做些成绩出来才说得起话。"

(编者按：以下是陶冶对杜高揭发的摘要)

2. 杜高曾把一次团会的秘密告诉了汪明，叫汪明不要外说。(按：杜高系青年团员)

3. 汪明、杜高说："看样子我们只有加入民主党派了。"

(编者按：以下是汪明对杜高的揭发的摘要。)

4. 杜高说："自从我学俄文能看《真理报》后，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我就以'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按：指肃反中问他案子的人)。归根到底还是赫鲁晓夫救了我。"他说他恨透了斯大林，认为中国肃反搞得如此糟，完全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他认为剧协的肃反搞得很糟，蓝光、赵寻逼供……他曾想自杀。



(编者按：以下摘自王里对杜高揭发的材料)

5. 杜高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极表同情，说胡风的"意见书"是正确的(按：这是肃反以后说的)，说不少人都放出来了(如王亚平、刘大海等)，都要写文章恢复名誉，并说这是党犯了错误。

四年前我介绍杜高和江荧认识，据我所知几年来他们并没有接触过，今年四五月他们才熟起来。在整风初期，江荧写了一篇文章控诉东北鲁艺和美术出版社，说他被开除和辞职是受官僚主义的迫害。写好后江荧打电话要我去看，下班后我去找他，杜高也在那里，我看了文章后认为太长，没有提什么意见，杜高即打电话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推荐说江荧是有影响的青年画家，应重视，当时江托我将该稿带《文汇报》办事处。过了几天江荧打电话说文章已专电拍上海，他叫我注意报纸，(文

章并未见报)写文章事先我是不知道的,事后知道该稿头尾为杜高执笔,杜高是起了向党进攻的煽动作用的,杜高在我们之中扬言:"在别的方面不行,如果写东西我是可以效劳的。"这就是他拉拢人的手法之一。

今年四月因打乒乓球,我介绍徐淦与杜高相识,他们一见相投。杜高编了一本连环画《金耳环》,编好后第一个读者是我,第二个是徐淦,徐淦大为赞赏,说除结构稍加修改外,写作格调之高,连环画中很少有。徐淦写了一本《血馒头》,杜高要他拿到戏剧出版社出版。他们接触虽没几次,但相互攻击了肃反运动,徐淦说他自己的问题早已搞清,这次对他的斗争是受了冤。也说肃反的打击面大了,百分之五的数字是错了等谬论。

(编者按:以下摘自杨哲民同志对杜高的揭发材料)

6. 杜高过去一方面表示对团籍一定要保留,为了找工作好些,但一方面又表示轻视这个组织。

7. 杜高对杨哲民说,他认识一个很有权力的人,那人叫王少燕,说王告诉肃反审查他的人,说去了之后,那人员说"王少燕过去在白色恐怖下,就是我们党争取团结的人",说于是就停止了对王少燕的审查。又说:"吴祖光原来也审查了,但吴祖光有他的办法。"问到他的"二流堂",吴说:"这是夏衍给起的名字,你们要问,问他好了。"他始终一个字也没写。

8. 杜高说:"共产党就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就是爱点面子。"当我贴出那篇说剧协肃反缺点是主要的那一篇大字报时,他对我又说:"我拥护你的正义感,但是,你为何在我的名字下边加上同志二字呢?"

(编者按:以下摘自鲁煤揭发杜高的材料)

9. 在匈牙利事件时,李悦之和我主张应该坚决出兵,杜高说不应该,一出兵就是干涉人家内政。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的交代材料)

10. 一九五〇年,在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里工作的时候,王少燕就看中了我是他的臭味相投的朋友。以王少燕为首就在那时形成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四人小集团(还有萧崎、汪明),王口口声声说

他的"政治关系不在这里，而在中央统战部"。他是郭沫若、吴祖光、邓初民的好朋友，是和吴祖光一起从香港来。王少燕到北京遛了一趟，回来向我们散布史东山因为小青年批评他，一怒告到总理那里，总理便写信给电影局领导，制止青年批评艺术家史东山。还散布许多大作家如吴祖光等人不接受领导，超然于组织之上的流言蜚语。

11. 吴祖光原来就保持了一个有历史性的小集团，叫"二流堂"，包括一些著名文人，黄苗子、郁风、盛家伦、冯亦代、张正宇、丁聪等。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互相吹捧，在吴祖光家里，经常看见一些著名的艺术家。

第三部分　杜高等人的信件和文摘

按：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抄录了一些信件和文稿。目的是使读者更具体地看到这些小集团分子鸣放前后在文字方面的具体活动，其中包括为了翻案而准备递上去的万言书，在报刊上发表的对新社会、对肃反中的一些负责同志、积极分子的人身攻击的文章，及反右开始时，为自己的肃反结论公开辩护〔此句红笔批注：辩护理论〕、攻击剧协肃反是主观主义的错误等等的大字报。最后附录一篇杜高在解放前发表的反动文章，主要为了和后面一篇大字报相对照。

一、杜高给中宣部的翻案信（摘要）

（按：此信系杜高一九五六年九月请贾克同志转中央宣传部陆部长的一封万言书。从信中对肃反翻案问题和对小集团反动性质的诡辩的言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杜高今天所以向肃反运动肆行攻击，并积极从事小家族复辟活动，是必然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

根源的。而不是一种偶然的冲动，或仅仅是随声附和。

文内重点皆杜高原来加的，括号中的按语是抄录时加上的。所录仅信中的四分之一，系重点摘录。)

……在这封信里，我将极力对我发生的错误和不幸的事的一些看法写下来，希望由你的手转达给剧协和文化部的五人小组的领导同志在最后研究并确定我们的问题的性质时作参考，如果文化部和剧协的五人小组在原则上不能同意我的陈述，那么，请将我的陈述转达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

我将在下面由两个题目来陈述我的意见，这便是：

我为什么感到应该重新提出我的看法。

我们这几个青年的结合，我们的错误及其性质的确定。

(一)为什么重新提出我的看法？

第一……长久以来，我想到另外一些人，他们比我更年轻，他们还刚开始生活，他们心里充满了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无尽的爱。……在这里我不是想辩解我们的错误，不是的，我只是想说，我们这群青年，不管我们犯有多大的过错，你们应该把他们当作好人，当作可以改造和教育的好人！不要过重地惩罚他们！……不要以为加重了惩罚便可以促人悔改，不要在这些青年的一生中留下消极的精神影响吧……〔此句用红笔画出，红铅笔批：充满威胁、分庭抗礼教训口气！〕

第二，当我逐渐地……了解到，信任了这个运动的正义性与革命性，我希望领导这个运动的同志们切实地向人们证实吧。……即不……降低可能提高的思想高度，尤其不能把思想性质作为政治性质加以夸大。……尤其后者，它将带来对人民的伤害。……特别有害。(……批判斯大林文集所载苏联及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不幸的错误，应该是最有教训意义的)……世界上的人们中的确也还存在着……一些非政治的内容和性质的结合。……一般社会学公式不能反映出这种种不同性质的复杂性。

第三……我们曾经有些朋友……大多数不是共产党人……年纪一般都比我们大许多。他们早就……称呼我们为“小家族”……纵容了我们这个结合……运动之前……和我们无所不谈……他们

了解真实,真实便会激动他们反驳,仅仅是他们不愿或不敢将这反驳说出口来。……这种在政治上偏于落后的群众不是少数,将对他们的精神影响估计进来……是必须的。(按:这里“朋友”即指吴祖光、王少燕等人)

(二)我们的结合、错误、性质

……从革命观念看来,不管这种结合(按:指小家族的结合)带有何种重大错误,思想上何等落后……甚至腐朽,以及带给革命所要求的……团结性纪律性以有害的后果……应该承认,这仍然只是一种感情的,气质的倾向,青年的狂热爱的结合。……不是在从事某种反对派的活动。……一定……夸大为反革命派的政治性质,是没有必要的。……在阶级社会里……感情……倾向……友爱……都具有阶级的性质。……发生在革命范围的……错误……它都是有害革命,有益于反革命的。……这……一个逻辑……能用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而决不能用在法律性的判断上的。……法律性的判断……应依据……对客观事实作……全面地(正,反……)了解。……不仅凭被斗争者在恐惧……下片面的供词。

为了供领导上做全面了解……提出一些辩解的意见。……



A……说这八九个年轻人结合起来,是为了搞反革命……篡夺文艺领导权……我以为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极不成熟的……他们之中的……少年漂泊者(如我和汪明)……写过不止一篇……攻击旧社会的文章,他们把……希望寄托给了共产党……革命和人民。我们不是失败了的阶级和集团的后代……是普通人民。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条件。自然只是前提。

B 小家族是怎样形成的?

……因为我们大家过去的经历大致相同,到过一些相同的地方……有相同的梦想,从事相同的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友情的宝贵,谈伟大的志愿……倾吐人生的幻想……爱情的幻想。……我们从书本上知道历史上……许多大人物的友谊,鲁迅和许寿裳……契诃夫和高尔基……文化人有热情的气质,喜欢高谈阔论……无话不谈,饶有风趣的。……我们便从各方面受到影响……我们对共产党员作家怀着更为崇高的

心情……片断的言谈却实在可以反映出我们观点中更主导的一面,忽略了这个……是不公平的。……我们也谈了一些听到的……文艺界的事,包括某种私人的……“小广播”一类的事……即使是比我们有为……重要的人们(按:这里所指的即吴祖光、王少燕等人)那儿听来的……那我们也可以谈……我们是抱着好奇心……天真的意味也就更多些。……不应该因为胡风和他的门徒……议论文艺界的长短,为达到反革命目的,因而逻辑地推理……说我们也是“反革命言论”……是不公平的。

……我们有一句……口头禅“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即我们之间没有秘密),这是为了激起那些隐瞒了自己觉得难为情的事情的人说出他的秘密来。……多半指的是……对女同志眷恋的秘密。……把这句话确定为我们小集团遵守的一条政治准则……多么不公平呀!

……嬉戏地,天真地称我们的结合为“小家族”……这里表现出我们当时……儿童般的狂喜的感情。……取闹的热情是我们性格和气质中极为本质的……特征。可惜,这种非常生动的人的天性中的东西,很难,也不会写进肃反的材料中去的……在肃反结论中……没有看见它……也不公平。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对蔡亮说过这样的话:“努力吧,将来总有一天到我们老了的时候,再开文代会时,我希望我们不仅都成了代表,而且你代表美术界,杜鸣心代表音乐界、我们代表文学界坐在大会主席团的席位上……多么美好呀。”……我们只是为着鼓励上进,现在成了“十年后篡夺文艺领导”的……罪证。……这也是对胡风的那一套逻辑设想化的……强加到我们身上的结果。

……我给汪明的信,不幸……竟有这么一句:“让我们争取入党吧,我想在工地争取,我觉得我们中如果有一个人先入了党,那么大家入党就方便多了……总觉得……组织不十分了解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先入了党,那么他便可以向党多作一些具体介绍。”……肃反材料写的“策划如何打进共产党内”来,这是从怀疑出发的一种……危险化了的臆测。……以为可以从胡风的信中摘录成一本……反革命材料……从我们的信中必定也要割裂它的全部精神,抛却它的主导的本质……专门挑出一两句……有错误的

话来构成……罪状，这除了使人颤抖，还会有别的什么结果呢？〔此句红笔批注：极尽诡辩之能事，充满对肃反处理的诬蔑，必然起了翻案野心〕

……我必得专门写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是引出这次问题的焦点。一九五二年……认识路翎的……当时……他的名声很大。……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印象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等。到我从外地（按：五四年杜到四川工地）回来时，正当批评《文艺报》……我碰到路翎……正是他要去文联开会，他便提到吴雪过去说过的一句话……问我还记得不？他说："那你们可以证明，我不是捏造。"我说："当然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吴雪确曾说过。"（按：当时杜高、汪明说路翎的发言是为青年出了一口气）……但事情还有……更主要的一面……不过几天（按：就在这几天，形势有着很大的变化，胡风已开始退却）……路翎的……报告经陈白尘同志出面调查……我们便写了一份本着真实情况为精神的书面材料。……证明了真实本身，而没有帮助路翎证明他的歪曲……不就是对路翎的一种最有力量的反驳吗？……（这份报告在六月号作家通讯发表）不幸的是，肃反……负责同志……不愿意去参考一下它。〔此句下红笔批注：甚至充满了对肃反负责人的嘲弄〕……我觉得这是不细心……不公平的。

……我在这里陈述了我的意见和要求，我的全部目的仅仅是在要求领导上不要将我们的错误性质夸大为反革命的政治性质，要求根据它的实际，得出客观的、真正能反映出这个错误的思想性质的结论来。……

杜高

十月十四日

二、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大字报）

（剧协大字报）

大家都知道我们剧协有一位当代最权威的理论家，我们不久前还读过他给两卷现代最优秀的独幕剧集写的序文——这就是赵

寻同志。他目前正在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这位权威理论家的作品我们也读到过两个：一个是根据苏联作品改编的独幕儿童剧《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这个剧本在印行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就将苏联作者的名字省略掉了，改为"著"。另一个作品也是独幕剧，叫《人约黄昏后》，是根据一篇通讯或小品文改编的，但发表的时候也未见说明。我们不禁奇怪，赵寻同志就是凭了这么两个作品的艺术实践经验就一跃而为指导千百青年作家的权威么？我们想问领导，这里是不是存在着宗派主义？

《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原是一个优美的题目，希望赵寻同志不要用来当作对自己的讽刺才好。

唐湜　杜高

三、空头作家（摘要《北京日报》）

陶冶

新中国恐怕不会有什么样的工厂，那里的工人可以不干活……然而，在我们这充满劳动诗意的国家里，竟容忍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八年来可以拿着高薪，住在国家为他们安设的舒适的寓所里，一切琐事都不操心，看报、闲谈、午睡、逛琉璃厂，坐在招待席上看戏，然后打哈欠。你会惊讶地问我，这是一种什么人？我告诉你，这是被培养了七八年的一些"作家"，他们没有写出一个字，没有作过一篇短文。看样子，这群"作家"还要这样一直被培养下去……

……

比如，我认识一位作家，十年前他曾写过一个独幕剧，后来他住在北京城，小小的作品享受他的声名，八年来，他坐在各种有关创作的会议席上，他慵倦了，不再想到自己的作家的职责。他发胖了，据我知道，国家按月给他二百余元的工资。这使我想到一位老爷式的饱食终日的浪费。

再比如，我认识另外两个作家，他们就连小小的独幕剧也未曾写过，八年前，他们工作单位的领导上轻信了他们的愿望，认为可以被培养成为作家，却习惯了作家的称号和无所操劳的生

活。……我觉得，为什么通常使用的“试用期”制度，不该适用于这一类的作家，他们被试用了八年，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努力和才能。于是，这使我想起一种对才能的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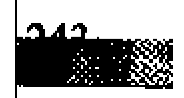
那么，我建议：不能让那些饱食终日的人继续浪费国家资金，也不能让那些没有理由被“培养”的作家再无限制的被“培养”下去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北京日报》三版）

四、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摘要《新观察》）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七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安东·契诃夫写了一个故事《小公务员的死》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知道读者可曾读过这个短短的、辛酸的、悲哀的故事？……我们也这样开头吧。）一所大剧院里挤满了上千的观众，他们是工人、干部和穿着花朵般漂亮服装的男女青年。今晚剧院里演出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的一出小人物的悲剧《万尼亚舅舅》。……

在后台的一间小化装间里……扮演乡村医生的演员正对着大镜子粘他的淡黄色的美丽的胡髭，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子……原来这位高大身材的、潇洒的中年男子，除了是一位著名的演员之外，而且是这个大剧团的团长。所以演员们总习惯称呼他“章团长”。……



推门进来的是一个管服装的后台职员，一个充满了幸福感情在观众看不见的后台工作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把捧在怀里的西装和长统靴送到男演员的面前，怀着幸福的感情对他说：“团长，换服装吧，快开幕了。前面观众早坐满了，门口有些观众已经在排队买明晚的票了。我干了半辈子戏，还没有看到过有观众熬夜买戏票的哩！这出戏真是轰动啦！”男演员漠不关心地“唔”了一声，没有看他……“今晚部长要来看戏的，来了么？”他一面跷起了脚。脚尖刚好挨到蹲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的鼻尖前面。管服装的职员便两手捧住他的脚，从那脚上脱下袜子来，换上另一双袜子。男演员打完了领结，顺眼瞧了瞧脚上的袜子。可是忽然间，（正像契诃夫那个故事里说的：在小说里人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叫人惊讶的事啊！）他的眉皱起来了，他脸

上的笑容逃走了，他的嘴唇抖动了一下，便从那一双热情的手心里把他的大脚缩了回来。这个强烈的动作使蹲在他面前的这个矮小身材的人足足有一分钟呆住了，说不出话。

“今天怎么啦？我的那双黑丝袜呢？”男演员用他粗鲁的中音问。

“那双黑丝袜穿脏了，摸在手里都是滑的，我拿去洗了……”

男演员狠狠地瞪了一眼。看样子他要发脾气了。

“是谁要你拿去洗的？你请示过我吗？你……”

“团长，袜子穿得太脏了……换双袜子，套在靴子里，观众看不见的……”管理员低声地说，垂着头。

“岂有此理！”男演员猛地挥了一下手，身子往软软的沙发背上一靠，用懒散的声调说，“没有黑丝袜我怎能演得好戏呢？今晚……我不演了。”

蹲在他脚前的这个服装管理员听了这话，脸色变得苍白，抬起头来用充满哀求的眼光望着这个结着花领结的、淡黄胡髭的、美丽的、契诃夫心中的善良的小人物。

“团长，您别生气，将就一晚，我……”管理员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

“要是戏演糟了，你要负全部责任！”团长的声音变得严厉了，他那用深褐色油彩衬托出来的忧郁的眼睛现在变得愤怒了。

管理员蹲在他的脚下，嘴唇颤动着。……

幸而男演员站了起来，套上了破靴子，披上了那件破旧的俄罗斯乡下医生的大衣，昂头匆匆地走了出去。屋子里剩下的就只有他——这个蹲在地板上的，曾经怀着幸福的感情在工作，而现在充满了惶恐和悲伤的管理员了。……他将近四十岁。在旧社会的小剧团的后台打了十年的杂，后来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五个孩子，刚解放的时候失了业，后来才进了这个国营的大剧团。他的月薪五十元。另外每月得到补助金二十元。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每天他是第一个到后台来的，散戏后等演员吃完了夜宵他才回去。他生得矮小，眼角上印着一条条的皱纹。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幸福。

这时候，他独自留在化装室里，后台的灯暗了……只是他的心

老在胸膛七上八下地跳动。“啊哟，今晚的戏可出不得岔子哟！”他的嘴唇变得像一张脆弱的薄纸一般颤动，额角上迸出了冷汗，在暗暗的灯光下，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影子。

观众厅里爆发了热烈的喝彩和掌声。后台的灯亮了。……管理员挨近男演员身旁，把一件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一面低声地切切地说：“团长，请您原谅我，我实在不知道您没有黑丝袜就演不好戏，我向您检讨……”

高大的男演员侧过脸来望了一下身边的这个人，好像忘记了是怎么一回事似的，嘴里轻轻地冷冷地“唔唔！”了一声，转身就走出去了。……

管理员呆呆地站在大镜子面前一动也不动，这一回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恐怖的表情：“啊哟、团长真的生了气，他到现在还不肯原谅我……”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浸满了他的脸。他用一只冰冷的手去摸了一下，这个五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在后台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自己半生的管理员禁不住地像孩子一般哭起来了。……



后台的灯又亮了。男演员带着靴子的“咯咯”的响声走进化装室来……管理员用力捏了一下自己的手，一个指头的关节响了一下，他鼓足了勇气走到男演员的身旁。

“章团长，那双黑丝袜的事……我，我今晚回去就写一份检讨，明天，明天一早送给你……”

男演员仿佛正在回味自己一桩快乐的心事，忽然被这个声音打断了。这一次他侧过身来，恶狠狠地盯着这个苍白着脸孔的矮小的人，“你这个混蛋！”他的眼光这么说，他当真生气了，他把烟往地上一摔，用暴躁的声调吼道：“你到底怎么啦？你有完没有完？你是不是存心来跟我开玩笑？还是存心来破坏我的创作情绪？你说！”说罢便愤愤地冲了出去。……浑身颤栗的管理员……他哆嗦了好大一阵子。啊哟，团长一定会要处分我了。他会在大会上批评我，他会宣布取消给我的补助……再去求他一次，啊哟，我怎么知道团长没有黑丝袜就演不好戏呢？……”他在心里诅咒自己，恼恨自己。……

这时候，男演员也进来卸装了。……管理员走过去，蹲了下来

去脱下他脚上的那一双破旧的大靴。他的两手重又捧住了那只大脚，眼光一下又触到那一只袜子上，他忽然又害怕得周身麻木，呐呐地说："团长，您误会了，我没有想过要跟您开玩笑，更没有存心来破坏……那黑丝袜，的确是穿脏了，我就……"

那只大脚猛地又从他的手心里缩了回去。

……一个穿西装的矮矮胖胖的副导演推开门走了过来，门外站了七八个青年男女。……副导演笑着向年轻的人们介绍："喏，朋友们，你们不是想见见戏里的那个小人物，那个正直的、人道心肠的乡村医生么？"……小化装室里重又寂静下来了。夜深了，后台的灯暗了。只有这个后台的小人物还蹲在那里，像一个小小的影子，仿佛团长的那只大脚正压在他的胸口上。

（原件标有：物证 019 号）

五、单纯和美及其它《长江文艺》

——读戈尔巴托夫的剧本《上一代》

杜高

为了怀念和敬仰，最近我又重读了已故作家戈尔巴托夫的剧本《上一代》。觉得很亲切，长久地被感动着。隔了许多天，还时时想起它。现在回忆起它的情节来，才发现是这样简单，编不起一个有趣的故事。它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也才知道，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示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写一个师长在卫国战争前线的防空壕里接见了两个女孩子，她们请求送过前线去执行特别任务。师长注视着女孩子中的一个，显得十分激动。他认出了这是娜塔莎的女儿。娜塔莎，是他年轻时候一块儿为着苏维埃政权斗争过的亲爱的同志和朋友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青年团员，他们的血流在一起。他爱娜塔莎，并且忍受过爱情的痛苦。在他一辈子里只有过一次向别人倾吐出那年轻心里的爱情。后来，娜塔莎英勇地牺牲了。二十年以后，在新的战斗里，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英勇的女青年团员，梳着同样的两条辫子，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声音，同样

的快乐，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师长想起了过去，十年、二十年以前，快乐、青春、和痛苦；理想和不顾牺牲的英勇的一生。这时候，在他的面前青春正闪耀着光芒，那在他一去不复返的东西，重新属于了他。他振奋、激动。事业和斗争都在继续，甚至青春的美也在继续。多么愿意和可爱的女儿情深意长地谈谈过去：一九一七年，一九二〇年，或者，谈谈她的父亲和母亲遭遇到些什么，他们怎样考验自己，怎样相爱的呢？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就是写的这些。也就给它取了一个单纯的题目：《上一代》。

上一代的事业被第二代人承继，父母们疼爱子女，子女们把父母的英勇当作自己的榜样和骄傲，这是多么容易明了的现象呀。但是，这个爱情的联系经历了一条艰苦的战斗的道路，需要牺牲，需要顽强地抵抗痛苦。戈尔巴托夫的剧本并不在仅仅证明这回忆本身的价值。它没有半点对于个人遭遇的惆怅和追悔的感叹，也没有教训的腔调。这个回忆自始至终骄傲和快乐，充满了爱情，甚至充满青春的。戈尔巴托夫也没有去展开对于二十年代宏伟的历史斗争场景的描绘，因为那也不是他的目的。但却给我们画了一张亲切的素描，单纯得就像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一个孩子在听伯伯讲他妈妈的故事。戈尔巴托夫的剧本要证明的是：父母亲和子女，这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联系。意志联系着，精神联系着，生活由一代辟开了最初的道路，由另一代承继，发扬，推向更远的前景。唤起孩子们更加珍贵父母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会更勇敢地进取。——虽然，戈尔巴托夫并没有在剧本里这样来教训我们，我们却自觉地服从了这个结论。并且感受到艺术家这一颗美好心灵里激动着的爱情，深信他的思想的深远。戈尔巴托夫是从人民的生活中血肉地感受到这个深刻的意志和爱情的联系，他才能给我们写出这个热情的剧本来。我们读着它，深深地爱着上一代人，不管是伯伯或妈妈，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们现在一样，天真和富于幻想，悄悄地爱着一个人，怕说出口来。他们也有过快乐和伤心，希望和失望。但是他们却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创造着最伟大的历史事业，不顾困苦和牺牲。那正是伯伯和妈妈呀，如果是我们，就不会为了一个小问题也要争论老半天了。但他们哪有我们这样幸福和自由呀，为了革命，那时候连恋爱也不准讲

呢。……戈尔巴托夫写的正是平常的，活生生的人；平常的，亲切的生活。没有采取公式的手法给人物安排英雄性的举动，也没有给他们插上英雄的标记，更没有把生活装扮成复杂得不可理解的样子，但我们却看见人们的可爱的心灵，受到他们精神力量的强大影响。看到生活是怎样地被创造。艺术家的权利是叫我们看到真实啊，是给我们以热情和力量啊，却不是强迫我们去听他的教训。不是为着教训人们，而是为着真诚和爱，艺术家才能被平常的人间关系所感动，才会充满诗意地描写人的美，扩大和提高它的价值。

戈尔巴托夫的剧本提醒我们，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我们是多么希望读到一些有诗意的，亲切的戏剧呢！我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的。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的纠葛，给人物硬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因此，我们作品里的时代和人民的伟大往往不如他们原来那样朴素和诚实；而恰恰是朴素和诚实，才使人感到亲切。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难道不正是反映了歌颂了时代的伟大和人民的伟大么？但他不是借助观念而是依靠纯朴和真诚的内心的感动。他没有创造伟大的事件，相反地描写了人人都懂、都能理解的小事。他描写的是人、真实的人，而不是描写观念。他是从人和人之间的同志的关系中，工作，友谊，爱情中反映出时代的感情，时代的斗争和命运。这些关于人的友谊和爱情的描写丝毫没有使剧本渺小和琐碎，也没有使人们创造历史的革命精神黯淡下来，反而使人们的精神得到了充分地发展。我们不能相信一些头脑简单，没有爱情和幻想，没有快乐和痛苦的公式化的人物能承当改造社会的事业。而我们的许多作者往往为了企图更方便地教训读者，便剥夺了作品中人物自己的深厚感情，甚至连他们的青春和自由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命令他们做各种各样安排好了的事来完成故事的发展，说各种各样堂皇的话来表白自己的高尚和光辉。作者不是以真诚对待人物，爱他们，尊重他们自己的个性。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的人物就像他们原来那样单纯和美好，毫不做作，毫不掩盖自己的天真甚至幼稚，也不强迫自己尽说表示正确观念的话。

但谁都爱他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关心他们的胜利。——因为他们真实。

戈尔巴托夫的剧本和我们的许多剧本不同，不是围绕一个工作和生产上的对立意见的争论来展开情节，然后让双方代表出场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使正确的意见受到许多阻碍后终于得到胜利。戈尔巴托夫的剧本是非常单纯的，没有提出任何争论，只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在过去，怎样生活着。我们被人物的整个精神吸引住了，而不是被人物所代表的某一个意见所吸引。我们被他们的精神和生命力吸引了，用不着争论，我们便知道他们的倾向。

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并不是一片散漫的生活，因而就没有剧情的复杂性和生活的矛盾冲突的深刻性。正相反，冲突在这里不是以表面的形态体现出来。我们从人物的每一个前进中，从人物的内在的精神活动中，自我牺牲的崇高举动中，都看到冲突的深刻意义和紧张性。在第三幕娜塔莎作出英勇就义的决定上面，那母亲心里的爱的痛苦和同时是为爱而牺牲的欢乐，这两者的交融，表示着一场多么严重的壮丽的斗争的胜利。在梁比尼忍受对娜塔莎的爱情的心中，又表示了个人与集体，高尚和庸俗的感情相互间的多么紧张的冲突和庄严的社会内容的深度来。而恰好在许多情节曲折的剧本里，冲突在表面上似乎很紧张，很吸引人们，但因为缺乏社会内容的深刻性，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它们。特别在冲突仅仅被表现为肤浅的争论而不是展开在人物的精神活动里时。戈尔巴托夫的剧本在这一点上也提醒我们，对于冲突的把握是只有依靠艺术家善于辨别生活的发展，和对于人们隐藏着的思想感情的深刻了解上面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作家开辟了表现生活的最广阔的天地，要求作家采取多种多样的活泼的形式和风格反映生活的真实，理想和无穷的美。我们希望听到雄浑的合唱，也同样喜欢听一支抒情的小曲。我们希望看浓丽的油画，也喜爱一幅朴素和亲切的素描。我们希望看到伟大斗争的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也喜爱纯朴的描写亲人和爱情的作品。

艺术最忌冷漠和机械。洋溢着热情和崇高理想的作品，一定

会感动读者，为读者珍爱。那些只顾着简单的教训读者的作品，我们读一遍就够了。崇高的热情和理想却能鼓舞我们的心，引导我们向生活作更高远的追求和奋斗。我想，戈尔巴托夫的《上一代》再读十遍也不会使人厌倦，原因就在这里。

附记：《上一代》的原名应译为《父辈的青春》。我们有的译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司马译的。

（《长江文艺》1954年第6期）

（原件标有：物证019号）

六、我们要发言（摘要）

汪明、杜高1957年7月2日剧协大字报

我们要发言！

我们有必要从自己切身的感受和一些具体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恶毒攻击。他们……“建议成立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凡委员会”。

我们说：只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才会为这些疯话喝彩。……

我们是两个在贫苦中长大的人……（当我们挨饿受苦的无依无靠的漂泊求生的时候，正是今天的某些右派分子的头目做达官贵人的时候）从那时起，共产党就是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太阳。我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给了共产党。解放以后，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光明……我们对党的感激和热爱是无尽的……参加革命后我们犯了一些思想上的错误，肃反运动时对我们进行了全面审查，这从整个革命利益来看是应该的。

当运动结束以后，我们对领导有过一些抱怨，精神上感到压抑……但是整风开始后五人小组……向我们道歉，说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感动得流着眼泪向他们道出心中的感激来。……

但右派分子却利用党在肃反运动中的个别偏差来向党进攻，这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七、沉默的祈祷(湖南伪《中央日报》)

我不能用庸俗的观念欺骗或炫耀自己的，我一向不会用美丽的词句去歌颂别人的光荣，尤其是伟人，我想出于心底的敬仰和真诚的祝福更会比庸俗的歌颂诚恳些，所以，在一个大人物面前我只有“沉默”着不发声，而心里却给他祈祷。……

因此对于一个“能士”我所应该在他身上插满着花朵。给他歌颂，给他建筑学校，培养新的英雄，更为他流的血和汗建成一座灿烂闪光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应该的，为了给一个真正的战士的真诚的慰藉，像我们这些被享受这种血汗取来光荣的人民应该在这一天大声的唱哑自己的嗓子，会说话的人不应该再沉默，会写文章的人手都应该写酸……在这一天，全中国的人民也都应该站起来，更应该浮出从来没有过的喜悦的微笑，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是值得笑的……

然而从报章读到“各地纷纷筹备主席六十寿诞热烈献效运动……”的消息，也看到了现在一些人整天忙碌的筹备，我心里却又起了一种奇异的感情，啊！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这是巨大的功绩，激起了人们的反响，这是光荣，照耀了人们的眼睛，这是如椽的大笔，写出了光辉的历史，这是……总之，这是出于人们无上的爱的。



纪念庆祝，我想是出于灵魂深处的诚恳，然而真诚要怎样才能表达？这真诚要怎样能由心里倾泻出来的？执着秃笔来写文章？手兴奋的已经有点颤了。我去叫喊？然而我的声音太渺小了，于是我终于……

所以我想真正诚恳的人只有沉默了，用心底深处的诚意祝福和祈祷，这样作为一个伟大的战士的心里会得到更深的慰藉，因为，这种不发声的闪光的诚恳是会保持得更长久些。……

一九四六年十月长沙伪《中央日报》“祝寿”专刊

极右分子杜高原始材料

黎维新检举杜高

据报上揭露，杜高是吴祖光反党集团的重要分子，这使我回忆到他的一段谈话，可提供组织上作为进一步审查他的问题的参考：

今年四月底，我到北京有关出版社参观和学习的时候，曾去看过杜高。第一次是一天晚上去的，他请我在馆子里吃晚饭，除和他闲扯关于他的婚姻问题之外，我曾问他最近写了些什么，他说没有写什么，只是搞点翻译，并准备埋头多读一点书。由此触及他谈到有关肃反问题。他说肃反以后，自己和党的感情疏远了，明知不对，但感情上仍然如此。又说，"自己是个超龄团员了，准备退团。"我劝他不要退团，说在团内可以受到组织的教育。还劝他：肃反问题只要组织上作了宽大处理，你也就不必去计较它了。他说："有罪恶的人才会感到是宽大处理，没有罪恶的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接着又说了这样的话："肃反是搞宽了，这在当时斯大林的理论的指导下，是难免的。"（这句话大意如此。他所指的斯大林的理论，就是我们的事业愈发展，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他把党对肃反运动的正确领导，说成是在斯大林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冤枉了不少的人，这显然是对肃反运动的一种污蔑。随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情绪不对，改口说：我真佩服有些老党员，他们过去在延安也受过审查，可是他们对革命仍忠心耿耿。并举出他的在北京某部任处长的表姐（?）为例，说他表姐是老党员，曾经这样告诫过他："传惠（杜高原名），你的思想感情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真为你担心。"我说：你这位表姐的话是对的，你真应该警惕你自己。我因察觉到了杜高的思想感情不对头，除了劝他之外，没有附和他上述意见，也没有谈我自己的肃反问题。



此外他还谈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他说他听到过毛主席报告的录音。我说我们出外参观，只在临走之前

听过一次简要的传达。我当时很羡慕他能够听到毛主席报告的全文。他在讲毛主席的报告时插进了这样一句："毛主席在报告里也谈到胡风。"我问："谈胡风的什么？"他说："毛主席说要不是胡风在政治上反革命，他在文艺问题上的一些见解，也还是可以争鸣的"。又说："路翎最近要放出来了，他的家属最近得到了通知。"我不知道他讲这些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有意歪曲，也一并提供组织上研究。

我记得：杜高还问到汤炜的表现怎样(汤炜现在湖南省文联工作)，他和汤炜还保持有通信联系。他说在肃反时组织上给他看过一份材料，那就是汤炜曾加入过特务组织。他问我是不是这样？组织上对汤炜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要是汤炜的问题严重的话，他不打算和他通信了，免得日后惹一些麻烦。我说：我对汤炜的问题不了解，肃反后，他仍在《新苗》工作，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据说汤炜在大鸣大放中有问题，汤炜和杜高之间的关系怎样？组织上应加以注意。)

我仔细回忆，我和杜高第一次会见的谈话内容，主要的就是这一些。当晚，他和我谈过一会之后，就带我去看了看我小学时期的老师齐新和李融中(杜高的姑子)，在她们那里坐了一会，我就回到寄宿的地方了。第二次我去会杜高，是齐新托他把一盒"鹧鸪鸟蛋"转交给我，要我带回长沙送给李倩士先生(现在湖南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工作)。我到他那里已是九点了，只稍坐一会就走了。他当时曾问我们出版社要不要翻译稿，他准备翻译一点东西。我推脱了，说我们出版翻译的东西很少，你最好就近向北京的有关出版社投稿。我问他过去出版的几本书可否送给我看看，他推说不成样子，不肯送。最后似乎情不可却，送了我一本《战斗和战斗者》。临走之前，我曾要求他送票给我看戏，他问我愿看什么人的，我说想看新凤霞的。他说："那好办，我和新凤霞熟极了。"边说边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新凤霞送给他的照片给我看，那照片上写着"杜高弟，嫂新凤霞赠"。我当时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竟以"弟嫂"相称。现在明白了，原来杜高是吴祖光小集团的干将，他们"称兄道弟"是有他们小集团的"规矩"的。后来，杜高打电话问了问，知道新凤霞最近没有戏，我才没有去看成。

以上我和杜高的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肃反的不满，并



把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污蔑为"搞宽了"，是"受了斯大林的理论的影响"。杜高之所以堕落为吴祖光集团的一分子，是和他敌视肃反运动、敌视新社会这一极端阴暗、反动的思想分不开的。

和杜高分别之后，我没有和他通信。

以上情况属实，请组织上再予以考察。

黎维新

该同志曾因与胡风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列为肃反对象，问题已基本搞清。这次整风运动中未发现什么问题。所写材料可供你处参考。

湖南人民出版社人事科（章）1957

杜高给江荧（右派分子）改写的向党进攻的文章摘抄

剧协整风领导小组

孟超、陶毅同志：

我处右派分子江荧在鸣放期间写了一篇极其恶毒的向党进攻的文章，该文经你处右派分子杜高修改，江荧直到最近才将经杜高修改的原稿交出。现将打印的该文及抄录的江荧交代的材料转给你们。并将该文原稿转给你们看一下，请摘录后将原稿退还美协整风办公室李寸松同志。

此致

敬礼

美协整风办公室

二月九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人事室（章）

杜高材料.

（按：此材料摘自杜高帮助右派分子江荧写的向党进攻文章：《当作历史教训来看》。自第二页起凡蓝笔均系江荧原文，凡红笔皆为杜高所加或改。——陶毅）〔整理者注：括弧内为杜高删去的，楷体字为杜高加上的〕

我想在今天写下我的九年来的遭遇。这些事现在都已成为历史了；熟识的同志们都不愿提起它，我自己也把它埋在心里。在我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受到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讲话的鼓励和温暖时，我是不会想到要写它下来的，我并不是为了控诉某一位领导同志，也不是为了趁着党进行整风时来攻击某一个党的组织过去的错误。不是的，我是想把我的遭遇作为一个教训提出来，并且我深信，今后不会再有第二个青年经历像我这样的可悲的遭遇。而我自己也将会从此彻底地抛弃掉过去留在心灵上的痛苦的负担，紧密地依靠着父亲般慈爱的党，为党的伟大理想献出整个生命。

(以上是杜高在文前加的开场白)

……生活抛弃了我，使我无容身之地，我将向哪里去呢？难道我只有被逼着毁灭了自己的生命才能结束这个绝望的局面么？(所以曾经萌发了毁灭自己的念头，但是，死，虽然是一种脆弱的表现，毕竟也还是需要勇气，更何况)〔括号内是杜高所删〕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刚刚满二十岁的青年，(生活对于)我才不过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生命终究还是宝贵的，我又想着能够打开一条生路，重新)还没有为祖国的伟大事业做出一件工作。我要生活下去！我要打开一条路走！于是我只好把身边的一切都卖掉了，又得到一点好心的同学的帮助，(好容易才)总算凑到路费，还清了伙食债。

× × ×

这样，我的一切生路都被他堵塞了，(我在绝望之余，曾经产生了一丝非常危险的念头，我想，既然我要为革命而革命不要我，我也许可以到香港去谋到一条生路。但那究竟是行不得的绝路啊！连产生一丝丝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我又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当时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还有没有一个青年要求生存、要求工作的权利！



我想，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姑且说)即使他(是)有(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呢)，这些("好心"的人们的"好心")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员的"帮助"、"教育"、"考验"(几乎使一个年轻的生命走上了)把他逼上毁灭的(道)路。这是多么(地)令人难解啊。(痛心，而且看起来又是多么缺乏人道主义的精神啊！它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不是很清楚的吗？)

× × ×

……另一方面，因环境有了改变，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东西，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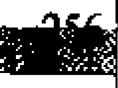
的(一种自满情绪又)便滋长(起来,使)是一种带有赌气意味的骄傲,想用工作的成绩来为自己争一口气。我的心情(经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

× × ×

……在《人民日报》和华君武同志的帮助下,我才慢慢地从绝望和痛苦中重新(创作了一些东西)振作起来,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恢复一个青年人的朝气。日子过去已经很久了,在工作中我已经逐渐淡忘了过去的悲痛,而且党的组织和我们可爱的社会、正直的同志们也都在长期的工作中认识了我的真正的品质,排除了对我的疑虑,巩固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我)现在我已经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个(所属的)职业画家。

……(回家后)也再一次地感到(前途茫茫。)满心的伤痛和绝望。回想起自己几年来的遭遇,感到有如经历了几个世纪,自己都不敢想象是怎样(熬)生活过来的,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也完全失去了)再也不敢有什么信心。

× × ×



……今天,(在新的形势的鼓舞下、才使)我有勇气把我过去几年来的遭遇(提出申诉)写出来,是因为我也想到,经历了我这样的遭遇的青年可能还有一些。而这种遭遇又是多么深刻地违反了我们党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我觉得我的九年来的个人遭遇可以当作一个历史教训提出来,从这个教训中可以引发一些同志——尤其是党员领导同志的深思,过去他们是多么粗心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啊。(同时,我也想到,有像我这样的遭遇的人,恐怕也不止我一个人,这和今天的时代,和我们的党一再所说的要细心的爱护和教育青年一代的精神是违背的,而如何来挽回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值得考虑的。)

江荧

一九五七年五月

——反右期间:"小家族"互相揭发和杜高自我交代的材料摘编(摘编者:范景宇、陶毅、王命夫、黄悌、颜振奋)

杜高交代王正的反党言行

(一)我最初接触王正,正是大鸣大放后,青年剧院的整风会开过以后。王正那一向是特别活跃的。他常到大楼来,找《文艺报》的人谈稿子,就是他攻击刘芝明同志的那篇公开信。关于这篇文章他谈了下面的一些话:

1.“青年剧院的座谈会,许多年受压抑的人都站起来说话了。许多人一边流泪一边诉苦。”他说他自己就是含着眼泪在听那些发言的。他举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吴雪穿黑丝袜的事,一件是路曦穿拖鞋的事,他愤愤的说:“这些事简直听了吓人,万想不到新社会还有这许多黑暗!”

2.“剧院的同志们被官僚主义压苦了,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说心里话,但是刘芝明却来打击群众的情绪,我认为这太使人气愤了!”

3.他说,他的文章一送到《文艺报》去,立刻就受到了编辑部的支持,但是《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却要删改(这是《文艺报》记者姚澄莹告诉王正的),据王正说,《文艺报》第二天派了一个记者来剧院找吴雪,在门口碰到,吴雪当时很慌张,想躲开,而且支吾地说:“和事实有出入。”王正还说,刘芝明很紧张,接连给吴雪打电话,问王正是何人,要查对事实,等等。结果,《文艺报》记者支持王正,对王正说:“文责自负,我们照发。”结果文章就登出来了。但还是被《文艺报》领导上删节了一些,王正极不满意。(过了两天,王正说,《文艺报》编辑部把他的文章原稿当作大字报贴出来向领导提意见了。)王正说,刘芝明最怕名字上报,刘芝明说,整风他的名字已上过三回报了,这比肃反时喊喊口号不知道要凶多少倍。王正说,我的这篇文章是会得到剧院同志的支持的,大家有一肚子的苦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4.他又写了另一则直接攻击吴雪本人的文章叫《黑丝袜》交给《文艺报》“文艺茶座”发表。他到大楼来送稿,碰到我,便将这文章的大概讲给我听,最后一句记得是:“这就是戴着乌纱帽来演契诃夫小人物的吴雪同志。”我当时听了他讲的这件事以后,情绪上受了很大刺激,便告诉他我要用这题材写一篇小说(即后来的《契

诃夫悲剧的幕后》一文），他当时很支持。他把文章送出后，还有些顾虑，他对我说："吴雪一定会报复他的。但是不怕，这些事应当揭发！"

5.《文艺报》内部当时正向张光年提意见，便组织王正写一篇批评张光年教条主义理论的文章，王正答应下来了。《文艺报》答应供给他全部材料。《文艺报》也要他批评赵寻，他认为赵寻不值得批评，只要批评张光年就等于批评了赵寻，因为赵寻的理论没有一条不是张光年的。我当时也是鼓励他写这文章的，并要他写完后给我看看。

6. 在谈到赵寻时，他是非常不满的，同时是非常看不起的。他说："这个人凭什么写序言？就凭了一个《人约黄昏后》和一个《小苍蝇变大象》？这样的作家太可怜。完全是凭了张光年的提拔。"

7. 王正还谈到赵寻、蓝光做人是极险恶的。他说，赵寻是一个窝囊废，怕老婆。蓝光的一个剧本给《剧本》月刊，退回来后蓝光大吵大闹，赵寻不敢说一声。

8. 王正说，蓝光虐待赵寻母亲，赵寻的母亲经常坐在院子里哭，倾诉对蓝光的苦肠。

9. 王正说，贺敬之和赵寻、蓝光之间的矛盾深刻得很，赵寻把贺敬之看作眼中钉，因为贺敬之比他有才能，有学问，妨碍了赵寻。肃反时赵寻想整贺敬之，整得很惨。冯恺（贺的爱人）对王正说，他们和赵、蓝住一院，但是见面连招呼都不打一下的。

10. 王正说，整风开始后，剧协贴了创作室的大字报后，蓝光在院子里骂："就是范景宇、刘莎害了我们的，没有他俩，群众也不会贴我们大字报。"当时，冯恺坐在一边实在气不过了，说了一句："人家刘莎也写过一个独幕剧的。"意思就是指你蓝光也不过就是写了那么几个作品而已。

11. 王正攻击青年剧院的党员，说剧院就是毁在罗伯忠、沈贤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手里。

12. 王正说，青年剧院宗派严重，许多十几年的演员不推荐入剧协，但是连洪纬这样的人都推荐做会员。他还谈了一个青年演员郭常教的事：她生孩子剧院让她住在楼梯口的一个小格子房里，

根本不理她，王正气愤地说："这就是人对人的态度！"

13. 王正攻击肃反运动，他说他在肃反中自己是积极分子，现在想来很痛苦，尤其对被整的纪芒感到精神负担沉重。他说他和纪芒原来是好朋友的，肃反中斗了纪芒，纪芒调到贵州去后，王正曾给纪芒写过一信，纪芒没有回，心里恨死他了。他说，肃反运动使人与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现在一想起纪芒来，精神上的负疚就十分沉重。

14. 王正说，吴雪的爱人吴一铿写了一个剧本，是讽刺那些靠了丈夫作威作福的新的"贵妇人"的。王正讥笑地说："真不懂她要写这干什么？她自己就是一个活标本，她只要写自己就够了！"

15. 王正说，他的父亲劳改了两年，只因为填过一张军统的表，并未做过别的事，他要给中央写信，代父伸冤。

16. 王正说，吴雪出风头的瘾足得很，什么戏都要自己演，自己导演，完全是为了想巩固自己的名位。他说，他看了《莎恭达罗》，吴雪在幕前也要出来说那么几句，心里难过得很，想作呕。他说，剧院群情激动，有人骂吴雪重视演员冀淑平是因为和冀接过吻。



17. 王正攻击刘芝明同志宗派主义，说东北的几个戏因为都是他一手领导完成的，是公式化标准作，但他还要拼命推荐嘉奖。

18. 王正对北大学生的风潮大受鼓励，他曾和汪明同去北大。记得他说过，他认识北大学生，他和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此事请组织追查。

19. 王正的一本论文集《形象的魅力》是由王肇烟介绍到上海新文艺去出版的。王正的父亲劳改出来后，也是王肇烟介绍到文联茶座来工作的。他们之间到底还有一些什么互相利用的关系，请追查。

20. 王正在整风开始后和汪明接近起来。汪明对王正是印象很坏的，他说，王正曾在肃反中踏在我们身上往上爬。要我和他谈话时谨慎些。但他自己和王正住在同院，因此那一段时间里是常作深夜谈的。

21. 王正和汪明同去过师范大学，并访问过学生。他们可能是带了文怀沙的介绍信去的。在汪明那里，我发现过一本反动刊

物《苦药》。王正说，师大很热闹，可惜他们去时已近尾声了。他说，他受到了一次民主教育。那里学生可以自由演讲，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是兴奋极了的。（据我所知，汪明、王正、段承滨后来与师大女学生王勃有来往。）

22. 王正告诉我，戏剧学院也动起来了。孙家锈也发言了。他说，群众公开要××（记不清名字）下台。他很焦急地说：可惜剧院的人都出去了，不能搞得这么热闹。

23. 王正从北大回来后说，林希翎真有些本领，这个小家伙读了些书，别人驳不倒她，她的演讲很有号召力。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羡慕林希翎的。他不满《人民日报》不发表报导北大的消息。他说，这样下去，都去读《文汇报》了，《人民日报》没有读者了。

24. 反右开始后，王正从大连写信给段承滨，说反右后他情绪大受刺激，东西也写不下去了。（这也是我听段说的）

杜高 4/8

汪明揭发杜高的右派言行

杜高对肃反问题的看法：（以下汪说）

杜高一经恢复自由行动后，他跟我说："自从我学会俄文能看《真理报》后，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我就以'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指问他案子的人），归根到底还是赫鲁晓夫救了我。"我在朝鲜体验生活时，有一个杂记本，封里贴了一张斯大林的像，他说，他恨透了斯大林，认为中国肃反运动搞得如此糟，完全是受斯大林错误的影响，而我们肃反后期有了改变是受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影响。汪明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看法有分歧。

他认为剧协的肃反搞得很糟，首先赵寻逼供，使他很颓丧，曾想自杀，他说在那期间每晚听见贾克回来的小汽车声，就心惊肉跳，跪在床上划十字。

他说："共产党真厉害，使我们这样的好朋友都互相仇恨起来，这不是六亲不认是什么呢？"

他又说：我们这个家族里有非常单纯和善良的人，光整我们两人（汪、杜）倒情有可原，他以同样的话也告诉了陶冶。

他出来后，我曾先问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他说："我参加国民党的那事是瞎编的，文化部在中山公园开大会前夕，李之华和范景宇到我房里来威逼我说，'如果你再不承认，我们就让你上大会谈！'"我又问过他："人家说你写反动文章在特务报馆当过记者？"他说："这是我在肃反中夸张了的，不夸张不被信任。"他又说："我给蒋介石写祝寿文章是写的反话！……我过去是进步的，剧协将我们一整再整，主要是没有全面看人，将我们进步的一面全面抹杀，我们以前吃的苦都白费了。剧协斗了许多人，完全是主观主义，恐怕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我们被斗主要是和剧协创作室的关系没有搞好。蓝、赵是专门整人生活的。"当我们听说电影局、青艺、师大的肃反运动，也大部分搞出来的不是反革命分子，都一致认为肃反搞错了，他看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曾写了一封长信给陆定一，此信他说给贾克看过，但是没有发。

整风后，他将这封信给我看了，又到处宣扬剧协党冤枉了他，看了罗隆基的倡议后，他要给政协写申诉信，给《人民日报》支持罗的倡议。杜高专门会借刀杀人。他写了一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给我看时，我劝阻他三次，要他不要伤害吴雪，他说怕什么，这材料是王正给我的。陶冶写的那篇《空头作家》完全是杜高授意写的，陶冶写后杜高修改后才发表的。整风后有一次王正想写一篇批评赵寻的教条主义文章，杜高极力怂恿王写，王后来又不写了，要写批评光未然的教条主义文章，他说：那也可以顺带提一提赵寻。是他想写《小苍蝇变成大象》的，一定要拉上唐湜。

肃反结束后，我和陶冶工作都很积极，陶冶说他还受到了表扬。可是一和杜高接触后，我们就慢慢变了。

他和陶说："党老整人，真使我吃不消，剧协肃反搞错了许多人，孙福田要负责任。有一次孙找我谈话，我觉得孙很不安，态度十分谦虚，极力装出好态度来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你快给领导上申诉吧！"陶冶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就在联络局闹开了。

他也鼓动我申诉，要我不但口头谈，还要书面谈。

他也同样地鼓动陈敏凡（电影局）写申诉书，经他激发后，陈敏



凡就这样做了，陈敏凡在整风初期大贴大字报。

这次蔡亮由西安来，他第一次见着蔡亮就说："我们问题平反了，李之华跟我们说，你们过去的那些事，都是开开生活检讨会上的事，你的问题回去一定要搞清楚！"

他说："共产党叫人互相仇视，我们要提倡人道主义。"他对所有参加过斗争会的人，对他提意见的，发言积极的人都仇视，连李钦也恨，我有一次和李钦在北海喝茶，他说："你不要跟他好，这种人翻脸不认人。"

反右以后，他说："这回我可好了，我没在会上说什么。出版社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故意说得左一点，这样，他们才能相信我。"整风后，有一次见到蓝光，他没打招呼，他说："蓝光现在萎了，不像整我时那么威风了。"

杜说："党要整谁就整谁，共产党最怕小集团，以后，我不要那么多社会关系了，只要两三个朋友就行了。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小集团了，譬如谭天荣，他们有政治目的，有纲领。肃反时说我们是小集团，真说不过去。"

黄悌贴出大字报后，我很紧张，他为了洗清自己，他说黄悌主要是矛头指我，我没有说他抄袭，你说的你要负责，你快贴一张大字报吧！我不肯贴。

蓝光六位同志写了大字报后，我们都很紧张。他说，看样子又整到我头上了，整吧！我来"油"的，要不然一卷铺盖不干了！再不然就自杀。这些人又神气活现要整人了，我非拼了不可！后来，我们分头找了李之华、贾克，他说，贾克谈得很好，说他们的大字报不能代表组织，杜又轻松了。听说他上星期日还参加乒乓球比赛呢！

他跟杨哲民谈了赞成罗隆基的倡议，组织平反委员会后，我说："你看你说了怎么办？"杜说："我可以赖！"

于质斌的检举

今年夏天，杜高的右派面目被揭发以后，在一个晚上（日期我忘了），时间约摸是八点钟左右，他在南河沿的一个小饭馆广聚兴吃饭，这家饭馆有公用电话，据饭馆的主人（姓李，此人是街道积极

分子)说，在电话上说话的时间不长，并且还没给电话费。据李说不是故意不付，是他们算账时忽略了。

于质斌 19/11

——附：杜高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明书

(我觉得应该提请组织参考的，只有一件事实，即"结论"最后一页的第四行，"给吴祖光私通电话"的那件事。事实上我没有给吴祖光打过电话，我一直认为是另外一个坏人给吴打了电话冒顶我的名义。由于我过去对组织是不诚实的，因而别人便利用了我的这个错误；组织上也不能信任我的解释。——这对我是一个痛苦的教训。我请求组织现在能信任我；即使现在仍然不能信任我，我会在若干时间以后，用自己的言行和为人的品质来求得这个信任。

杜高附 3.28



杜高的自我批判

(原件第一页破损无法辨认)

……趣味的一致性为基础，终于反动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小集团。在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时候，这个小集团的曾经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过打击的分子——我、汪明、田庄、陶冶便又在吴祖光的支持下死灰复燃，企图以顽强的存在来反抗党，来报复肃反运动。

但是，"小家族"这个集团的罪恶重要的还不仅仅表现在"鸣放"这个时期，(当然，作为这个集团首领的吴祖光在这个时期内发表了纲领性的右派言论)它的主要活动是在"肃反"以前的一两年里。肃反以后是它的又一个发展。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和路翎(胡风集团)的关系。在一九五五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当文艺界进行着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文艺思想路线的剧烈斗争时，我、汪明、田庄从阶级的本能要求出发，同情和支持了胡风集团

的反革命文艺路线，并和该集团的重要分子路翎建立了私谊。

1. 吹嘘路翎的为人和他的反动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做了胡风集团的义务宣传员。

2. 当路翎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向党进攻时，我和汪明自愿挺身为他作证。

3. 和路翎一起散布对党不满、攻击领导的言论。在二次文代会前，路翎曾将代表名单给我和汪明看，我们看到名单上没有吕荧等人，则愤愤不平。又如胡风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我们加以赞美，认为照这样做，文艺界才会有一番自由竞赛的景象。——这是具体的支持胡风文艺路线的行为。

4. 接受胡风、路翎等人的文艺思想。我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受到路翎的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

一、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否认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面是反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另一方面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创作的指导和领导作用。实质上也就是不愿放弃资产阶级的立场。

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流言蜚语是"小家族"的重要罪行之一。"小家族"里的吴祖光和王少燕是流言蜚语的制造人、加工人，我们从他们那儿听到，则当作"趣事趣闻"再传播开去。这些表面上看来是自由主义的无所谓的"清谈"实则充满了政治的灵敏性，是深刻的阶级本性的反映。这些流言蜚语没有一条不是嘲笑某些领导同志，某些追求进步的同志，或者诬蔑中苏关系，诬蔑党和国家的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这些当作"笑话"讲的流言蜚语没有一条是对党、对革命运动有益的。因此，它就不能不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而传播它们也就不能不带来政治后果。



三、腐蚀青年。我不仅自己竭力保护我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生活的旧习气和作风，并且还要用它们去腐蚀比我更加年轻的青年。这就是说，要用我的观念去改造世界。四年前，对于蔡亮的腐蚀就是我的腐蚀青年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我吹嘘蔡亮的"天才"，吹捧他为"未来的中国列宾"，介绍他读《克里斯朵夫》等外国作品来汲取"个人奋斗"的狂热的感情。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不是劝他和组织多靠拢，取得组织的帮助，而是劝他"拼命地

画作品”，向他宣传“什么都是假的，美术家靠自己的作品才是真的”这一类谬论。鼓励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怂恿他看不起周围的同学，脱离群众。在艺术上则鼓励他追求一种形式主义的“抒情诗画”，追求平凡的题材，追求所谓“哲理与诗的深刻结合”。并且传扬“发掘那些小人物的心灵的美，才是最好的艺术，要爱一切人，同情一切人的不幸才是一个艺术家宽大仁慈的胸怀”。向他宣传一种“无报酬”的友谊。离开了社会运动的前进的大集体，来追求一种温情脉脉的小集体，就是我的友谊观。其结果便是小家族反动小集团，其结果便是政治上的反动和个人的身败名裂。其次便是对陈敏凡，我们利用她在北京也没有家，年纪小，喜爱文学，便从感情上、思想上腐蚀她，带着她吃喝玩乐，放浪不羁，使她也终于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共青团员慢慢堕落成为自高自大厌恶集体生活和对党不满的右派集体的一个成员。再其次，由于小集团中的其余成员的吹嘘，还有许多青年对小家族的生活方式和所谓“拆不散的友谊”极为羡慕，他们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和影响。（如田庄的朋友谢蓉明，陶冶的朋友许仪耀，罗坚的朋友××，我的朋友王蓓，汪明的朋友段承滨，以及当时和我与汪明在一起工作的王正、陈刚等人。）从这里，就明显的标志出了小家族的政治性。它的确是和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年相对立的一个以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来争夺青年的小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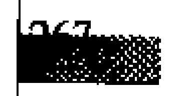
四、散播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和文艺观点来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抗。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不仅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制度，而且要彻底改造作为这一个没落制度的上层建筑的人的社会意识。因此，党和国家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培养高尚的道德，要求培养起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腐朽的个人主义意识。但是，我和我的“小家族”则是恰恰相反，是以保护作为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以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作为共同的体系来承继来联合的。我们宣传所谓“人性”、“天才”、“理想”、“个人奋斗”这些荒谬的哲学。我们把“人性”看成是永存的，非历史的，抽象的产物，我们把“人性”看成和阶级性对立的一种现象，我们把“人的才华”

也看成是可以脱离社会运动的东西。我们要求个性的绝对自由，对个人的才华采取绝对的崇拜态度。“个性解放”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旧口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真正解放人的个性，顶多是“解放”了少数人——本阶级的分子的“个性”，对绝大多数贫苦人民则采取了更残酷的压迫；而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真正的解放了大多数人的“个性”，保证了个人的创造力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而这种个人的创造力或个人才华则必须和社会的统一意志相结合，它才会成为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否则，个性的绝对放纵就会妨碍他人的利益，妨碍社会的统一的秩序和纪律。这一个真理是我过去不懂的。我要求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放纵，一种绝对化的自由，一种我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流浪成性的无拘无束，乱说乱道，散漫和放荡。于是，我把一个最严肃的革命集体看成是对个性的一种束缚，极力要冲破这种束缚。我们过去所说的个性和个人才华是要促使社会往后退，违反了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社会利益和愿望，违反了历史的前进的要求的反动的人性和反动的个人才华。我还宣传“个人奋斗”，这也是我的人生观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联系着我对所谓个人才华的崇拜而来。我历来把自己的道路看成为“个人奋斗”的道路，以为自己可以不要任何的援助和依赖，把个人完全从社会集体中孤立出来，这原来就是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不仅把个人和集体分开，更把个人的力量无限的夸大，把个人看得高于集体，高于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因此，我错误地把那些勤勤恳恳服务于集体利益、忠心耿耿靠近组织和集体的人们，看成是没有“理想”、“庸庸碌碌”的人。我的所谓“个人奋斗”实质上就是胡风说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的扩张”，是彻底的为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奋斗，为个人的卑鄙的欲望而奋斗，为我说的“将来我们要坐在文联主席台”这样一个野心而奋斗。所以，我的这种“个人奋斗”的哲学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个人野心家的“个人奋斗”。它和党所教导的，每一个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努力钻研业务，挖掘潜力是完完全全相对立的。

再就是我所要求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我把“自由”和纪律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个东西，把统一的意志看成是对自由的

妨碍。我所说的“自由”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自由。“自由”永远是和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相结合的。其实，我自己在旧社会本来经历过不自由的痛苦，而且应该亲身感受到新社会的自由的，因为新社会给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最广大的自由。但是，我却要求那种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说妨碍集体的话，做妨碍集体的事也不受任何批评处罚的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本来就是一种和纪律的结合，和人民利益的结合，只要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就必定会感到身心愉快，生活得自由活泼的。而我们要干反对纪律、反对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主义利益的事，当然就不会感到自由，感到处处要受到约束了。因此，我所向往的、追求的那种“自由”它本身就必然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与纪律相结合的原则的性质。

“玩世不恭”是我和我的小家族的反动、腐朽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我们宣传“玩世不恭”的哲学，以“玩世不恭”为生活的乐事。我们不把人生看做庄严的、战斗的人生，而是看做无度的吃喝和一群所谓才子的高谈阔论，我们不把人生的意义看做为人类谋福利，而是看做好逸恶劳的无限的满足自己的游乐。因此，在我参加抗美援朝的庄严战斗的时候，我居然可以坐在安东的咖啡馆里与朋友清谈，可以眼望鸭绿江彼岸的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而无动于衷。可以在文工团进行紧张工作的时候，大讲恋爱，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影响。因为，在我当时看来，这种玩世不恭、风流倜傥、放浪形骸的旧才子作风，正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玩世不恭”是一种地道的才子加流氓式的没落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我和我的小家族则承继了这种迂腐的哲学，这正是表现我眷恋过去的时代，反对在社会主义时代追求新的健康的人生，这种大吃大喝高谈阔论的生活作风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意识。这种腐化堕落的生活自然地使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真理。



我的文艺观点也是浅薄和混乱的。我把欢乐的情绪看成是浅薄的情绪，把痛苦看做深刻。这种观点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就带有明显的反动性质。因为它必然引导我只看到现实生活中痛苦的一面，看不到生活中蓬勃的、前进的、光明的一面。用这样的观

点来考察生活，势必是片面的、歪曲的，不能够认识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和本质的。我喜欢背诵赫尔岑《往事与回想》里的一句话，他说："只有坚强的人才谦逊，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错误，只有坚强的人才肯饶恕别人，并且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往往等于眼泪。"重要的是最后一句，我片面地理解他的话，我把这当作对人生的深刻的哲学的发现。很长的时间来，我陶醉在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品里，尤其是俄罗斯那些作家的充满痛苦和抒情的梦幻的作品里。这些作品不仅影响了我的感情，而且影响了我的意识。我接近杜思退夫斯基的时候，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我受到他的忧郁的性格很深的影响，我变得沉暮，把生活看做一场痛苦和反抗。这种文学影响使我不能接近社会主义的欢乐的现实，我的成见表现得很顽固。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和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一脉相承的。这种观点降低对人的信心，并用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来做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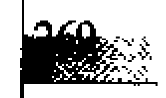
我说要发现小人物心灵的美，艺术家应该有爱一切人的仁慈胸怀，这也是十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首先，在人民做了主人的时代，所谓"小人物"这一个用语就是错误的。这是表示着对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信任，这是对普通的劳动者的一种侮辱。用这种观点来观察生活的结果，便是写出像《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这样歪曲现实，在团结一致的人民中间划出阶级的区别，夸大一般性的缺点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来。"艺术家应该爱一切人"这种提法本身也是缺乏对劳动人民的爱，一个真正爱劳动人民的人就会深恶地憎恨劳动人民的敌人，就不会有所谓抽象的、一般的绝对性的爱。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欺骗，这样的爱和仁慈的胸怀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描写永恒的主题"也是我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我所谓的永恒的主题常常是指那一般性的、抽象的哲理。作为创作现象来说，这种提法就是违反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历史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作家越是能深刻地掌握客观现实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他的作品的艺术力和思想力就越是强大，作家对现实的描写越是真实（本质意义上的真实）越具有历史的具体性，社会主义思想感情越饱满，他的作品

对人民就越加具有不朽的永恒的价值。这本来是一般的真理。但是我偏偏打着反对公式化和一般化的口号来提倡一种抽象的“永恒”，一种所谓“诗与哲理的结合”。因此，我的几部作品都表现出缺乏生活的实感，缺乏对历史现象的深思熟虑，我的几个作品都不过是想象的感情的直接表现，充满浓厚的主观神秘色彩，这个创作思想和方法实际上也就是胡风、路翎等人的主观论的思想和方法。

根据上面的这些观点，我在艺术的实践上就必然是轻视客观，崇拜主观。我强调作家的想象，却轻视作家的艰苦的生活实践。我几年来的创作生活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深入实际生活，和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艰苦过程。这就说明我一向是违反毛主席向文学工作者提出的实践方针的。

五、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我在近几年来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到处表现出了我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还在参加抗美援朝的运动，我在东北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时就犯了许多错误。首先，在那个文工团我和汪明、王少燕、萧崎结成了一个小集团，搞反领导的活动。我们的小集团破坏了当时地方上来的和部队上来的同志之间的团结。我们想挤掉党员领导干部，让我们来领导全面的业务，我们破坏了面向部队的文艺方针，我们想把一个战斗的文工团领到后方大城市的剧院的方向去。我们自高自大，看不起文工团的同志，骂他们是“小儿科”，“什么也不懂”。我们自视特殊，不遵守纪律，生活制度（起床、吃饭、集会）常常任意地加以违反和破坏。我身为一个青年团员可是却厌恶团的组织生活，认为开团小组会是一件枯燥的事，甚至狂妄地向团提出条件，“一个星期只能开一次小组会”，青年团不能占去更多的时间。我的恋爱当时也造成不好的群众影响。但是当群众和领导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时，我和汪明等人又聚在一起咒骂文工团是个“黑暗的角落”，骂领导人丁帆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并且为了报复他，在我们写的检讨书上用上几个难认的字去难他。后来，我们又一齐被调到前方去，在前方我贪生怕死，躲在山洞里，不敢往危险的地方去。把许多时间用来给爱人写信，在信里故意发泄对文工团和丁帆的不满。（因为那时的信都是经丁帆检查的）以表示“他拿我们没有办法”，以显示“我们的顽强”。对丁帆的这种仇恨决不应该看做是对他个人的，



这是我们共同对待批评我们、向我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作风、行为进行斗争的新的力量的仇恨情绪的具体表现。我们对待旧的东西是热衷的，留恋的，而对于亲身参加的火热的生死斗争却冷漠、旁观。在安东，我们可以泡茶馆、遛江沿，部队动员参军时，我却对别的同志说："千万别参军，搞艺术的不能在部队里搞一辈子的。"并且诬蔑那些从部队里来的文工团员"水平低，在艺术上也只懂得服从纪律，不懂创造，是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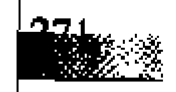
就当我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抗美援朝的运动时，我却同时一篇又一篇地写歌颂忘我精神、写歌颂集体主义的文章。这一方面说明了我的两面派政治面貌，同时也说明了我是怎样继承了旧文人的那一套"人格分裂"、"言行不一"的恶劣的做人的法则。

从部队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又以原来的小集团为基础，慢慢发展了"小家族"这个小集团。同时，我和汪明与路翎开始建立了"友谊"。当全国人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又从思想到行动都是同情胡风、支持胡风的。（我在前面已经举出了和路翎关系中的错误的几个主要方面。）

从上述我亲身参加的两大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来看，我是一直站在与党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右派立场上的。

再其次便是对于肃反运动。肃反运动可以说是对我过去的全部错误言论和行为的一次总的检查。党组织向我和"小家族"的全体成员进行了斗争。我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不好，在思想批判阶段没有作深刻的反省和检查，以至后来发展到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来帮助我。肃反运动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组织上给我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姑息我年纪还轻，还可以教育改造，给了我极为宽大的处理。这中间有一度"小家族"是被击溃了的，我自己也经过了很大的痛苦，决心和小家族及自己的过去告别。但是，我的转变是被迫的，不是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醒悟和自觉。肃反末期，苏联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了，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和修正主义的浪潮，国内又由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提出，开始出现了一些对党不满的或右派的言论。在这种政治空气底下，我的反动思想又有了发展，阴暗情绪又有了增加。我把肃反运动看成

是"非正义的","非人道的"运动,我认为中国的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的受到批判的"阶级斗争论"的实践。我以为现在是共产党全面改正自己的错误,扩大民主,缓和国内外紧张局势的时候了。这时候,我非但把自己的过错置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反而认为,如果是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小家族"等等根本就不是什么错误。我的阶级本能使我很容易就和当时的这一般政治逆流吻合起来,很容易接受来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一些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观点,一些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用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观点。这个时候联系着我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我就十分敏感地去注意这些言论,因为处处联系着自己,因此在判断这些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时,就失去了清醒的客观精神,牵强附会地去为自己辩护。在这个时期我写的一份为小家族辩护的材料就是具体的证明。正当这个时候,我又碰到了过去的那几位反动朋友,我们便很快地又在仇恨肃反运动的基础上恢复了过去的"小家族"的所谓"友谊"。肃反以后,我们大家都变得更加阴暗了,对现实环境的热情降低了,政治上更反动起来。我们在一起咒骂肃反中负责我们工作的同志(如蓝光、赵寻等),并且在吴祖光、王少燕的支持下,开始对肃反结论进行翻案。为了报复肃反,我们开始利用各种集会来显示小家族存在的顽强性(如在陶冶结婚的时候,在开座谈会的时候都不忘记这样做),汪明说:"我们是打不烂、炸不散的。"吴祖光、新凤霞也说:小家族又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和《新观察》上团聚了。"(指我们发表在一起的文章)这就是我们当时共同的情绪和共同的语言。



肃反以后我自己的阴暗情绪还表现在我的作品上。我曾写了一个短篇,叫《肖像》,本来是由《人民文学》发表的,在这篇小说里我写了一个女子的命运,我写了她的孤独和悲苦,整个小说的感情都是低沉的,跟现实生活的欢乐的调子是不协调的。五月以后,我更写了《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这样一篇反动的作品。在这篇作品里,我尽渲染之能事来歪曲新社会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一种伪人道的掩饰下来攻击新制度。这篇作品可以说是非常尖锐地暴露出了我当时对生活的错误观点和文学上的恶劣倾向。肃反以后,我读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喜欢的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

人与海》，我认为这是一篇情感最深刻的作品，中国有一位新作家写的《改选》，是一篇有错误的小说，我也觉得它是感情深刻的。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情绪的倾向来。凡是阴沉的东西就被我所赏识。

总之，我的阴暗的反现实的情绪和错误的政治观点在肃反运动以后，在受到了一次打击以后有了发展，向着与时代的前进运动相反对的方面有了发展。因此，经过了一次像肃反这样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不是接受了考验和锻炼向前进了一步，而是和党、和前进的政治力量更加对立了。我的思想、我的情绪，和我当时所处的位置都使我觉得我和这个社会这个集体是不融洽的，不和谐的。我没有想到只有改造自己才能适应这个社会，这个集体，而是对它不满、苦闷，甚至觉得过去在香港流浪还"痛快些"，于是拼命在另一个小集体中去找知己、找温暖。

这就是我几年来所走的错误道路、几年来所犯的主要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它的历史根源。



六、我的错误思想的历史根源：我虽然出身在一个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家庭里，但因为父亲很早就到解放区去了，我从十四五岁期间开始了独自的社会流浪生活。这种生活一方面动荡不定，贫困，使我和城市下层社会有过接触，但同时使我染上很大的流浪习气，也培养起我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偏见。另一方面这种生活使我和旧社会、旧的政治势力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思想的联系。我的几年的社会生活正是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变化的时期，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社会关系也表现得空前未有的复杂。从国统区来说，这是一个苦难的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生活濒于破产。民不聊生的痛苦当然也是我所切身感受到的。我对那个社会有过诅咒，有过憎恶。但是那个混乱的社会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形态却也给了像我当时那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留出了一条可以凭借个人奋斗的方法来找生路的可能。我从小梦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受到那些资本主义社会里伟大的人物的个人奋斗的历史的感召，以为凡是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不依靠别人，也不受别人的支配。这种个人欲望的滋长使我渐渐脱离开那个时代里遭受痛苦的人民。我当了记者开始接触了另一个阶

级、另一个阶层的生活。旧记者的散漫、腐化的自由生活促进了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意识，上层社会的吃喝玩乐对于我是一种引诱，这个时候，我的个人奋斗的目的性就越加明显地成为追求私人占有的欲望，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享受，没有多数人的享受，人们是没有平等权利的。我就是要凭着个人奋斗爬到剥削别人的位置上去。我所要成为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愿望也就是朝反动的方向，朝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1946年我写的一篇小文章《沉默的祈祷》（发表时是经过编辑篡改、添加过的）就是用来歌颂蒋介石的，这就证明了我当时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我对那个旧时代的反动统治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也有过一些不满，希望那个社会改良一下（这些不满也反映在当时写过的一些小小的文章里），希望变得好些。我有一些苦闷，但这些苦闷也只是我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时的反映，这些不满和苦闷和那整个社会的基础都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相反，那个旧社会却给了我实现个人占有愿望的可能，我靠了小聪明，靠了投机取巧的本领，居然从一个练习生爬到采访主任。我学会了应付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本领，懂得去讨好别人，也懂得设法让人们来赞美我。那个社会是欢喜讲"神童"、"才子"之类的。我在十七岁时当了报馆的采访主任，能够写一些文章，自然也就背上了一个"小才子"的包袱，自命不凡，少年得志。这就足以使我和那个社会的基础建立起良好的思想与意识的关系。与此同时，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也因为我还表现出对旧社会的若干不满的情绪和言论，因此，我和进步的力量也建立起了一些思想与意识的联系，因此，总的说来，我就是处在两种势力的平衡状态中间，或者是受着两种势力的牵引。这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两方面都给了我好处，所以在那个社会里，我不存在十分迫切、十分尖锐的矛盾。我便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近三年的动荡不定的文人生活。追求着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和享乐。我的人生观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形成。这是一种最彻底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以一切都是为了个人，为了个人的私欲的满足和享乐。这种人生观的实质就是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就是个人占有，这就是剥削意识。我喜欢到处讲"爱"这个字，这个

抽象字眼下的阶级内容就不外是爱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反过来就是恨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我喜欢讲"个性"，实质上也就是用来掩饰灵魂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代这一套人生哲学当然是不受到限制的，但是到了新社会，新兴的无产阶级要改变我的人生观和一整套生活习气，我经不住了，抵抗这种改造，个人主义稍受打击就起来反抗，这样，几年来，我就慢慢发展为政治上的反动。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开始以后，这种矛盾就愈益加深，处处感到受压抑，受打击，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连同它的思想与意识的方面。而我，处在社会主义时代，却要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方向和道路，处在广大人民空前的意志统一，以伟大的集体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时代，却要坚持以满足个人欲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就造成了我和整个历史运动的对立关系，也造成了我个人的根本性的错误和个人的悲剧。

反右运动是我个人和与我联系的小集体的一个彻底的革命。我是逐渐才懂得这个革命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广泛性的。我是逐渐才看清自己灵魂的丑恶，逐渐才觉悟到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个人把他最美好的一段人生用在一个反逆于人民反逆于真理的"事业"上，作为个人来说，原是十分凄惨的事。对于社会说来则是罪恶。我就是在罪恶中活到今日的。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在声势浩大的开展，共产党还本着救人的精神不给予像我这样一个反动分子施以极端政策，反而指出一条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生路。仅仅这种宽大的胸怀和改造人类的伟大庄严的精神，也会是足够……（以下因原件破损无法辨认约二十字）永远跟着党，永远追随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还年轻，我希望党能赐予我下农村或到其他更艰苦的地方去劳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踏实地改造自己的立场，做一个劳动者。能够在以后几十年人生中还能切实地做一些有益的事来补偿我的罪恶。

“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

(一)小家族性质的揭露和批判：

1. 小家族概况；

2. 他们的文艺思想。

(否定文艺的党性，阶级性，宣传写爱，写人性，写忠诚；否定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说越学马列主义的理论越写不出东西来；不愿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自己。)

3. 分析杜高的理论和创作，做他们文艺思想的典型例子。

4. 小集团和胡风集团路翎的关系。

(吹捧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文艺青年和学生中宣传路翎的作品及其本人的“天才”。胡风思想批判时，帮助支持路翎等向党进攻，肃反后整风期间还怀疑胡风、路翎不是反革命，悄悄探望路的爱人，同情她的“不幸”)

5. 一系列的打击文艺领导，对他们做人身攻击，污蔑他们不懂文艺，制造、传播文艺界是宗派对宗派之说，其结果是取消党的领导。

6、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性质和目的是什么？

7. 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结集敌对情感的阴暗心理表现出的对党和党员的仇视。

8. 吹捧自己，打击别人。

(采用集体性的行动)

9.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

(吃喝玩乐，搞女人，盯梢等行为)

10. 从一系列的活动来分析他们是不是一个小集团，小集团是不是政治性的，是不是反动性的。

11. 这个小集团和吴祖光的关系。

(肃反前后，整风期间吴在小家族的地位和作用)。

(二)关于肃反问题，和有计划地策划翻案。

1. 这样的"小家族"是不是反革命的？在肃反中该不该审查他们？是否结论作错了。

（包括小家族成员中骨干分子有历史问题）

2. 肃反对他们是不是人道的？

（经过情况，他们在肃反中的态度，我们为他们花费的人力物力，他们自己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3. 调动他们的工作，处分他们是不是宗派主义？

4. 小集团在什么实践，什么基础，什么目的下又结合起来的？

5. 翻案的策划和吴祖光的鼓动。

（三）整风期间向党的猖狂进攻：

1. 几次座谈会上，在吴祖光指挥下有计划有配合地放火。

2. 集体创作的几篇对党进攻的文章。

（如此人事处长、空头作家、保姆升迁记、契珂夫悲剧的幕后、墙）

3. 掩护吴祖光退却：（抽原稿，放空气）

4. 有计划的集体打击、报复党员的行为。

（四）几个理论性的问题：



1. 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小集团？新社会是不是不让人交朋友？是不是六亲不认？

2. 什么是生活的自由？什么是创作的自由？为什么"小家族"分子在新社会中不能愉快地工作，自由地生活，永远地挨"整"？（历次运动中他们的表现）

3. 他们的人生观，及这个小集团对我们社会事业的腐蚀作用。

4. 分析小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杜高的所谓"革命道路"。

5. 吴祖光为什么要组织和积极恢复这个"小家族"做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班底。

6. 他们是"年幼无知，交友不慎"碰巧结合在一起，又碰巧遇到路翎、王少燕、吴祖光的吗？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杜高团籍的报告

一、简历：

杜高，男，27岁，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分：旧职员。194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团。1945—1949年，先后在国民党《贵阳日报》等六个反动报纸任编辑、记者、采访主任等职。解放后，先在“上海青年团儿童部”工作，后调铁路文工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协工作，现任剧协戏剧出版社编辑。

二、主要的反动、错误言行：

(一)伪造历史：

杜高自1945年至1949年在蒋匪敌特报纸供职时，经常进行反动宣传，颂扬国民党反动派，污蔑人民解放战争。例如1946年1月，他在长沙伪《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为蒋匪“祝寿”的文章《沉默的祈祷》，称颂蒋匪为“我们伟大的领袖”。1947年7月7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他在《湖南日报》发表关于长沙国民党匪徒召开“戡乱”动员大会的报导。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常熟《新生报》以《剪烛残余》为题连续发表讽刺短文，向革命阵营放冷箭，污蔑党的和平政策。

但是，杜高在解放后，长期隐瞒了自己的反动历史，伪造“革命经历”，企图钻进共产党内。

(二)组织反动的“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自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搞小圈子，并组织反动的“小家族”小集团，对革命进行多方面的破坏。1952年，杜高和“青艺”的汪明、电影局的田庄，以及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自称为“小家族”的小集团，进行了一连串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活动，例如：(1)散布政治性的流言蜚语，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许多诽谤，破坏国际团结关系；(2)他在生活方面常施用流氓式的手段追逐异性，并



在青年中散布资产阶级玩弄女性的腐朽思想，如他们追逐异性的暗语叫“显示家族的威力”和“抓小鸡”；(3)支持、策应胡风反革命集团。如杜高在五三年给汪明的信中，要汪明多安慰路翎，说路翎的作品感情是真挚的，能鼓舞人去追求光明。当《文艺报》发动通讯员写稿批判胡风时，杜高曾把“内部通讯”刊物给路翎看。胡风的30万言书未发表之前，杜高、汪明、田庄等都先看到了铅印稿；发表后杜高便到处向人叫喊：“胡风的文章(指30万言书)写得好极了。”

(三)参加抗美援朝时的表现：

杜高曾两次被派到朝鲜去，这时，杜高暴露了自己可耻的怕死保命思想，整天蹲在防空洞里，吃饭、烧柴全靠通讯员送，把战斗英雄叫到洞子里来谈话。

(四)肃反后的表现：

肃反后，杜高并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小家族”集团在右派分子吴祖光的支持下，又死灰复燃。他们常在吴祖光家里集会，进行反党活动。

(五)鸣放前后的右派言行：

小集团的成员们，在鸣放初期积极地有计划地为“肃反”翻案，否定组织上在肃反时对他们的审查。杜高是策划翻案的主持人之一，他指示小集团的分子分别向本单位提出申诉书，以达到共同翻案的目的。杜高还对“小家族”的分子说：“不能说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他还写信给《人民日报》支持右派分子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他还说剧协的肃反有宗派主义，他被斗错了，认为他的历史问题是在肃反运动威逼下被歪曲了的。又说：“肃反运动使我们互相仇恨，仇恨了就乱写材料揭露，这太不人道了。”他对所有参加过斗争他的人都仇恨。如“小家族”成员在谈论赵寻(党员)时，杜高说：“愿他坐飞机摔死。”(当时赵已出国)

这时，杜高还对新社会进行了大力攻击。他和右派分子王少燕等人去“北大”参观民主墙时，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民主，并说：“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应该每时每刻都让人民说真心话，而不该用运动的方式让人家说话。”杜曾给王少燕的反动剧本《墙》出过主意，这个剧本写好后，杜向戏剧出版社积极推荐出版。杜还以

“青艺”的吴雪同志(党员)为模特儿,写了《契河夫幕后的悲剧》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内容充满了不满和哀伤的情绪,把新社会描写得很阴森、很不平等。杜高还用陶冶的名字写了攻击剧协创作委员会同志们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

(六)他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

反右开始后,杜高污蔑反右运动,他对王少燕说:“闹得朋友之间不能畅谈了,这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当大会批判他时,他在下面发牢骚说:“他们故意制造矛盾,我得自杀了,辞职不干了。”他并借口其兄病重,要求回家,企图摆脱斗争。在反右斗争中,他的态度一直是不老实的。

在反右初期的一次团支部大会上,同志们谈了一些情况(当时尚未停止他的组织生活),会后,他马上将情况泄露给右派分子汪明,严重地违反了团的纪律。

三、基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杜高已经完全不配做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为了纯洁团的队伍,我们已于1958年1月6日召开支部大会,建议大会通过开除杜高的团籍。表决结果,与会者一致通过支委会的建议,同意开除杜高的团籍,特报请批准。



共青团剧协支委会

杜高(签字)
三月二十五日

团支书　韦启玄(签字)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第三编　劳动教养时期(1958年—1969年)

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　东单临教字第480号

姓名:杜高　别名:李传惠　性别:男　民族:汉

家庭出身:职员　籍贯:湖南长沙　年龄:28

现在职业:剧协创作室　文化程度:专科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父:李仲融,任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陈璧登,小学教员

北京只一人

1937—1945年在长沙、桂林等地上小学中学

简历:

1945—1948年历任《贵州日报》、《湖南日报》、《中国时报》记者、编辑等职



1948年12月—19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

19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志愿军文工团等。

1953年调任现职

案情性质:右派

劳动教养理由:

该人自1945－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的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

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结其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等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该会已将其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原单位或申请人意见：开除公职，建议劳动教养。

处(分局)审查意见：劳动教养。张文凯　1958.4.11

民政局公安局复审意见：同意。陈树森(印)　安林(印)

市人民委员会批示：同意。冯基平(印)

备考

北京市公安局东单处(分局)

1958年4月7日



关于杜高的情况

不满领导方面：

1)杜高知道领导给他家里写信的事以后，心中惶惶不安。他猜测地说“一定是把我不好的表现告诉我哥哥了，弄得我好像是多么严重似的”。又说：“要知道，我的哥哥是个病人啊，我很担心他的身体。”

2)领导上扣留了他的翻译本子是不满意的，虽然开过会，但没有彻底解决思想问题。事隔不久，还是在工作时间翻俄文字典，看小说。另外，在翻译本子扣留不久，他又买了一本(是邵维城转让给他的)说记东西用。我认为，他的本子里如果还是一些翻译的东西，杜高就等于以实际行动反抗领导的处理了。

不正确思想行动方面：

1)在做模型时，他说“跟咱们一起工作的那个油漆工是个杀妻

犯哩。”我知道他平常就好打听、探索一些事情，所以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自己说的。”对这件事，于鸿慧曾提出让他注意。他则表示说：“我没什么旁的意思，何必又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2)以前，杜高特别向尹元文表示“好感”。常偷偷地向尹元文说些什么。我知道的有：议论于鸿慧的缺点，也曾让尹元文建议领导上放他假到外面玩一趟，并利用尹元文自由散漫的弱点，不通过领导去买些东西、借烟，甚至去多睡会儿觉等。

3)不安心工作。说“我真愿意回到土城去，跟于鸿慧在一起工作实在受不了”。“今天对这个有意见，明天对那个猜疑，其实没什么大事。他(指于鸿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愿呆在美工组，晒晒图倒满愉快的。”

张光华

五月十六日

关于杜高的材料

去年十一、二月间，我和杜高交换意见时，当时我曾表示对张光华的不满意，他曾说，(原话已记不清，大意如下)何燕明有个朋友认识张光华，对何与张在一起改造表示奇怪，认为张不配与何在一起改造，杜高并说张光华过去在机关里工作，外表看来特别积极主动地加班加点，反右时发现很多右派和他有关(意思是说张在暗中煽动)。我认为杜高这是揭人隐私的做法。当时杜高和我的关系搞得不好，他曾怪张光华挑拨他，这也是为他的这种说法提供“证明”。

在那个时期，我曾主动地找杜高交换意见，他说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只提出了两个不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说张光华告诉他，他在监狱吃饭是我汇报给李干事的，而对我不满，首先是他对汇报工作抱着恶意的态度。另一方面，后来了解不是张光华告诉他的，而是他偷看了我的工作日记，这问题说明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

处，反而嫁祸于人。

于鸿慧(手印)
1959.5.22

检举材料

杜高：自从国务院发布关于去掉右派帽子的文件后，经常问我，我们有没有希望，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当领导找我们谈话后他问谈的什么，说话的那个人是哪的，原来是不是本厂的。当我告诉他以前我没见过这个人时，他说那我们可能有希望，这一定是上级下来的。并几次问我那个人都找谁谈过话，被找的人是犯什么错误，并说出去后他坚决不留厂，要回原单位去。他说他们单位本来不送他教养，但其他单位有比他错误轻就送去了，所以才送他教养。

当邹文伟开会回来后，他和我说，这次在释放时不知是否说到这是第一批或首批释放，假若说过的话那一定马上还会有被释放的，并说要再找邹文伟问一问。

胡功勋
1959.10.6

鉴定表

单位：　　　　1959年12月
姓名：杜高　区别：是否剥夺和管制，是否正在受处分
事实摘要
优点：
1)在教养期间认错服教，拥护政府。领导上交给的任务能积

极完成，并努力领会领导意图和指示进行工作。在创作剧本和编写产品介绍工作中能贯彻党的政策和体现劳改工作成就。

2)接受领导的批评教育，领导上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能抱着诚恳态度进行反省，并能在实际上改正。

3)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能够进行批判和斗争。

4)能积极主动担任琐碎的日常小劳动。

5)政治学习较积极，特别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有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比较认真。

缺点：

1)在这一段工作中，思想上有一种单纯任务观点，只要能完成任务不出错误就行，缺乏钻研探究精神，力争上游的决心不大。

2)思想上还存在着"娇"气，自高自大，背了一个"作家"包袱，瞧不起人，妨碍了和同学的团结。

3)生活上还有些"娇"气，刻苦、俭朴作风还不够。

4)这一段工作中滋生了一种急躁情绪，和同学发生过争吵，用气话伤人，表现得态度蛮横。

5)思想上还存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情绪不够稳定，有时过多考虑前途问题，思想不够开朗。

6)学习上还不能很好地将理论联系实际，有时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对上列一些个人主义思想情绪的改造还不够严格。

车间意见

厂长意见

备考

张光华汇报材料

李干事：

杜高这次受了领导上的批评后，情绪很不满。说是因为昨天

与于鸿惠顶嘴，今天被于搞了一下，并当面质问于鸿慧说“为什么来这一套”。不仅如此，杜高对这次的批评，认为是错的，认为领导是发脾气，说什么“民主也是应该有限度的”，“党也是按原则办事的”，“我险些要拍桌子了”等等。

我认为杜高是极端错误的。我当场批评了他(赵振宇也批评了他)，但他只认为自己态度不对，而领导的批评是错的。我同杜高相处时间较长，我深深体会到他的思想比较顽固，死抱住个人利益不放，凡是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就大发雷霆。通过今天这一件事，领导上应该给他彻底的帮助。

张光华

1960.1.16

汇报材料



一月十五日中午，大组内布置了读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外交部对于日美修改“日美安全协定”的抗议及社论)，大组长宣布让大家都安静地听着，只有杜高表现得不在意，打水洗碗走来走去，以后又提醒尹元文要我们各别去上班，对读报表现得不耐烦。在态度上不只是对这样的学习不乐意，并且对这样一个重要消息也是不重视的。

近日来翻译书籍的时间很多，一般的工作也不主动去做，并和尹元文说，我一结束劳动教养就发表这个东西，见到尹元文买了一本小说，就要尹元文考虑画连环画，而这正是领导提出不叫他翻译书以后，也正是领导批判我们其中一些人不安心工作有个人打算以后。杜高对领导的教育不但没有遵守，而且是背道而驰的。

于鸿慧

1960.1.16

汇报材料

李干事：

上午自你走后，杜高对你这样处理非常不满，说了下面一些话：

"假如这是按照党的原则来处理问题的话，我是没有意见的。"

"这样的方法不是教育一个人，这个事情用不着这样发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讲民主的。"

后来有人对他说，你这样说法是不对的。他又接着说："我知道我这样对自己会带来不利的，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并因此又对于鸿慧不满。在昨天中午因读报时杜高没有好好听，于鸿慧对他提出意见，两个人就发生过争执，所以今天这事情杜高疑心是于鸿慧汇报的，他对于鸿慧这样说："假如昨天的事还有意见的话可以讲讲清楚，用不着这样，你这样做对以后没有什么好处。"

以上情况，确实使人听了很不对头，和领导以前对他的教育及他自己上次总结中表示的态度不一致的。因此反映领导。

股宣队　陈诚

1960.1.16

汇报材料

9月10日晚在小组评分会上，杜高由于对前一次评比扣分不满，在会上发言情绪极为激动，坚持不能扣分，他认为这样扣分对他没有教育意义，因之也无从改正，同时他说："不对的，可以平反，现在就是平反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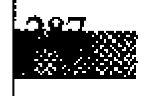
在问题本身，杜高是有错误，扣分是应当的，他不但不检查自己，相反地无理取闹，要求"平反"，"平反"是在五七年整风期间反革命分子向党进攻要求"平反"，杜高引用这样的字眼是有严重错误的。

汇报人
颜锦城（指印）
1960.9.12

年终总结会议记录（1960年）

23/12 杜高检查：

总的情况，我是不自觉的。觉得不改造是不行的，争取方面做得不够。把希望放在党的政策上，希望缓和些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认为争取早日改好的人是幼稚，表现好也白费劲儿，人们都是不了解党的政策的。因此在工作上不是意气风发的，但也不是消极混泡，而是忽冷忽热，搞展览会情绪就高，做产品画册时就消沉，这说明无自觉性，劳动教养，没办法。



例如对大跃进时能多睡会儿就多睡会儿。并阻止尹元文加班加点，给群众泼冷水，我还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在工作时看书，翻译东西。

我完全保留资产阶级落后的思想，顽强地想在集体里表现特殊。

24/12 杜高检查：

对粮食问题，没有抵触的，但不等于没有错误想法。感到无可奈何，感到肚子饿。又不愿向领导谈，认为29斤不是合理的，32斤才合适。后来把浮肿与定量看做有关。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感

觉少，给32斤才合适。

半年前通过运动，认识些问题。8月间和赖教员吵架后，心里很害怕出事儿，提心吊胆，克制自己，因为过去是由于冲动。另外在大跃进初对群众不信任，当时去监狱搞剧本，对别人写的不信任，三天赶写不出不朽的作品来。后来看了些红旗歌谣等，又产生了另一种极端思想，认为自己又自卑起来，没有什么资本。在大时代里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了。

对自己前途有幻想，过去有。运动后，没幻想了，对什么事没追求了，给什么干什么，吃饭劳动，劳动吃饭而已。但这也不行，就又想多看些理论书籍。

对拿粮票上饭馆是合理，但感到也不方便，我属于是对新事物不满的那种人，对旧的有留恋。

过去我大手大脚，可是现在又自私，好占小便宜起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本质是一样的。没有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

自己还想保留个人特殊一点，但又怕犯纪律，如在外边用热水洗脸，坐在被子里值班等等。

过去想和大家相处好一些，近几个月来，心里很害怕，休管别人事，怀疑别人，过去就没有这样。现在也不愉快。

29/12 补充检查：

关于冷热问题，热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是一时的感到兴趣，当一受阻时就冷下去了。自己脑子里主要是个人打算，如考虑什么时候结束？将来干什么等。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消极的。对待改造问题上：一是觉得教养处分是被党抛弃，所以靠几天的争取就太天真了。另外感到矛盾的转化也需要许多因素，现在对老年人错误宽些，对青年人错误严些，这还是对年轻人负责。在思想问题上，我认为经济条件变了，思想就要变。

26/12

（赵振宇提）：杜高说，“在教养上对政府政策抱着幻想，别人积极是没用处的。”但如何认识的，要提出来。还说：“做什么工作都

吃饭。"真的没有打算和思想活动了吗？工作的问题要和三面红旗精神结合起来检查，这方面谈得就少。

与赖教员吵架，也不是急躁的问题。与韩若彬在宿舍里因挤了一下，就又发了脾气。对别人看法都不是善意的。

（王宝丰提）：工作上不主动，总看文学作品，记东西，为将来结束教养下些本钱。对大跃进没有重视起来。在思想上不要求进步，对加班加点、工作时间长是相当抵触的。对靠拢政府有错误看法。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很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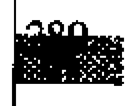
（张光华提）：对自己的错误通过批判不暴露而已，并非克服掉，对贪小便宜，并非现在有，而过去就有。

杜高思想深处对大家所提的意见有一些仇视，不与别人接触了。而表现出一种虚伪现象。经常与别人发态度，如和韩若彬发态度，恨起床太早，自己的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刘绪兴提）：对改造态度有问题，以为自己与别人不同，纪律对自己无约束力。对改造抱混的办法。对大跃进很抵触，反对加班。也不是忽冷忽热的问题。

对待粮食问题，刚定量时喊"饿"是很多的。

（刘仲遥提）：经常发言里引经据典，其实问题很简单，故意显出自己高明一些。例如看《真理报》，为什么不看中国的报纸？真的为学俄文吗？好表现自己。



30/12 继续昨天补充检查：

对待改造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政策上。觉得人的思想随着环境而变的，就不主动去改了，这是错误的。在奖惩大会上看到重犯罪的人，给自己一定教育。自己也满足两三年会有改进。现在要抛弃这种思想，这是非常消极的。自己要时时刻刻努力主观改造自己，自觉地改造。在劳动上我也不是自觉的。在工作上时时刻刻觉得不像过去在社会上的那么主动精神，叫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也愿意把工作做好，但一碰到困难（如扫盲工作）心里就想不要要求得太多了，都是犯人和教养的，主要是改造思想。没有本着领导精神突破困难。任务完成的好坏没什么关系。

对人的关系上，三年来思想上是有变化的，不是建立在共同改造为前提的，过去倒不怀疑别人，以前有很多朋友，没有彼此的，教养后也带着这种精神。后来感到周围的人都不是单纯的，因此就抱以戒心了，自己有防人的心，因此就羡慕独善其身，并尽力学，我是很爱谈话，发表个人意见的人，所以也就克制不住自己。当别人提出与自己相反意见时，就不高兴，而表面上虚伪，说"好！好！好！"对王宝丰在生活上的管理方式上，表现不满，认为他是管理小孩子的样子。联系到这次学习，检查起来是没有存心害人的人，因此也联系到对汇报情况的看法，过去是有不正确看法的。

1960年劳动教养分子第二次排队登记表

单位：生产技术股

姓名：杜高　性别：男　年龄：30　籍贯：湖南长沙

原表现类型：三类

教养理由：右派　劳动教养时间：1958年4月18日

建议类型：二类

现实主要表现：

在上半年表现思想抵触，不认错，散布说："我原来单位不打算送我教养，是别部门提出的。"因而在教养两年来，思想很抵触，认为自己错误不大，经常违犯纪律制度。更严重的在工作中翻译小说。领导给予没收，他说"政府也得讲民主，按原则办事"等话不服从管教。工作忽冷忽热。在表面劝别(人)一通大道理，对自己毫不改正错误。

通过坦白检举运动以来，在认错方面是有了进一步认识，并能严格要求自己的自由主义。当领导派他到监狱学习汉语拼音，获得表扬，成绩优良，安心学习。回场后在教学工作很是认真，对扫盲工作很是重视，思想比先有了进步。但在靠拢政府方面很少反映问题并和就业人员吵嘴现象，作了比较深检查，同时现在对教养

期和今后前途问题考虑过多。

审查意见

审查人　蔡仲元(印)

1960 年 11 月

检查

杜高　1960 年最后一天

沈方白昨天中午的两个窝窝头，本来是中午就预备送回伙房的，当时伙房很挤，又考虑沈方白可能一会儿之后还要吃，我就给它搁在案子上了。吃过饭以后，接着开评分会，又接着工作，这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沈方白回去休息了，他的饭另外做了。

我在去打晚饭的时候，想起了中午的这两个窝窝头，当时，我的思想深处萌动了一个不纯洁的念头：如果沈方白不再要吃这两个窝窝头，那么，我就想不送还伙房，自己吃掉它。当思想深处一闪起这个念头之后，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念头很可怕，并且很可耻。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决定这样做，虽然我很想吃。思想上有矛盾，有斗争。

晚饭时，因刘仲遥对张干事的错误行为发生了，饭后接着就开会，一直到九点。这两个窝窝头就这么搁下来了。既没有当天送还伙房，又没有被我吃掉。那时，是把这件事忘却了。

今天早上来上班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两个窝窝头。这时候，我想吃掉它的念头增强了，但同时，自我斗争的程度也加剧了。我很苦恼。第一，想占有它，多吃一些；第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做一件类似这种偷偷摸摸行为的坏念头，心情上很惶恐；第三，自己问：为什么会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这么经不起考验？——所以，当时仍没有去动它，也没有吃掉它。不承认我思想深处的这个矛盾

是不诚实的。

学习以后，接着去洗澡，回来就接着吃饭了。这时，我想即刻去送还这两个窝窝头，这两个窝窝头从昨天搁到今天，已经很不对了，我怕群众发现这两个窝窝头直到今天还没有送回，而怀疑我有不纯正的念头。因为自己有不纯洁的念头，所以特别怕群众怀疑自己有不纯洁的念头。心情上很惶恐。正当这时，王干事当着大家突然问我，昨天的窝头还给了谁？这时，因为自己的思想深处正充满矛盾，情绪上正为这两个既不敢吃、又没有立即送回的窝窝头而苦恼着，所以一时不知所答。我当时的唯一的念头是在群众面前掩饰我的思想深处萌动过的“想吃掉它”这个可鄙的欲念，而让群众仍像以前一样相信我还是一个在做人的品质方面不至于堕落到如某些坏分子那样的人，所以，我缺乏勇气当众告诉王干事窝窝头至今还没有送回去，反而不诚实地说：“已经送回去了”，并且急切地要求王干事等我吃完饭以后再处理这件事。我没有想到王干事就要立刻问清这个问题，我更加难堪了。如果我当时从案子上拿出那两个窝窝头，那么群众就无疑会识破我思想深处的那个坏念头了。我这时只有硬着头皮维护自己，请求王干事等一等再处理，这就使我犯了在领导面前说瞎话的另一个性质的错误。

饭后，等王干事再来时，我向他告白了我的思想和承认了这两个窝窝头之所以没有即时送回是由于我的思想深处确实有着“想吃掉它”的这种可耻的恶劣欲念的缘故，而和王干事一起，把窝窝头送回伙房去了。

我现在感到很羞耻。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有勇气承认自己思想上确实存在过的那种可耻的欲念，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从这里得到教训。

“为什么在吃的问题这么经不起考验？而居然会在思想深处产生想占有这两个窝窝头的念头？”我问自己。能不能把这简单地看成是想多吃一点东西的问题呢？不能的。在对待粮食的问题上，现在尖锐地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立场。当全国人民都在自觉地减少自己的粮食定量来和天灾带来的困难进行斗争的时刻，当先进的人们以少吃一颗粮为乐事，以节省一粒米看成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尽了自己的责任的时刻，而我却产生了贪得别人的粮食的可

耻念头，居然在两个窝窝头面前表现了这样大的动摇，甚至还引起矛盾和斗争，我的立场难道不是很显明的吗？过去一个时期，我自我欺骗地以为自己在粮食这个问题上是站稳了立场的，但是现在，当我学习了三面红旗的文件，检查了自己的实际表现，特别是现在面临到两个窝窝头的实际考验时，那一切嘴上的空谈都破产了，反人民的，个人主义的贪婪本性就显现出来了。原先是隐藏着的，真正的立场便暴露出来了，于是，思想深处的那可耻的念头就产生了。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在接触到与自己的利益有切身关系的事物时，总是会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全体的利益而谋取个人的利益的。从对这两个窝窝头所产生的自私观念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浓厚和丑恶，有着自私的观念的人，必然在粮食问题上是站在反集体、反人民的立场上的。不从立场上来认识这个问题，痛切地批判自己，是不会真正认识这个问题的实质，即不会认识它的严重性，不会真正求得改正的。除了从立场上来认清产生这种坏念头的根源之外，同时，还应该认识到，这里包含着一个品质的问题。通过这种隐藏在思想深处的不纯洁的、企图占有别人的东西的、贪得的欲念的出现，我看清了自己的真正思想品质是何等低下，而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又是怎样根深蒂固。受过党和革命多年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近三年来又经过劳动教养这种严格形式的改造，思想品质上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不令我自己都惊异，并且感到羞愧而痛苦的。我自己设想了一下，这种意识是通向犯罪的，难道那些贪污分子，盗窃别人财产的分子不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恶性发展的结果吗？最近一个时期来连续揭发出来的许多人在粮食问题上所表现的恶劣行为难道不正是这种意识这种品质的表现吗？我的意识和我的品质跟这些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的想下去，我为自己而颤栗，我感到害怕，我立即揭露出它来。不立即正视它、改正它，让它隐藏在思想深处，让它再发展一步，那结果是不堪想象的。

关于两个窝头的批判会

刘绪兴提：

杜高的检查，真实思想活动是想吃，而不是有什么思想斗争，而是怕人知道。

过去说自己不愿星期日加班是为了节约粮食，这是两面派的手法。利用了马列主义，说一套，实际是另一回事。有一次对我谈，说我对特赦问题想得太天真了，应从政治上看待这一问题。因此能看出杜高对改造态度上的问题。

赵振宇提：

当王干事来问的时候，杜高还说交给于班长了，既然有思想斗争，为什么不马上承认。又说报纸发表灾害消息对自己起斗争作用，但为什么还不承认？

过去也并不是没散布过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言论，如很关心回家人怎样吃饭的情形，说自己可以每个饭馆吃二两粮票而多吃副食。关于与人关系，生活纪律方面的问题，也希望主动检查。

王宝丰提：

今天所谈并不深入，其他的一些错误也没交代。上次写了一封信，领导没给他发，究竟写了些什么，要交代。

于鸿慧提：

最近就窝头问题，跟一些人都谈了些什么？过去的检查是不深刻的，好像是读什么文章的学习心得，缺乏具体内容。关于所谈立场问题，但真正的、大的立场问题就不谈了，例如说汇报制度是害人。对市民买东西用购货证说是不方便。

刘仲遥提：

当王干事问到自己头上时，还编出了一套假想的时间、地点，

意思是诬赖好人。

赵振宇提：

实行计划供应后，杜高好羡慕我先买了一件绒衣，好像自己事先也应多买一些。

胡功勋提：

对我建议，叫我到北京饭店去吃饭，不要粮票。这说明自己在这方面也下了一些功夫。

杜高补充检查：

我在思想上是想留起沈方白的两个窝窝头而吃掉的。第二天王干事突然问起我这件事，我没勇气承认，怕面子不好看，就在大家面前说还回去了。我觉得是立场和自己的品质问题。过去我自认自己在粮食上是没问题的，站稳立场的。今天的事情就是没经得起考验。第二天报纸发表我国灾情的消息，我很悔恨自己的卑鄙行为。我口头上拥护定量，人民公社，但实际上行为是反人民的肮脏的。我也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品质。

当天我是要还去的。因伙房人多，我就摆在桌子上了。事后就产生了要占有它的思想。第二天上午也没有人问，我思想就更产生矛盾了，怕人知道，但又想吃。正在这个思想斗争的事后，王干事突然问起我。



杜高1960年年终评奖

优点：

1. 在遵守各项纪律制度上比以前有进步，并且能对别人的一些违反纪律制度现象提出意见。

2. 这个时期靠拢政府，曾向领导主动地反映情况汇报思想，政治态度也比较积极，如前两天政府公布了镇压一个反革命的布告，他说："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应该惩处！"

3. 在苦战38天中工作比较积极主动，如在做大图表做木盒的

工作中，能主动争取工作，情绪比较饱满，加班较多，也未叫过苦。

4. 工作中踏实肯干，能钻研，并能节约原材料，如在做大图表等工作中，能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工具材料问题，又如在协助胡功勋晒图时能节约原材料，得到了好评。

5. 关心别人的思想，肯于帮助同学，并善于从政治上帮助别人。

缺点：

1. 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还不够，如在工作时间内有空时还是看文艺书，这是领导过去批评过的，由于如此，又怕别人提意见，情绪有时较反常，不够稳定。

2. 遵守纪律制度还不够好，如未经允许自己买好香烟，并骂过邵维城"混蛋"。

（张光华提出，尹元文、于鸿慧、赵振宇等同意）

表决结果：全体通过杜高受丙等奖。

该分子通过教育后有很大转变，可以给予丙等奖。

李光荣

1960.4.2

历史登记表

类别：劳动教养　姓名：杜高

1960 年 7 月日填

姓名：现名：杜高　原名：李传惠

出生时间：1930 年农历 6 月 6 日

家庭出身：革命家庭　本人成份：文艺工作者

婚姻状况：未婚　宗教信仰：　民族：汉

现参加何劳动：晒图及其他杂务性劳动

文化程度：大学以上　健康情况：曾患肺病

专长：文学戏剧创作（俄文翻译）

籍贯：湖南长沙

现住址：湖南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 144 号

案情或教养理由：右派分子

刑期　收容教养日期：1958 年 4 月 18 日

历次所犯罪行或错误及处理情况：

我是文艺界的一个右派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之一，这个小集团以吴祖光为首。我们散布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流言蜚语，“同情”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骨干分子路翎，1955 年反胡风集团时，党因发现我所参与的小集团活动，曾对我进行了批评斗争和审查，1956 年，根据我的错误，给予了行政降级的处分，但保留了我的共青团团籍和中国作家协会会籍。但我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错误和诚恳地接受党的处分。1957 年初，这个小集团又死灰复燃，我并向党提出翻案，说什么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并攻击了在肃反中表现积极的个别同志。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我同情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并写过一篇错误的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在《新观察》上发表。而在反右斗争初期我的态度表现得也很不好。因此党决定给我劳动教养的处分。

家庭成员：

父亲：李仲融　男　58　共产党员　南京大学教授

母亲：陈璧登　女　56　民盟盟员　原任长沙小学校长
　　　　　　现退休养病

哥哥：李桑牧　男　32　作家　现居家养病

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社会关系人：

表姐：陈西　女　42　共产党员　北京中央农业部
　　　　　　肥料处处长

姑姑：李融中　女　50　湖南省委幼儿园园长

履历表：

自 1940 年至 1943 年，桂林新安旅行团小学，学习、演剧

（证明人）李仲融，党的工作者，父亲

自 1944 年至 1945 年，随母亲从桂林逃难到贵阳

（证明人）陈璧登，母亲

自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1 月贵阳民教剧团，演剧

（证明人）万流，该剧团主要负责人，朋友。《贵州日报》校对，现在柳州人民银行

自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中国胜利旅行剧艺社（从贵阳到长沙），演剧

（证明人）万流，该剧团负责人

自1947年2月至1947年12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

（证明人）陆诒，该学校主要负责人，现在上海《新闻日报》工作，师生

自1947年8月至1947年12月长沙《湖南日报》，记者

（证明人）汤炜，现在湖南省文联朋友

（证明人）梁中夫，现在湖南省委宣传部，朋友

自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衡阳《力报》，采访主任

（证明人）邹今铎，现在《新湖南报》工作，朋友

自1948年6月至1948年8月，长沙《小春秋报》，记者、编辑

（证明人）汤炜，现在湖南省文联，朋友

（证明人）梁中夫，现在湖南省委宣传部，朋友

自1948年8月至1948年10月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编辑

（证明人）曹明，现在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朋友

自1948年11月至49年2月，常熟青年军604团政工队演《小人物狂想曲》一剧，演剧。（证明人）李金声，现在上海音乐学院，朋友

（证明人）陈奇，现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朋友

自1949年3月至1949年5月，常熟《新生报》，编辑

（证明人）纪芒，现在贵阳文化局，朋友

（证明人）李牧子，现在上海盲哑学校，朋友

自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上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新少年报》文艺版编辑

（证明人）胡德华，党的负责人，现在北京团中央《新少年报》，同志

自1950年3月至1950年8月，上海总工会，下工厂体验生活

（证明人）范小凤，现在上海总工会任青工部部长，同志

自1950年9月至1950年11月，北京中国铁路文工团，写剧本

(证明人)王里,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同志

自1950年11月至1952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组

(证明人)楼适夷,当时的宣传部长,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同志

自1952年5月至1953年10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创作干部

(证明人)吴雪,该院院长。

自1953年10月至1954年末,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干部,创作干部

(证明人)陈白尘,现在中国作家协会

自1954年至1958年4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创作干部

(证明人)李之华,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



坦白登记表

单位:七车间设计组　61年1月31日

姓名:杜高　年龄:30　单位:七车间设计组

主要问题:

在去年12月中,我在粮食问题上有一个时期思想很混乱,围绕着"吃"的这个问题、犯了一些错误:

1)12月27日,我担任值日打饭,剩下有病号不吃的两个窝窝头,自已很想把它吃掉,所以没有立即退还伙房,直到第二天中午干事问起这件事时,自己还没有勇气承认没有送回去,企图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直到干事进行了批评以后,才把这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去。(这个错误我已向领导作了书面检查)

2)去年12月里,在一次看病的时候,我曾要求大夫考虑是否可让我晚上少工作二小时,我说:"一到下午以后,身上就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当时的思想是想多休息,少劳动。

3)去年12月的一段时期中,我不止向一个人说过这一类的话:"腿子发软,走路一点劲没有。"这些话今天看来,都是对粮食定量的一种不满的表现。

4)几个月以来,凡是休息的日子,周围的人都是谈吃,自己的思想中也就是想着"吃",所以也很愿意谈。在这类谈话中,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就是想多吃到一点东西,如果能让我请假出去一次,不管多贵,也得狠狠地吃一顿。"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是在散布一种不满情绪,好像我们现在真是"吃不饱"似的。

5)去年年底一个时期厂里病号较多,我自己的身体也有些不好,这时我就把病的原因推测为"吃得少了些"的缘故。我不认为是缺乏某种营养的缘故,我这样想:过去因为吃得很饱,所以大家的精力都很充沛,过去我们的食物营养价值也不都是很高的,但吃得很丰足,所以大家身体都很好。

6)去年底一个时期,思想上老是被"吃"这个问题纠缠住了,自己也很苦恼,想摆脱也摆脱不掉,吃了这顿盼那顿,而且吃下去像没有吃一样,思想上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整个的自己都被一种生物的原始要求支配了,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直到年底和张雨田干事的一次谈话之后,自己才重新在精神上振作起来,才开始以意志去战胜那种思想上的混乱状态。

坦白人　杜高(手印)

备考

徐福明检举杜高的材料

杜高曾说过:

1)"反右派时我听罗部长说过,谭惕悟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可是他现在摘掉了右派帽子。"

2)"胡业明(音,和他曾长时间在一起的教养分子,现在在兴凯

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

3)"现在咱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丰富的内容,除了买点东西,买顶帽子,还有什么?生活不就是只充满着这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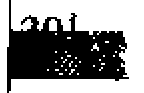
4)学习三面红旗时,他发言当中谈到美国,他屡次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剥削农业",这就是剥削的实质,从不谈阶级关系,不谈资本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

5)工作时经常看书,看报,写一些东西,效率很低,工作计划也无人检查,组长也不过问。

徐福明(手印)

1961.2.1

月终鉴定表



生产技术股　1961年2月10日

姓名:杜高　区别:教养　是否剥夺和管制:

是否正在受处分:　　事实摘要:

自己检查:

优点:(一)扫盲工作上,比较细致而耐心,得到过表扬,并能主动到生产股帮助抄写工作。

(二)思想上靠拢政府,汇报自己思想情况,态度诚恳,三面红旗的学习中,态度是端正的,经领导谈话,思想有收获。

缺点:(一)在粮食问题上思想混乱,想请假出去吃一顿,并企图贪吃病号的两个窝窝头。

(二)工作中磨磨蹭蹭,想回兴凯湖工作。

(三)生活上,在坐班及早晨洗脸上都违犯过制度。

大家意见:

优点:(一)在扫盲工作上有成绩。

缺点:(一)有思想问题,没有暴露,对前途,认罪服教方向都未检查,检查思想只是理论与口头上,所谈也是似是而非。

(二)思想意志薄弱,改造决心不大,处处原谅自己。

(三)工作中打不起精神,扫盲工作之后情绪不高。

(四)对同学鄙视,和大家格格不入。

(五)思想上错误是很多的。

小组意见:不评奖

车间意见:免予奖励

蔡仲元(印)1961.11.2

厂长批示

备考

教养分子杜高表现综合材料

1)自教养以来,不认罪认错,曾和教养分子于鸿慧、刘绪兴说"我不够教养条件,因为不教养别的单位有意见,所以才争取我的意见,送了教养。"因此不安心改造,不断违犯纪律制度,思想反常,劳动忽高忽低,并散布说:"我没有前途啦! 劳动教养没有什么追求的了,解除也好,不解除也好,都一样,好像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多吃一个窝窝头似的。"现在仍有严重悲观情绪和不满言论。

2)在服从管教遵守纪律制度很差,如在劳动当中看文艺书和翻译外文,领导阻止不听,反说"政府也得讲民主,按原则办事"。又如在教员室和就业人员赖新华吵架。谩骂教养分子邵维城"混蛋"。当别人对他经常违犯纪律制度提出意见,他反说"小题大做"。

3)靠拢政府极差。由于对教养期和定量不满,工作不能达到个人要求悲观失望,情绪消沉,领导找他谈话也不谈个人思想问题,而和犯人徐福明说:"像我们受过这么严重处分的人,这一辈子恐怕是完了。"

4)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三面红旗基本有认识,但有时散布不满言论。如对教养分子李跃华说:"目前形势很好,这就为政府对我们进行长期改造提供有利条件。"散布说:"报纸上没有报道陈

云、彭德怀的活动,这可能是犯了右倾错误。"当他在看报时,看到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的照片,和犯人徐福明说:"他不会有吃不够的苦恼。"他看到队长严厉批评教养分子,他很为不满说:"如果从社会职业来说,队长这种职务,实际上就是'狱吏'。""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目前身份的限制,对批评不能不接受罢了。要是让我在劳改单位,在犯人群里当一辈子的职工,我是会苦闷死的。"在徐快刑满时考虑就业问题,他说"最好我替你写两封信,一封给清华党委,另一封给五处领导,要求升学""将来我要找周扬、夏衍、刘白羽来挽救我"等等言论。

5)在劳动态度,极不端正。从兴趣出发,而不是认真改造自己,适合自己,便干一阵,如编写产品介绍一般能按时完成任务,但在劳动时间看小说,翻译外文。又如60年叫他学习汉语拼音成绩优良,回厂后积极钻研,想办法把汉语拼音教会大家。在扫盲教学中认真负责。以后叫他帮助整理技术资料,劳动态度极为消极,一天描三张项目表,装订本一天订三本,并经常不断在劳动中又偷看文艺书籍或翻译外文。领导批评他,他背后说"叫我干这活,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浪费。"目前劳动态度仍然如此。



6)曾受物质奖一次。

教养分子,杜高,右派分子,问题、情节较重,教养期间以(已)满三年,表现很坏。仍不认罪服教,多次违犯纪律制度,不靠拢政府,散布言论,劳动极不正常,消极,故根据现在表现,在(再)教养三年。

曹殿功　4.6

再教养三年　王文明　4.10

继续教养审查批示表

姓名:杜高　性别:男　年龄:31

别名:李传惠　籍贯:

案情性质:右派　收容时间:1958年4月18日

继续教养理由

该人系右派分子，问题情节较重，教养期间已满三年，表现很坏，仍不认罪服教，多次违反纪律、制度，不靠拢政府，散布反动言论，劳动极不正常，表现消极，故应继续教养。

教养年限：　　　单位意见：提议继续教养三年

王文明.(印)

1961.4.15

处长意见：同意：　李一平(印)4.15

民政局公安局意见：同意　陈树森(印)安林(印)4.15

市人民委员会批示：同意　冯基平(印)4.15

备考

北京市公安局　1961年4月15日

劳动教养分子登记表

1961年10月29日

姓名：杜高　性别：男　年龄：28　籍贯：湖南长沙

现住址：　　　类别：右派　有何技术及熟练程度：

劳动教养以前的职业：剧协创作室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父：李仲融，任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陈璧登，小学教员

北京只一人

来场日期　何时何地由何机关送来：1958年4月18日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刑事处分：

参加过何种反革命活动及流氓组织：

简历：

1937—1945年在长沙、桂林等地上小学中学

1945—1948年历任《贵州日报》、《湖南日报》、《中国时报》记

者、编辑等职

1948年12月—19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

19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志愿军文工团等

1953年调任现职

劳动教养原因:

该人自1945—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的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结其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等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该会已将其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备考:继续劳动教养三年

附注:一、用钢笔写,写正楷,不得潦草和涂改。

二、如有表内未包括的项目,可写人备考栏内。

1961年思想总结

杜高 62年1月

1961年,在我个人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一年。

1961年，是在紧张热烈的劳动、是在对暂时性困难的斗争以及丰收带来的欢乐之中度过去的。

1961年，是我的劳动教养的第四年。年初，在学习了三面红旗以后，进一步认清了国际和国内的大好形势，提高了政治认识，增强了改造自己的信心和自觉性，六月，我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接受了政府的调动，从北京来到了农场，通过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紧张热烈的劳动，使自己从实际锻炼中，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形势，更进一步地得到思想改造的实际的收获。因此，我觉得，1961年这一年，在我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是思想收获最多、最宝贵的一年。

首先是通过三面红旗的学习，对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的英明正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个学习中，我批判了自己在60年底在粮食问题上所一度表现的思想混乱，当时，因为自己患了浮肿，体力衰退，便开始对战胜暂时性困难失去了坚定的信心，在周围的一些错误言论的影响下，立场有所动摇，也散布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如"浮肿的原因是吃得太少了"，"腿子软得都迈不动步了"等，这一段时期，思想改造和劳动的情绪也表现出消极。通过了三面红旗和对大办农业方针的学习，认识明确了，思想提高了，精神面貌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于国家克服粮食问题上的暂时困难有了信心，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在前一段时期所表现的消极情绪实质上是政治立场背弃三面红旗的表现，只有站在六亿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观察现实的人才能真正认清三面红旗的优越性，并满怀信心地和暂时的困难作斗争。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是五月间政府对教养期限的宣布。当时我被宣布继续教养三年。这促使我认真地反省了已经过去的三年我存在的问题，并从领导的这个决定中体会到对自身改造的积极意义。我总结了三年改造生活的成绩和缺点，消除了对自己改造的自满情绪，发现了在我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主要的问题，归根结蒂仍然是认识自己罪错的深度不够，从自己的各个时期的表现中来检查自己认错服教的程度，我发现阻碍我进步和转变得更快的主要障碍仍然是改造的决心不大，对过去的自我还

存着一些原谅和留恋，因而在改造过程中，有时表现一些自满，认为“改造得差不多了”，有时存在着幻想，把结束教养的希望不是牢固地摆在自己改造的水平上，而单纯寄托在党的宽大政策上。联系着在认罪服教方面的问题，我也从遵守纪律、靠拢政府等几个方面检查了自己。在领导上的教育和鼓励下，我重新订出了改造计划，在1962年，决心在改造的道路上跨出新的一步。

1961年，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通过了实际劳动的锻炼，在思想改造上是有收获的，在政治上是有进步的。为了进一步争取改造，我现在根据五项改造标准检查自己在61年中的主要表现：

一、在认错服教方面：由于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看到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中亲身体会到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而联想到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从内心的深处痛恨自己，从而感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能洗刷自己的错误的过去，重新做人。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认错服教比过去的几年就有了提高和进步。一年来，没有在这方面犯过较大的错误，对于政府干部的管教是诚恳地接受的。表现得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是在夏收夏播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为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所鼓舞，我为争取小麦丰收的光荣劳动所激奋，政治积极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劳动上比较积极，能够紧密地靠拢领导及时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并且也积极地向周围的一切错误言行进行斗争。在这个生产的热潮中，无论在遵守夏收纪律或劳动、学习方面都受到了领导的鼓励，肯定了这一时期的成绩。

二、在遵守纪律方面：过去的几年中，在遵守纪律的方面虽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但由于自己在改造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便有过许多自由主义的表现，把一些生活方面的纪律看成是“小事情”，认为自己只是来改造政治思想的，一些“生活小节”影响不大。对于这种错误思想过去认识得不清楚，因而改正得也不坚决。在61年中，特别是到了583一队以后，在秋收的阶段中，在遵守纪律方面是表现得不好的。在场院的脱粒工作中，我违反秋收

纪律吃过生的稻谷，并且有两次把稻谷装在衣袋里带回来炒吃。经过领导上的教育，特别是把这个行为提高到“偷窃国家粮食”的高度来认识时，我才感到性质是严重的，便主动向领导写了检讨，提出了保证。如果把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表面化地去认识，对于提高自己的思想是没有益处的。生吃稻谷的丑态并不能以生理上需要多吃一些东西作为借口来解释。这里表现出了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暂时性的困难面前，我仍然没有经受住考验，以致公然地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秋收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的思想情绪是混乱的，有一个想法是“大家都吃，我也吃，反正无所谓”，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政治上犯过罪错的人，应该处处严格地从政治立场上来要求自己，检查自己的言行。正因为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改造的要求，消极情绪就得以上升，结果犯了错误。调到二队来的初期，也因为没有从政治上正视自己在违反某些生活纪律方面的错误，因而也有过点火热饭，和职工拉扯等违反纪律的错误表现。遵守纪律是改造的几个重要标准之一。与服从管教是密切地相联系着的。违反纪律，实质上就是不接受管教，不愿彻底改造自己的表现。这是我在61年，思想和行为上存在的妨碍改造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在靠拢政府方面：有一段时期是做得比较好的，在二分场麦收时期，自己能积极的靠拢政府，反映情况，因而那一阶段，思想上的进步就比较快，但后一阶段，到了583一队后，在这方面就做得不经常了。当时的思想情况是：“领导上很忙，我写过二次思想汇报，也没有得到领导的指示。队里很乱，队长分不出时间来管我的事。”因而也就不再积极地靠拢领导，争取教育了。在反映周围的情况方面，我做得也不经常，思想上存在着一个错误的想法：“有些小事情，何必给领导添麻烦呢？”其实，许多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也就在所谓“小事情”的下面放松过去了。在这方面，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自己是否在政治上完全和党和政府站在一起，是否把自己的整个思想和心灵都交给组织的问题。一年来的表现证明，我和政府仍然是有距离的，我还没有做到一切言行按政府的要求，一切话都和政府谈的程度。这一年中不同时期的表现，也给我自己很实际的启发，凡是我在靠拢政府方面政治积极性强一些的时期，

那么，这一时期我在政治上的进步就较明显，政治上就比较开展。反之，就会犯错误。

四、在劳动上：一年来我的劳动热情还是比较饱满的。在夏收夏播的整个时期，不管天气多么热，身体多么累，我始终坚持出工，做到了没有一天缺勤。但是在到583一队后，除了在秋收的割稻高潮中劳动情绪是饱满的之外，中途有一个时候，因为身体坏了，劳动情绪受到了影响，有时在工地，也没有始终做到力所能及地积极劳动，有时候以身体坚持不了来原谅自己。但是一年来的实际劳动给了我许多宝贵的锻炼，思想上有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收获。首先是，我培养起了对农业劳动的真诚的热爱，并且通过这个劳动，通过对于大自然的征服，真正从思想上树立起了"劳动创造一切"的信仰。过去，我把精神劳动看得高，以为作家的劳动是最"神圣"的，而轻视体力劳动，以为这种劳动是"简单的"、"低下的"，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被这一年来的劳动粉碎了，我不仅在理性上批判了这种错误的、反动的观点，而且从情感上开始感到这种思想观点是多么可耻！在这一年的劳动锻炼中，我初步地放下了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而决心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深感做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是最最荣誉和快乐的。但是，在这一年的劳动过程中，思想上不是没有斗争的。特别是当体力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劳动就成为斗争的焦点，有时候在思想上出现消极因素，劳动的热情就受到压抑，这时劳动就表现得不好了。同时，由于自己过去长期脱离体力劳动，劳动知识的缺乏也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但是在这方面我的进取心表现得并不强，对于农业知识的钻研在思想上还重视得不够。这也是劳动中存在的缺点之一。这也反映了立志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内行的决心仍然是不够坚决的。

五、这一年，在政治思想上的收获是丰富的、宝贵的。总的说起来，在政治上更坚定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并决心忠诚地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在这一年中，我没有在政治思想和言论上犯过大的错误，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政治思想是一贯地健康地发展着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一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以为自己的改造时间已经很长了，因此，逐渐产生了一种惰性，不再是积极争取，而是抱着习以为常的消极等待，我曾

经说:"教养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结束不结束,现在想得很少。"实际上这句话反映了对思想改造的一种厌倦,这是政治思想上的抵触改造的情绪,正是因为思想上还存在着这种消极的东西,才使我一年来的政治上进步得不够,改造的收获与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的原因。

1961年过去了。1962年在全国更好的形势下来到了。感激政府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为我们的改造准备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社会上大批右派分子得到新生的事实给了我极大的政治鼓舞,我将在新的一年中更认真地更努力地改造自己,从各方面严肃地要求自己,争取在不久后能达到自己的政治愿望,摘掉右派分子这一顶可耻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的处分,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

表现材料

教养分子:杜高　男　现年:32岁　长沙市人

现住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128号

案情:右派于58年收容,定3年,64年5月24日到期。

该人自教养以来表现一般,对自己错误稍有认识,在劳动上也能干点,对坏人坏事能及时的反映给政府,如徐继和看着窝头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当时给干部写材料。遵守纪律不好,有时偷吃农作物及菜,该人现患有肺结核病,不能参加劳动,整天在家休息,现其母愿将其接回长沙医治,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提议回家休息疗养。请场长批示。

园林七队　董维森

1962年7月26日

附来信一封

报管教股　市五　7.29

关于杜高申请保外就医的材料

1)领回就医的教养分子情况介绍表

填发机关：　　　　　　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公章)

(母亲的申请信)

队部负责同志：

顷接小儿杜高来信，始悉他于今春患进行性肺结核病，蒙组织爱护已予以治疗休养，作为家长，不能不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肺结核系慢性病，医疗过程可能较长因我家喂鸡养鸭营养条件较好，并且在湖南医学院左近，来往医院极为方便，因此请考虑是否可让杜高回家疗养，一来使他得到家庭照顾，二来也可减轻组织负担，一俟病情稳定后，当即命其返队生产。

致以　　　　　　　　敬礼

陈璧登(印章)

处理人民来信求访情况报告表

民字72号1962年8月3日收到

民字号1962年8月3日报(附原件)

单位领导审核意见：　　　　报处批准

黄敏代(签字)8.4

2)调查处理及答复情况：

右派队教养分子杜高，其父(应为母，原件如此)陈璧登来信要求其回家休养。

处理意见：

根据中队意见，提议准其回家休养，并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此信就不予答复。

3)劳动教养分子领回就医审查批示表，1962年8月10日

姓名：杜高　别名：李传惠　性别：男　年龄：32

民族：汉

家庭出身:革命职员　成分:文艺工作者
教养前职业:文艺工作者
现住址:湖南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 14 号
籍贯:湖南长沙　文化程度:大学以上
教养日期:1958 年 4 月 18 日　收容时健康情况:
简历:
1952 年 5 月—1953 年 10 月　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
1953 年—1954 年　中央文化部艺术创作室
1954 年—1958 年　中国戏剧家协会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李仲融　南开(应为京,原件如此)大学教授
母:陈璧登　民盟盟员,长沙小学校长现退休
哥哥:李桑牧　作家
劳动教养理由:

他是右派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之一,散布一些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同情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路翎,在肃反运动中提出向党翻案说:"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同情右派分子的言论,并写过一篇错误的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领回就医理由:

该人患有肺结核,不能参加劳动,整天休养,现其母来信愿将其接回长沙医治,家庭情况也很好,根据以上情况提议领回就医。

处理意见:

审查该人患有肺结核,长期不能劳动,现家长来信,提议领回就医。

赵岱　62.8.10

单位负责人:同意领回就医。

董尚斌(印)　杨春旭(印)

处长
局长批示
备考
北京市公安局五处　填表:赵岱　校对:　处理:

4.(致长沙公安局公函)

湖南长沙分局：

(62)团管字第号

兹发去我处拟病残的老弱病残就业人员杜高的档案材料一份，希你局提出意见速退我处。

此致

敬礼

第五处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公章)

1962年8月24日

分局意见：

湖南长沙市公安局程兆萃同志答复杜高可以回来，我们没意见。

联系人：赵倚

1962年9月21日

(五处另函)

团河农场：

杜高领外就医问题，经审查缺病情诊断书，补充后报处。

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公章)

1962.10.24



奖励批示表

姓名：杜高　年龄：32　单位：

事迹：

一、政治思想：

1. 政治上积极向上，对过去错误认识深刻，严肃认真改造自己。学习时积极发言，立场正确，在反修正主义学习时，能坚决与错误观点进行斗争，歌颂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坚决维护我们党的立场观点。2. 服管服教，靠拢政府，向领导反映情况，工作中忠

实贯彻领导指示，经常把中队的情况书面或口头向领导汇报。3. 对目前形势认识正确，坚决拥护三面红旗，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情绪饱满，常鼓励大家认清形势加速改造。4. 他原是长期休养病号，但积极参加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定量与工资，政治热情高。

二、工作情况：

1. 担任中队宣传员，积极负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方面，宣传工作成效显著，曾协助中队统计员总结自去年10月以来中队增产节约成果，根据场长报告精神及队部指示制定增产节约指标；2. 通过多种宣传形式开展运动，设立聚宝盆，展开搜集废旧材料活动，下工地组织劳动竞赛，进行门头鼓动，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逐项登记，并协助试制粉笔等项副业生产项目的实现；3. 出版墙报，大字报，黑板报，及时反映劳动情况，公布效率，进行表扬、批评，并专辟"好人好事栏"鼓励先进，以上宣传活动对提高中队工效，节约劳动力起了推动作用，群众对宣传工作反映很好；4. 自运动开始以来，经他一人自编自写，共出版专刊、快报、评论稿共45期，大、小稿件约180篇之多。

三、生活纪律：遵守制度纪律，从未与人争吵，坚持原则，待人诚恳，能帮助别人。

中队意见：表现一般较好，提议给予乙等奖。

董维森

1963.4.28

大队意见：

场长意见：同意，乙等奖

杨春旭

4.28

备考

五年来思想改造总结

杜高

一九六三年五月

这一次重新学习五七年反右时期的几篇重要文献，讨论过程中又联系着对自己过去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再批判，受到很深的教育。经过了五六年的改造，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立场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回过头看过去的错误，审视五六年来改造过程中的得失，觉得眼睛明亮了许多，头脑清醒了许多，也才真正地懂得了党是怎样地挽救了我，把我从一条黑暗的道路上引向了光明的前途。当我一提笔写这份总结性的文字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想要把感激党的千言万语一口气都写下来。

我曾经是文艺界的一个以吴祖光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右派分子。我的错误主要在于：1. 在革命队伍中进行小集团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具有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党的性质；并以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同党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2. 当党对我的小集团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在肃反运动中对这个小集团作了认真的审查和系统的批判之后，我非但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反而更加顽固地坚持错误，反党情绪更加发展，利用整风机会向党提出指控，污蔑肃反运动是"反人道主义的"，是"扩大化的"，是所谓"斯大林公式的实践"。到这时，我的错误已严重地发展到同党和革命产生敌我性质的对抗，党不得不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对我进行严肃的斗争，并作出必要的处理。



但是在反右期间，我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搏斗。因此，我虽然在运动的压力下面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却并不能由此而自觉地进行阶级立场的根本改造，我当时仍然受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蒙蔽，对错误产生的根源，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以及自我改造的途径，都仍

只是一片模糊的认识。

这以后，迄今五年多来的劳动教养，才是我一步一步地由被迫到自觉的转变过程。

我虽然出身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共产党员和老革命干部，母亲是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说，和党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但是，从我所受的社会影响和广义上的教养来说，却都是资产阶级的。从少年时代起，我便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理想，它以后就成为我的全部世界观的最核心的部分。我的少年时期经历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整个阶段，我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倾向过这个革命。在参加革命以后，我的思想水平也仅仅是一般的对旧社会的不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正义感，并未真正懂得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因而没有认清自我改造的必要性。相反，从旧社会感染来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气，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却同革命的利益格格不入，日益成为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的严重障碍。在我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与革命的组织纪律性经常所发生的冲突，真像"聚小流而成大川"一样，为我后来的严重错误埋伏了早期的根源。

我把文学工作当成谋名夺利的工具，在名利欲念支配下，我写了一些粗劣的作品，却自以为居人之上，有了向革命讨价还价，甚至同党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我把个人名望看得高于一切之上，无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当我穿上军装，和革命战士一同走上烽火的朝鲜战地的那一刻，他们抱着的是崇高的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而我所想的，却是怎样写出足以"流芳百世"的所谓"不朽之作"。

出自卑劣自私的动机来从事任何一种事业，那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就的，尤其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当他的灵魂浸透着腐朽的气息，他怎么能够创作出闪耀革命光辉的作品呢？

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并不到此为止。

当党和革命给了我许多远远超过我应该得到的荣誉、地位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以后，我并没有感激党对我的培养，却把这一

切归功于“天才的自我奋斗”。我开始狂妄地标榜个人才能，我把那些谦逊质朴的同志看做“庸俗之辈”；我陶醉于吹捧和赞语之中，我厌倦过组织生活，厌恶同志间的批评和鼓舞；我热衷于贵族文人的放荡闲逸的生活方式，热衷于没落才子的茶余酒后的清谈阔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革命同志相距愈远，却与另一群臭味相投的朋友愈靠愈近，共同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使我们形成了后来被叫做“小家族”的小集团。在这个小集团里，可以倾泻一切对党不满的言论和情绪，可以散布流言和蜚语。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垃圾桶。

到此时，我的资产阶级名利观已经不仅使我堕落到了一个与革命文艺工作者毫不相容的地步，而更是一步步把我推上了政治上反党的道路。十年前，当我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时候，我向小集团的伙伴们说：“若干年后，我们要坐满文代会的主席团的席位。”可见我当时的野心勃勃。我对那些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投之以蔑视，我在文章中宣扬所谓“人道主义”，“艺术的单纯和美”，“对人的爱”等等，总之，用这些抽象的资产阶级美学概念来与党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

1955年，当文艺界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时，由于我和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路翎的所谓“友谊”，党对我的文艺思想和与该集团关系进行了批判，我当时虽然一面公开写文章批判路翎的“作品”，内心却对他抱以政治同情，始终划不清政治界线。当时，党已经发现了我的小集团活动，为了把我们从胡风反革命派的影响下挽救到革命方面来，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但我却由于反动立场的顽固性，并没有通过这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幡然悔悟，反而从国际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里受到了鼓舞，他们的攻击立刻得到了我的阶级共鸣，更加煽起了我的反党情绪的恶性发展，在所谓“国内民主化”和“肃反问题”上我完全成了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政治应声虫。我和吴祖光、以及小集团的其他成员向党发动了卑劣的进攻，我向陆定一同志上万言书为小集团辩护，推翻党的结论，攻击文艺界的肃反运动，在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作品”，到这时，我们的这个所谓“纯粹友情结合”的小集团，已经彻底暴露了它的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它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右派小集团，而我作为党的凶恶敌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面目也已经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无遗了。

1958年4月18日，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我实行劳动教养的处理。从五年后的结果来看，党的这次处理是正确而有远见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要求，教育了广大群众，并且是使我个人真正走上了自新的道路，真正进行了一次阶级立场、思想观点的根本性的革命改造。这是我的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五年，也是充满着最剧烈、最深刻的自我斗争的五年。要在一篇比较简短的总结性文字中详尽地写出思想面貌变化的整个过程，那是困难的。我只想写几个主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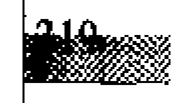
1.58年和59年的大跃进运动，使我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动。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我，第一次认清了和承认了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伟大，认清了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渺小。现实生活是这样改造着我的：我所在的教养单位的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发挥出来的干劲，所创造出来的奇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都是使我惊异不已的。那时候，我们每天忘我地劳动十几小时，谁也不感觉疲倦，几乎没有我们战胜不了的困难。白手起家，一天就能建起一座小肥料厂；一座大堤，一锹一锹，一筐一筐，十多天就能筑起来；一块土地，经过自己的手耕耘，可以打下一千多斤麦子。人们在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中团结得这样紧密，没有谁还会去想到个人的私利，想着的只是怎样取得集体的劳动任务的胜利。我融化在这个劳动的集体里，每天出工、收工，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当我们战胜了困难，取得了生产上的成就时，我们的欢乐是共同的。我开始意识到把个人融合在强大的集体里的幸福，特别是当我们处在北大荒兴凯湖那样比较困难的自然条件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成就不了任何事情的。从实际的生产斗争中所滋长起来的集体主义观念开始猛烈地冲击着我那“个人至上”的资产阶级偏见，我开始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劳动阶级是最富有集体性，最缺乏自私的观念，精神上最纯洁的阶级。

2. 同时，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又是充满着最尖锐的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的地方。这里有来自旧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带着

各自的丑恶的历史，可以说是各种反动、腐朽、黑暗的思想和意识的集合体。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思想上的两种力量的尖锐斗争。投入这个斗争，抵御反动思想和情绪对自己的侵蚀，在自己的头脑中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通过这个最实际的阶级斗争来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五年多来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思想斗争方面，我所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勇气都更超过劳动方面。因为这当中包括着一个和自己的旧思想、旧意识所作的艰难的斗争。在我所处的集体中，差不多每天都会听到不同的人对党和对现实生活所发出的各种不同的议论，有明目张胆的攻击，有牢骚，有怪话，有对现实的嘲讽，有的出自糊涂的观念，有的却出自阶级本能的仇视。总之，面对这比较复杂的现象，怎样去明辨是非，怎样去识破假象，怎样去划清界线，是否向政府揭露那一切不法的或错误的言行？是否敢于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批判那些错误或反动的观点时自己是否建立了正确的或进步的观点？这就不能不促使我去学习，去检查自己。五年多来，我经过难以数计的批判会和斗争会，看到过各种人的精神面貌，听到过各种音调的奇谈怪论。这一切，年复一年，使我学习到了最宝贵的阶级斗争的知识。而每通过一次这样的批判和斗争，总要使我自己在头脑里消灭掉一些反动的思想或错误的观点，因而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实际的改造。譬如，当我认不清一种反动思想，对它产生了政治上的憎恨，我就会尽一切努力用我所能占有的正确观念作为武器向它斗争，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立场就很明显地是在正确的一方面，而正确的观念经过了这样一次斗争也就更稳固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子。最初是学习来的东西，逐渐也就成为自己所固有的东西了。再如，当我认不清一种反动思想，或者同情一种论调，或者是那被宣布为错误的言行恰恰也是自己所有的，这时，思想斗争的程度就会更剧烈一些。五年来的经验通常是：经过政府干部的教育，群众的说理，事实的验证，开始有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然后和大家一起向错误斗争。而每经过一次类似这样的批判斗争，自己在思想上就会有比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受到的教育也特别深刻。

五年多以来，印象最深的，是 59 年、60 年的两次坦白检举运



动，1961 年初的三面红旗学习，以及近一年中对孟广居、陆浩清等人的反动言行的揭发和批判。

3. 五年来的改造，使我真正懂得了革命同反革命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也使我从无数具体的事实中，真正懂得了党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所进行的改造事业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性质。这对我的政治思想和观点的改变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过去，我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大力宣扬"人道主义"这个抽象概念，我崇拜一种"人道的"与"仁爱的"精神，我把这个概念和这种精神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因而在政治思想上把革命对反革命的统治同民主和自由对立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残暴的现象。五年多以来，我到过监狱，到过许多劳改单位，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犯人，我自己也经历着相同的劳动改造的生活，我不但没有看到过一件残暴的现象，反而无数次地被党和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所感动着。我看到无数个罪犯经过改造成为新人，获得了幸福、光明的生活。当资产阶级用残酷的镇压屠杀革命人民的时候，无产阶级党却用改造的手段给自己的阶级敌人以光明的出路，还有什么比这种革命精神更富于人道主义的感召力呢？用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在五年多的教养生活中受到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除了给予各种工作的机会和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来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以外，当我近一年来病重以后，我便得到了治疗和休养的条件。这一切实际经历粉碎了我过去的反动的政治观念，使我认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以及它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与人道精神的统一性。由于这一个政治观点的改造，使我在最近一两年来能够从思想上抵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蚀，识破修正主义者的"阶级调和论"的理论谬误和作为他们进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的"人道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4. 五年多来的俭朴的物质生活对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是逐年逐月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察觉出来。记得在 57 年的一次批判我的小集团的大会上，陈克寒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在政治上的堕落都是从生活上的追求享乐和腐化开始的。"可见物质生活对思想意识的作用，我在劳动教养以前，不事生产劳动，特别是从 52 年

以后，远离工农兵实际斗争，一味追求城市生活的享乐，这就使我从生活上向资产阶级方面的转化一直到政治上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为止。教养以后的五年多来，整个的物质生活方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三年抗灾以来的比较艰苦的物质生活的锻炼，使我的人生观，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都起了一个量到质的变化。教养初期，我几乎咽不下这样的菜饭，睡不惯这样的被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但是五年以后，真正懂得了一些创造生活的艰辛，不仅习惯于劳动者的简单朴素的生活，满足于粗茶淡饭，布衣粗衫；不仅不慕奢侈，并且感到了用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纯洁，最高尚，最有乐趣的人生。现在当我回忆起过去几年中的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贵族作风，回忆起灯红酒绿、杯盘狼藉的腐化生活的场景，真感到一种羞耻和情感上的厌恶。古人说的"以俭养志"这句话是不错的，我将深深地记取这一个教训，从俭朴的物质生活中培养起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志向。

最后，我还想写一点对劳动的体会。

同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一样，过去我在灵魂深处是鄙视体力劳动的，把普通劳动者看成是低贱愚昧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以概括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点，我当然也不例外。长时期的脱离生产实践，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逐渐也就养成了好逸恶劳的生活态度，因而教养初期，劳动成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不仅鄙视劳动，而且惧怕劳动，想尽方法躲避艰苦的劳动。过去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成天躲在书房里做彩色的梦，那自然是很轻松的事。现在要在烈日下面，风雪面前进行一锹一锹的脚踏实地的生产斗争，那自然是要艰难困苦得多，手要磨出血，脚要打起泡，腰会酸，背会痛，肩膀要扛得住重抬，脊梁要经得起重压，亲身一经历，才知道原先自己的舒适生活原来都是劳动人民的这样辛辛苦苦创造得来的，甚至连自己的一点点学识也都是靠了劳动人民心血创造，靠了劳动人民的抚养才得到的。从耕耘的艰辛到收获的喜悦，这才真正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这一个伟大的真理。

过去把社会的精神财富看得高于一切，现在才懂得一切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都是一刻也脱离不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创造的，社

会的存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无不要依赖劳动人民的一粟一菽的生产。通过几年来的实际劳动，不仅对劳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对劳动逐渐建立了感情。看到别人的劳动好不仅不去轻视他，反而会产生一种由衷的爱慕；过去感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是一种"快乐"，现在觉得闲下来就很不好过，觉得不劳而食是一种莫大羞耻。即使在休养的时期，也总想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劳动。当然，我还远远没有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但是我十分珍惜五年来的劳动锻炼在思想意识、观点乃至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和我所得到的一些切身体会。

是立志终身做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继续做一个精神劳动者，这当然要看整个社会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否能够决心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更应该作为我检验自己是否已经彻底抛弃资产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的最重要的标准。在联系自己的未来所作的种种考虑中，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说仍然充满着两种意识的斗争。因而我时常意识到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艰苦性。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写下来的：经过五年来的改造，我觉得我的整个立场、观点、思想意识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词句上的，而带有根本上的阶级性质。这是党和政府的挽救教育，长时期以来的劳动锻炼和严格的集体生活的锻炼所带来的结果。

我觉得在往后的一生中，我能够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我的幸福和光荣。

我将把我的整个生命完全交给党和国家，不计较个人的私利，不谋个人的所得，在农业战线上和一切劳动岗位上，用忠诚的劳动来报效党和毛主席。这就是我的志愿。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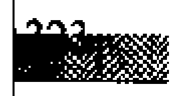
杜高评比材料

（二季度）

一、思想方面

改造情绪一贯安心稳定，自己身体不好（肺结核），受到领导照顾，担任中队宣传工作，本人表示："领导上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的改造环境，从各方面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自己还不好好改造，做一点对人民有利的工作，就对不起领导。"在宣传工作中，能一贯及时地通过黑板报、喊话等方式，贯彻队长指示，鼓动大家的劳动热情。

对目前社会的大好形势，有明确认识。多次向大家宣传个人家庭来信及接见谈话所了解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好转等情况，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拥护及说明党的政策的正确。如有一天报纸副刊登了一首歌颂麦收人们集体劳动的力量比宇宙飞船更伟大的诗歌，他立即向人们介绍。



二、学习方面

本季度处于麦收、夏种大忙阶段，同时时事政治学习也很重要，他不仅自己遵守学习制度，而且对别人说："劳动这样紧张，学习也抓得紧，思想怎能不进步呢？"

在学习中，能深入领会文件精神，态度严肃认真。

他经常给大家读报，并仔细阅读了党中央关于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学习时的体会说："苏共二十大以后，受到国际上刮来的一阵歪风的影响，自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通过这次反修正主义的学习，认识到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斗争。自己领会到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在整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相当复杂尖锐和曲折的，只有认真地领会党的各项政策，才不致在政治上走弯路。"并说："对所谓反对个人迷

信及反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看到苏联大学生砸碎我国宣传橱窗的消息后，他表示非常愤怒，会上有人说，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苏联学生在课堂上受了一些反华宣传的影响而这样做的。杜高当即根据事情发生的细节，指出这是修正主义者经过精心策划的一次预谋，不能把问题的严重性冲淡。

三、靠拢政府方面

对领导所号召的各项运动，除通过宣传工作及时反映外，并能把自己在工作中看到的好人好事及生产中发现的问题：如拔菜时的质量问题，麦收起场时有些人收麦秸时麦粒未抖净等及时向领导反映，并通过质量检查及喊话等改进工作。

对个别人违反纪律，如郭锷权偷吃修建人员西红柿等行为，能进行调查，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

四、劳动方面

宣传工作密切配合麦收，增产节约及卫生运动，认真贯彻队部指示，及时反映生产情况，进行表扬批评，对推动生产起了良好作用。

在工地除进行宣传工作外，并参加劳动，如外出变工时，协助炊事员送饭，搬运秧芽，帮助别人拔菜、做埝，在麦收时，清扫场院等。

五、纪律方面：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制度，在对人对事方面，能坚持原则，待人热情，乐于助人。重视卫生工作，主动参加清扫环境等卫生工作。

（刘佛生整理）

（此件无日期记载，应为1963年）

季度评比材料（1963）

杜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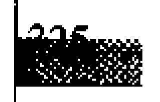
四小队杂务组

一、政治思想

1. 通过反修正主义学习及反右文件学习后，对个人罪错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检查自己说："在反右初期自己还不承认右派是反动派，经过几年来的改造，回顾所经历的道路，再学习当时的文件，自己的心情是沉痛的。当时，自己是有言有行的，不仅自己写文章攻击党，并向《文汇报》介绍别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政治上影响非常恶劣，自己还有政治野心，有小集团，比一般右派分子罪行更严重。回想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多年，从小就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不应该以怨报德。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和改造，自己在立场观点方面，有了基本的转变。"

当他和同组刘佛生谈到党的领导时，他说："过去，自己只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认为不接受单位党政负责人的领导，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现在，认识到每个单位的党政干部都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必须服从他们的具体领导，听党的话，踏踏实实地完成他们交给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2. 服从管教。在宣传工作中，能够认真领会政府干部各项指示的精神，并在群众中贯彻执行，无论是出版稿件，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事先均向政府干部请示，事后把实际效果总结汇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及时向领导汇报各小队情况。他不仅运用大字报、黑板报等方式开展批评与表扬，并且每天都把自己在工地所见到的情况，用书面或口头向队长汇报。



3. 对目前国内的大好形势有明确认识，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情绪饱满。春节期间，他曾请假回湖南家乡一次，回场后，他积极把亲眼所见的情况向大家介绍，鼓励大家加速改造。他说："在社会上，完全看不到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的痕迹，人民觉悟很高，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人民对我们并不歧视，而是希望我们加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中间。社会物质供应充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别人问他回家的感受时，他说："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形势大好，加速改造'。"

4. 在反对修正主义学习中，思想敏锐，立场坚定。

在《人民日报》未公开发表反面文章和进行批驳时，他在和郑伯才谈话中，就敏锐指出，赫鲁晓夫一修正主义集团的指挥，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我党这次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

历史中起重大的作用。

对各种修正主义论调和模糊认识，能够揭破其花言巧语，指出其阶级实质，不仅对我党的各次批驳和措施表示拥护，而且能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的各种论点，一一加以分析批判。有一次，他所在小组殷畅宙等人提出："如果苏联不把导弹运往古巴，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制止美国侵略呢?"杜高当时就指出殷等问题的实质是不同意我党批评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多方面给予批驳。

《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各次反修正主义文件，都由他给大家读，大家反映：杜高读报，不但让大家在理论上弄清大是大非，而且在感情上也能受到鼓舞，充满对我党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5. 杜高原系长期休养病号，回家返场后，无论在言谈及劳动中，对政府的照顾均深表感激。当身体情况好转后，进行半天劳动，直至全日出工后，对个人定量及工作从不计较，在平日，对自己改造中的收获和体会，均能正确认识到是党和政府干部耐心教育的结果。

二、劳动及工作

1. 在半天劳动编筐时，他在短短的四个半天中，就掌握了编筐技术，在编筐时注意质量，认真学习，由完全不懂到半天能起底，收边二个。平日也主动干些在编筐中较吃力的工作。

2. 担任中队宣传员，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能忠实地贯彻队长和董干事的每一项指示，深入动员组织各小队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成效显著：

1)协助中队统计员，总结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中队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并根据场长及队部的指示，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项措施及指标。

2)坚决依靠领导，贯彻队部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多种方式，协助领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及时下工地，了解劳动生产情况，并和大家一起劳动，利用"增产节约墙报"和"好人好事"等大字报、黑板报等进行表扬和批评，宣传节约，反对浪费，对提高全中队的工效、节约劳动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设立"聚宝盆",搜集废旧材料,交工具房重新利用,改制工具。

积极组织各小队提出合理化建议,并逐项登记,提供领导参考,并自己动手和袁嘉祖一起试制粉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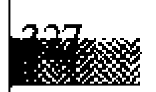
3)每天总结各小队的劳动竞赛成绩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向领导反映,公开批评、表扬等不同方式,协助领导开展工作,鼓励帮助生产上消极的同学,扭转落后局面,赶上积极的。工地上午的情况,下午就能在黑板报上反映出来,自运动开始以来,经他一人自编自写,其出版专刊、大字报、黑板报共45期,稿件约180多篇之多。

三、对各项纪律制度均能遵守,从未与人争吵,在生活中能与人和睦相处,见到别人吵架时,能进行劝阻、制止。遵守作息制度,重视个人卫生。

(刘佛生整理)

(此件无日期记载,应为1963年)

杜高评比材料(1963)



一、政治态度方面

第一,杜高非常注意政治时事学习,每天都关心地阅读报纸,尤其近来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古巴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他都很严肃地加以思考,而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他看到意共、捷共代表大会对我们党进行片面攻击时,就担心地说:"看来这样分歧会愈大,希望不要再这样,尤其苏共领导这样支持这些做法是很不应该的,这将会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团结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又曾说:"赫鲁晓夫居然滚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了,真是想象不到的,不过也不奇怪,在革命的历史关头,总会有些人会掉下车子去的。正像列宁在第二国际变质前的处境一样,我们党暂时看来似乎是少数,但历史会证明中国党将是正确的。"

与此相应，杜高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拥护的，平时谈天中能联系自己过去犯的右派错误进行批判，如曾对值班员谈到自己过去因为家庭出身较好，从小就跟着父亲的革命前辈朋友，后来又受到党的培养，才成为一个年轻的作家，但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自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革命思想逐渐泯灭，所以堕落成为吴祖光集团的右派分子，非常悔恨。通过这几年的教养，知道今后必须彻底从人生观改起才能达到真正改造好的目的，因此今天改造他是很安心的。

第二，杜高虽是病号，但积极靠拢政府，对反动言行进行有力揭发批判，如过去陆浩清在组内说"干事找我谈话，我才知道了底，我到期没有解除，我要向场长控告"等言论都及时汇报给干事，并在会上坚决斗争，又如后来在运动中对孟广居抗拒改造的言论，殷畅宙散布的对政府对定量不满的言论（如殷说他偷吃老玉米棒子是饿的，吃得牙都疼了，但不得不吃，等）都做了有力揭发和批判，是组内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最坚决、最深刻的一个人。

第三，杜高在搞宣传工作中经常坚持政治第一，任何稿件或宣传形式他都从政治意义角度去审视，提出意见，并坚持请示报告然后进行工作，使宣传工作起了积极推动劳动的作用，很受大家欢迎，改变了过去为文艺而文艺的观点（他以前是文艺工作者）。

第四，他政治热情很高，在国庆、新年的庆祝准备工作中，虽然有病，但常全日工作，有时还加夜班，他的投稿内容也充满对祖国、对党的热爱，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

二、劳动方面

杜高因肺病，来不久就全休息，近两个月来半日轻劳动，做宣传工作，他除了有时身体不好外，总是不分早晚投入这项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工作踏实，愉快主动，能无条件地接受交给他的任务，而且做得很有成绩，如国庆和新年的庆祝活动，都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在工作中还能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如总是在炕沿上写大字报，尽力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同时主动提出计划请示领导，推动整个宣传工作。

第二，天寒风大，他又有病，但常去土方工地采访宣传材料，并在工地上广播，宣传鼓动劳动竞赛，为了和大家同享劳动的愉快，他抱病也和大家抬几台，所以杜高虽然参加体力劳动时间不多，但从宣传工作一段来看他是尽到力所能及，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这个任务。

三、纪律方面

杜高初来不几天，曾有过一次吃作物事，经队长批评后，自己认识了错误，下决心改正，此后完全没有犯过纪律，并且还积极地向违犯纪律行为作斗争，如张道达徐继和二人清扫厕所时常不好好劳动，到六处去共同偷吃作物，他及时写了书面情况汇报，又如殷畅宙的屡次犯纪律大量偷回玉米种子被发现后，开会时他尖锐地指出殷畅宙偷吃作物不单是因为饿，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对抗政府的定量政策，殷畅宙说"我定量32斤，身高一米八七就是犯纪律的一切原因"。杜高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原则的抵触，不是满意按劳分配，而是要求"按高"分配，等。

所以杜高是维护了纪律。

（刘佛生整理）

（此件无日期记载，应为1963年）

单位　园七队



奖惩批示表

1963年7月25日

姓名：杜高　年龄：33　案情：右派　刑期3年

1961.5.25起1964.5.24止

事迹：

1）安心改造，情绪乐观，他说："领导上给我们安排三余庄这么好的改造环境，自己患肺结核得到领导的关怀和信任，担任中队宣传工作，自己应该好好改造，把政府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他不仅

自己认真对待改造，并经常帮助鼓励别人，经常与人兴奋地谈到社会上的大好形势，丰收，人们的喜悦，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拥护。

2)学习认真严肃，对我国党的历次言论，都有较深刻的体会。他说："这次反修正主义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整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仍是尖锐曲折的，只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对苏联大学生砸碎我国宣传橱窗，有人说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在课堂上受到反华宣传的影响，杜高当即指出，不能降低事态的严重性。他根据事件的细节，指出是经过预谋策划的。

3)经常以黑板报、喊话等方式贯彻队长指示，并将自己在工地发现的问题向领导反映，对郭锷权偷吃西红柿的行为，也进行了揭发。

4)密切配合麦收及卫生运动，及时根据队长指示，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大字报，黑板报进行表扬批评，推动生产。

主动参加劳动，如协助炊事员给工地送饭，检查拔秧质量，清扫环境卫生及麦收起场等。

5)遵守纪律，待人热情，重视卫生工作。

中队意见：虽有些缺点，但在宣传工作尚起到些作用。

提议给丁等奖。高原松

中队意见：提议给予丁等奖。　　　　宋翊宾(章)　7.25

场长批示：同意。　　　　　　　　　杨春旭(章)7.26

备考：62年终，乙等奖，63年初，乙等奖。

检举材料

九月十二日傍晚吃饭时杜高单独来和我一起吃饭，他和我谈起白天管教干事来过这里，并且指着孙本乔说，也许他能提前解除。他说，还有八个半月我们也该解除了，我说解除了争取回家一趟。他说："多可怜的愿望，希望是一个一个的幻灭，剩下的只是实

际的了。"他又问我："最近看报了没有？德共为中国右派喊冤，说中共打击报复了应该团结的知识分子。"他又说："傅雷在摘帽子以前就已经翻好了《搅水女人》一书，出版社要他用笔名出版时，他回信说我只有一个名字，要不把稿子寄还给我，结果帽子摘了，书也出版了。"

九月十三日晚上他又问我你的小队有没有人对报纸上的事有勇气提出相反的看法来，我说除了朱仲康有时发些谬论外，别人的发言都是正面的。他又问我谢自渝的思想倾向如何？我告诉他谢自渝在小队里起骨干作用，他说："在表面上这样，真正的思想是这边还是那边？"他当时用手势比着左和右。他又问我杨路的情况，又问我了不了解陈海铨，我告诉他我不了解。

后来殷畅宙和范森来吃葡萄，他说你们多吃一些吧，你们的饭量大，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你们的定量问题，你们的定量也太低了。当时殷畅宙说，我准备再坚持八个半月，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了。当时我很惊异，因为在我印象中过去杜高对他们两人的印象都不好，怎么一下子变得那样的亲密，而且偏偏找他们两个人谈定量问题。他们两人曾经为了定量问题闹过很久。根据以上一系列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我认为杜高近来的行动是可疑的，我估计他想拉拢一批人在他的周围（今天晚上他又和范光斗在一起吃饭谈了很久），这批人大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思想上不太健康的，他这样做和这样说肯定都是有用意的，利用目前国际上的混乱来做一次投机的买卖。

希望队部注意他的行动。

朱维民（手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

杜高1963年年终总结评比材料

六三年主要是因病休养，一部分时间担任中队宣传工作。一

年来对自己罪错有进一步认识,感激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因此,政治热情比较高,改造中表现安心,情绪乐观。在宣传工作中能够尽力配合政府各项号召,贯彻队部指示。年终协助队部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搜集整理和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配合每一时期生产任务刊出一些宣传稿件,鼓动全队劳动热情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节日和假日负责组织各项文体活动,活跃生活情绪。在这些工作中,一般地能认真贯彻领导意图,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在组内能够对人展开批评帮助,亦容易被人接受。夏季为了加强学习,还利用每天业余时间给全队读报。通过宣传,督促全体人员注意卫生,个人也每日参加清扫环境卫生劳动。

学习中原来在二小队发言较多,到一小队后曾有一段时间发言较少,经提出后,立即改正。发言内容深刻,有系统,能够结合思想谈出自己认识。平日对政治时事关心,经常读报。遵守会场纪律。

遵守纪律方面做得不够,自己检查有如下违犯纪律事实:职工王天乙找他看给新华社俄文译稿的一些意见,商谈意见内容;给职工袁家祖思想总结做文字修饰;五月份托白玉书从他朋友家为他带回一包炒面。

缺点:1)秋收中由于身体已逐渐恢复,宣传工作之余参加能负担的轻劳动不够主动,比如在剥玉米时既未固定在本小队劳动,又不是去搜集宣传材料,面去和职工权上正边聊边干;2)北河堤上白菜施药亦未积极参加,队长曾提出批评。

杜高鉴定材料

一小队四组　1964.3.21

鉴定时谈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他说:"教养几年,对自己的罪行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刻。我的罪行很大,组织小集团,写反动文章,这都是反党活动,我和小集团要党接受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错误的基本原因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改造以来，特别是通过大跃进，看到了集体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才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观。”

教养以来是安心改造的，因有病，仅58年在兴凯湖参加劳动一个月，62年在清河劳动半年，63年冬季参加半日劳动，从今年二月起全日劳动。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做宣传工作。58年在兴凯湖参加布置展览会期间曾受奖一次，59年临时派到北京去做展览会工作期间受奖一次，到团河以后，62年年终得乙等奖一次。到团河以来做宣传工作时，经常协助值班做整理卫生等杂活，宣传工作方面，平日每星期左右，不定期地编写黑板报，每逢生产高潮（如拔秧、麦收、土方、秋收）黑板报就多些，有时一两天出一次，在这一工作中，他做到了严格按照政府指示办事，一切内容都经过请示或经队长审阅才发表。历次生产运动中，他经常担任工地宣传，也是严格遵照队长指示进行的，主要内容是批评、表扬。由于严格地执行了领导指示，所以在宣传内容上没有发生问题，并且对生产、学习和卫生工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除卫生工作以外，在拔秧、秋收时曾参加中队组织的质量检查组，把宣传工作同质量检查工作结合起来，及时发表质量对比排队，指出缺点，表扬好的，在这方面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作为中队宣传员，他多次给全中队或全小队朗读报纸，读得很好，工作有热情。



政治学习方面，他发言次数不算多，但对学习是抱着积极态度的，经常看报，学习时精神集中，发言不空洞，通过了思考。讨论“二评”时，他发言说：“苏共领导借反对斯大林全面地对马列主义进行修正，苏共20大提出和平过渡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借反对斯大林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关于斯大林问题不仅是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当时我们党立即发表‘论’与‘二论’来批驳这种理论。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领导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好流露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情绪。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问题是以肃反问题为中心，正好表明修正主义在攻击专政理论。由于斯大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而把问题弄得比较复杂，对待斯大林的错误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共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讨论“四评”时他发言说：“通过学习这个文件，我们应当认识到全国正在展开阶

级教育，其中有国际主义教育，即树立新的世界观……赫鲁晓夫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实质上是反对革命。目前我们的劳动不仅是爱国主义表现，也是国际主义表现，我国建设好，别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有更大可能获得解放。通过文件，应该树立我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建立新的世界观，加强改造信心。"在讨论当中，有几次别人发表糊涂看法，他便同另外几人(冯志轩、范光斗)提出反驳，例如去年11月讨论"四评"的时候，吴志祥说："美国只有国外市场，没有殖民地；苏联既没有国外市场也没有殖民地。"杜高当场反对这种意见，说明美国是新殖民主义者。同时期，邱清遒在会下同杜高闲谈时说，过去总认为苏联好，现在应该对苏联改变看法了。杜高对他说："不要否定了苏联。我们对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我们只是反对修正主义。"

在靠拢政府方面，杜高做过一些工作。1963年夏季，郭锷权偷过职工放在暖房里的几个西红柿，起初不承认，经杜高同他个别谈，他承认了，杜高便汇报了队部。1963年9月，殷畅宙偷白薯，送给缪光谦一块，被发现后，缪光谦为了包庇殷畅宙，不肯交代事实，只说是自己偷的。杜高同缪光谦谈，动员他说实话，他才谈出是殷畅宙送他的。1963年国庆，杜高负责编排墙报，朱维民担任画报头，要画一张讽刺画来嘲笑修正主义者。杜高根据领导指示，告诉他墙报内容不要涉及赫鲁晓夫等问题。朱维民不听，杜高坚持未经请示审查不能发表，结果没有发表。并曾面对面地揭发过孟广居、陆浩清、何修俭、徐继和的反对言论和违犯纪律行为(1962年)。

缺点：

1. 对劳动不够热爱，虽领导照顾半日干活和干轻活，但自己缺乏主动争取多干些活的劲头，长期没有正式参加劳动，即便参加劳动也抓得不够紧，如63年夏季菜田追肥、秋季剥玉米之类的活，是可以干的，他也做了一些，但很少正式地干半天或相当于半天的时间，干的少，干的时间也少。1964年以来全日参加劳动，比过去有进步。

2. 1963年5月，曾未通过领导托白玉书从北京带炒面一包。另外同职工来往有：1963年秋收时，曾帮助汪天乙校阅俄文译稿，

1963年12月，曾为袁家祖审阅思想总结材料（袁家祖请他修改文句和错别字）。

记录：王京　整理：刘乃元

杜高1964年一季度评比材料

一小队三组

1964.4.20—21

一、思想改造方面

1）认罪认错方面

对自己右派错误认识清楚，改造情绪乐观，在谈到自己错误时曾说："过去几年虽然认识到自己错误严重，但总是把它当作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并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现在就真正认清我过去小集团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认清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政治性质，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做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由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实际表现是服从政府管教，听领导的话。



2）对三面红旗的态度

他看到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比学赶帮运动蓬勃开展，因而表现在自己行动上是：积极投入劳动，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和整理材料进行工地宣传，推动各小组小队工作。他说："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在改造中做得多做得好。"支援灾区时他主动提出捐献粮食支援。从行动上他表现了对三面红旗的衷心拥护。

3）靠拢政府方面：能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春季卫生运动中，组织全队检查、评比，通过黑板报、口头广播、个别督促等方式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推动卫生工作。在比学赶帮中，除了向全队

宣传队部号召和指示以外，每天早起广播好人好事，对推动运动起一定作用，大都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些工作。

为了使领导上及时掌握运动情况，他每天将全队运动开展情况，及时整理汇报。

能够及时向政府反映情况，如姚志成怕报复不敢揭发缪光千的言论，当即向队长汇报，范光斗对年终思想总结不满的言论也及时汇报；平时对不正确的言论也能批评帮助，如有人对义务劳动有牢骚，认为多干了，他说："义务劳动就是应该争取多干一些。"

学习方面，能认真阅报，看文件，讨论会上发言等均表现积极。

二、劳动表现

去年三、四季度中本人有病稍好，除做些宣传工作以外，对积极争取劳动不够，有些松懈。但在今春人工湖土方工程中就开始克服松懈现象，大部时间跟大队出工去人工湖，一面配合全场搞宣传，开展竞赛，一面参加土方劳动。最近，劳动与表现更为主动，在场院劳动时并能协助小组长工作，组织劳动。小组评为标兵，受到队长表扬。挖肥料坑时，干得很猛，和强劳动力一样干，效率达到方。



运动中参加小组小队组织的义务劳动表现突出，如四月十一日运炕坯积肥，因工具不齐，他就迅速地用手装筐，动作快，热情高，藉以带动别人。各项义务劳动均能积极参加，如散肥，拾肥，平埝等。

为搜集破废材料，组织全队聚宝节约活动，取得一定成绩。

三、遵守纪律制度方面

个人遵守纪律制度，并能维护纪律，比如：四月十日下午值班忘了打起歇钟，他在工地及时叫大家干活，并赶到二小队督促他们起歇，虽遭到个别人讽刺打击也不动摇。

缺点：劳动中偶尔表现出坚持性不够，如说"腿酸了，手腕酸了"等话。有时聊天不顾影响，如同贺义大声聊天，别人制止。

记录　冯志轩（教养分子）

整理　冯志轩（教养分子）

一年来的总结(1963.4—1964.4)

杜高　1964年4月12日

63年4月,我曾写过一篇关于5年来思想改造的总结性文字,在那篇文字里,我力图根据当时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对我曾经所犯过的右派错误,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及其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做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批判。通过这一个再批判,通过对于5年来思想改造的种种艰辛曲折的经历的总结,我觉得在自己的世界观、思想立场、政治态度、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方面,较之5年前都有了一个基本性质的改变。在那篇总结里,我分析了我的主要错误——小集团活动,从它一开始就具有的分裂革命队伍和反党的性质,以及我的反党情绪是怎样发展到同党和革命产生敌我性质的对抗;我的资产阶级名利观是怎样使我从政治上堕落、怎样一步步地把我推上反党的道路;在那篇总结里,我已经得到这样的认识:我把我的错误归结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图谋复辟的表现。"我把我的错误当作阶级斗争的现象来认识,这样就加深了我对它的严重政治性质的估计。

现在距离写那一篇总结性文字,又过去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辩论,与之相联系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全国正开展着一个同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路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从来未达到像这一年中如此尖锐、剧烈和深刻的程度。就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一面受着革命思想的教育,一面经历着政治立场的锻炼和考验,一面把我的思想改造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年中,我在政治思想上的提高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更加显著,党中央对现代修正主义者展开的原则性斗争,以及连续发

表的批驳修正主义的理论文章，不仅使我提高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而且使我在政治立场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上都受到了一次最有力的锻炼。因为认识到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前景，因为认识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这一代革命人民的伟大历史使命，我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不抱更加严肃的态度，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要求就不能不更迫切，对自己过去犯的错误和曾经所受到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也就不能不作最后的彻底的决裂。就是这样，我一面学习党的文件，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一面清算自己的过去，一面向革命的方面自觉地转化。

一年来的基本情况是：思想改造的态度是积极的，情绪是稳定的，政治上是靠拢政府的，对前途是有信心的。因而这一年来总的趋势是健康的，改造是有收获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够的地方。但这些，通过领导上的教育，我正在努力地改正。

下面，我将在几个具体方面作一个小结：

一、响应政府号召方面，我的具体表现

一年来，政府对我们多次进行形势教育，并在不同阶段发出号召。对政府的各次号召，我都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尽我所能有的力量积极响应。63年4月，全场展开增产节约运动。我执行着队部指示，首先通过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我在队长领导下组织了全队合理化建议、节约献宝、工地劳动竞赛等各项活动，并编辑大型墙报、特刊，编写黑板报100期以上，及时反映运动中的好人好事，把群众的自发活动有意识地引导到队部指向的正确方向。除了宣传工作之外，我并参加拟定全队增产节约的规划，在队长的领导下通宵地进行工作，同时也提出个人的增产项目，曾与袁家祖一起试制成功粉笔，作为副业增产的一个具体项目。

7月，场长号召全场行动起来支援河北灾区。我受到感动，最早向队部申请每月节约2斤粮食献给灾民。

冬季，场长号召大干20天，完成人工湖土方任务。我执行队长指示，每天在工地组织竞赛，进行工地鼓动工作，并在工地出版快报，及时表扬好人好事，在工地编写通讯稿，向全场广播我队生产进度和竞赛动态。在工程结束以后，我与朱维民合作出版大型画刊，在“热火朝天的20天”的题目下，歌颂全队人员响应政府号

召所表现的冲天干劲和所取得的成就。

64年1月，全场号召以革命精神展开卫生运动。我积极地投入这个运动，除了在群众中宣传运动的意义，贯彻领导上的每一个指示外，并组织全队卫生红旗竞赛，组织卫生检查评比，自己也就利用宣传工作时间清扫环境卫生。

64年3月，全场展开声势浩大的比学赶帮运动。我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进行宣传鼓动，除了编辑特刊，出版黑板报以外，每天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收集各班各组的情况，编写通讯稿，并在每天早晨提前起床、利用出工前的时间向全队广播好人好事。我同时参加了小组的义务劳动（中午不休息出外积肥的活动），带动起全队的义务劳动热潮。

二、向政府反映情况方面，我的具体表现

一年来，我曾主动地、负责任地向政府反映过一些真实情况，在政治上是靠拢政府的。

63年10月以前，我在二小队，当时何修俭散布过一些政治上有害的言论，我及时向队部写了书面材料，何修俭并写了一首辱骂领导的打油诗，我当即笔录下来送交队部。又如郭锷权在国庆节文娱活动贪污奖品的错误行为，和他偷瓦工西红柿的活动，我都积极向政府检举，对于谭天荣的若干反动言论，我也实事求是地向政府书面汇报。调到一小队来以后，向政府反映过缪光千的一些错误言论，并向队部或小队长及时反映学习讨论会上的思想情况。



在向政府反映情况的时候，我是抱着政治上严肃的态度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一种政治上的自觉的责任感。

但是，我做得还是很不够的。一年来，特别是10月以后调到一小队，我反映情况不多。思想上的原因是：我对一小队过去的情况了解得不够，特别是对大部分人的政治思想的情况了解不够。初到一小队时，我曾想多了解一些人的情况，但这样做引起了个别人（如朱维民）的猜疑，认为我是“宣传员”，是“专门来打听人们的情况作为汇报资料的人”，我因而产生顾虑。这种顾虑和过分的谨慎，妨碍了我更及时地向领导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以便领导上掌握更多的情况。比如缪光千、杨学章之间的问题，我在平时的生活中和学习会上也多少知道一些他们之间的对立情况，但我却没有及

时地汇报队部，直到他们的问题在今年3月由领导上提出公开讨论时，我才发现这问题的性质是如此严重，而我当时没有及时向领导提供我所知道的点滴情况，是我在靠拢政府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而按照我所担任的宣传员工作，以及领导上对我的要求，我是应该做得更多更好一些的。

三、在遵守纪律与维护纪律方面，我的具体表现

一年来，我基本上遵守了各项纪律，并与违反纪律的行为作过斗争。

无论是劳动纪律、学习纪律我都能自觉地遵守，没有违反过。生活上也没有发生吵架骂人或偷吃农作物等现象，和大家的相处关系是从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愿望出发，是正常的和健康的。我对某些人的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过善意的帮助和批评，对个别人的性质严重的错误（如郭锷权的贪污、偷窃行为）作过斗争。通过这些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我的纪律性和组织观念，锻炼了我对自己要求严格的精神。

一年来，我自己也有过违反纪律的行为，主要是在和职工的关系上。63年5月，我曾未经队长批准，私自托请职工白玉书从城里捎回一包炒面。63年秋收时，职工汪天乙请我校阅他写的对俄译文“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译文意见给新华社的一封信，63年12月，职工袁家祖写了一篇总结请我为他修改文句，我未经向领导请示就答应了他。以上这些行为都是违反教养纪律的。领导上曾多次指示不允许同职工发生私人接触，而我却违背了这个指示。这说明我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并未得到根本消除，纪律观念并未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对自己的纪律要求是不严格的。在63年的年终评比，64年3月的鉴定会上，我都对上述错误作过自我检查，通过这个检查认识提高了，有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前进了一步。现在我再一次地写在这篇总结里，是为了使自己在今后记取教训。



四、在劳动方面，我的具体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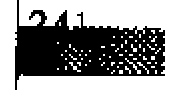
一年来，我参加劳动的时间不长，前半年是疗养肺病，后半年参加一部分轻劳动，直到64年初才整日参加劳动。

几年来，我虽然参加劳动的机会不太多，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

紧张劳动的集体里，我的实际锻炼虽然还不够坚实，但对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的认识和情感却是日益加深的。过去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贵族偏见，经过了几年来的劳动生活的实践，基本上是抛弃了，"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已经成为自己一生的生活志向。

一年来，我在劳动上的基本情况是：不断在进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断在提高。但这并不是说我已经牢固地建立了劳动观点，已经养成了深厚的对劳动的热爱和习惯，不，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受到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建立"终生做一个体力劳动者"的信念仍然是一个需要更长期的锻炼和艰难的思想斗争的任务。

一年来，我在劳动上有做得不够的表现，特别是在63年夏秋之间，我本应更主动、更积极地参加劳动，但我却没有这种主动精神。我在那时没有充分地去完成半日的劳动任务，这是一年中在劳动方面的重要缺陷，在这里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思想上对劳动的热爱不够。63年末，我在年终评比会上作了检查，下决心对自己作一番踏实的艰苦的努力，从那以后，我就随小组出工，尽可能挤出休息时间来做宣传工作，并在劳动上努力学习，以积极的劳动态度来完成任务。我已经开始这样做，时间还很短，成绩还很小，但我是有决心这样做下去的。



总结了一年来的实际表现之后，我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

我怀着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怀着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决心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继续改造自己，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教养分子杜高解除教养材料(1964.3.26)

杜高：男　35岁　原籍：湖南长沙

现住：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128号

因右派于1958年4月18日收容教养，于1961年5月25日定

期三年教养。

该人在改造期间情绪乐观,安心改造,他说:"领导上给我们安排三余庄这么好的改造环境,自己患肺结核得到领导关怀和信任,担任中队宣传工作,自己应该好好改造,把政府交给的工作做好。"鉴定时谈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他说:"教养几年对自己罪行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刻,我的罪行很大,组织小集团,写过反动文章,这都是反党活动。我和小集团要党接受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错误的基本原因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改造以来特别是通过大跃进看到集体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才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观。"

在靠拢政府方面,一般做得较好,能热情担任中队宣传员工作。在工作时能严格按照政府指示办事,一切内容均经过请示或经队长审阅才发表。在日常生活中能反映情况,能检举郭锷权、殷畅宙偷吃农作物事情。也能及时反映工作中的好人好事。

在政治学习方面能抱着积极的态度,经常看报,有较正确看法,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拥护及党政策的正确,他在反修学习中对我党历次观点,都有较深刻的领会,他说:"这次反修正主义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整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只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在劳动方面:由于患肺结核,参加劳动不多,大部时间是做宣传工作,58 年在兴凯湖布置展览会期间受奖一次,59 年临时派到北京搞展览工作期间受奖一次,到团河以来做宣传工作时经常协助值班做整理卫生等杂活,在宣传工作方面不定期编写黑板报,每逢生产高潮(如拔秧、麦收、土方、秋收)黑板报就多些,保证质量。在工地除进行宣传工作外,并参加劳动,如:外出变工时协助炊事员送饭,搬运秧芽,帮助别人拔秧,做埝;在麦收时清扫场院等。

在纪律方面尚能严格遵守。待人热情。

该人在 1962 年终获乙等奖一次,63 年获乙等奖一次,丁等奖一次。

根据上述表现,提议按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于 1964 年 5 月 24 日教养到期。

园林大队七中队　郝占义(章)3.26

提议按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

宋玉彬　3.26

综合材料(196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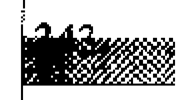
教养分子:杜高　男　现年30　湖南长沙人　家庭出身:职员　本人成分:文艺工作者　文化程度:大学　民族:汉

家住: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岭144号　有父、母、兄

简历:

自幼上学,42年—44年学演剧,45—48年先后在贵阳民教剧团、中国胜利旅行剧艺社演剧,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长沙《湖南日报》记者,衡阳《力报》采访主任,长沙市《小春秋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编辑,48年11月—49年2月,参加伪青年军604团政工队演剧,49—50年在常熟《新生报》上海民主主义(应为新民主主义,原件如此)青年团《新少年报》任编辑,50—52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创作组,52—54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干部,54年—58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干部,因该人思想反动,隐瞒历史,解放后先后拉拢落后分子,组织小集团,诬蔑我党政策。57年借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为此于58年4月18日被开除公职收容劳动教养,61年5月24定期继续教养二年,于62年3月份调来我场教养至今。

该人自教养后,经过教育,对错误逐步有了深刻认识,曾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解放前,为蒋匪做过反动宣传工具,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右时书写反动文章向党疯狂进攻,这都是反党活动。政府教养是应当的,我一定好好接受改造。因为我有肺病,政府照顾我,不叫干重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我一定安心改造。因而该人思想是稳定的,能够积极靠拢政府,服从管教。在63年先后反映教养分子郭锷权、殷畅宙偷吃农作物,在担任宣传工作中是认真负责的,经常编写壁报宣传好人好事,在工地里协助检查劳动生产质量。除此还经常主动搞些勤杂活,如在工地打饭、打水、修井、整埝等。在历次政治学习运动中能够积极学



习，主动给读报，在讨论会上能大胆发言，认识比较正确，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如反修学习时说反修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只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还能积极揭发批判教养分子孟广居、徐继和等人的反动言论。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表现较好，提议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留场。

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公章)

1964.4.2

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1964.4.16)

公安五处劳管547号1964年4月29日

姓名：杜高　性别：男　年龄：34　民族：汉

家庭出身：职员　籍贯：湖南长沙　有何疾病：

本人成份：旧职员

家庭住址：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园岭144号

收容前职业：剧协创作室　收容时间：1958年4月18日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李仲融，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陈璧澄，小学教员

简历：

自幼上学，45年至48年历任《贵州日报》、《湖南日报》、《中国日报》记者、编辑等职，48年至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等，53年调剧协创作室，58年4月18日被教养。

案情性质：右派分子　原报请劳动教养的单位：东单分局

原来劳动教养理由：

该人1945年至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

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 1949 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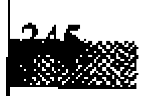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 1952 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朝鲜人民军拉中共代表团女同志的裤子",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集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是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该会已将其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现在何处执行劳动教养:团河农场

收容后的表现:

该人自 62 年来场后,对错误逐步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曾向政府表示说:"教养几年来对自己的罪行我感觉一年比一年认识深刻,我的罪行很大,组织小集团,写反动文章等这都是反党活动,要党接受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通过改造,才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观,教养后,领导给我安排这样好的改造条件,应该好好改造自己。"由于该人有病(结核),在担任中队宣传员时能严格按照政府指示办事,所写出的稿件都由队长审阅后发表,为鼓动劳动情绪起到一定作用。在学习方面,能积极参加,表示拥护我三面红旗,如曾发言说:"通过大跃进,看到了集体的伟大。"反修学习也能发言,谈出自己的看法,如讨论二评时说:"苏共借反对斯大林,这就全面地对马列主义修正,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讨论四评时说:"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弄清,还要在思想上树立新世界观,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斗争,这实质上是反对革命。"在劳动上,因有病,没有正式参加各项工序操作,但对于黑板报、宣传鼓动,根据干部指示,作的比较好,及时。也能主动参加一些轻劳动,如和炊事员一起往工地送饭,检查劳动质量等。在纪律上能遵守。



提议摘掉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留场就业。

杨春旭(印)64.4.20

处长分局长意见：提议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

刘向军(印)

64.5.16

批示

备考

负责人　填表人：马凤山　　填表日期：1964年4月16日

教养分子批示表

1964年4月22日

姓名：杜高　年龄：33　案情：右派

刑期：

1958年4月18日起1964年5月24日止

事迹：

一、思想改造方面

1. 认错方面：在检查自己错误时曾说："过去也认为自己错误严重，但总是把它当作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现在认识到我过去小集团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全面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

2. 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看到全国一片大好形势，比学赶帮运动蓬勃开展，因而表现在自己行动上是，积极投人劳动，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和整理材料进行鼓励宣传，推动各小队、小组工作。他说："全国人们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在改造中做得多，做得好。"他曾主动提出捐献粮食来支援灾区。

3. 靠拢政府方面：在春季卫生运动中，组织全队检查、评比，

通过黑板报、口头广播，个别督促等方式，推动卫生工作的展开。在比学赶帮中，除了向全队宣传队部号召和指示以外，每天早起广播好人好事，对推动运动起一定作用，并每日汇报全队运动开展情况。曾向政府反映，如姚志成怕报复不敢揭发缪光千的言论，范光斗对年终思想总结不满的言论。又如有人对义务劳动有牢骚，认为多干了，他说："义务劳动就是应该争取多干一些。"

学习方面，能认真阅报，看文件，讨论会上发言积极。

二、劳动方面

去年三、四季度中本人有病稍好，除做些宣传工作以外，积极争取劳动不够。今春大部分时间去鱼池，一方面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参加土方劳动，最近劳动上表现主动，在挖积肥坑劳动中与重劳动力比着干。在参加义务劳动时表现热情高，如四月十一日运炕坯积肥因工具不够，他就用手装筐。又如积极参加散肥、拾粪、平埝等义务劳动。曾设了聚宝盆为了搜集破废材料。

三、遵守纪律、制度方面

能遵守纪律并能维护纪律，如：四月十日下午值班忘了打起歇钟，他在工地及时叫大家干活，并赶到二小队工地督促他们起歇，虽遭到个别人讽刺打击也不动摇。

缺点：劳动中有时表现坚持性不够，如说"腿酸了，手腕酸了"等话，有时聊天多。

中队意见：能够检查自己的错误对宣传表扬好人好事较负责，提议二等奖。

郝占义

大队意见：给予乙等奖　　宋翊宾(章)4.25

场长批示：同意。　　杨春旭(印)4.26

备考

奖励批示表

65年7月6日

姓名：杜高　年龄：35　单位：园林五队

事迹:

一、思想方面:1. 积极学毛选,学《实践论》,《矛盾论》,都作笔记。2. 对过去错误有认识,他说:"我以前搞不通,像我这样革命家庭出身的人怎么会堕落成右派,现在明确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有的人可以蜕化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他们是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思想改造是不可忽视的。"3. 安心改造,情绪稳定,平时没有牢骚和不满言论。

二、拥护党和三面红旗方面:平时在言谈中经常歌颂党,歌颂三面红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多次谈到这件事,认为这是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又一重大胜利。

三、靠拢政府方面:1. 在冬训中,能深入检查自己,并揭发别人,比如对郭东海、贺毅等人的意见能及时向领导反映,发言内容正确并能启发别人。2. 积极响应各项号召,宣传工作总是配合运动,走在前面。自己动脑子写了些"思想漫谈",思想性强,有启发性,宣传工作中认真贯彻领导指示,对推动运动起了一定作用。

四、劳动方面:1. 过去缺乏锻炼,今年来努力要求自己,效率提高很快,虽然体力不强,主动争取干较重的活,并注意质量。2. 节日组织文娱活动,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

五、纪律方面:能遵守各项纪律。

中队意见:提议给丙等奖　　　　郝占义(章)

大队意见:

场长意见:同意　　　　杨春旭(章)65.7.15

国庆十六周年的感想

1965年

六组　杜高

今年的国庆节在我们这里过得特别好,整整的三天假日里全队洋溢着一片欢腾和热烈的气氛。从电视节目中,看到了天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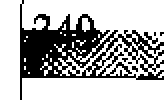
游行的实况。当我看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我禁不住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游行队伍的雄壮的步伐，从千百万人的歌声和欢呼声中，从整个节日的欢乐、胜利和战斗的气氛中，我受到革命力量的莫大鼓舞，感到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感到我们的祖国和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充满着革命的朝气，为建设祖国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壮丽的事业在忘我地劳动着和战斗着。

在战胜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困难以后，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又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和新高涨的局面，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新的局面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上。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整个节日假期中，领导为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伙食，安排了各项文化娱乐活动。使我们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的生产也在向前发展，在国庆节前，我们正收割了今年的玉米，我们的收成比去年更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切身地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大好形势，而且这个大好形势正在鼓舞着我更积极更踏实更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

当着欢度国庆的时刻，面对着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深入发展的形势，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仍然是自己的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城乡深入地开展，全国知识界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大革命。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在这一个历史时刻，我应该坚决地自觉地同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彻底决裂，坚定地站在党和毛主席的革命红旗之下，重新开始我的后半生，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近半年来，我在领导的教育下，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初步学习着用毛主席的思想来观察问题，思想有了提高，对党和毛主席的革命感情加深了，因而更加痛恨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用行动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争取重新参加革命。这个决心和愿望，现在成为我思想改造的动力，它强烈地鼓舞着我不断严格地要求自己，在这样一个思想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顺利地完成自己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从右派变成左派，往后的一生真正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我从下面的几个方面订出我的思想改造的计划

1. 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我自己



的切身体会是，学了毛主席的著作，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就提高了，决心就大了，干劲就足了。近半年来，我因为认真地学了主席著作，进步就比较显著，工作也做得好一些。我深深地感觉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就不能做好任何一件事，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首先就要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产生强烈的感情，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只有学了毛主席著作才能深刻地看清自己过去的错误到底错在哪里，对革命和人民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样才能解除旧意识的束缚，解除盲目性的束缚，才能有改造自己的自觉要求。我决心今后更努力地读主席的书，联系自己的实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各方面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做。在学习主席著作的运动中，我不仅要自己学好，而且要带动全组和更多的一些人一起来学。在近几个月来，我是这样做了的，结果全组绝大部分人都积极学习主席著作，有一些人的进步很快，收效很大。通过学习主席著作，我发现我们全队的人们当中，正出现一个政治上迅速分化的新局面，很多人都向党和革命的方面转化了，花岗石脑袋的少数顽固派已经在政治思想上越来越孤立。我觉得这正是当前思想革命深化的标志。我相信我自己会从学习主席著作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永远跟着党，走革命的道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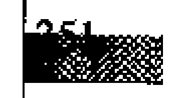
2. 我必须从劳动中积极锻炼自己。我在劳动上一般是尽到力所能及的，对劳动越来越发生亲密的感情。但在我身上“书生气”仍很重，劳动技能仍很差，体力也不够健壮结实。因此，我时时要求自己向劳动化的方向作更大的努力。现在我们组劳动情况一般是好的，每天都能提早出工，劳动时没有人磨磨蹭蹭，大家的自觉性较高。但我不能像要求老年人一样来要求自己，领导上虽然对我有许多照顾，但我自己应该更努力锻炼自己。只有从体力劳动的长期磨炼中，才能使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别的途径是没有的。因此，我常常在我们组里自觉主动地做一些较重的劳动，以得到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使自己真正完成“劳动化”的这一个转变。

3. 在今年的国庆节中，反帝反修的任务提得特别突出。以我国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修

的革命大旗，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和尊敬。我是憎恨美帝国主义的，十多年前我上过朝鲜战场，亲眼看到过美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凶狠，不打败美帝，世界和平是不可能保证的。我要坚决反对美帝，在一切反对美帝的斗争中贡献我的力量。但是对于反修，我过去是不坚决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如肃反问题，民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等）受过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使我在57年犯了绝大的右派错误，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从全国反修以来，我通过学习，一步步认清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危害性，今天更看清了修正主义作为美帝帮凶的丑恶面孔，决心同一切修正主义思想观点划清界限，我认识到，毛主席的著作正是我反修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只有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才能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者的一切谬论，认清它们的本质。

今年的国庆节过得特别有意义，我自己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很有决心也很有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忠实地跟着党走，我个人的前途一定是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一样光明灿烂的。

十月七日晚写



解除教养表现材料

（1965.10.11）

杜高　男　34岁　右派　教养定期三年　64年5月24日到期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家庭　本人成分：学生　文化：大学
专业：戏剧作家　现住：湖南长沙上麻园岭128号

认罪认错方面：对自己的右派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总结和评比时都能谈到自己错误，曾说过去几年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总是把它当作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经过政府教育和学习，现在才

真正认清我过去小集团的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认清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由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在实际表现上是服从政府的管教听领导的话。

政治态度：对政治时事学习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有关中印边界、古巴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他都有很严肃地加以思考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他说看到意共捷共代表大会对我国党进行片面的攻击时，就担心地说看来这样分歧会愈大，希望不要再这样。尤其苏共领导这样支持这些做法是很不应该的。这将会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团结带来多大的损失。又曾说赫鲁晓夫居然滚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是想象不到的，不过也不奇怪，在革命的历史上总是有些人会掉下车子去的，正像列宁在第二国际变质前的处境一样，我们党暂时看来似乎是少数，但历史会证明中国共产党将是正确的。对三面红旗是拥护的。他说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在改造中做得多做得好。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主动支援灾区，提出捐献粮食，从行动上对三面红旗的忠心拥护。现在学习主席著作做到了经常学，认真地学，联系思想学，他说通过学主席著作，我深深地感觉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就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就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事，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不仅自己学好而且要带动全组学好。对靠拢政府方面也能及时反映情况，如对姚志成有些人怕报复不敢揭发问题，缪光干、范光斗等人的不满言论能及时汇报，平时对不正确的言论也能反映。

劳动方面：该人在劳动上过去有病，身体也弱，除做些宣传工作以外也能做些轻劳动，最近经过学习主席的著作以来，每天带动全组早出晚归。今春大部分时间去养鱼池，一方面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参加土方劳动。平均完成 1.8 立方的任务。在菜园干活时主动联系翻地，平地注意质量，做得比较细致，经常义务劳动打扫室外卫生，除排用支草每天能完成 30 米长的地段，做得质量较好。对场规纪律制度遵守的较好。

缺点：1. 过去爱犯自由主义。听见别人说调白城子就到处传

说。2. 喜欢表扬不爱接受批评，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爱面子。

园林五中队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印)

65 年 10 月 11 号

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

1965 年 10 月

姓名：杜高　性别：男　年龄：34　民族：汉

家庭出身：职员　籍贯：湖南长沙　有何疾病：体弱

本人成分：旧职员

家庭住址：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园岭 144 号

收容前职业：剧协创作室　收容时间：1958 年 4 月 18 日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李仲融，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陈璧登，小学教员

简历：

自幼上学，四五年至四八年任《贵州日报》、《湖南日报》、《中国日报》记者、编辑等职，四八年十二月至四九年二月在伪青年军任职，四九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等，五二年调剧协创作室，五八年收容教养至今。



案情性质：右派分子　原报请劳动教养的单位：东单分局

原来劳动教养理由：

四五年至四九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 1949 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 1952 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朝鲜人民军拉中共代表团女同志的裤子"，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

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集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是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现在何处执行劳动教养：团河农场

收容后的表现：

对罪恶有认识，如曾检查说：几年来经过政府教育学习，认清了我过去的小集团活动和反动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

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如曾说："在党的领导下，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努力改造自己。"六三年主动节约粮食支援灾区。在反修文件学习中他说："赫鲁晓夫居然滚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是想象不到的，不过也不奇怪，在革命的历史中总是有些人会掉下车子去的。正像列宁在第二国际变质前的处境一样，我们党暂时看来似乎是少数，但历史会证明中共将是正确的。"

劳动方面：体弱有病，但主动做些轻劳动，通过主席著作学习，带动全组早出工晚收工。遵守场规，纪律较好。

解除劳动教养的理由和安置意见：提议解除教养，不摘帽子。

杨春旭(印)

65.10.15

冬训检查总结(1965年末)

杜高

在这次冬训学习中，进一步认清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化，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加速革命化

的形势要求着自己加速思想改造、坚决实行自我革命,同资产阶级观念作最后的彻底决裂。

在学习中,我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言行,作了批判,提高了认识,加强了今后改造的决心和信心。

一、问题

1)过去对于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根源认识的是不深刻的,虽然对过去的错误一再作过批判,一般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危害,但没有真正弄通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所以几年来,一直在思想上认为自己并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同党没有阶级仇恨,这样的想法使我对错误的认识是停留在表面的,不深刻的。

2)去年五月,教养到期没有结束,我当时对形势缺乏充分认识,有过思想不稳定和情绪急躁的表现。听到有人谣传一些消息时,我很注意听,并做了"宣传员",最突出的例子是当时有人说,我们要调到白城子去,我把这个谣言告诉了别人。

3)我对过期不解除有不正确的看法,我认为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可以是长期的,不能用时间来作规定,但作为处分形式之一的劳动教养,既然定了期限,那么可以按期解除,然后留在农场继续改造,我把思想改造从具体的形式(劳动教养)中抽出去了。



4)我在改造中有右倾的思想情绪的表现,没有认识到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待周围一些人的缺点和错误,我常常抱有"同情"和温和的态度。譬如同组贺毅偷窃粮票和散布不满言论,大家向他展开激烈斗争,我却有些"怜悯"他"吃不饱";又如有些年轻人思想混乱,想老婆,有时发生流氓行为,我又有些"原谅"他们,觉得这些人想结婚是可以理解的一些情绪。我对一些老年人也抱着"怜悯心",说:"六十多岁了,还得和年轻人一样在这里呆着,怪可怜的。"这些右倾的、温情的思想情绪,妨碍了我同错误现象作斗争,妨碍了我的进步,同时暴露出我的思想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旧观点。

4)对于苏联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修正主义者,我也流露过一些"惋惜"的情绪。譬如在和平理事会上建议为肯尼迪默哀的柯涅楚克,曾经是我最喜爱的一位苏联作家,看到他干了这样不光彩的事,我心里为他"惋惜"。

5）去年，同组郭东海生活作风蛮横，顶撞队长，犯了不少错误，对于这样的人应该从生活上孤立他才对，但是我由于拉不开情面，生活上还是同他来往，客观上使他不感到在群众中孤立。郭东海向我埋怨有些人是恶意地汇报他的缺点，有些夸大，我非但不批判他，反而也附和着说："有些人的确喜欢注意生活小事。"这是我对积极汇报的人的不正确看法。

6）在遵守纪律方面，我曾接受过职工们送给我的一些吃的东西，同他们平时有些私人交往。去年十一月，贺卫民、陈世民等人在马路上拍照，看见我经过，要我参加照，我照了相，但未向队长汇报。我接受过吴越、庄信杰等人请我吃的肉、火烧等食物。搬到仓库来以后，庄信杰来看我，还给我捎来了饼干、烟。

7）今年二月，有一次在草莓地拾草，司徒洵谈到他家在香港，我向他谈过香港街道的繁华，电影院，海滨跳舞所和双层电车等，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繁华热闹"。

8）杨学章提到我有时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前途的悲观情绪，这个意见是符合实际的。当我每每想到改造七年了还没有解决问题，今后怎么办这一类问题时，流露出一些苦闷情绪。我也说过，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再不会得到像过去那样优越的工作条件了。

二、认识

从以上的这些问题来看，我的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旧意识，特别是对待自己过去的错误的产生、前途等重大的问题还不能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以至在改造过程中立场不稳定，有右倾的表现。只有在学习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后，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后，我的认识才有了提高。我认识到，由于过去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文化的熏染，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因此，当1956年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起来，1957年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对立起来的时候，我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就促使我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在思想上受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影响，这使我不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周围的现象，对待许多人的错误，我不敢

于进行尖锐的斗争，反而是“原谅”和“调和”。这种错误的观点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改造就是要求极不严格。我把遵守纪律不看成改造自己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把吃职工一点东西看成一件“不关紧要的事”，时时“原谅”自己。我没有把“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当成生活的理想。我仍然想做一个脑力劳动者，把改造看成一个手段，对今后生活的方向思想准备不够。因此，我在劳动中艰苦性不够，钻研不够。

三、决心与愿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化，随着全国人民从思想到作风的革命化，在这种形势下，我决心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从三个方面做起：

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学习反修文件，树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改造的根本目的，需要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努力。因此，必须深入地认真地学习反修文件，明辨是非，提高认识。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教条主义的，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今后必须带着问题学，联系自己的改造学。

2)要靠拢政府，向政府反映情况，积极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这对于克服我思想上的右倾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决心今后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诚恳地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争取教育。立场站在党和政府方面，这是判断一切是非的出发点。要从每一件事上检查自己的立场。

3)劳动上要努力锻炼自己，把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自觉地、刻苦地劳动，在各项工序中努力完成任务。

4)纪律上割断同职工的一切私人联系，严格要求自己。

（原件未注明日期，应为1965年末）



张道达汇报杜高（1966.5.21）

中队长：

杜高和章亚航关系很好，特别是66年春节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用俄文谈论一些俄国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候章亚航还借给杜高许多本俄文书籍。在65年旧历除夕晚上两个人用俄文翻译《火中的凤凰》时他们很洋洋得意，（《火中的凤凰》是朱维民画的一张画，意思是他们在教养中和凤凰在火中一样）在这时期他们两人还有戴煌用请客的方法大吃大喝，在我组内就有两三次之多。杜高从医院回来以后，章亚航经常到我们组找杜高谈话，一谈就到深夜11～12点。

最近当章亚航逃跑以后，开会时杜高作了一次和章亚航的关系检查，会上也有人给他提出意见之后，他书面地做了比较系统的检查批判。在写这篇检查批判的时候征求意见，甚至每写一段都叫姜崇武给修改，用这个方法探听姜崇武对他的情况了解，以便蒙混过关。虽然杜高在检查中谈到给章亚航粮票，借过钱和东西，这都是表面现象，而他们之间秘密谈话中的事情还没有检查出来。

另外，杜高和原三余庄的反改造分子每个人每件事大大小小都有联系，这说明了杜高这个人思想中有一定问题。

来一大队以后，他又和胡双来、张志华来往很密切，在吃喝上不分，（胡双来、张志华过去都是逃跑过的）吃的东西都是胡双来买的，张志华买的少，杜高没有买过白吃。

以上报告作为政府参考。

张道达

5月21日（1966年）

通过杜高六月份改造小结(1966)

大家提意见:

张道达:在这次夏忙劳动中能坚持下来,有时效率也不低,这与过去比,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学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在对待批评问题上(对李济川问题的错误观点)态度较好,也作了些检查。"与人为善"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在生活中是有选择性的,"与人为善"只是幌子。

姜崇武:对这次墙报上对待大家的批评,态度较好,但检查的很不好,很不深刻,比如对章亚航的关系就回避过去,其他问题,理论上谈得多,思想实质暴露得少。

田世忱:对李济川的错误看法这问题,表面上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思想并没解决问题,如有次在工地对人说"组长对李济川照顾不够","不要把组里的人都当成阿斗"等,这些话都很有问题。

蒋惠贤:学主席著作、在劳动上,这月都有进步。但还存在问题,主要是斗争性不强,立场有问题,突出表现在对李济川及其他一些反改造分子的态度上。

小组其他人同意上述意见。

通过杜高七月份思想小结(1966)

大家提意见:

张子正:对思想斗争表现的软弱性这问题做了检查,如批判了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观点,但,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这是立场问题,特别表现在和坏人坏事作斗争问题上曾出现过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必须引为注意。

张道达：劳动上比过去有进步，但还要继续提高，做到在劳动上真正过关。平常说话还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必乱说。

刘伟才：待人接物马马虎虎，和什么人都谈得来，特别和许多反改造分子都有来往，这对自己的改造是不利的。

赵宗力：暴露思想较大胆。这次郑伯才的问题也涉及到你，这成为老问题了。每斗争一个反改造分子，都得和你挂上点事，这必须引为警惕。

小组其他人同意上述意见。

陈邦钊谈杜高、吴宏达

他说：指导员看问题很尖锐，上次揭发赵筠秋的问题，我发了言，但是指导员并不满意，并提出吴宏达的问题，我没有表示什么恳切的态度，因为我了解吴宏达的问题和杨路的性质是一样的。他又说：我很奇怪，平素我和吴宏达并不十分亲近，怎么引起他们的注意呢？又说：吴宏达的问题搞不出来不说，一旦被揭发可不亚于任何人。又说：吴宏达很有两套，如：他尽管有严重的问题但是他表现得很积极，这样继续下去，说不定也能过去。

他说：最近我发现杜高有些话敢和我讲，前些日子他向我讲了很多而且是非常露骨的话，但是我很警惕，尽管他这样开诚布公向我讲，我只是附和他，而不会发展他的讲话内容。他又说，据杜高讲，昨晚他听到了美国之音，听说周信芳自杀啦（这时宋有余问陈邦钊耳机子能听到吗？陈回答能听得到）。他们早就知道彭真下台了，是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台的，另外说，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前病得很厉害。所有这些都是从美国之音而来的。

宋有余

27/8（1966年）

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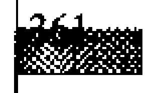
1. 关于十六条：

他说：党中央在制定十六条时，召开了革命师生的座谈会，我们这里的一个职工（在医院养病），他的弟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看望该职工时，对这个职工说，参加会议的有全体中央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都作了指示。

刘少奇主席提出"保护少数"的问题，说这有二种意义：1）是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那一边，所以要保护他们。2）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也是少数，对于这些人也要保护，只有当他们把问题全部暴露以后，才能很好地批判和斗争他们。

周总理在会上对学生们说："我和大家一样，都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学生们深受感动，认为周总理非常谦逊。

杜高认为在十六条中指出的"方向的错误"和"路线的错误"指的是挑动工农斗争学生，或学生斗争学生。并说这次刘少奇主席排在林彪、周恩来之后，可能是犯了某种错误。



2. 他还说：张承先犯了错误，和陆平、彭佩云在一起挨斗，张到北大后，坐着小汽车去挨门拜访那些名教授，问他们对文化革命有什么意见，而不依靠革命师生。中央觉得撤消工作组，李雪峰书记作了检讨，说这是路线的错误。现在由江青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由王光美领导清华的文化革命。

3. 在谈到文艺界的情况时，他说：

吴祖光在反右时，就是在田汉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发了一次言，田汉马上就抓住了。把矛头对向吴祖光。

他并说，当时在剧协（戏剧家协会）实际负责的是张光年的两个妹夫，其中之一是赵寻，他说，当时反他反得最厉害的是赵寻，这次文化大革命赵寻也可能有问题，那时，这些人也是做官当老爷。赵寻家里非常阔气，地毯、沙发、睡衣，过资产阶级生活。

（这时，我插话问他："周扬怎么样？"）

他说，周扬倒是不像他们那样，生活也较朴素。当时反右是搞冯雪峰。在上海时，鲁迅很信任冯雪峰和胡风，中间还有一段历史关系，就是周扬他们反对鲁迅和冯雪峰。

当时贺敬之对他（杜高）是同情的，反右开始以后，贺敬之也起来反他，他是可以理解的，他和赵寻等人不同。

他还说：筱白玉霜家里给打得稀烂，郭东海还对他说，李凌也搬了家。

早在65年周扬在文艺界搞假整风时，他就对我说过，田汉写了篇《谢瑶环》，康生看了以后，发现是反对大炼钢铁的，是反党的。

在63年一些人解除以后，他曾托何平去看望过吴祖光。

4. 他说：这个月他到南边看病的那天，马路上闹哄哄的，回家的职工由红卫兵看着上汽车，有原籍的公安机关派人来接，分三类处理：1)表现好的，可以到工业单位做工。2)在公安机关办的农场中劳动。3)监督改造。

5. 他也谈到：他母亲来信告诉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从老人到小孩都参加了，他一个二岁的侄子也已经能够背一条毛主席语录。

6. 对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六、七号通令，他的反映是：

他说，这个通令对右派宽多了，已经摘了帽子的不再看作右派，搞错的，也在运动后期处理。对四类分子回原籍的问题，也延长了日期。

他还说，关于文斗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他说你可以建议队部组织我们学习。这也是宣传党的政策。当时，我说：外面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搞守法教育运动，情况不一样，政府会根据党的政策考虑我们这里怎么搞的。政府怎样布置，我们就怎样执行。

他说，了解党的政策，不是更便于开展运动吗？

他还向我解释因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所以在开王继俊的批斗会上提出给王摘牌的问题，免得在摘牌时，大家认为王的态度还不好，为什么又要摘牌呢？弄得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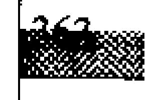
他说，我们当然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政府把秤定在一斤

上，我们就按一斤办事，在这里可以发挥，但还是定在一斤上去做。

我问他是否见到这个文件，他说是听说的。我说，关于这些问题，只有向领导指出以后才能证实，不能随便乱说，以免起不好的影响。这些事只要向队部反映，领导上就可以告诉你是真是假。当晚我就向队部反映了上述情况。

7．有一天我和王祖德在写语录时，谈到我们的名字有封建迷信的意义，应该改掉。当时，杜高也在旁边，我们说王祖德改成王左德，我改成刘复生。并且每个人想了一首诗，三个人凑起来，主要是杜高出词，他来写，用了一个“高左生”的名字，当时杜高说是“革命的三家村”。我立即对他说：“三家村”没有革命的，因为这个匾牌本身就是从“你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出来的，就是反动的。并对他说，我们不过是一说一笑而已，真的要改名，不像在社会上那么容易。并对他说，在给人谈这事的时候，切不可说什么“革命的三家村”之类的词。结果，他回宿舍后，又对姜崇武这样说。我知道这事以后，立即对他提出了批评。

8．也是到南边看病的同一天，他说他遇见了滕英俊（解除职工）还乡，问他母亲住在那里，杜高把通讯地址告诉他后，他立即写下来，后来他告诉杜高，他的爱人没有熟人，想在他家里落脚，等滕到达后再走。



杜高说，这件事我很着急，在清河时，有一个人假充说和我很熟，骗了我妈妈三十块钱。这次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去，怎么办？他准备写信告诉他妈妈。我说，要是那人今天走，你写信也晚了。他考虑以后，还是写了一封信，交给了高队长，要他妈妈对这里去的人，一律不接待。

9．同一天，他还说，有个看病的职工对他说，城里红卫兵打人，个别人给打死了，这个职工家里也呆不住了，就回农场来了。

我问杜高，这个人是不是不老实。他说，该职工告诉他，在家养病大门都不出。我就对杜高说，既然他大门都不出，显然他告诉你的事不是他亲眼看到的，而是听来的。对这些事应该加以分析批判。

10．在他对我说“七·七通令”时，我对他说，我是不主张打人的，但是群众气愤起来，打了人，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群众起来

斗争的表现,有时很难避免,应该看到正如十六条所说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自己应该站到革命群众的一边,否则就是右倾了。

以上情况,除关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和职工还乡的事外,其他谈话王祖德均在场。

刘佛生 66.9.15

通过杜高九月份思想小结(1966)

大家提意见:

刘广瑞: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积极参加,又创作又演出,很有热情。学习很好,发言很有内容。

刘伟才:思想改造很有进步,主要表现在劳动上比过去很有进步,以前是惧怕劳动,劳动关没过.而现在是开始积极改变这种状况,下决心锻炼,并且有所成效、效率有的不低。

张道达:精神面貌很有转变,与人关系,生活上看不惯的事,自己都注意到并努力去改善。近来的进步要坚持下去,不要犯知识分子的冷热病,顺利时有热情,遇到问题时就消极。

姜崇武:对文艺节目创作上今后要更注意政治思想内容上的提高。

王京:劳动态度上的开始转变,仅仅是开始,而且是开始的比别人晚,不能有任何的满足,而且比不少人还是有一定距离。演出上的收效不能引起骄傲(实际上有所流露),要吸取郭东海的教训,不要有特殊化的表现和要求,如饭票的事,平常举动中的问题。在登记要被了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自私自利,自己有鸭绒被还要登记,当大家沉默不同意时还发态度,这种行为实在令人不满!

六组小组鉴定

杜高

李衍德：自私的感情比较重。下面说有些人反动，不愿接近，但表面上很好，跟人关系很微妙。

董立：写的哲（理）太多。还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天晚上还要泡茶喝。

杨春泉：有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写得有些口气太大（创造白求恩、张思德起了一定作用）。保命哲学比别人高。造纸厂劳动去得不多，但反映不太好，没做到力所能及。理论（宣传）与实践结合不好，不如刘佛生好，工休写东西，第二天还得补休，（听队长们对话，这不是肯定意见）有些同志说他劳动上没过关，不够泼辣。

周盛雨：有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自己的特长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成功的，受到了欢迎，将功折罪。演出中下功夫，要求是高的。写的剧本符合时代潮流。与反改造分子关系有改进，学习毛著很刻苦。

陈平：在劳动上有抛弃过去的看法，有过好劳动关的决心，还是肯干的。到这儿后，还是遇到了些问题，怕苦怕累还是反映了出来。在生活中还变的小，较突出。要有劳动中很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人之间关系，感情上比较软弱，还是资产阶级，只在革命高潮时才有革命性，在平常开会生活中没斗争性，阶级概念上不强。

对毛主席的热爱，感情上有转变，加深，在排演节目上看得出来。工作有一定成绩，但有一定虚荣心。

周盛雨：在劳动上有思想病，但还是能跟上。政府让干什么干什么。对演节目，重才不重德，生活上言行不一致。

张开元：对周盛雨的态度是资产阶级权力的态度，但能检查，作自我批评。写《战火中的白求恩》时身体不好，但反复写反复改精神好。宣传毛泽东思想热情，放弃补休。

姜崇武：原来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这方面悔过了，改正了。对过去罪行清算认识好，如报上批判二流堂文章，他结合自己写批判。对清理阶级队伍，积极提供材料，力求把劳动搞好，与反改造分了关系开始划清界限。生活上流露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有人说"杜高身上带戏"——言行不一。劳动上过去有幻想，没下决心一辈子劳动。

杜高本人表态：意见很好，很诚恳，没什么意见。自己看自己不很清楚，不多听大家意见，改造障碍大，希望平常大家也多给我提，多帮助，我今后在行动上更严格要求自己。

杜高思想改造鉴定小组意见

（1967年第一季度）

小组认为该人的思想小结基本符合其实际情况，但对有些存在的问题，还缺乏检查。

这季度以来，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能抓紧时间阅读毛选的很多文章，并写了不少学习心得，批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写得比较深刻。但在学用结合上用得还不够，对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克服做得还不好。对旧文艺与之决裂还不彻底。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般来说是拥护的，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有过错误看法。如对于旧文艺的留恋，传播一些"消息"等等。但在这次运动中对于自己错误的批判还是大胆的。对坏人坏事的斗争过去存在的软弱性曾有所改变，但应该指出，当斗争采取比较激烈的形式的时候，有错误想法，温情，对此已作较好的检查。

能做到服管服教，一般纪律尚能遵守，但生活散漫，对自己要求很不严格。平时常和一些人聊些低级下流庸俗不堪人耳的东

西。有些言论还是很成问题的，如说："周总理在日内瓦开会时，大中华烟一筒筒的给，多大方呀！在印度访问时给雇佣人很多钱，够他一辈子花的。"还聊大右派吴祖光的身世，以及他和新凤霞的关系等等。

在未参加劳动养病期间能帮助组里和全队做一些工作，特别做了不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

我和杜高的关系和双方的问题

62年调到团河农场以后由于过去都出身于文艺界，所以很快地和杜高就谈在一起了，我们谈到了艺术，谈到了过去我们共同的朋友，谈一些对目前处境不满的话，都认为政府对我们的惩罚是太重了，他说："要不是在清河农场时有一个人经常帮忙给买一些黑市大米，我早就饿死了。真想不到写了一篇文章就得负这样的后果。"

有一天傍晚在东院乘凉不知是谁谈起了斯大林的晚年错误的话，我和杜高站在铁丝网那儿聊天听到了。他和我说："中国情形也是一样，现在正在鼓励个人迷信，周扬从苏联回来后的传达报告你听了没有？他说他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在苏联时一个苏联老工人问毛主席什么时候去领导苏共？毛主席听了笑了笑说：'人民总是喜欢信神的。'杜高又说："他把自己当作神。"与此有关的62年冬天他写了一首诗贴在墙报上，在写的时候念给我听，其中有把毛主席比作现代马克思现代列宁的诗句，他念完了暧昧地笑了笑说："他要看见了得高兴死了！"

63年夏天有次我在院子里吃晚饭他和我说："你看了报纸上登的民主德国批评中国反右派的文章吗？"我说很少看报，他说："他们说中共把一些帮助党整风的提意见的人本来应该团结的却都戴上了帽子。"又说："傅雷在这期间翻译了很多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他用笔名出版时，傅雷不干，说他只有一个名字，结果为了

要出版就给他摘了帽子.他是个有骨气的人。”

那期间他向我打听一小队有些人的思想情况,特别问到谢自渝,他问我:“那个小胖子的思想怎样,很进步吧?”我说是很进步。同一时期他和范森和殷畅宙在晚上乘凉时说:“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你们二位老弟的定量问题,对子干活的人来说吃这点也太少了。”当时范森和殷畅宙正因为定量低而闹情绪。

国庆节出墙报我画了一幅插图来补充吴越写的一首讽刺苏共修正主义和南斯拉夫拉拉扯扯的诗,我画了一只乌鸦落在猪身上说:“我并不黑。”题目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当时杜高极力反对认为不应该画这个,即使画一朵花也比这个强,当时争执不下,我去找高队长,等高队长去时,原画已经由杜高让殷畅宙画的一条花边贴上了,而且墙报也已经贴上了墙。后来高队长让我把这情况写了一份材料。

过了些日子有职工看到了我的材料告诉了杜高说高队长的桌子上有一份写他的材料,他急了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意气用事,他对我没有恶意,同时指责我不应该把赫鲁晓夫画成猪,说:“你们都是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有很多事情你们本来可以问问我。”

这时《文艺报》上正登载了一篇文章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电影《第四十一》、他在三组向大家说《第四十一》的故事。

当时我也向他介绍另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电影《海之歌》,我说这才是艺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诗篇。

有一次看了报纸上的绘画作品我和杜高说:“现在的艺术界空气太沉闷,这几年就没有出什么好作品。”他同意我的看法。当报纸上批判邵荃麟等人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时他说:“邵是当年批判胡风人性论最积极的一个,可是现在他却犯了当年胡风所犯的错误,可见真理是批判不了的。人们寻找可行的创作道路,找来找去只有这一条。”他不仅和我说同时也向别人说,当时我想这家伙真够大胆的。

我在北苑美工室工作时,那里的就业职工江荧收到杜高一封信,把这里的职工吴越介绍给他。

冬训运动开始后杜高改变了他的态度忽然“积极”起来,有一次和范森吵架公开说:“我是条狗,是共产党的狗!”第二天在地里

他和司徒恂抬一副抬，把我叫住用四川话和我说："千万不要怀疑，在这时候怀疑是最危险的。"有一次我和他都留家整理材料，他和我说："郭东海真是个流氓。他叫杨学章保护他过关，否则就要揭杨的底，杨学章现在很为难，因为郭东海闹得太不像话。"

有一次我向郝队长汇报郭东海在地里消极混泡的事，杜高听到了马上就告诉了郭东海。

在运动中郭东海说："现在我得好好干两天，让黑板报上表扬表扬我。"杨学章就叫杜高利用广播和黑板报。

有一次杜高在三组的记录材料里发现了一张纸，其中揭发杨学章的材料，把这份材料交给了杨学章。事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出了事他负责。

有一次报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他和我说："老头子已经老得不行了，你看了国庆节的电视没有？"我说我不爱看电视。他说："电视上毛主席出席人大主席团时由一个女人扶着，实在太老了。"他又说："老头子死了之后接他位子的人是谁那还是个谜，可能会是陈毅，陈毅如果上了台情况也许好转，陈去过法国也年轻些，思想比较活泼。"

今年五一肖队长和他一起打乒乓球，他回来后告诉我："今天胖子找我打乒乓球，算是联络感情，现在他不是我陪他打就不过瘾。"

很多人认为杨学章和他的关系他是灵魂杨是躯体，他比杨聪明，会出主意，杨比他强有力，队长那儿有办法。这次谢自渝交代的一些问题事先都和杜高作了商量，据杨路说杜高曾劝谢自渝先不要交代，等解除以后再说。杜高看了谢写的材料之后告诉别人材料的内容。

（编者注：原件未完，缺署名页）

1968年思想改造的总结

杜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主席又教导说：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一、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送别1968年迎来1969年。

1968年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伟大革命变化的一年。1968年也是我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思想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的一年，是我的整个世界观发生比较深刻的转变的一年。

在总结这一年来的思想改造的收获时，我怀着衷心的感激，祝福伟大的救星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防止片面性地看问题，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分析事物。毛主席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

我力图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来总结自己一年来的思想改

造。在看到自己的进步时，我要归功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教导，我要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威力。在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时，我要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和思想改造的艰苦性长期性。特别要充分注意和努力防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容易出现的摇摆性和重复性。

我要通过总结，对思想改造和光明前途建立更强的信心，但我更要通过总结，树立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和毅力，在新的一年中，争取更大的进步。

二、1968年，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和随着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推动，在军管会和政府干部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加强了对我们的改造，我自己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加速世界观改造的阶段。

在这一年中，思想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收获是：

一、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加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我学习了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史料，学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学习了有关当前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的材料，我提高了对毛主席的伟大的认识，我认识到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项最新指示，我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高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理解，我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集中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丰富的经验，集中了全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科学真理。这样，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加深了，加强了，这种信仰也逐渐地深化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有阶级内容的感情了，这种信仰也逐渐升华为一种自觉的政治信念。这样，我的思想改造就有了一个基础，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悔罪的感情，怀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如饥似渴的要求，一年来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武器来批判自己，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这样，一年来的思想改造就比较顺利地沿着毛泽东思想照亮

的轨道上向前进。

二、随着文化大革命所开展的革命大批判的深入，随着68年年初全队认罪学习的开展，随着斗私批修的学习，我对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罪行，对曾经严重腐蚀了我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认识加深了，痛恨强烈了。在这一年中，比较彻底地从思想上解决了认罪的问题。这样就使我在一年中更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更安心的改造，更遵守各项纪律，服管服教。而且也就促使我更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这一年中，运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清算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运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源，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我过去的言论、思想和行动，这样，我不但思想认识提高了，不但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危害性和反革命性，而且从感情上也开始真正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犯了罪，是党和人民的罪人。这样，我也就越加迫切地要求自己快些改造好，在往后的半生中，以赎罪的心情来为党和人民更积极更忘我地做一点工作。

这两方面：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自己罪行的痛恨，使我这一年来思想改造得到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促进和加速了世界观的转变。这是成绩的一面，或者应该说，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很不够刻苦的，常常满足于一知半解，并不深刻领会，更不能和自己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思想改造的实际表现上就常常出现学用脱节，言行不一，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在"用"字上下功夫不够等等这些错误和消极的现象。从这些表现上来检查自己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没认识到自己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热爱都还只不过停留在一个很低的程度上，还是很不巩固和很不深厚的。我要在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泽东思想信仰的这个基础上提到无限忠诚的高度上去，要从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毛主席的忠心来，这就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改造即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任务还繁重得很，在"用"字上还要作最艰苦的努力。同时，我也检查到对自己的罪行和头脑中、灵魂中的修正主义的毒素还必须加深认识加深清算，应该看到这一年中认罪是有进步的，但是不够的。特别是八届十二中全

会公报发表以后，全国人民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的清算和批判更深入了，对比之下，我就认识到自己的批判还是很浅薄的，我中修正主义的毒是很深的．所批判的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还不能说都已肃清，因此，继续深入地联系自己的罪行，联系自己在改造中的表现，特别是联系现在存在和出现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彻底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也是我今后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1968 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我们队里形成剧烈而曲折的反复而经常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一年来，我的思想改造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进行的。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反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 1968 年中，这种斗争又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拥护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敌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的斗争。因此，在这个斗争中站在哪一面，是对我思想改造的一个最实际的考验。

在 1968 年以前，我对队里的这种阶级斗争认识不深刻，甚至对某些反改造分子抱幻想，希望劝说他们，对他们讲“友情”。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风云锻炼了我，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提高了我，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一方面批判自己所受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一方面学习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投身到这个斗争中改造自己。在一年来的无数次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中，我都站到政府和人民的一边，积极向反改造分子进行斗争，我在队部的领导下，积极写发言稿，在批判会上向缪光千等反改造分子作面对面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在平时的改造生活中我也注意划清界限，孤立反改造分子。经常向政府揭发反改造分子的言行。这是我在一年来的思想改造中政治思想的提高和政治立场的转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和在改造中靠拢政府的积极表现。

我认识到，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场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政治思想的彻底改造是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才能完成的。过去的

那种"怕得罪人","你改造你的,我改造我的","独善其身"或"保持一团和气"的想法和做法,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都认识到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表现。

一年来,我虽然阶级斗争的观念加强了,在斗争中态度积极了,立场明确了,但应该看到自己仍然是很不够的,无论是坚决性和彻底性都不够。我虽然一方面大胆地揭发和批判了反改造分子,但内心深处仍有顾虑,怕报复,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有这种私心当然不可能坚决和彻底。另一方面对反改造分子的痛恨也不深,这就说明自己的立场仍然不坚定,心里想:"你反动也是右派,也是教养,我向你斗争也是右派,也是教养,还不是一个样?"这样,自己在斗争中就不是理直气壮,义无反顾,而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这些表现都说明自己的思想立场是不过硬的,有时甚至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才向反改造的言行去斗争的,而不是自觉地站起来挺身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也说明自己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没有向毛主席尽到一个忠字。这些错误表现,都是需要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改正的。

四、一年来,在"老三篇"的教导下,我逐渐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且在张思德、白求恩等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精神的教育下逐渐地锻炼自己"完全彻底"的精神,朝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目标要求自己,使自己一步步接近毛主席教导的做一个"五种人"的崇高目标而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在文艺界所推行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罪行被彻底揭发和清算了。这对我认识和批判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生活作风和名利观点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成名成家,追求物质享受,做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是最可鄙可耻的。而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普通劳动者则是最光荣、最高尚的。

在这一年中,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起了变化,我开始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工人和战士,而对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开始鄙视和厌恶起来。过去几年的改造中,我在"生活小事"的借口下顽强地保留知识分子的一套习惯和爱好,在这一年中,由

于自己的阶级感情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自觉地抛弃了它们，我在生活上要求自己勤俭刻苦，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产生了尊敬，感到美好，而对资产阶级的豪华虚浮产生了憎恶，感到是丑恶。我对劳动人民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如陈永贵、尉凤英、孟昭科等等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产生了学习他们优秀品质的强烈愿望，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自私自利、虚伪奸诈，产生了由衷的憎恶。这样，一年来，我在老三篇的教育下不但在政治上加强了自己的改造，而且也开始从思想品质上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改造。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品质的彻底改造是世界观改造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是一件极艰苦的事。我在学习"老三篇"和许多无产阶级战士的感人的事迹时，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耻，感到自己长期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灵魂深处充塞着肮脏的东西，浸透了由自私的打算所积起来的污垢和臭气。无论在对工作、对集体、对人、对待生活等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和卑劣的利己打算，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两个极端相距何止万里！这种距离只有在今后学习工农兵的长期改造过程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批判检查自己才能逐渐缩短的。

在这一年中，我对劳动的感情也起了变化。过去轻视劳动人民，必然就轻视劳动，认为种田做工是卑贱的事。教养后的七八年，虽然在观点上起了一些变化，但并没有下决心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心里想的还是自己的一些学问专长，脱离体力劳动。再加上，前几年自己一直在生病，受到政府照顾，所以虽然教养八九年，但认真说来并没有过好劳动这一关。68 年这一年情形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随着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逐渐树立，随着向劳动人民的靠近，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大大增长了，从春耕、夏收、夏种到秋收，在各个工序中，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过去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也做到了，在割稻时，我也割了九分多地，而前几年顶多割三四分，我虽然患过胸部重病，但也坚持抬土，做到了力所能及。在亲身的劳动实践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也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由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的。

但是在看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也深深地看到自己同劳动人民的距离，我时常叫苦叫累，在工作中拈轻怕重，更表现出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极深刻的影响。有了活命哲学，就决定不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就决定要追求物质享受，贪生怕死。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自己平日的劳动中经常地表现出来，因此一方面要珍惜自己的进步，又一方面在新的一年中要更积极地同自己身上的修正主义活命哲学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更自觉的斗争。使自己在劳动生产的实践中更快地向劳动人民的方面转变去，真正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

五、68年，在我的整个思想改造中，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又因为我曾经是党长期培养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今天能够光荣地参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政府和人民给我的一个主动赎罪的宝贵机会。

在这一年中，我在队部的领导下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小小的力量，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创作了剧本《为人民服务》、《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后来又创作了一个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型话剧《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我并在舞台上塑造了张思德、白求恩的艺术形象，扮演了《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战火中的白求恩》中的白求恩。这些作品和演出给观众一定的教育和鼓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没有别的能力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也没有别的能力来向毛主席赎罪，我还有一点点写作剧本的能力，我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贡献在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中呢？我只有在这个工作中来表达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我要一辈子歌颂毛主席，一辈子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伟大思想。

一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即使是这一点成绩也完全是归功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归功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归功于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所进行的伟大革命，归功于政府干部对我的教育。我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也进一步清算和批判了过去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崇拜"名、洋、古"的错误。更坚定了自己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

务的决心。

但是，在这个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我仍旧经常地表现出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旧文艺界的思想、工作作风对我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深刻的，它时时都要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在我的思想深处仍有轻视工农兵新文艺，特别是轻视群众文艺的反动观点，我虽然在口头上或理论上承认群众的文艺是革命的、新鲜活泼的、朝气蓬勃的，有创造性的，但又觉得它们缺乏“艺术性”，“形式粗糙”，“内容简单”，仍旧是欣赏那些所谓“大型的”、“正规的”东西。甚至在自己可能的条件下还要追求自己喜爱的那一套东西。我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宣传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但在许多实际表现上却是个人高于一切，多占了自己的一点休息时间就有怨言，多演了几场或冷一些、热一些就叫苦叫累。在工作中，也有摆老资格，“我说了算”的恶劣作风，这种资产阶级“专家”作风正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打倒的反动东西，而在我的身上却仍表现出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严重的自高自大的表现，甚至有恶劣的突出个人的表现，这种把自己当成“英雄”，把群众当成“群氓”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动文艺家最典型的反动思想，早已应该坚决抛弃，但是在我的身上至今还表现出它的影响来，就可见我的思想还是极其反动的。

总括起来说，台上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台下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台上演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形象，台下表现的又是浸透着个人主义意识的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用一句文艺上的话来说，就是“二重人格”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清醒地看到自己在思想改造上还很不成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还差得很远。

我必须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在新的一年中，踏踏实实地在用字上下功夫，时时批评自己，经常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决不能够忘记思想改造的严重任务。

六、68年11月，我们从北京调来清河以后，两个月来，我的情绪虽然一般说来还是比较稳定，对当前的大好形势虽然基本上也有正确认识。但是当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些的时候，考虑个人就比较多，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就又表现出来了。我曾考虑到营养差

一点，身体会坏，看到自己瘦了一些、又担心日子长了，旧病会复发，甚至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浮肿，劳动上干劲不足了，工作上劲头也不大了。……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己经不住考验，学了毛主席著作，一到实践就完全不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这是值得我今后严重注意的问题。

七、在总结68年一年的思想改造时，我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收获和成绩，又一方面看到自己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我的检查是很不深刻、很不全面的，仍然犯了成绩看得多，缺点看得少的毛病。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对新的一年是有信心的。不管我的思想改造还存在着怎样多、怎样严重的问题，但是整个形势推动着和鼓舞着我加速世界观的改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一定在新的一年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养成学用结合，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好学风，切实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争取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于人民有益的新人。

1968年12月31日

汇　报

杨路 1969.1.29

一、昨天(1.28)晚饭后学习前休息时间，杜高在组里聊他过去在朝鲜见到的事。他聊得很多，其中问题不少，我听到如下几个问题：

1)杜高说："本来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有许多民工参加，后来这些民工全都逃跑了。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战争！他们都怕得要命，一个单位的民工常常在一夜之间就跑得一个不剩。所以后来就不用民工了。"

这种言论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是完全违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杜高说："我在东北见到了很多缺胳膊断腿的志愿军伤

员，有不少四肢都没有了。他们之中有的连一个美国人也没见到，一枪也没打，四肢都冻坏了。有的人见到我直哭！”有人问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他说：“何止几个，这样人太多了，大批的，都集中在东北××地方。”

2)杜高说：“板门店正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苏联的火箭炮‘卡秋莎’运到了，我们用火箭打美军，四十里之内一片火海，烧得它没有办法，第二天赶快就在停战书上签了字。”

这是严重的错误。这里把朝鲜停战的决定因素说成是苏修的火箭炮决定的。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的教导，同时这是公开为苏修张目。杜高的上述修正主义观点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当时有好些人政治嗅觉不灵，如陈平、周盛雨等都没有注意到他谈话中的问题。可是另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今天在工地田世忱就问我这事，他说有人和他谈了。其实我早就听出来了。

二、调来清河后，杜高表现出不少对于生活不满的情绪，例如：

1)他曾经发牢骚说：“现在又不是自然灾害的年代，这几个教养分子的供应怎么也好办，也能解决。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生活上把我们抠得这么紧。”

2)他曾说：“不能把我们和他们那些新教养的一道看待，他们两三年就出去了，生活问题能克服，我们十多年了，生活这么样哪行？”

3)他曾到处散布恐慌情绪说：“李洪奎又浮肿了，看起来非让家里寄点吃的不可。”最近又说：“听说军代表批示，我们保持原定量不动，这可够呛！”

4)关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作，他多次在组里表示不愿意干下去了。上次排演话剧时他对我发誓说：“这次我坚决不干了，我要再干，我是你儿子！”

5)平日在组里聊吃聊喝，他是最严重的一个。他经常宣扬他过去多阔，上什么什么大饭馆，喝什么什么名酒，什么什么大人物请他吃饭之类。

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心得

——在大好形势下，加速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杜高(1969年)

一、一九六九年，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将是光辉的、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一九六九年开始的时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正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

(1)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现正处在斗批改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1969年将取得彻底的全面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对他的流毒继续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根本，清除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都有极其伟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

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教导指引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历史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教育、改造文艺、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这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革命纲领，是防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用和平演变来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本措施，是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的

保证。现在，在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部门里，已经彻底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旧局面，清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层建筑各部门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广大革命群众从伟大的革命运动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创造性和智慧，如烂漫的山花盛开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的以革命带动生产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工农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1968 年我国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大丰收，工业战线上捷报频传，特别是 1968 年末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标志了我国科学研究和工业发展的新的飞跃。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我国国防力量的强大。

在我国正在发生着的这一系列的伟大革命变化中，在我国所取得的这一系列伟大成就中，最根本的变化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统帅着一切和改造着一切，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变成了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七亿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都化为广大群众的实践，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正从胜利走向胜利，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

(2)毛泽东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世界革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对世界革命人民的鼓励，中国的空前强大对世界革命人民的有力支持，这些都推动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使世界革命呈现出了一派大好形势。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面临着不可解救的危机。美国人民正在觉醒，工人罢工，学生运动，黑人斗争都标志着美国人民反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内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使美国反动统治阶级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中。美国的财政金融危机已日益严重，由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大量增加军事费用，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大逆差，美元信用破产，并因此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

危机。经济总危机的乌云正压在美帝国主义头顶上。——美帝国主义所面临的不可解救的政治和经济的困难，美帝国主义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惨境，已经从新上任的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中充分地反映出来了。

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想念毛主席，向往中国，在中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它们也越来越看清苏修集团的反革命面目，越来越坚决地采取了革命的行动，苏联斯大林小组的传单就是一篇代表了苏联革命人民的声音的声讨叛徒集团的革命檄文。

最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举行声势宏大的示威游行，奋起反抗苏修的军事占领的革命行动，就更进一步地标明了东欧人民的觉醒，和苏修叛徒集团的必然灭亡。苏修对东欧人民的侵略和掠夺，必将激起东欧各国人民的更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最终埋葬它。

美帝和苏修这两个世界人民的最大的敌人正在加快地烂下去，世界人民的革命烈火却在一天比一天燃烧得更炽烈，毛泽东思想正在指引着世界人民的斗争。这就使世界革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好。

处在国内国际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欢欣鼓舞，都不能不信心百倍，都不能不斗志昂扬。我更感到在新形势下加速思想改造的迫切性，争取更快地改造好自己。

以上，是我通过元旦社论的学习，对国内外形势的粗浅的认识。

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英明政策的感召下，加速改造，重做新人

学习元旦社论时，我们着重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对敌斗争的最新指示。

毛主席教导说："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指引着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航道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对敌人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稳、准、狠

地打击了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威力无比，我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一个右派分子来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加倍地感到只要加速改造重做新人，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宽大，得到新生的机会。

我认清了当前的形势，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伟大正确，我不愿意再做人民的敌人，我要立即从反革命的阵营中跳出来，向人民低头，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清算过去所犯的罪错，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积极劳动，刻苦锻炼，用自己改造的实际表现向人民证明自己真心悔改，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

在学习的过程中又读到了刘凤平的爱人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的来信，更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更受到了政治上的鞭策和鼓舞。

刘凤平的爱人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通过阶级斗争的实际考验，通过在群众监督下的劳动改造，对自己的右派罪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她向革命群众深刻检查批判自己的罪行，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胆揭发了阶级敌人反革命言行，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她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右派立场，转到人民的方面来了。因此受到了群众的宽大，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光辉政策，摘掉了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一个活的事例，具体地体现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政策的革命威力。这一个事例在我们队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我们的改造。

我从刘凤平爱人摘掉右派帽子这一事例中联想到自己的改造表现。我首先想到自己在十一年来的劳动教养中，没有像她那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没有像她那样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深人地认识和批判自己的右派罪行。

我在有的时候对自己教养时间长、问题得不到解决抱悲观消极的情绪，看不见自己的光明前途，认为自己的错误严重，又受到了教养的处分，是永远不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和原谅了。有的时候又因为教养不能解除而产生急躁情绪，甚至错误地埋怨政府不管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改造成绩，认为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可

以解除了。这两种思想情绪的表现，都反映着自己对待思想改造的错误态度，都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

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十一年前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党给我教养的处分是对我的宽大和挽救，是留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自己只有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而决没有理由埋怨教养时间长，更不能对党和政府有半点不满情绪。

从时间上来算，改造确实是不短了，已近十一年之久。但从思想实质上来看，从思想转变的过程来看，就更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改造程度距离人民的要求还很远。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自己的思想改造虽然也有一定的收获，但并没有真正狠触灵魂，并没有真正从世界观的最根本点上改造自己，特别是并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己的真正的思想改造方才进行了两年多，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犯过严重罪行、受过资产阶级思想长期腐蚀的人来说，非要狠下功夫，经过十年八年的艰苦磨炼才能得到解决的，有什么理由抱怨时间太长呢？

同时，我又检查到，自己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改造态度就端正一些，情绪就稳定一些，而到条件变得稍稍差一点的时候，情绪就要发生波动。去年底刚调来清河时，因为生活环境有了一些变化，我的情绪也就不如在团河时稳定，考虑个人多了，对自己的要求就放松了，私字一抬头就要挤走毛泽东思想，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毛泽东思想在自己的灵魂中扎根还不深，或者简直就还没有扎根，口头上的毛泽东思想、文字上的毛泽东思想都并不能证明在自己的灵魂中和行动上已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所以我深深感到自己同刘凤平的爱人比较起来，改造的程度是相距甚远的。

但是，历史是永不停息地前进的，大好的形势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英明指示响彻在耳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感召着每一个犯过错误而愿意改正的人，感召着每一个对人民犯过罪行而愿意回头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也感召着我，我只有加倍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清算自己过去的罪行，不断检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切切实实在用字上脚踏实地地下功夫。

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1969年，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将是十分重要、光辉的一年，而对于我的思想改造则更是具有关键性的一年了。这里说的关键性，就是：在这一片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在全国人民毛泽东思想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和巩固的大好革命形势下，我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的思想改造的整个进程，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好的客观条件，即外部因素，现在摆在自己的面前就是看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句话，就是看自己的内部因素如何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在思想改造上，自己的决心，自己的努力是主要的，不下决心，不严格要求自己，外因再好，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外部因素可以促使内部因素的变化，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来加速自己的改造，使内因和外因、客观和主观完全统一起来。我一方面认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刻苦的过程，在这里，任何自满、急躁、停顿、放松都是错误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像过去那样消极，等待，"反正是长期的，慢慢来"，而是要乘大好形势，充分运用大好的客观条件，以毛主席教导的"只争朝夕"的革命进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不是不可以在更短更快的时期里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因此，我有信心，也有决心，以更大的努力，争取在今年，使自己的思想面貌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使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一个飞跃。

怎样做，怎样改造？根本的一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统帅自己的一切。"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在学习中联系自己检查，看到自己在许多具体的表现上，思想和行动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而由资产阶级思想统帅着。我反省自己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就一定是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来统帅，在这里是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在思想改造上是不能允许有任何一点折衷主义的。因此，我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是一个极其坚决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战斗口号，只有用极其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才能实现它。

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自己的思想改

造的一切呢？我结合自己今年改造的保证，又想到如下几点：

1. 要不断加强和加深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敬仰，要不断培养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要经常回忆对比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经常想到毛主席对自己的恩情，经常想到党对自己的培养，而自己又怎样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不起毛主席，加深对自己罪错的认识，又要通过教养十多年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挽救，看到毛主席给自己指出的光明前途，这样来加深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

2. 要不断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把热爱毛主席的革命感情提高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提高到毛泽东思想新时代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时代的旗帜。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首要的就是要刻苦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思想和理论。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不管生活劳动怎样紧张，不管在任何条件下，每天都要学毛主席的教导，自觉地把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3. 要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教导和指示化为自觉的实践，也就是要在用字上真正下功夫。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克服学用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资产阶级不良学风和虚伪态度是最首要的，要时时想到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要斗“私”字，有了私，就决不可能对毛主席忠，也不可能真正建立革命好学风，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4. 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不忘自己头脑中、灵魂中的阶级斗争，不忘充满在我们改造生活中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学会运用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的言行，对周围的现象，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特别要警惕自己长期所受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影响的各种表现，坚定自己的立场，不犯错误。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是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经常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头上也喊着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要善于识别，要看清本质，不要上当，这样自己才能不犯错误。

我想，对我来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要从以上四个大的方面具体实践，再落实到自己所已经订下的今年改造的具体计划，从学习、劳动、纪律，服从管教、生活、作风等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检查自己，虚心听取同学的批评意见，经常做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有错就改，决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我想只要这样持之以恒地、脚踏实地地做，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不会流于一句空话，世界观的转变也就会有实际的内容了。

我通过公报和元旦社论的学习，思想认识有了一些提高，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改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 1969 年开始的这个光辉的时刻，我怀着无限感激，敬祝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杜高 1969.2

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

——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材料后的感想

杜高(1969 年)

每当我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革命实践的历史资料，每当我听到歌颂毛主席四个伟大的讲话，我都禁不住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产生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感情，我久久地仰望着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慈祥的面容，看到毛主席在向人民招手，在向人民微笑……每当这时候，我就更加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毛主席的像前低下头去，痛悔自己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犯下的罪过。……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您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岁月里，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手，驱恶雨，拨迷

雾，驾驶着中国革命的航船，沿着最正确的航道，乘长风、破巨浪，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您，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不调和的斗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全体革命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最最光辉的新阶段。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是一个出身在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弟，我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您的队伍，追随您革命。是您，把我这样一个出身在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年，从旧社会的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中解救出来，让我幸福地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是您给了我最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是您培育我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期望我为人民做出贡献。但是我啊，却完全辜负了您的培育和希望，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腐蚀下，一步步走向了反革命的罪恶道路，在十一年前，中国社会两个阶级严重搏斗的时刻，我终于充当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急先锋，对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我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之后，您又以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广阔胸襟，亲手制定了英明的改造政策，在您的光辉政策的指引下，人民不仅对我不记私仇，不给报复，不从肉体上消灭我，反而给我以耐心的教育，给我安排了各种良好的学习和劳动的条件，给我留下了脱胎换骨、彻底改造世界观，从坏人变为好人的机会，您老人家又给我指明了出路，向我指出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的光明前途。毛主席啊毛主席，想到这些，又怎能不更加感激您的恩情，怎能不更加拥护您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怎能不更加热爱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最重大的革命课题，确保了我国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您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给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指明了方向和作出了最光辉的榜样。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啊毛主席，是这一场伟大的革命，真正地挽救了我，改造了我，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风暴，猛烈地触动了我的整个灵魂，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雷霆万钧之力轰毁了资产

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这场伟大的革命所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烧毁了剥削阶级的一切腐朽丑恶肮脏的东西。毛主席啊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了改造自己唯一有力的武器，您的思想的光辉照到了我的心里。读了您的书，我才知道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我才开始对过去自己所追求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知识学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当精神贵族感到可鄙可恨，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到做一个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的劳动者是最光荣最高尚。读了您的书，我才在两年多来的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仇恨，加深了对十年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痛悔。读了您的书，我才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热爱，而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行，就是要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每一次读到您为革命为人民献出六位亲人的感人的事迹时，我每一次读到您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在延安的窑洞里为革命为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的光辉史料时，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是最无私的代表，您自己就是"老三篇"的最光辉的化身啊。而我过去却完全违背了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被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了，我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我披着革命的外衣，暗地里纠集小集团，散布反党的流言蜚语，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我的心里，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用血汗养育了我，给了我知识和文化，我却用它来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把知识和文化当作谋取个人名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在我改造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照顾，受到宽大的待遇，但我却仍经常埋怨生活苦，条件差，仍然留恋过去那种挥霍享受的糜烂生活，我仍然从个人的要求出发，不顾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埋怨教养的时间太长，叹息自己的年华在改造生活中度过。……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所有的这一切，怎么对得起您的六位亲人，中国革命的六位烈士呢？又怎么对得起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在整整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却历尽的



千辛万苦和伟大的革命实践呢？毛主席啊毛主席，想起了革命先烈为人民洒热血抛头颅，想起了您为人民吃大苦耐大劳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这样一个对人民有罪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个人打算不能抛弃，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呢？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是我这支渺小的笔永远也写不完的，您的恩情是我一生一世也诉不尽的，您是光焰无际的红太阳，您的光芒照耀全世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心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没有别的能力来报答您的恩情，我只有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按照您的伟大教导，一辈子改造自己，一辈子向工农兵学习，一辈子当一个普通劳动者，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我要一辈子歌颂您的丰功伟绩，用我的全心灵的热情歌颂您的伟大革命实践，一辈子宣传您的思想，让您的光辉思想千秋万代照耀全世界！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

（1969 年 4 月）

姓名：杜高　性别：男　年龄：39　民族：汉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　籍贯：湖南省长沙市

有何疾病：肺病　本人成分：旧职员

家庭住址：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园岭 130 号

收容前职业：戏剧创作协会作家收容时间 1958 年 4 月 18 日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亲　李仲融　68 岁　南京政协委员

母亲　陈璧登　65 岁　民盟盟员

兄　李桑牧　41 岁　文学工作者

简历：

自幼上学，45 年至 48 年历任贵州、《湖南日报》、《中国日报》

记者、编辑等职，48 年至 49 年 2 月在伪青年军任职，49 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53 年调中国剧协创作室，58 年收容教养至今。

案情性质：右派分子　原报请劳动教养的单位：东单分局

原来劳动教养理由：

该人 1945 年至 1949 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 1949 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 1952 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朝鲜人民军拉中共代表团女同志的裤子"，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后纠集小集团残部向党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污蔑党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也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现在何处执行劳动教养：清河支队劳改二大队四中队

收容后的表现：

该人通过政府多年来的改造教育，尚能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政治态度有明显的转变，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热爱和拥护。例如他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解放前为蒋匪做了反动宣传工具，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右时书写反动文章，向党猖狂进攻，这都是反党活动，政府教养我是应当的。"通过文革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其政治态度有了转变，例如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识，他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就是老三篇的化身，而我过去完全违背了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是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

了我，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等。该人并用自己的专长，热情歌颂毛主席，编写了许多小节目歌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演出后很受欢迎。尚能靠拢政府反映情况，如汇报姚志成缪光千等人的情况。能遵守纪律，努力劳动，其身体有病，能坚持劳动，态度较端正，能尽到力所能及。

解除劳动教养的理由和安置意见：

提议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回原籍。

清河农场管理处劳改二场(公章)

1969.4.22

军队意见

同意解除摘掉右派帽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
劳改支队清河农场(公章)

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征求意见回原籍。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
劳改支队(公章)4.23.

备考

填表日期：1969 年 4 月 20 日

1969 年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送回原籍的材料

(编者注：原件缺第一页，估计是姓名及右派罪行等登记材料)

教养期间的改造表现

该人自教养后经过政府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罪错逐步有了深刻的认识，曾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解放前为蒋匪做了反动宣传工具，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右时书写反动文章向党猖狂进攻，这都是反党活动。政府教养是应当的，我一定好好接受改造。因为我有肺病，政府照顾我不叫

我干重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我一定安心改造。"又说道："过去几年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总是把它当作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经过政府教育和学习，现在才真正认清我过去小集团的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认清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由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在实际表现上是服从政府的管教的。听领导的话。"该人在 1968 年总结写道："随着'文化大革命'所开展的革命大批判的深入，随着 68 年年初全队认罪学习的开展，随着斗私批修的学习，我对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罪行对曾经严重腐蚀了我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认识加深了，痛恨强烈了。在这一年比较彻底地从思想上解决了认罪的问题。这样就使我在一年中更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更安心改造，更遵守各项纪律服管服教，而且也就促使我更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这一年中运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清算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运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源，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我过去的言论思想和行动。我不但思想认识提高了，不但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危害性和反革命性，而且从感性上也开始真正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犯了罪，是党和人民的罪人。这样我也就越加迫切地要求自己快些改造好，在往后的半生中以赎罪的心情要为党和人民更积极更忘我地做一点工作。"该人在改造中尽到自己的能力大力做宣传工作，在中队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经常做些编制小节目以做宣传。如在总结中写道："在这一年中在政府的领导下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取得了一点成绩，我创作了剧本《为人民服务》《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后又创造一些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型话剧《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我并在舞台上塑造了张思德、白求恩的艺术形象，扮演了《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这些作品的演出对观众教育和鼓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该人通过学习改造态度端正，对我国的大好形势有一定的正确看法，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表示拥护的，对伟大领袖毛主

席是热爱的。该人在毛主席四个伟大的学习中写道："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是最无私的代表，您就是老三篇的化身，而我过去却违背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被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了，我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我披着革命的外衣暗地里纠集小集团散布反党的流言蜚语，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我的心里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用血汗养育了我，给了我知识和文化，我却用它来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把知识和文化当作谋取个人名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在我改造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照顾，受到宽大待遇，但我却仍然经常埋怨生活差，条件差，留恋过去那种挥霍享受的糜烂生活，我仍然从个人要求出发，不顾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埋怨教养实践过长，叹息自己的年华……"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较积极，如其谈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经常学，认真学，联系思想地学，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深深感到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就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事，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

该人靠拢政府属于一般，也能够向队长反映情况，但不很积极主动。但一度反映过姚志成、缪光千等人的情况，能够展开向坏人坏事进行斗争，敢大胆揭发问题。遵守纪律较积极，违犯纪律较少，教养以来能够服从管教，接受改造，听从队长指导，叫干什么干什么，表现很规矩，也从来未顶撞过队长。

劳动态度端正，虽然自己身体不很强，但能尽到力所能及，能够完成一般定额，在劳动上较主动，质量要求严格，做的活较细，但一度劳动主动性差，有病坚持性差。但该人在义务劳动表现好，并受到表扬，但重体力活干得较差。

根据本人在改造中能够认罪认错，在改造表现较好，端正改造态度，在教养期间能够大量编写节目，主动出演，宣传毛泽东思想较积极，取得了突出成绩，故提议摘掉右派帽子送回原籍。

队长　王延清

副政指　于增仁

副队长　王荣胡

附录一：

关于杜高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杜高　原名：李传惠　笔名：土低　湔非　DK　晓里等

男　1930年生　湖南长沙人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

解放前在国民党《湖南日报》、《力报》，南京《中国时报》等反动报馆任编辑、记者、采访主任等职，1949年于上海青年团少年部参加革命。同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做过编辑、文工团员、创作组员等工作。1954年到剧协创作室工作。

杜高1955年肃反时被审查，因参加"小家族"小集团问题和错误言论受降两级处分，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因为反动性小集团"小家族"翻案，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被划为极右分子，并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经调查核实：杜高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确与几个气味相投的青年常在一起，谈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散布一些错误言论，发泄因肃反受审查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根据中共中央55号文件精神，我们认为：杜高在1957年反右前后虽然有不少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不应认为就是反动性小集团，也不存在"小家族"问题。因此定杜高为极右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销原结论和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文艺九级）级别待遇。安排适当工作。亲属及有关人员档案中有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撤销。

改正后的工资一律从1978年10月1日起执行。

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小组

1979.1.17

中国共产党中国戏剧家协会

总支委员会（章）

附录二：

中共文化部党组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二流堂”的问题，1955年肃反期间，原“文化部五人小组”曾对其进行审查，并于同年九月六日，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作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央未批示）。当时对所谓“二流堂”的具体情况，缺乏全面了解，故把“二流堂”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同时又引出由“二流堂”派生的所谓“小家族”，使不少同志在政治上受打击和歧视，受牵连的人则更多。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所谓“二流堂”和所谓“小家族”长期进行“专案审查”，其矛头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的。为此，不少同志被抄家、被关押，甚至祸及亲戚朋友。

经过近年来的反复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在白色恐怖下，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场所。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同志，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没有发现一个是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的。

为了拨乱反正，党组已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出（79）文党字第99号一文：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至此，凡因所谓“二流堂”和所谓“小家族”等问题而受审查以及受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予以改正。撤销过去强加

于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现将文化部党组(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一文送上备查。

至于原"中央专案组"中有关"二流堂"问题而受审查的唐瑜、吴祖光两同志，我们将按照此"通知"的精神，分别予以结案，不再一一呈报备案。

当否，请批示。

附件：文化部党组：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日

抄送：中央宣传部

